中国精英是怎么样被毛泽东毁灭的？

第 0 篇 序言：中国精英是怎么样被毛泽东毁灭的？【1】

本书揭露了大量精英人物被毁灭的事实，善良的人们自然应该进一步追问：如此大规模地毁灭精英人物的根源何在？

第一、出于极权制度的本性。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的发源地是意大利。首创人墨索里尼宣称："我们是一个能控制一切能动力量的国家。我们控制了国家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道德力量……,总之，控制了一切。"可见极权制度实际就是集权制度，把一切权力集中于某一个政党，最后必然集中于某一个人。集什么权？首先当然是集个人行动自由权，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其次，还必须集言论自由权，不允许七嘴八舌，更不允许质疑、反对的言论存在。

为了维持以上两方面的集权，还必须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甚至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这样就可以做到："不听话者不得食"，迫使每个人俯首帖耳、恭听圣裁。

最后还要集中每个人思考的权利。为此必须编造一套神话，把某个领袖人物神圣化。神化领袖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权利，集中到他手里，任他摆布、调配。因此，不允许任何异端思想，甚至是异端的苗头，都必须掐灭在萌芽状态。

对于集权制度来说，什么人最危险？普通老百姓不过是墙头草，随风倒。只有那些读了书、明白事理的文化人，或曰知识分子，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敢于思考，随时随地都可能构成对权威的挑战和对集权制度的撼动。这就是知识分子所谓‘原罪’的由来，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罪，就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能思考。老子就明明白白地说过："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历朝历代的专制君王都对文化人千方百计地提防、戒备，以至于胁迫、监禁、消灭之。即使不得不使用时，也必须在使用中提防，在提防中使用。

到了毛泽东时代，集权专制制度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进一步打击文化人，从而维护这种集权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毛泽东发明了一个独特的理由：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从形式逻辑来分析就不通：知识的多与少，是文化水平问题，是事实判断；而反动与否则是政治倾向问题，是价值判断。前者有明确的标准，可以量化，后者则没有明确的标准，难以量化。因此也最容易被人从主观偏好出发随意定性。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东西，何来因果关系？其实，这其中还应该有好几个‘中间环节’被故意省略了。完整的因果链条应该是这样：知识越多——辨别是非能力越强——盲目性越少——越难驾驭、摆弄、控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危害越大——于是扣上‘反动’帽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把完整的因果链条明说出来呢？因为中间那几个环节是不可告人的，属于统治术的秘诀。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句话背后的险恶用心了。正因为如此，早在 1925 年，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知识分子列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势力。只是后来形势发展、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在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以至于面目全非了。虽然在文字上可以改动，但牢牢扎根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烙印在他脑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对知识分子敌对情结却没有、也不可能删去，始终伴随着毛的一生。第二、毛泽东变态、扭曲的报复心理，更加重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残酷性。

在 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个发言。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是坑了 460 个儒，我们坑了 46000 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 100 倍。"

老毛承认在坑儒的数量上超过秦始皇 100 倍。其实，除了在数量上超越秦始皇（不是 100

倍，而是几千万倍）以外，在坑杀知识分子的技巧和手段上也多有创新，为历代暴君所望尘莫及。

创新之一是：先辱后杀。知识分子大都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条，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毛泽东则别开生面、大胆创新。他开始声称：‘大部分不杀’，让这些人先感恩戴德一番，然后进行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自诬、自污。经过多次、反复的自我羞辱和互相羞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早已荡然无存，成为一堆行尸走肉，只有向新政权乞怜了。再通过惩罚性的超负荷劳动，从肉体上折磨你，让你在“早日改造好，重新做人”的诱导下，大量透支体力和生命。多少人正是在这样长期的超强的劳动折磨下，加上恶劣的伙食，一点点地消耗掉自己的生命。毛泽东不承担‘杀人’或者说‘坑儒’的罪名，却收到了‘杀’与‘坑’的实际效果。

为什么要如此折磨别人呢？或者说：毛泽东这个发明创造的灵感来自何处？毛泽东终其一生，手不释卷，勤奋苦读。据说：那卷帙浩繁的 24 史就读了若干遍。对于历朝历代宫廷秘闻特别是权力争夺，比如父子相残、兄弟操戈、妻妾争风，乃至夫妻互斗等等血腥惨案，几乎全部了然于心。他不会不知道：2000 多年前的吕雉曾有过一个发明创造。

话说当年汉高祖刘邦生前特别宠爱年轻貌美的戚夫人，身为皇后的吕雉早就恨入骨髓，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等待时机。一旦高祖驾崩，机会终于来了。她下令把戚夫人断其手足，挖去眼睛，令其服哑药，置之厕所中，名曰‘人彘’（即猪）。眼看着昔日的情敌求生不能，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死；以至于人不人、鬼不鬼。这个虐杀情敌的残忍手段非常典型，故史书多有记载。流传至今，当然会引起电影界的关注。80 年代末李翰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就把这一情节移花接木地嫁接到慈禧太后的身上，由影星刘晓庆扮演慈禧。

毛泽东最善于借鉴古人，无疑是‘古为今用’的高手。对于吕雉那一幕血腥的虐杀场面，读后不会不动心。当他君临天下、面临如何处置昔日敌人这个新课题时，为了把文章做得更生动、更精彩，自然要借鉴、借用了。

据毛泽东自述，早年曾经受到过大知识分子的冷遇和轻慢，心理上长期压抑，愤愤不平。一朝权在手，当然要报复。采取什么手段呢？借用吕雉的手段自然成为毛的首选。原因在于：老毛和吕雉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如狂热的政治野心、强烈的报复心、从虐杀中获得无限快感的变态心理等等。面对着昔日的敌人今朝却匍匐在自己的脚下，痛苦地挣扎、呻吟，卑微地认错求饶、乞怜，以苟延残喘。他（她）们同样从中获得了无穷的快感和极大的心理满足，也算是报了昔日之仇，了却心头之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毛泽东的名言，也是他的人生哲学。看来毛泽东比秦始皇高明之处不仅仅是杀人数量远远超过之，更重要的是在杀人之前，先让对方扮演一个卑微可怜的角色，活受罪、受活罪，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耗其生命。如此虐杀敌人，远比秦始皇一坑了之高明多多、也恶毒多多。

区别在于：当年吕雉仅仅对特定的对象进行报复，而毛泽东则无限地扩大了报复的范围，殃及所有无辜的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男女老少，无一幸免。其残忍、凶狠、疯狂，都是吕雉当年所无法比拟的。

毛泽东第二个重大创新在于：物尽其用。把这些昔日的仇敌，在他们死亡之前，让他们从事那些高度危险、艰难、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不需要任何报酬而又特别听话、彻底驯顺的劳动力，是中共夺取政权后从事所有危险、艰苦建设工程的主要人力资源，既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逼迫敌人、消弭其斗志和思考能力。真是一举多得。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把这些人生命的使用价值挖掘、发挥、利用达到极致，古今中外，无人企及。

许多民族精英正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超负荷地透支体力和生命，最终魂归西天。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包括重大工程、粮食、…….既满足了建国初期物资极端匮乏之时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替换了许多危险作业中其它劳动力，避免了其它劳动者伤亡的代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精辟地论证了古代奴隶制度下奴隶劳动的伟大意义。他写道：

“只有奴隶制……从而为古代的文化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恩选集》3 卷 220 页）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大批量的现代奴隶，就没有新中国建设的一切成就。几乎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设中，都会有那些现代奴隶的足迹、血汗和尸骨。这些被无情地打入另册的现代奴隶，为了国家各项建设工程，既流汗、流泪，更流血；既奉献青春，更奉献生命。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共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宣扬的建设成就绝大多数正是建立在无数现代奴隶的累累白骨之上。

本书中所记录的正是这些民族精英在无助、无奈情况下，折磨致死的具体情况。他们的被毁灭，是中华民族人才宝库中无可挽回的恶性损耗，这个损耗需要几代人连续不间断地拨乱反正、改弦易辙、兢兢业业才有望弥补于万一。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惨剧。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立此存照。让世界人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些精英们的悲惨遭遇。更永远牢记那个处心积虑地毁灭他们的屠夫和凶手的血腥罪行。

出版人序言

读者们看完《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后，相信一定会悲愤填膺，为文明的中国曾经历这样一个无法无天，人命如蚁的悲惨时代而悲哀。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荒唐残暴的事件，竟可以在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广泛发生。固然，毛泽东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残忍性格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编者希望能够从较深层次探讨这现象。

应该看到，精英被中共政权直接处死者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精英是被广大的人群，在革命的口号下被当权者煽动，群起围攻，迫害致死的。那就应该问，为什么这种荒诞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行，广大的群众竟如同群氓，其中应该有其更深刻的因源。

首先，最根本的因源是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即党天下，它在本质上是中国几千年极权专制制度的延续。编者认为。中共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基本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如历代农民革命一样，胜利者的意识是以一个新皇权取代旧皇权。新政权尽管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号，但专制王朝的思想依然不变。中共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为了争取群众，特别是争取民主知识分子，作为同盟军，在口头上承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提出共同纲领，甚至为针对国民党而提出“一党专政遍地成灾”的口号。但在胜利后，这些先前同路人，便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彻底清除。只有这样，才能使极权专制制度在革命的外衣下得以延续。

为此中共在 1949 年推翻国民党后，便在全国范围推行彻底消灭反对势力的各项运动：

1950 年首先在全国实施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富农阶级（农村精英）

1952 年起在全国城镇（乡）先后推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地方势力和宗教势力。（社会地方精英）

1953 年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基本上消灭了民族工商业。（工商界精英）

1955 年进行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消灭了隐藏的反对势力。至此，在国内阻碍中共实行彻底一党专政的只有民主知识分子，特别是其精英分子了。

在建国后的首届政府机构中，安置有不少的民主党派人士，他们都曾在不同战线上和中共协同作战的民主精英，虽然这些人有职无权，只作花瓶摆设，但不免心怀不忿，有时亦指指点点，始终碍事。

在社会上，西方民主思想及其代表，民主知识分子，仍在社会思想上占重要地位，这些都成为共产党彻底实行一党专政，君临天下的障碍，于是中共发动以消灭西方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反右运动，随后发动更大规模清剿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历程。

在清除异己的方法上，中共较历代皇朝高明，不是采取直接杀戮，而是广泛煽动群众，假群众之手，清除异己。

中共之所以能够运动群众，并非源自其精神号召力，而是依靠专政机器。以各种苛政迫使广大群众在人身和思想上沦为其奴隶。中共对人民的专政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压，二是骗，(就是毛泽东名言：枪杆子和笔杆子)：

（一）消灭人民独立谋生的机会。中共在执政不久，便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消灭了民族工商业，在城市每个人都成为整个国家机器某个单位的一个小螺钉。受到中共的直接控制，离开单位，即离开了中共的控制，就没有谋生的机会。其人身依附性近乎奴隶，只差没有脚镣。所以人们为了生存，便必须成为所谓党指到那里，便打到那里的驯服工具。

（二）在革命的漂亮口号下，消灭中国几千年来的伦常道德，煽起群众最卑鄙的自私本能，驱使群众，为求自保，不分黑白是非，只按当权者指挥，围攻无辜者。甚至自己最亲近、最了解的夫妻，父子，师友。使受害者，孤立无援，精神崩溃。许多人以自残谋求解脱。而沦为打手的群众，则在大义灭亲的革命口号下自我安慰而不自咎。这种倒行逆施发展至今，导致国内道德沦丧，人欲横流。就是除了骗子，甚么都是假，并且祸延子孙后代。这是半个多世纪来执政者对中华民族犯下最严重的罪行。

今天回顾 30 多年前的历史，有人认为现时已经有很大进步了，甚至自诩为“盛世”。但编者认为，只要一党专政的理念不废，中共把自己视为人民的主宰而非人民的公仆的帝王思想不变，社会实质就不会改变。现时对国内出现的民主萌芽组织，仍然格杀勿论，扼杀在襁褓之中，绝不手软。对广泛的社会不满言论，虽未出现偶语弃市的大规模镇压，其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原因是近 30 年来，在经济面临崩溃的压力下实行的所谓改革开放(实质只是回到当政初期的政策)。为广大的民营工商业创造了发展生存空间，也为人民提供了不靠中共仍可生存的机会。执政者已经没有能力为所欲为地运动群众了。而现时的中国在歌舞升平的表面下，还有过亿人民陷于赤贫（温总语）。政制不公，吏治不振，红黑交媾，冤民到处，民怨沸腾，上访洪流，汹涌北京。执政者是坐在火山口上。人民革命只是迟早而已。

编者认为，民主革命潮流如大江东去，不可抗御。其进程取决于人民的觉悟。执政者正极力推行愚民政策，把这些民族惨痛历史列为禁区，不许回忆、不许讨论，企图掩盖历史，欺骗群众。以一切向钱看为利诱，使年轻一代忘记过去，安于现状。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真实历史记录下来，使年青一代知道前辈经历过的黑暗年代和现今政权的本质。要以史为鉴，以社会进步，人人有责的精神，反抗独裁统治，彻底改变政治制度，争取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做出贡献。

第 00 篇导言 及目录

仅以本书献给
所有被毁灭的精英们。
让逝者和生者一道，共同
追究罪责
追讨欠债
追求正义
追寻一个真正的、人民的
共和国！
献给
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我的恩师

叶企荪教授

——岑超南

叶企荪教授是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曾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系主任和及北京大学教授，从他的门下走出了79位院士，当局曾隆重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绝大部分都曾就读于当年的‘西南联大’，都出自名师叶企荪的门下，他堪称为大师中的大师。他的学生、诺贝尔物理科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对叶企荪教授的评价是：叶老师才是真正的“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为纪念这一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清华大学在校园建立了叶企荪教授铜像，2010年12月7日纪念叶企荪的同名话剧在清华大学首演，这是科学家中鲜有的殊荣。

“我们想象：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五十名优秀物理学家、五十名优秀化学家、五十名优秀生理学家、五十名优秀数学家、五十名优秀诗人、五十名优秀画家、五十名优秀雕刻家、五十名优秀作家……，法国马上就要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

（被誉为“圣西门名言”）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1997年时任国家副总理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朱镕基如是说

【其实，朱总理的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过，但由国家领导人亲口说出来，意义却非同凡响，更值得人们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早就存在无数忧国忧民、有志之士的心中，只是由于环境的关系，他们大都明哲保身，‘欲说还休’罢了。如果还有人不明白的话，那么，在读了本书以后，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中国的数学尖子并不是自身欠缺什么，而是缺少机会，缺少一流数学家的指导和熏陶。”

——2000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

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恽之玮如是说

【中国的一流数学家到哪里去了呢？请读本书，答案自明】

目录

第1单元　党内精英

【编者按：为了配合中共建党90周年活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面对上海交大5000师生发表长篇演说。演说一开始，俞先生说了一段‘黑色幽默’。他说：有位大学生去应聘，

对方看了履历表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还是个党员？岂料应聘者竟然这样说：党员怎么啦？党员也有好的嘛！这段‘黑色幽默’表明：就整体而言，中共党员没有好人；只是个别的例外，所以才是‘也有’。

好，现在我们就把共产党内那些极个别的好人摘出来，记述这些好人是如何被毁灭的。既然好人都不得好死，一个个被毁灭，这叫什么？叫做‘逆淘汰机制’。好人一个个被毁灭了，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呢？不言而喻】

1、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死因真相仍然扑朔迷离

【编者按：选择田家英作为第一个党内精英来记述，不是因为他在党内地位最高，而是因为他距离毛泽东最近、跟随时间最长。他对毛泽东的了解最深刻、最真实。因此，他的被毁灭当然具有更深刻的涵义。】

田家英(1922--1966 年)原名曾正昌,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 岁丧父,家境开始衰落；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13 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937 年奔赴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 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时还经常给《解放日报》写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48 年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毛的秘书。此后,深得毛的喜爱和信任。除担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

田家英的工作深得毛泽东的称赞,并日益器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逼近时,毛泽东要田家英另行起草。田家英写出来后,受到毛泽东的首肯；再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开幕词中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广为流传,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从此,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60 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等方面,都做出很好的成绩。因此，毛泽东对他评价日高。1958 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他们之间裂痕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田虽然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中。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距离地观察和思考，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及其内心,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楚、真切。从 50 年代后期始,他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行事更多有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田家英甚至说：将来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 3 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慧眼独具，不同凡响。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思想和言行,因而受到冲击。虽然毛泽东出面保护,得以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很难消除。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由于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必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比如：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奉毛泽东的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却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结论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作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毛对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好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也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从不涉及他人,更不推卸责任。

1963 年 5 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同年 9 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之邀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也标志着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从此，田家英与毛泽东的思路渐行渐远了。

其次，田家英的正直，也是他的书生气。这一点在对《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 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谈话时,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艾思奇得知后，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能随便删掉。”田家英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删去。”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知道后，却抓住不放,给田家英扣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此其一。其二是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 1965 年 6 月 29 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当即明确回答：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又增加了新的罪证。其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

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为此，陈伯达经常向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以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揣摩术’非常反感,公开抵制，并表示由衷的鄙视。陈伯达对他的仇视由此而更加深了。以上多种因素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田的命运就不可逆转了。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十足的人。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却未能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爱憎鲜明的性格,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给予田家英最后一击的是：1966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 月 22 日下午 3 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说话间,深夜里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成为这位善良书生的最终遗言。若干年后，作为知己和同事，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下一首悼亡诗。诗云：

中枢执笔十余年，善察风云好直言；

水暖先知犹在劫，只因佛法本无边。

至于田家英究竟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然是个谜团，扑朔迷离。最初的说法是：5 月 23 日上午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他自己的寓所。后来又有两则更新的资料，其一是：

1980 年 4 月 1 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的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话，给予如实交待的机会。并告知：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1980 年 4 月 4 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待报告。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到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 月 23 日上午 10 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

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报告。

其二是：

另据中办（1980-5100797）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 1978 年 7 月，曾两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前后两则资料都肯定田家英属于‘他杀’，但究竟是谁开枪杀害了田家英？前者认为是内卫失控开的枪，后者则是汪东兴暗示下，内卫开枪。

看来田家英决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至于谁是凶手（内卫还是汪东兴？），困难在于：现场已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复原现场。再进一步说，最后也是最大的凶手是谁，不是昭然若揭吗？

田家英死后，有人报告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竟然这样回答：“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毛的话有两层含义：第 1、我不管；第 2、他死得活该!（另据 90 年代移居香港的作家申渊先生最近经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的《卧榻之侧——毛泽东宫闱轶闻》一书的记载：毛泽东在闻知田家英死讯后轻蔑地说：“死啦，小叛徒一个。”特录以备考）

冷酷无情，以至于此。一个在他身边服务了 18 年，并且屡屡受到表彰的大秘书死了，根本没当会事儿。普通人之常情，即使是宠物猫、宠物狗死了，也应该有点悲悯之心吧？可是毛泽东就是毛泽东，绝不！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那么就让我们找一个相似的例子来比较一下吧！当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是自杀身亡。陈死后蒋介石闻之悲痛至极，两次亲赴陈宅吊唁，后又亲率国民党在京全体政要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事后并亲笔为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文，另外还送上一幅挽幛，题曰“当代完人”，上书“布雷吾兄千古”，下书“蒋中正敬挽”。南京公祭结束后，陈的遗体被送往家乡杭州安葬。

同样是对待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同样是笔杆子，一个是悲痛至极，隆重祭奠；而另一个则冷酷无情、无动于衷。两者对比何等强烈、鲜明？看来毛泽东真是个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

【补白】

毛泽东论宪法：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

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甚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2、彭德怀等：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悲惨下场

1981 年 6 月中共第 11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从 1958 年底到 1959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虽然这段话对当年庐山会议的是非做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但是仍然有许多避讳之词。比如说‘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就纯是虚构的遁词。按照气象学家的调查，那几年风调雨顺，天气很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再一点当时苏联也没有逼债，相反，赫鲁晓夫甚至有意给中国人民部分粮食以救急，但被毛泽东拒绝了。因为饱了老百姓的肚子，却丢掉他毛泽东的面子。在毛泽东看来，自己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更重要。在这个会议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其成员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简称‘彭、黄、张、周集团’。

彭德怀（1898—1974 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原名‘得华’，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15 岁时参加饥民闹粜事件，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做‘堤工’。1916 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19 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某恶霸而被捕，但在押解途中逃脱。

1922 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 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 年 1 月于所在的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 年 1 月升任团长，4 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共；同年 7 月 22 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任军长兼第 13 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交界处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第 5 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 4 军会师。1935 年 10 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一次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大加赞扬：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同年 11 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

彭德怀失宠始于何时？说来话长。自从进了北京城，坐上了龙庭。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见到毛，都尊称“主席”；唯独这个老彭，大概自以为有救驾之功，仍然以“老毛”相称；50 年代初期，中南海经常开舞会，把许多文工团的女孩子找来陪首长跳舞。高干中有的参与，有的回避，又是这个彭德怀，竟然怒斥为“选妃子”。再有一点非常重要：1956 年中共八大时，老彭首先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马上得到刘少奇的同意，刘说：“还是划掉的好吧！”对此，老毛暂时没有发作，但肯定不会忘记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老毛又牺

牲了自己的长子。后来在某次会议上，毛泽东借孔子的话自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其伤心至极。追究起责任来，似乎和彭德怀毫无瓜葛，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再往前追索的话，还有 1935 年 5 月在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请彭德怀出来担任前敌总指挥，也就是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大权。其实，当时就受到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斥责。但在毛泽东的心里，总觉得是老彭在后面捣鬼，‘搞非组织活动’。有了以上陈年旧账，再加上庐山上那封信，好了，新账老账一齐算！

在毛泽东倒行逆施造成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时，彭德怀忧心如焚。曾写下如此诗句：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正是从这种对人民高度责任感出发，他向毛泽东写了那封虽然在当时惹祸，但却流芳千古的信。

惹祸以后的事情如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无情折磨。

先请看‘文革’中被批斗的一幕：毛泽东的爱将、红卫兵的小头头韩爱晶立刻扑上来，一拳打在彭德怀的下巴上，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群红卫兵跟着围了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一连七次，把这个年近 70 的老人，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个穿皮鞋的坏家伙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起来)。次日，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文革”报告：“昨天北航召开有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内伤，彭的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能吃饭和起床……”

为掀起“批彭”高潮，7 月 26 日下午，北航、地质学院联合召开七万人大会。接着，各兵种总部、国防科委、在京军事院校、人民日报、邮电学院等十单位，相继召开批斗大会，彭德怀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受尽肉体折磨和精神侮辱。张闻天和黄克诚、谭政、张爱萍、王尚荣、李志民等著名将领一次次陪斗。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也遭到北师大造反派的“喷气式”批斗。浦安修因为拒绝揭发彭德怀，扁担打在她的肩背上，头被揪着往墙上撞得咚咚响。大批斗的风暴刚过，又开始了更为残酷的秘密“审讯”。这种罪恶的审讯，从 1967 年 6 月 21 日到 1971 年末，据不完全统计，相继进行 150 多次，直到彭德怀一再昏迷，精神完全崩溃。

1973 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监护点联系送到阜外医院，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收……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同样遭到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 301 医院医治。

1974 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疼痛。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就在病重的 1973 年 6 月 10 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尽病痛折磨。1974 年 7 月 21 日，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我实在忍受不了，你帮

我打一枪吧！”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它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它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当医护人员将同意手术的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彭德怀顽强地挣扎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专案组自然不让他随便走动。彭德怀不屈地大声喊：“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他看着彭梅魁，顺从地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彭德怀苏醒过来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1974 年 11 月 29 日 14 时 52 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彭德怀元帅，病故在 301 医院 14 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 76 岁。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彭德怀离世之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1974 年 12 月 17 日，彭德怀的遗体从 301 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 岁，监 0012690。”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因此，他所有遗物都被焚烧，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 62 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张闻天（1900-1976 年），原名“应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共的历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张闻天是江苏省南汇县人，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 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6 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论家，其地位有些像苏共的布哈林，其人生的轨迹亦极为相似。

1900 年 8 月 30 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1914 年考入浦东中学，1916 年，进入吴淞水产学校，1917 年，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读，受《新青年》影响倾向革命。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0 年至 1923 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 年 6 月在上海加入

中共。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1 年 2 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

1933 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 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

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 年 5 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1951 年 4 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 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 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闻天在党内有过重大贡献。当张学良囚禁蒋介石的初期，中共党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一致主张杀老蒋、或“审蒋”，以谢天下，以报多年宿怨（参见 12 月 15 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唯独张闻天力排众议。在发言中提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方向性的总结。为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龙颜大怒时，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见风使舵，及时改变发言的内容。唯独张闻天大义凛然、仗义执言。他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自己站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即使“犯上”也要讲。在他发言之前，了解内情的田家英、胡乔木等相继来电话，劝他少讲。但是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下午。这确实是一篇深刻剖析 1958 年“大跃进”以来错误的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张闻天特别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万万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他竟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才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文革”灾难来临，张闻天当然地被再一次批斗。这次批斗的强度和野蛮程度上，则大大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党内斗争。

1966 年 8 月 9 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 5 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

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 10 个月就有 219 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着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 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派武装人员将张闻天夫妇分别“监护”了 523 天，直到 1969 年 10 月 20 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再次相逢。

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 10 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内一个半山坡的平房瑞安家。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凝思。

他是在进行深刻的反思，自己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得罪了毛泽东？早在 1937 年，党内十几位从事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反映江青的历史，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理由非常充分，他们抬出毛泽东自己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当时审查干部时对阶级成分极为重视。为什么你毛泽东却不遵守，不要贫农出身的老红军贺子珍，而要娶大地主出身的“明星”？那些清楚江青被捕脱党历史的老党员一致同意把信交给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总书记又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大家的意见。

向来特立独行的毛泽东顿时火起，马上决定立即结婚。次日便在合作社摆了几桌宴席，邀请各位同志光临。当然，客人的名单上不会有张闻天，张闻天也不会去赴宴。从此毛、张二人结下了芥蒂。后来再加上庐山会议的发言，好了，新账和老账一齐算。聪明如张闻天这样的脑袋，这点事情难道还想不明白吗？

【编者按：按照共产党的纪律：普通党员或干部，要求结婚，必需向组织申请，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才行。否则就是违反纪律，要受处分。但毛泽东却可以例外。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可以不受党纪的约束。由此可见：共产党经常宣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党员”云云，实在是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 71 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 1971 年 10 月 12 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

1972 年 4 月 2 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 6 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 5 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

1974 年 10 月 18 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它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1975 年 8 月 23 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 45 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 年 4 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

张、刘，1976 年 4 月。”

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请别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1976 年 7 月 1 日下午 7 时 30 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终年 76 岁。

江苏省委当夜急电中共中央，请示丧事如何安排。7 月 3 日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一个方案：“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位领导同志主持，无锡市委一位领导同志讲话。同时草拟了的讲话稿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如此简约的仪式，如此低调的评价，‘上面’竟然不同意。在江苏省委一再催询下，仍然迟迟不予答复。直到 7 月 8 日下午，中央有关部门才电话指示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无锡，《新华日报》发一条消息，刘英由江苏安置。此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反映：遗体告别时如送花圈，写张闻天还是写张普？家属说：“人都死了，还保什么密!”答复却是：‘继续保密’。所以，7 月 9 日下午向遗体告别，“张闻天”这个名字仍然不许出现。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违背人伦和情理，以至于此!

张闻天遗体于 10 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木箱里面。又过了 3 天，7 月 13 日，才在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注销张闻天逝世的消息。这则消息由‘上面’拟定，仅 78 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 1976 年 7 月 1 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 76 岁。”首都报纸一概保持缄默。呜呼!一代伟人，就这样无声息地殒落！他能安息吗?

周小舟（1912—1966 年）原名周怀求，字符诚。湖南湘潭人。

1929 年秋考入湖南大学预科，1931 年秋结业后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 年 4 月，加入中共，不久担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同年 11 月底调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工作。1936 年春奉中共中央指示赴南京，与国民党宋子文、陈立夫的代表秘密谈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8 月，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旋即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曾被派作毛泽东个人代表赴新疆、太原宣传团结抗日，进行统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 年秋调任中共冀中区党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参与领导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1949 年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兼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湘西区党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1953 年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并兼湖南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南军区党委常务委员等职务。1958 年，被补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在“军事俱乐部”这个大案中，周小舟的职务最低，只是个省部级干部。他为什么被牵扯进去呢？说来话长。早在大跃进的年份，人们头脑过热，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却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始终持保留态度，主张公社规模“搞得小些”，对于“共产风”和大搞土法炼钢也非常担心，因此同省委书记周惠等研究决定：停止土法炼钢。从而使湖南多数土高炉没点火就下马了。对于口粮控制也比较紧，没有放开肚皮吃饭。同年 11 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农业会议，周小舟和周惠研究主张实报产量，结果在会上湖南被插了白旗，成了全国倒数第一。第二年，插红旗的湖北、广东、河南等省，反倒要向插白旗的湖南要猪肉、粮食、肥皂……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及其危害，到 1959 年上半年逐步显露出来：基层问题与矛盾成堆，头绪纷繁，周小舟感到在机关听汇报、读文件，似雾里观花，有必要作一次深入的调查，从 4 月 29 日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湘西之行。他轻车简从，微服私访，由长沙出发，经宁乡、常德、永顺……5 月 12 日，周小舟于慈利县给在长沙主持省委工作的周惠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进一步缩小生产单位，允许私人养猪和整顿大食堂。其办法一是只办农忙食堂，二是缩小食堂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周小舟一边检查工作，调查研究，一边着手解决实际问题，仅慈利县 5 天内就解散 1336 个食堂，占全县食堂的 25%，退出食堂的农户占总数的 38.4%。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彭德怀到湖南,他陪同视察了长沙、湘潭等县，并且向彭德怀反映了基层的实际情况。6 月 20 日，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周惠问毛泽东：“这次下去，主席看形势怎样？”毛泽东脱口而出：“我看不错么！”随即他反问一句：“你看形势怎样？”周惠经过一番思考回答说：“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前途还是光明的。”毛泽东一震，忽而笑道：“好，概括得好！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7 月 2 日，周惠抵达庐山，此前周小舟已随毛泽东上了庐山。7 月 11 日晚，毛泽东在住处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当时湖南的情况比其它省份好些，所以毛泽东对“二周”的意见颇为看重，但二周明白越是如此越要谨慎，可“二周”又总觉得去年憋一肚子气，不吐不快，并认为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是非曲直交锋才有好处。因此，周惠说：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小组讨论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毛泽东听了叫李锐也来参加座谈。当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当时气氛融洽。毛泽东说：1958 年有些事，我有责任，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这使在座的既吃惊又感动，周小舟故而谈兴渐浓，口无遮拦，竟说起高指标，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显然这话是针对毛泽东的，说完顿觉不妥，但毛泽东仍很平静，不仅没有引起不快，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据御医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的说：“周是第一个挺身批评毛的地方首长”(见该书第 274 页)“二周”受到毛泽东的召见，在庐山立即“红”了起来，大概受毛泽东谈话的鼓舞，第二天，周惠鼓动周小舟去找彭德怀，要彭总出头向毛泽东进言。彭德怀上书后的 7 月 23 日，会议来了个急转弯，从开始“纠左”突然转向反右倾斗争。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党内斗争，周小舟从未经历过，自然有许多事想不通，心情十分沮丧和沉痛，因此他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有“出家”的想法。

毛泽东最初是对原来与彭德怀有相同看法的人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 月 1 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尤高”，并送了一本古书《与陈伯之书》，想以古喻今，传递他心中对周小舟之期望，期望他“迷途知返”。随后，毛泽东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

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二周相抱而泣，他一再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忙照顾妻室儿女。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

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予‘甄别’。

8 月 17 日,他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以观后效。9 月上旬,他回到湖南接受批斗。后下放基层,任湖南省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 年 6 月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1966 年，十年动乱开始了，周小舟首当其冲。广州梅花村他家的门上，贴满了大字报。接下来是夜以继日的批斗。1966 年 12 月 25 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斗后，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 8 时报到。这一天晚上，周小舟服用了大量安眠药。12 月 26 日早上，人们才发现周小舟已身亡。这一天恰巧是毛泽东 73 岁生日。真没有想到：毛的老部下竟然用这种方式为毛“祝寿”。此时周小舟年仅 54 岁。

还应该提到一点：在疯狂批判周小舟的人物中，有一位他的老部下——华国锋。1959 年周小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才是省委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后因批周有功，才进入了省委书记处任书记，八年后的 1968 年，华终于成为省委第一书记。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在湖北等邻省大刮“共产风”之时，周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不能不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华国锋的文章展开深入揭批。张平化进京后，把华国锋的文章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张平化和华国锋的订交也在于此。而后，当华国锋青云直上时，他没有忘了张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并且许诺以后可以进入政治局。

据传后来有人问过大权旁落的华国锋，您怎样评价周小舟？华长叹一声：难得的一个好人。

黄克诚（1902—1986 年）大将军衔，也是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位列彭德怀之后，张闻天之前，是第二号人物。也是该集团四大骨干当中的唯一幸存者。正是因为他的幸存，才有机会配合胡耀邦等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历史的眷顾。同时，因为黄将军寿终正寝，在‘文革’浩劫中摧而未残、毁而不灭，得以幸存。为了节约篇幅，本书就不详细介绍，仅录其名。

【补白】

美国前总统布什 2004 年国庆节的讲话：

在人类千万年历史中，最珍贵的成果不是令人目眩的科技，不是大师们那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统治者，只有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讲话。

这个笼子有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

3、李达：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未能幸免于难

李达（1890—1966 年）出生于湖南永州。1919 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 年 2 月起任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

一。1922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仍然坚守马列主义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1961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李达来到庐山休养。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见面。上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同时毛泽东也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这一次毛泽东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之后，又建议他"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忘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接受任务后，李达雷厉风行：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毕业生中物色两位优秀者做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随后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该校是全国最早建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高校。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学者和政客之间的蜜月总是非常短暂的。很快就发生了关于"顶峰论"的意见分歧：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而大唱"顶峰论"的赞歌。说什么："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还有一位领导人特地撰写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人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不可能阻止那个时代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宣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给予严厉批评，他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死板？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倒能够出成绩？"李

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不满。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毛泽东未置可否。在杭州会议上，又有人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并请示可否对其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个人再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毛泽东来了个‘顺水推舟’，轻描淡写地说：“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 年 5 月 10 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掀起高潮。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某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补充”，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 月 3 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 月 7 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个人。

从此，李达陷入了无休止的批斗中。最先被“勒令”停止写作，交待自己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的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掐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走。6 月 8 日至 9 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艺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 月 10 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高校中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6 月 13 日，武汉大学 7000 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媒体连续发表长篇累牍的“批判揭露”文章。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 1958 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 月 30 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

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越来越升级、越来越野蛮。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性格倔强的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但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则更大，每一次批斗对其人身和精神的摧残也最重。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他无奈地叹息道：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到了这个时候，仍然念念不忘那个‘毛主席’，是固执，还是愚忠？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使李达身心备受摧残。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每况愈下。妻子石曼华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何其愚也！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那个‘润之’的杰作啊！】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李达的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毫无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一无所知。3天后，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精神为之一振，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强支病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只有19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第二天，李达小心翼翼地用信封把信牢牢封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尽快将这封信送毛泽东。

李达哪里知道，他心目中的‘大救星’已经离开武汉了。幻想不能改变他的病情。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厉害，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时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遭到拒绝。

到了最后，也许是有造反派中某些人“良心”发现，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无法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

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补白】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人民中间，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是简单地要求有饭吃，还要求当主人翁，参与国家大事。……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

4、项与年：拯救过中央红军 却死在红色政权下

1934 年，在 50 万国民党军队的堡垒战术进攻下，红一方面军八万多精兵在血战中基本打光，而中央苏区武器低劣的红军也节节败退，蜷缩在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几个小县的边界处，苟延残喘。为了最后解决红军残部，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秘密布置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步——“铁桶计划”。该计划确定以瑞金为中心，各部队在指定时间、地点，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形成半径 300 华里的大包围圈。然后每天向前推进约 8 华里，6 个月之内到达瑞金城下。那时，瑞金的 8 万 6 千红军，将在 150 万国军、300 道铁丝网、30 道碉堡火力网，加 1000 辆快速运送拦截部队的军用十轮大卡车严密封锁中，插翅难逃。这就是著名的“铁桶围剿计划”。

1934 年 10 月，红都瑞金上空乌云密布，杀气弥漫，蒋介石按照绝密的“铁桶围剿计划”派出 150 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蒋介石此举就可消灭红军“毕其功于一役”了。可是，事情偏偏就出了意外：当围剿大军形成铁桶之时，竟然发现：红军早已远去，人走山空。消息报告到主帅处，蒋介石大惑不解：红军莫非上天了？入地了？

他哪里知道：就在庐山他那个极其秘密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竟然有个中共的暗探。此人谁何？莫雄是也。

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是国民党左翼，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与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李克农等有秘密交往。他请中共派人到德安司令部工作。中央特科迅速选派项与年、刘哑佛等前往执行秘密使命。为配合莫雄“剿共”，迷惑蒋介石，红军特地减少在德安地区的游击活动，佯装败退，给莫雄创造辉煌的“剿共战绩”。国民党曾嘉奖德安专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蒋介石也传令嘉奖，并破格邀请莫雄上庐山，出席高级军事会议。这个傻老蒋哪里知道：会议一结束，莫雄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向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绝密作战方案交给中共地下组织。如何将这个关系八万多红军生命和革命前途、极其机密的情报及时送达苏区？难啊，难得很！国民党早已重重包围了整个苏区，连飞鸟都难以通过，何况人乎？

中共方面立即决定派遣项与年务必把情报及时送进江西苏区。

说起项与年，绝非等闲之辈。

项与年（1896——1978 年）原名项廷椿，又名梁明德,原籍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的一个农家，1925 年在浙江加入中共，成为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不久，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的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的三马林达活动。1927 年回国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科长，并在上海创办复炎学校，自任校长，这为以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取得了公开合法的身份。此后，他在周恩来亲自创建和直接领导的上海中央联络局白区工作部（特科）担任上海与苏区的秘密交通员，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他曾和中央特科红队的战友相互配合，在市区击毙叛徒白鑫和三名国民党特务，一时震惊了上海滩；他还配合红队在枫林桥用武装拦劫囚车以营救彭湃，虽然营救失败，但这仍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传奇经历之一。当年陈云、潘汉年、李克农、曾希圣等都是他的战友。

接受任务后，才感到困难重重：谈何容易？

为了使情报万无一失地送达中央苏区，他计上心来：何不扮成一个乞丐？但他那副文质彬彬的儒雅模样距离一个乞丐相差太远了。项与年在路旁找处隐蔽地方，毅然用砖头敲掉自己四颗门牙。巨大的疼痛使他顿时昏倒在路旁，过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想到重任在肩，他不顾伤痛又继续赶路。连续的昼夜行走、极度的疲劳使他蓬头垢面，脸无人色；树枝和石头撕破了的衣服和鞋，加上缺了牙的血淋淋的嘴巴，没有人愿意再多看他一眼。在敌人设置的关卡处，凶神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问项与年：‘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他谎称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但没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他，他慌忙奔跑中跌倒时摔的。敌人信以为真，让他过去了。就这样，途经 8 个县市，混过十多道关卡，一路上风餐露宿，经过无

数艰难险阻，终于将情报亲手送达苏区。（引自福建连城县委党史办黄明溪先生写的《英雄无语——记我党传奇人物项与年》）

正是这位传奇式人物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机智，才换来中央红军的及时转移，才有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上是“一次带有惊慌失措色彩的搬家式大逃跑”深圳《百姓周刊》2003 年 6 月 23 日厚朴文章如此评价）和此后的节节胜利。因此毛泽东才说：“搞情报的同志有功劳！”

全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派人专程前往福州、广州，将项与年、莫雄接到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典礼。之后，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莫雄与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设宴招待了莫、项二人，热情地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既然有功劳，那就该论功行赏吧！

当革命斗争火热进行时，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必须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分彼此；方能够众志成城，方能坚无不摧、攻无不克。可是，当大功告成，稳坐天下时，问题就来了：如何分配胜利成果？谁的功劳更大？谁应该坐第几把交椅？换而言之就是：整块胜利的蛋糕如何切割、分配？

这取决于谁来切蛋糕？即刀把子掌握在谁手中。

非常不幸的是，历史安排了毛泽东来切这块胜利的蛋糕。他掌控的党中央有个内部文件即 16 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按照这个方针，不管原先有什么功劳，现在都要降一级。

【编者按：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合理吗？其次，‘逐步淘汰’？难道说这些人都是阶级敌人？应该被淘汰？真是岂有此理!可当时刀把子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高兴怎样切就怎样切，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说一个不字。】

人们自然非常关心莫雄、项与年这二位大功臣在解放后的生活。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叶剑英亲自写信盛情邀请下，从香港回到大陆的莫雄，两年之后便被家乡地方政府当作“反动官僚地主恶霸”逮捕，并被陶铸批准“枪决”。虽经中共要员古大存仗义执言，才得以保命。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坐监、劳改、批斗、游街，一次一次审查交待，没有一次幸免。

本可为莫雄作证的有关共产党员，个个因自身难保而默不做声。有位高级干部古大存曾愤愤不平地说：“过去莫雄是用脑袋来保革命同志的，共产党人怎能过河拆桥？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几句公道话，竟然无人做声！”。

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位古大存自身也难保。当年古大存曾在莫雄手下当过参谋长，后来他又和冯白驹、云广英、尹林平一起被打成“严重右倾”和“地方主义”分子；在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古大存保莫雄”竟然成了一条重罪。以至于在文革开始，即遭受迫害，1966 年 11 月 4 日含冤逝世。

古大存虽然保莫雄暂免一死，但此后的活罪也让他度日如年。文革时更升级为“江南第一大特务”。终于含冤去世。

项与年的情况又如何呢？解放初被安排到辽宁监察厅当个副厅长，已经是很重要的岗位了；退休前最后得到的正式职务是“省文史馆员”。——这就是曾经拯救过中央红军的大英雄仅有的回报！应该知足了吧？且慢高兴，还有磨难在等着他：

事情应该追忆到 1937 年，他同十几位地下党老同志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反映江青的历史，反对毛泽东娶江青做老婆。从此结下了宿怨。

项与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大叛徒、大特务”责令他交代一大串闻所未闻的“历史问题”。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轮番游街、批斗、毒打，一次一次整得死去活来，甚至从七层桌椅垒起来的“高台”上滚下来，得了脑震荡，中风失语，以“大叛徒”、“特务”罪名开

除党籍，送去农场劳改，1969 年遣送回福建连城老家孤身生活。一生被“革命”折磨、损伤和迫害，使身体从孔武勇猛变为佝偻驼背，瘸拐失语，眼球混浊。身心备受摧残的项与年，文革结束后，经胡耀邦干预才被允许回北京治病。但还没来得及动身，便在龙岩病逝。斗来斗去，项与年最大的“罪行”其实只有一条：

“当年为什么没有死？”这几乎是所有白区英雄和朝鲜战场遣返战俘无一例外的“罪行”。

一代传奇英雄，最终却活得如此窝囊，天理何在？

【补白】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77 年 5 月：

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了；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

在思想政治或其它领域，到底是应该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还是应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流氓无产阶级？

5、潘汉年、扬帆：情报战线无名英雄的悲惨人生

潘汉年（1906—1977 年），江苏宜兴人。1925 年加入中共，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等要职。

潘汉年是一位在秘密战线上有突出贡献的共产党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秘密使者。其经历丰富而历坎坷，颇具传奇色彩。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到新中国成立，他长期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依靠自己的大智大勇，凭借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纵横捭阖，做出了在真枪实弹战场上所无法做到的辉煌业绩。例如 1931 年 6 月中共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并叛变投敌，势必危及当时活动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各级组织。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女士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在第一时间转告了潘汉年，潘马上报告周恩来，周立刻决定让李富春、蔡畅等人及时转移。当敌人前来搜捕时，早已人去楼空。前后相差仅仅几个小时。多么惊险的一幕！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其坚持内战、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开始有所松动。1936 年 1 月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试图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处发了一封信，表达了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为了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1 月 13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在胡秋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的寓所秘密会见邓文仪，由此拉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的序幕。4 月中旬，潘汉年与胡愈之扮成游客，带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的新密码，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途径巴黎、马赛回国。

从马赛乘船到香港后，潘汉年立刻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商量好的办法，给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发信，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尽快取得联系。又派胡愈之去上海，通过鲁迅寻找地下党组织，了解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情况，准备把新密码送到陕北。为了找到去陕北的渠道，他立即到上海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说明了去陕北的意向。冯雪峰通过中共驻张学良处代表刘鼎为潘汉年具体安排去陕北的行程。这时，张学良也恰好在上海。刘鼎介绍潘汉年见到张学良，潘汉年向张学良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发展的形势和“八一宣言”，张学良听得很投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潘汉年于 8 月 9 日顺利地回到了陕北。

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当天晚上，潘汉年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与之彻夜长谈。第二天，潘汉年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新密码交给了中共中央秘书

处负责人邓颖超。

9 月 24 日，潘汉年肩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交付的与国民党谈判的重任，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及毛泽东致宋庆龄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的亲笔信，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途径西安去上海，又赴南京。到南京后，把中共中央致南京方面的信件交给了张冲，让他代转陈立夫。

11 月 10 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正式会谈。由于双方条件相差太悬殊，因此僵持不下。

第二天，潘汉年以“小 K”的代号，将自己与陈立夫谈判的情况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请示下一步的方针。

11 月 19 日，潘汉年与陈立夫进行了第二轮谈判，但进展不尽人意。

正当谈判陷入困境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给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带来了转机。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潘汉年的极力斡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最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高级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杭州，宋美龄专程拜访了潘汉年，对潘汉年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努力表示非常感谢。

周恩来于 3 月 30 日返回陕北，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继续奔波于上海、南京和陕北之间，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同陈立夫、宋子文反复商谈。“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共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后，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1937 年 9 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战略总方针是什么呢？现已解密的资料铁证如山：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高喊抗日口号，但对内却另有一套。他曾制订了一条“抗战时期的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要求各级严格遵守，并一再强调：“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这才是爱国，否则就是爱蒋介石的国了。我们共产党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祖国——苏联。”“我们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最有利。即使日本占领全中国也不要紧，可借助苏联收复失地嘛！”

对于毛泽东的总方针，有爱国心的彭德怀和林彪曾予以抵制。所以才打了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三百多人）和“百团大战”(实际是百排小战)，却受到毛的多次严厉批评。而先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和饶漱石则坚决执行毛的指示，新四军从未对日军打过一场稍大的战斗。毛曾指使刘和饶授意潘汉年去和汪伪、日方会谈。正是根据毛和刘、饶的指示，潘汉年才敢于大胆随汪伪政权江苏省主席李士群（特工头子）去会见汪精卫，并与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头子袁殊（潘的部下）去与日本军方商谈。商谈内容是：最好互相配合共同对付国民党的抗日力量，最低也要使日伪与中共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以便中共能放手大发展，扩大实力，以便将来打败国民党。这才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或者说是战略意图。结果如何？

1．潘汉年与日方会谈虽未达成协议（原因是日寇看到毛泽东嘴上把抗日喊得震天响，怀疑毛心中有诈，不敢轻信），但仍有不少成果，双方都有默契：（1）日、伪军与新四军基本上处于停战状态，新四军才得以全力夺取国民党政府在苏北的地盘，并消灭国民党在苏北的十多万军队；而日寇也得以腾出兵力，向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势力范围大举进攻。（2）华东一带是日寇经济掠夺的主要地区，是汪伪政府首都所在，他们的统治解除了新四军的威胁。（3）江南沦陷区的战略物资和人员可以顺利通过日伪封锁线进入新四军统治区，很少阻碍。（这些内幕，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的回忆录有详细记载）

2．潘汉年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与日伪会谈，取得“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重大成果，使中共在抗战期间能大大扩张地盘、发展军事实力，潘汉年对中共无疑立了大功。但是，毛泽东深知在抗战中秘密和敌人会谈，是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如果被彻底揭露出来（事实上，当时在重庆已有知情人揭露此事，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中共当局不得不发表声明加以否认），必将破坏他“抗日”的名声，会彻底剥掉他“抗日”的伪装，甚至会在他死后赐

以“破坏抗战的民族罪人”和“汉奸”的谥号，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接受的。权衡再三，毛泽东决心来个‘李代桃僵’，把一切责任转嫁到潘汉年的头上。这才是潘汉年冤案的真相。为此首先要给潘汉年栽赃（说他瞒着党中央与日伪会谈），下一步就是灭口（终身监禁直到死亡），让潘汉年做他的替罪羊。

潘汉年被捕后，公安部预审给他认定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 1936 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这三条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上面’给潘汉年做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因此，后来庭审时潘汉年只好违心地全部认罪。

其实不需要多么专业的法律知识，仅从常识出发，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三条‘罪状’漏洞百出。比如对于所指控的第一条罪行，潘汉年屡次都解释：这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回国，与国民党方面联络共同抗日。这也是他被派回国的主要任务。再比如第三条：给国民党提供情报“轰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轰炸是 1950 年，那时候国民党撤离大陆不久，对上海的工业布局了如指掌，上海发电厂这么大的地方，他们会不知道在哪儿？难道还需要特务提供什么‘情报’吗？

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成立一个工作组，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反复核实，于 1956 年 4 月 29 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1、中央曾多次指示：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

2、潘汉年利用原国民党特务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人，事先都有正式报告。

3、他向党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等。

4、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仍然在起着绝密的作用，这是毛、周都知道的。

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和毛泽东内心的如意算盘直接相悖，也为当时“极左路线”的环境所不容，所以根本不起作用。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不顾事实，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 CC 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据亲自参与审判该案成员之一的彭树华事后回忆，当具体办案人员和主持案件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正院长是谢觉哉，因年事已高，不做具体事务，由吴德峰实际主持工作）在不作记录的情况下自由交流时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现在照录如下：

吴老转头问我：‘小彭，也说说你的意见吧！’我就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全案认定的犯罪事实还存在很多疑点，唯一可以认定的是会见汪精卫的问题，但这是犯罪还是违纪，还值得研究。

吴老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潘汉年出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上，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

‘像潘汉年这样长期在敌占区或大后方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必定非常复杂。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

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说做秘密工作的人，一只脚在监狱里面，一只脚在监狱外面，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潘汉年问题出来以后，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确实感到一种压力。’

吴德峰虽然没有把话直接说透，但意思我们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办的，我们照办手续就是了。

在一次谢老接见全体办案人员时也是这样交代：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更有意思的是：有次谢老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话："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征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征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忠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谢老还一字不差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争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更为可笑的是，当时指导办案的主要文件，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而是毛泽东在潘汉年被抓后，于 1956 年 4 月，在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那篇讲话。该讲话中以较长的篇幅谈了潘汉年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因为它强调了"阶级斗争"，所以公安部内部编了一本书——我们叫它"黄皮书"，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点学习，作为办案的主要依据。另外，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其实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此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手续而已。

正像我们此前所听到的传闻那样：潘汉年‘认罪’、审判后马上就‘自由’了——一个月后，被假释出狱。妻子董慧在此前已被释放，两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虽说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但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每月还有 200 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妻子董慧每个月也有 2 斤鸡蛋，在生活上没受什么罪。包括饶漱石，因为在服刑期间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 年 9 月 23 日被假释后，安置在一个农场里，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发给 200 元生活费，还有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还听说他甚至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多么天真！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了调子："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谁还敢再用他？

潘汉年一案的审判结束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告一段落。没想到"文革"一来，本已尘

埃落定的‘潘案’再次被政治风浪高高地卷起。

最高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楼。楼下有一间地下室，原是银行金库，就被当成档案室的档案库。厚厚的水泥墙，几寸厚的铁门，封得严严实实的。造反派前来造反，首先需要掌握秘密材料，因此想打开这扇铁门，想了许多办法都打不开，就找来了一个开山大铁锤，几个学生轮番捶打，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档案库的门砸开。这便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砸档案库“事件，这在当时轰动一时，也算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公检法系统遭到如此破坏，可见当时”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

高法的档案库被砸，牵动了另一位特殊人物的神经——她便是江青。而这背后，又有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

潘汉年被逮捕后，被牵连进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扬帆，原名石蕴华，也曾用名殷扬，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1939 年，扬帆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得知扬帆上世纪 30 年代曾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与江青前夫唐纳一起共过事，又对江青比较了解后，就找扬帆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情况。扬帆不知道江青已在 1938 年 11 月与毛泽东结婚，便无所顾忌地谈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其中当然不乏贬斥之辞。

1939 年 5 月，项英将扬帆所谈的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了延安，一封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发给党中央，一封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本人，对毛、江的结婚提出异议。项英在电报中特地注明材料的来源是由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提供的。这两封电报都被江青看到，她自然对这个”殷扬“牢记在心。

1954 年，江青到杭州探望正在西子湖畔研究起草新宪法草案的毛泽东。她突然收到一封从杭州交际处转来的从上海寄出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了材料交给中央组织部，你要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等等。

江青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她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的背后是将矛头指向主席的。毛泽东当即把公安部长罗瑞卿找来，罗瑞卿不敢怠慢，迅速召来华东公安部长梁国斌到杭州一起研究”案情“。江青提供了一份”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 30 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首先列出的怀疑对象就是扬帆。

可是经过几年调查，证实了这封信与扬帆无关。专案组先后收集了 800 多人的笔迹，也没查出写信的人，成了一桩悬案。直到 1961 年林伯渠去世，他的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这封信的笔迹与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地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

1954 年，由于”高、饶事件“的影响，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报，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当然也被牵连进去，被送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案件“。这个案子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钩，于是成为”潘汉年、饶漱石、扬帆反革命集团“，3 个人被绑在一起。饶漱石被定为该集团的首犯。

潘汉年、扬帆都长期在上海工作，扬帆此前又因为”匿名信“事件接受过专案组调查，江青猜测案卷里会有不少她当年在上海的资料，听说高法的档案库被砸，担心这些材料会流落到社会上去。江青就找到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以政法学院学生砸了高法的档案库为由，称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党和国家很多重要机密，如果卷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谢富治于是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虽然匿名信已证明与扬帆无关，但江青对扬帆依然不能放过。”文革“一起，公检法遭到

冲击，正好给了她一个绝妙机会。1967 年 3 月，江青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江青把扬帆排在第一位，可见她对扬帆的怀恨之深。4 月，江青又派人到上海”搜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还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不久，江青指令专案组提审扬帆，追查他 1939 年给项英提供材料向中央发电报的事。

现在也有人把潘汉年案的发生同江青联系在一起。客观地说，江青虽然身份特殊，但她最初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制造这个冤案，只不过后来插手，让”潘案“进一步升级。江青最介意的是她 30 年代在上海的那段丑史。除了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方面之外，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江青在上海被捕后，究竟有无自首变节问题。

1967 年 5 月 22 日，潘汉年再次被抓进秦城监狱。1970 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写了一份《关于内奸分子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从法治观点来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根本就没有对潘汉年判处所谓‘无期徒刑’的权力，最高人民法院也根本不知道此判决。但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这样荒谬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最高层。

1982 年 1 月，中纪委把《关于潘汉年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到高法，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批示：”我同意撤销潘汉年的原判 15 年有期徒刑。“本来要改判一个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本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复审，但由于潘汉年这个案件的特殊性，经院领导同意就把复审的一套法律程序简化了。令人遗憾的是，当裁定书下达之时，潘汉年早已在 5 年前离开人世了。

1975 年 5 月，潘汉年从秦城监狱转到湖南，与先期到达的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东南茶陵的米江茶场，继续劳动改造。

1976 年 10 月，潘汉年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欣喜若狂。可是 1976 年 12 月 26 日这一天，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 83 周年，《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重登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该文在论及潘汉年的地方仍然一字未改：”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些文字从心理上彻底击垮了潘汉年。

1977 年 3 月，经请示公安部批准，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字住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 月 14 日傍晚，71 岁的潘汉年与世长辞。去世前，董慧获准来到病室，潘汉年睁大眼睛看着董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潘死后做了遗体解剖，发现他肝部已烂成了豆腐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长沙金盆岭墓地，墓碑写着”萧叔安之墓“。

1979 年，61 岁的董慧也离开人世。董慧（原名董奉然）之父是香港的大银行家。她本人为了革命理想来到延安，1940 年与潘汉年结婚。她曾经利用父亲银行家的背景帮助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动员父亲捐赠 10 万大洋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到延安。这对于缺医少药的延安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所以在董慧被捕后，潘汉年曾说她是”最冤枉的“。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董慧从未离开过潘汉年，想来令人叹息。因为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生前无子女，身后无亲人，裁定书除了送给中央有关部门外，已无处送达。

众所周知，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问，我们现在也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当年，被潘汉年案牵扯到的共有 46 人，其中一位最冤枉。他叫蔡秉贤。参与审判此人的一位公安部的干部在看了案卷后，气愤不平，当即找到十三局领导说：”蔡秉贤怎么能判呢？他十几岁就参加党，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给组织提供了那么多情报。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破获过几起潜伏敌特的重要案件。是不是把这个案子改一改？“他希望十三局的领导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领导回答他：”不行，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来后又找王德茂说，王德茂批评他：”你真糊涂，这个案子，你改得了吗？“

【编者按：】文中提到谢觉哉说的那首《满江红》全文如下：（括号里的字是另一版本，同时列出供读者比较、玩味、选择）

拂拭残碑、敇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

最无辜（端）堪恨更堪怜（哀），风波狱。

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

念（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注：圻：读 qi,亦读 yin,边界之谓。】

6、王稼祥：为纠正极左路线而牺牲

王稼祥（1906-1974 年）安徽宣城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

1920 年离开家乡赴南陵县乐育中学读初中，后转入芜湖圣雅各布中学读高中，不久去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附中，从此走向革命道路。1925 年 5 月领导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8 月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9 月加入共青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同年 2 月转为中共党员。1930 年 3 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 年 1 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 年 4 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 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 年 4 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在敌人的空袭中被炸穿了肠子，然后又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 1 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即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因此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据陈毅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好比楚汉相争时的韩信，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过雪山草地时，由于伤情恶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王稼祥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 年夏，又转赴莫斯科治伤；并兼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 年 8 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9 年 1 月，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1941 年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1942 年 6 月，同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

1944 年伤病复发，脱离工作。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6 年再次去苏联治病。1947 年 5 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1949 年 3 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此后被任命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1951 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

王稼祥的外貌清瘦，经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由于留学苏联五年，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他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始终从中国

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在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中经常能提出真知灼见。他当年提出的那些见解，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其正确性。例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1956年苏共20大会议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主要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稼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尤其突出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积极的时期。1962年，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转机，经济衰退最先从农业开始，后来逐步扩展到轻工业、重工业，以至于全面衰退。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境内；在东南沿海，蒋介石势力打算乘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为此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只是判断：“帝反修”联合进攻。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曾经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但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铺开，甚至穷乡僻壤的地方，瞬间都建立起来了；更为可笑的是：党的领导人竟然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当毛泽东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时，竟然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王稼祥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痛哭。”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国的矛头全部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等人的以上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无的放矢。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丝毫未减。据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宾馆，曾是“绝密”级别的会谈记录里，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比较突出的例子是：1960年4月16日，我国驻几内亚使馆来函请示，说明几内亚目前粮食紧张。“兄弟国家使馆纷纷议论，希望中国能有所行动。”该请示报告表示，鉴于几内亚反帝较坚决，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还友好，建议我方主动赠几内亚3万至5万吨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复，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峻形势下，大批中国粮食却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据外交部业已开放的档案显示：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我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满足老挝9月初播种的需要；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国再援助老挝15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我方决定再援助15吨。

什么叫“打肿脸充胖子”，此之谓也！

王稼祥有鉴于此，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

促使王稼祥写建议还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 1962 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但还是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啰啰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

即使如此谦恭的文字仍然没有被毛泽东原谅和宽容。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如此概括是受到陈毅在小组会上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 1960 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这个“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别有用心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在这个‘最高指导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根据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引述，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 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 2 亿元增加到 5 亿元。而 1973 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 55.8391 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6%～7%。”

此后不久，王稼祥被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全家被迫搬出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则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面对这一切，一介书生的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高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

1974 年 1 月 22 日《北京日报》再次批判所谓“三和一少”“妖风”，给了王稼祥最后也是最沉重的一击。1 月 24 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 68 岁。

这位智者的防“左”、纠“左”尝试终于失败了。整个中华民族注定要和王稼祥一起承受更多的苦难和灾祸。

7、闫宝航：情报战线大功臣之死

阎宝航（1895—1967 年）生于辽宁海城小高力房村。1913 年考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 年毕业，1927 年至 1929 年赴英国留学，并赴丹麦等国考察。

阎宝航受“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影响，接触了革命思想。在沈阳组织创办了“星期三会”、“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启明学社”等组织，以极高的热情研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5 年，阎宝航与中共中央派驻沈阳的共产党人合作，创办了以传播马列主义为内容的“奉天暑期大学”，同任校长。他是东北地区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阎宝航是一位站在反日斗争最前列的先锋战士，是东北民众反日斗争的积极组织者与领导者。为了抵御外侮，捍卫主权，他邀集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等，先后组织了“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三个民众反日团体，动员、组织各界人士，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并曾三次查获日本人所贩卖的海洛因及烟土，价值近百万元，当众焚毁。

1929 年秋，阎宝航被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主任。阎宝航当时从张学良那里获得了日本阴谋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当即把这份秘密文件译成英文，借到日本西京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之机，将《田中奏折》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田中奏折》被公诸于世，及时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此举令日本朝野震惊，更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亿万人民公愤。

阎宝航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同卢广绩等人从沈阳化装逃出虎口。到北平后，立即见到张学良将军，陈述了沈阳失陷的经过，谴责了不抵抗政策。之后，他积极联络东北各界人士，于 9 月 27 日，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此，阎宝航全力以赴地投人了抗日救国活动，为支持东北义勇军、支持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并从资金、军械物资、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早在 20 年代初，阎宝航便在政治上成为张学良所倚重的朋友与谋士。1936 年东北军奉命调往西安对陕北红军作战后，连吃败仗，进退维谷。阎宝航等人几次到西安，劝说张学良转变态度，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抗日。1936 年 11 月初，阎宝航又专程赴西安，看望张学良，并于当月 14 日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会同卢广绩、王化一等，与张学良进行了一次长谈。经他的劝说，张学良对形势有所认识，表示不再打内战。此间，中共也派人专门对东北军、西北军进行说服工作。张学良也曾秘密飞往延安，见到毛泽东、周恩来。不久．又到安塞，与周恩来长谈。促使张学良转变了思想，决心联共抗日。1936 年 12 月 12 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2 月 26 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了自由。第三天，阎宝航第一个来到宋子文公馆，见到了被扣留的张学良。随后，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和宋子文、宋美龄的承诺，飞抵西安，向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传达了张学良的消息。在西安，阎宝航还见到了周恩来。1937 年 1 月 3 日，阎宝航受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托，飞返南京。多次找宋子文、宋美龄商谈，甚至四赴奉化，直接找蒋介石面陈，为营救张学良而全力奔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37 年 6 月，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阎宝航被选为常务执行委员。“七•七”抗战后，“东总”总部迁往南京阎宝航家中办公。他积极组织东北军军官、东北流亡民众、爱国人士，开展促蒋抗日活动。

1937 年 9 月，阎宝航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参加中共。从此，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以民主人士身份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发挥其聪明才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重庆，阎宝航的家成为中共地下党和“东总”活动的重要据点。周恩来经常在阎家小客厅开会．布置工作。董必武、叶剑英也都在阎家召开过重要会议。阎宝航的家又是革命者的栖身之处和

庇护所，一些同志遇到困难和危险，便转到闫家暂避。

闫宝航是一位卓有才干的社会活动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上层人物以及军政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并不断地获取重要情报。他为东北抗日救亡事业，竭尽了全力；他为沟通东北军与国民党的关系，为掩护和营救爱国人士、共产党员。

1939 年，闫宝航根据周恩来的嘱托，在重庆家中设置了无线电台，建立了情报机构。同时，还设置了极为秘密的备用电台。

1941 年 5 月初，闫宝航从国民党要人那里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在 6 月 20 日前后一星期内，突袭苏联的重要情报后，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于 6 月 14 日把这一重要情报，及时的通报苏联，为苏联提早进入战备状态争取了时间。苏联对闫宝航提供的情报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闫宝航同志是第一个知道德国进攻苏联日期的人。”斯大林还致电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及闫宝航本人表示谢意。半个世纪后，即 1995 年 5 月，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不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中国人民的儿子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以表彰其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特殊贡献。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国民党要人能够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呢？当时，尽管蒋介石与莫斯科交往频繁，但德国方面确信：从意识形态来分析，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与中共、苏共的阶级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柏林方面坚信，国共抗日联盟只是暂时的战略步骤而已。

此外，蒋介石本人也在竭力利用两个大国之间的对立，同时保持与莫斯科和柏林双方的联系。比如：蒋介石将亲生儿子蒋经国送往苏联学习，又将养子蒋纬国送往慕尼黑，接受慕尼黑军事学院的军事训练。在德国吞并奥地利时，他曾任德军的坦克指挥官，差点没参加入侵波兰的行动。蒋纬国还参加了德军高山射手支队的培训，并获得了佩戴“雪绒花”徽章的权利。有如此渊源，远离欧洲战场的重庆能够获悉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当然就不足为奇了。下面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获得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后，又是如何传到闫宝航手中呢？遥想当年，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重庆市开始扮演中国“第二首都”的角色，被称为“陪都”。战争期间民国政府机构以及外交代表机构都迁移至此。闫宝航奉中共指示在重庆工作，他在国民党上层有许多密友。再加之闫宝航本人曾在重庆军事政府委员会政治局任职，是蒋介石的顾问之一。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均在其接触范围内。他同著名政治家孙中山之子孙科保持联系。孙科是国民党“亲苏”派代表。闫宝航在西方外交官中也有很多熟人，尤其是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大使馆中。

闫宝航正是在出席德国使馆的聚会时，获悉了希特勒军队准备攻击苏联的准确日期。

闫宝航再次建立奇功是在半年以后。他从破译军统机构密码中，获得了日军将对夏威夷的瓦胡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日军调动的情报，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党中央马上转告苏联，由苏联通知美国。12 月 8 日，果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

第三次奇功是在 1944 年夏季，他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境上部署的全部详情，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无一不备的书面材料。闫宝航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送达周恩来。周令驻重庆的南方局，立即拍照报送延安。中共迅速将情报转给苏联。苏军在 1945 年 8 月 8 日对日开战后，由于对日军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只用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日本关东军经营十多年的防御体系，把日本号称的王牌军彻底摧毁。闫宝航的默默贡献，功不可没。

1945 年，抗战胜利后，闫宝航又果敢地站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最前列，同国民党坚持内战、坚持独裁的反共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闫宝航与宁武、卢广绩等东北各界人士一道，于 1945 年底，在重庆，成立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周恩来、叶剑英等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闫宝航等还与美国特使马歇尔面谈，力陈东北问题必须和平

解决的主张。

闫宝航还是重庆“较场口事件”和南京“下关事件”的亲历者。1946 年 2 月 10 日，在重庆较场口，“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举行大会，闫宝航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打伤了李公朴、郭沫若等 60 多人。闫宝航与特务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立即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合议，坚持独裁内战的真相。同年 6 月 23 日，闫宝航在上海参加了以马叙伦先生为首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当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闫宝航不畏强暴，为掩护马叙伦等人，同暴徒英勇搏斗，身负重伤，住进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闻讯当夜赶到医院看望、慰问。郭沫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也都前往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于 6 月 25 日致电马叙伦、闫宝航等表示慰问。

1946 年 8 月 20 日，闫宝航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9 月，闫宝航由上海、经天津，辗转回东北。1947 年 2 月 1 日。闫宝航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1949 年 5 月，闫宝航调中央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

此后，闫宝航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要职。1959 年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以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主持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经他征集的文史资料近 2000 件，1500 余万字。

“文化大革命”中，像阎宝航这样的大功臣同样未能幸免，受到迫害，并于 1967 年 11 月 6 日晚被投入监狱。1968 年 5 月 22 日，这位年过七旬的“犯人”，在审讯中被人从背后猛踹一脚倒地昏迷，送到复兴医院后，也无人理睬。在监狱的折磨和摧残下，终于含冤去世，终年 73 岁。死后监狱的批文写道：“反革命罪犯 67100 号，不得留骨灰。”

1991 年 5 月，当其女闫明光女士在美国纽约见到父亲昔日的老朋友张学良时，这位 90 高龄的智者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做女儿的竟然不敢据实以告。她害怕什么？原来在她的头上有一张无形的网，迫使她不得不保持缄默。悲乎！

【编者按：中国目前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人们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不敢说出真相。于是假话盛行，伪装风行。政客的骗术于是得逞，愚民伎俩，瞒和骗的手段越来越高明。】

【补白】

鲁迅：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就产生了瞒和骗的文艺，令全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

8、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　壮志未酬身先去

邓拓（1912——966 年）从小酷爱文学艺术，1926 年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两年后和傅衣凌等人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 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翌年冬，加入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参加中共。翌年秋，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曾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1932 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1937 年 6 月，出版专着《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 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

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

内战期间，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在纪念中共成立 21 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该文在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1944 年 5 月，主持编辑出版 5 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1949 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本来一帆风顺的邓拓开始有些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了，终于在 1957 年 4 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1958 年 3 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受到严重的挑战，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立即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

早在 1958 年 8 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 1959 年 2 月才完成。全体同仁为邓拓送别，邓拓当场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 1949 年 7 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 1959 年 2 月离职，10 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

对邓拓的境遇，老领导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

从 1961 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此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 1 月 11 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 1961 年 3 月 19 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1961 年 9 月 20 日，邓拓、吴晗、廖沫沙一起吃饭商议为《前线》写稿事宜。邓拓提议，3 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

前后共计发表杂文稿件 153 篇。他的短文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因为文笔生动，内容更是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深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后来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

正当邓拓努力开拓新局面的时候，毛泽东又开始折腾了。‘文革’前夜，1966 年 4 月 16 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牺牲品。5 月 18 日，邓拓含冤自尽，成了‘文革’期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后同意第二天转载。可是，次日《北京日报》

竟然没有转载，郑天翔向范瑾电话询问，答复是："邓拓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这样的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但是北京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合适；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中央文革五人领导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证明是经过批准的。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段。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 1965 年 11 月 10 日到 1966 年 1 月 5 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只有 55 天。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邓拓已尽力而为，力图为一场新动乱断然刹车，不至于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方向发展。其间他发表演说，组织人员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用"向阳生"的笔名写文章。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授人以柄，都被当作邓拓、彭真的新罪行。

1966 年 2 月 3 日，彭真主持召开"5 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归我管，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接着，事态迅速恶化：3 月 28 日至 30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作了三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暗指彭真)。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4 月 6 日至 4 月 11 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等单位，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它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 月 8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

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

1966 年 5 月 16 日，“5•16 通知”被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闹剧正式开锣。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从此身陷囹圄。

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 7 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了可怕调子。读到戚本禹的文章，邓拓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人间，告别即将扑向自身的灾难。

5 月 17 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邓拓伏案疾书直到深夜。第一封信，写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

（我的）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以较长篇幅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他申诉说：因此，我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最后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编者按：和几乎所有的自杀者一样，即使是在最无奈的情况下，在被迫自杀时，仍然要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什么万岁之类的无聊口号，用意在于求得最高当局的谅解以避免追究妻儿老小。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和皇权专制制度下临死之前仍然要叩谢皇恩，皇恩浩荡等等陈词滥调相比，有何区别？】

邓拓于 5 月 17 日深夜或 18 日凌晨自杀，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写完给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时间可能已经进入 5 月 18 日的凌晨。天亮后，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短信诀别。

最后，他用服毒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 54 年短促的生命。一代书生，就这样被政治所裹胁、所扭曲、所戕害，最后被政治所埋葬。悲夫！如果不是‘玩政治’，以他的才华本来可能成为很有成就的文学家、作家。像他这样被政治所裹胁和埋葬的，岂只一个邓拓？

【补白】

海伦•托马斯 40 多年来曾当众质问 9 位美国总统（从肯尼迪到小布什）。他在《白宫前沿》一书中写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记者才被允许质问国家领导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敬仰领导人多么德高望重，而是把他们搁到聚光灯下，看看他们是否有负民众的信赖？”

9、杨刚：一代女杰自杀之谜

杨刚(1905-1957 年)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她出生在湖北一个豪门望族,父亲曾是军阀时代的湖北省代省长。杨刚自幼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英文系。1930 年加入中共。不久因病治疗期间退党,但一直坚持左翼文化活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曾帮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刚于 1938 年重新入党,主编过《大公报》副刊《文艺》版。

这时,她的婚姻破裂,与丈夫郑侃离异。郑侃后来在福建时死于侵华日军的轰炸。此后,杨刚和女儿郑光迪一起生活。1944 年至 1948 年,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员,在美国从事新闻采访,并根据中共的安排做国际统战工作。20 世纪 40 年代，她的“美国札记”通讯曾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她和浦熙修、彭子冈、戈扬等人一起成为新闻史上少有的几位女记者。1948 年 11 月,杨刚奉命归国,经香港到西柏坡,在平津战役中参加接收天津,担任天津《大公报》副总编辑、党委书记。同年 5 月上海解放,杨刚南下,任上海《大公报》军代表。次年,杨刚调回北京,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同年 10 月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1953 年,出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5 年春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她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总体来说,她的工作经历大致上比较顺利。仅在 1955 年秋天,在北京机场路上遭遇车祸,头部受到重创，受脑震荡影响而病休半年。1956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改版后扩大版面,杨刚仍积极参与,并全天工作,因此，可以说基本恢复健康。也可以看出杨刚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

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开始时杨刚积极投入。1957 年 5 月 6 日,报社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共 7 人：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黄操良、陈浚、萧风。杨刚位列第三名，是唯一的女性。进入 6 月,“整风”转为反右,原整风领导小组即转变为“反右领导小组”，还加上了新来的总编辑吴冷西。

反右风暴使杨刚看到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当年和杨刚一起奔走采访的新闻记者们,特别是《大公报》的记者、编辑们,纷纷陷入“阳谋”的陷阱，被批判的声浪所包围。老党员徐盈要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妻子、名记者彭子冈也未能幸免。就在 9 月里,杨刚参加了《北京日报》社举行的批判会,还发言严厉批判过去《大公报》同事、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彭子冈。一年多未看见杨刚的当年《大公报》同事吴永良(后来也被“划右”)发现,杨刚的头发花白了。刚刚 50 岁出头的杨刚本不该有那许多白发。他由此深深地怀疑：杨刚批判彭子冈的发言是言不由衷的敷衍行为？还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表态？另外，在风暴来临的时候,杨刚和原《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有过一次长谈。谈什么？未见披露。

杨刚多次参加文化界批判右派的活动。自杀的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大会。这次会议上,丁玲那些早已有过结论的“历史错误”又被拎出来反复清算。杨刚熟悉丁玲,她们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的优秀女性。杨刚所熟知的、即将被打成右派的朋友多着哩！她在《人民日报》的同事,当年《大公报》的同事高集,曾向胡乔木提过一些意见,在运动中险些被扫入“右派”行列,侥幸过关。但其妻子,也是《大公报》记者的地下党员高汾却未能幸免。据叶遥后来回忆说：“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杨刚)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更为直接的刺激恐怕是来自于：由杨刚点名,于 1955 年 4 月从新华社调来《人民日报》担任国际问题评论员的蒋元椿。在对右派大反击前夕的 1957 年 5 月 20 日,蒋元椿响应负责国际部工作的报社副总编黄操良的号召,在办公室走廊墙报上贴出若干页小字报《论圣旨口》,认为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编辑事务管得过于琐碎,没有抓住大环节等等。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蒋元椿很快成为运动的活靶子,无可避免地掉入右派的深渊。眼看蒋元椿落入陷阱,杨刚在报社决策层面也曾多方保护,力图使他免被“划右”。也许杨刚的救助曾经起过一点作用，在 1957 年 10 月前,蒋元椿的名字总在“疑右”和“右倾”的帽子之间徘徊。但到 9 月底,形势进一步发展，蒋元椿终于在劫难逃,杨刚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果然,在杨刚辞世 23 天后,蒋元椿被正式划为右派。后来蒋元椿回忆说,自从惹下文字大祸,时时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之虞。有时在报社见到杨刚,但是杨只是朝他看看,什么话也不说。蒋元椿说：“我有一种预感,像她这样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革命知识分子,恐怕难以理解、也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严酷的现实。像她的名字一样,在敌人面前,她一生刚强。可是当自己的同志被当成敌人对待的时候,她越是刚强,痛苦也就越大,

她承受得了吗?”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仅蒋元椿一个人，运动以来,各种斗争场面十分骇人,到 9 月中旬,编委会讨论,拟将 11 人划为右派,另有‘疑右’10 人、“未定”6 人。更可怕的是,将被“划右”的远远不止于此数(最后达 32 人,另有一工人不够右派的资格，就给他戴上了“坏分子”帽子)。而且,杨刚先后负责的两个部——国际部和文艺部成为运动的重点(后来地方记者部又“挖”出了更多的党员右派,成为报社中出右派最多的部门)。和杨刚关系更为直接的是,1955年春,她向新华社点名要求调来的“骨干”蒋元椿、李慎之眼睁睁地看着成为“大右派”,同时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的黄操良和部主任胡骑也命运不济,后来都成了右派。杨刚和他们的工作往来密切。事实上,这把火不断地烧下去,距离杨刚本人是越来越近了。

在残酷的运动威逼下,报社内部相继出现自杀事件。8 月 14 日上午,自“三反运动”后一直担任图书馆团支部委员的林安干不堪批判和侮辱,吞服毒药“六六六”自杀。但因药粉的强烈气味,林安干在服后即大部分吐出,被同事发现后马上送医院洗胃抢救,林活了过来(在“文革”中,林不堪忍受折磨,在安徽农场投湖自尽)。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杨刚辞世的前一天,报社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位部门副主任也因面临严酷的反右批判,于 10 月 5 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因发现及时,这位抗战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救了过来。(他和林安干一样,在“文革”中不堪凌辱,最终还是服毒自尽)。报社内的反右运动正从党外延伸到党内,更惨烈的悲剧即将发生,在蒋元椿等相当一批党员干部必将被戴上“帽子”的时候,杨刚选择了离去，这可以说是她的明智；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杨刚没有离去,随后的政治生活中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杨刚辞世的第二天下午,社长邓拓在报社五楼大会议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杨刚去世。他含糊地猜测杨刚的死因,说大约在 10 月初,她偶然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心情不好,前几年车祸造成的严重脑震荡使她很痛苦。说到这里,邓拓立刻打住。【也许是如辛弃疾的《采桑子》里所说‘欲说还休’吧】最后邓拓还告诫大家，不要随便猜疑。但他同时又宣布：不开追悼会。

杨刚从此长眠在北京八宝山的山坡上。她的离去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政治涟漪。但是,此后人们的猜测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仔细思考那些经常被人提起的原因：比如“丢失笔记本”、“1955 年遭遇车祸导致头痛”、“女儿远在苏联学习,她一个人生活缺乏家庭温暖”等等。按蒋元椿及许多熟悉杨刚者的说法,只要熟悉杨刚,读过她较多作品,都感觉到,以她豪爽硬朗的男性化的性格,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解释她的自尽。倒是胡乔木 1983 年 6 月为《杨刚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有一句话似乎更接近真实。他写道：杨刚的死“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还应该提及：张宝林先生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具生花笔一枝——高集与高汾》一书中说：杨刚辞世时留有遗书,最先来到现场者赶紧将遗书交给社长邓拓。邓拓又马上将遗书报送周恩来总理了。直至今日,未见对遗书文字的披露。如果有遗书,当是能够解释杨刚为何离去的重要文件。张宝林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言必有据,他的论述值得重视。那么，她究竟为什么会选择自尽？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这样说：“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自从燕京大学入党以来，她献身理想已三十年，哪怕是站在党外的岁月里，她的信念也没有改变过，她始终如一团燃烧的火焰。1957 年那个躁热的夏季以后，她理想的火焰终于渐渐熄灭了。”人是要靠理想支持才能活下去的；理想破灭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此说颇有道理。

更有人认为：如果她活着，即使逃过了反右，也逃不过“文革”。只要看看在她身后，新闻界那一长串自杀者的名单，就一切了然（其实何止是新闻界），和杨刚一同出身《大公报》的人中就有范长江、孟秋江、刘克林、蒋荫恩等相继以自缢、投井、坠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杨刚之死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

【编者按：死者已矣，真相难觅。但只要看看在她之后那众多被迫害而死者的种种惨状就不难理解。如果说某个人自杀有其个人独特的性格因素，但大批量地自杀现象显然无法用个人的原因来解释，只能归因于政治迫害。】

10、李立三：‘毛泽东半个朋友’服毒自杀

李立三（1899—1967 年）湖南醴陵人。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早年经罗章龙介绍，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广益中学毕业后，到护国军当兵。1919 年 9 月赴法勤工俭学，在克鲁梭的史乃德钢铁厂当翻砂工，并积极参加留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春,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坚等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为华工谋福利。同年10月,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12 月中旬,在上海加入中共,随即被派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1922 年 1月,在安源创办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安源支部,任书记。5 月 1 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选为主任。9 月 14 日,和刘少奇等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创建汉冶萍公司总工会。1923 年3 月,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 年 4 月,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地区工人运动。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在小沙渡、杨树浦、吴淞等地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进德会。1925 年 2 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 5 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担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一直坚持在斗争第一线。10 月,与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6 年 5 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同年 9 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代理全国总工会领导武汉的工人运动。1927 年 1 月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6 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7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改组,成为 5 名常委之一。

早在 1918 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研究，并懂得编制密电码。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江西中央苏区的秘密通信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今焚皇渡路)福康里 9 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中共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 1929 年冬天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共产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 年 12 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 1 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 年 10 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与谭平山、邓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建议。南昌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 12 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赴香港重建广东省委,恢复党的工作,曾提出在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然后夺取广州的战略思想。1928 年 6 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1930 年 6 月至 9 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

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9 月 24 日,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他很快认识并检查了错误。1930 年 12 月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交代自己的错误,羁旅莫斯科 15 年,受王明的陷害和苏联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影响,曾坐牢一年多,甚至被共产国际停止党籍。他多次申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均遭苏联内务部拒绝。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 年 1 月回国,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东北 3 人小组中共方面成员、首席代表,同美、蒋势力进行斗争。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城工部部长等要职,争取了滇军六十三军、九十三军起义,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8 年 8 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49 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6 年在中共八大上发言,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总清算”,诚恳坦率地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受到好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 年初,率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分干部下工厂调查研究,召开部分省市工交部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思想,撰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60 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也正由于他曾经有过那么一次虽然短暂（前后不超过 4 个月）却有广泛影响的失误，使他被当作“错误路线的代表”、一个党内的“另类”，长期未能得到合理的介绍和科学评价，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李立三，几乎就是党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特定的“反面教员”。

和其它共产党人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有一段非常浪漫的跨国恋情。在苏联期间，认识了比自己小 15 岁的俄罗斯人莉莎•基什金娜。并于 1936 年正式结婚。这段跨国婚姻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终结，成为令人羡慕的佳话，但却成为他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一大由头。理由竟然是那样可笑而又可悲，说李立三是外国特务派遣来华的间谍。在那个疯狂年代，这个罪名足以让所有的善良人们闻之不寒而栗。

果然，在狂飙压顶的 1967 年，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批斗无辜的干部、群众。李立三当然在劫难逃。6 月 22 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并同时通知他：必须参加下午的批斗会。当天下午 3 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几个“常委”们正处于万分焦急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 7 月 4 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遗书上云：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华北局机关干部对李立三之死，议论纷纷，纷纷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种种解释都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重要的疑点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一位资深的工人运动领袖就这样被‘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无情地葬送了。

【补白】

朝代纷纷排成行，开国明君皆流氓；

如果有人不相信，请看刘邦朱元璋。

——著名学者季羡林

11、陶铸：党内第四号人物 也未免灭顶之灾

陶铸（1908-1969年）又名陶际华，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元帅）的全权代表，参与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东省省长。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领导人中，相对来说，陶铸比较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他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因为这个称呼太伤感情。今后“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指示制定一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知识分子的名单，共计2000人，每人每月补助食油1斤，粮食10斤；从这些人当中再选出200人的名单，享受厅局级干部的待遇。在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民都处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煎熬时，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食品供应，无疑起到了雪里送炭的作用。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

最高当局所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坚持认为刘少奇不是叛徒。这种政治表态显然与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相背离。于是，假手江青的策动下，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在各种指责和迫害下，心力交瘁的陶铸病倒了。1969年10月，陶铸病情开始恶化，到11月15日获准施行手术，结果发现，癌细胞已广泛扩散，腹腔内血管焦脆，根本无法进行手术。重病的陶铸，被从北京中南海转移到安徽合肥的“秘密病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一种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四人帮”恶行的愤怒，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陶铸举起一只手，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然向墙上一击，“砰”一声过后，那白色的墙壁上，被汗湿的手掌沾去了一层墙皮，竟然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手印！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含冤病逝。其后，以烈性传染病为借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在此前后没有任何亲人获准探望；死后也未告知亲人前来料理后事。陶铸被火化之后，骨灰随意放置。此后9年间无人知道其人行踪。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护送到陶铸生前曾工作多年的广东，埋入广州白云山松树下。“松风”二字出自书画家吴作人手书。当年广州市委老领导林西，得知陶

铸逝世前的情况，派人到合肥，要求务必找到当年囚禁陶铸的那间屋子，看看墙上那个手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一定把它拓印回来。那个手印居然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而且清晰、完好如初！

陶铸的手印被拓回来，被镌刻在巨石上的“松风”二字的下面。

陶铸是党内的高官，但入选本书的最重要理由是：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颠倒的年代，他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宽容和关怀。仅举数例如下：

1、容庚担任过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教授，是文字学家、书画（法）家、收藏家、文物鉴赏家。日寇侵略我国时，大量的珍贵古物外流。容庚变卖家当，耗尽工资，购回了许多珍贵古（文）物。但此人口无遮拦，秉性刚直、口无遮拦。

然而，在陶铸的保护下，容庚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并未遭受大难。中山大学还专门腾出一间教室，存放容庚购置和收集的青铜器、古字画等藏品。在陶铸个人魅力的感染下，容庚竟然将所藏珍稀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国筹备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批判中共政权。会议拟请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作重点发言。周恩来得知后，嘱咐陶铸找人给钱穆做工作。熟知容庚的陶铸立刻想到钱穆和容庚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同事，便请容庚出面。1956 年秋，容庚赴香港和钱穆叙旧话新。后来，钱穆虽然参加了那次“国际学术会议”，却没有发言。

1957 年“反右”，容庚没被打成“右派”，但于 1958 年下放农村，去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陶铸专程到东莞看望容庚。省委主要负责人屈身茅舍，探望被称为“野马”、“鬼锁”的容庚，使得容庚的恶劣处境一度有所改善。

2、陈寅恪学贯中西，又精通多种文字，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他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信条，全国政协拟请他担任委员，他毫无兴趣；1954 年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提的任职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这显然是对当局及其权威的严重挑战。

陶铸对这位“国宝”级的学者，并不介意，却处处袒护、照顾。1954 年，中山大学某负责人在会上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陈旧腐朽”。陶铸知道后，严肃批评了此人，并要他向陈寅恪赔礼道歉。陶铸看到陈寅恪住房小，书籍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当即通知学校全部给他妥善解决。

1956 年，陶铸在广东省高教工作会议上，公开为陈寅恪“说话”：“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

由于陶铸的“过问”，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山大学对陈寅恪的生活给予重点照顾。听说陈寅恪睡眠欠佳，陶铸设法为他从香港买来进口安眠药；陈寅恪视力差，陶铸指示中山大学在陈寅恪的院子里修筑一条白色水泥路，好让他在上面行走安全；陈寅恪爱听京剧，1962 年 4 月，陶铸参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时，买下落地式收音、电唱两用机，送给陈寅恪。最动人的要数 1962 年 7 月，72 岁的陈寅恪意外右腿胫骨折断，陶铸特批三名护士，24 小时轮流护理和照顾陈寅恪的生活。

如果没有陶铸的关照，目盲腿瘸的陈寅恪很难完成辉煌著述，甚至日常生活也难以自理。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后来对朋友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3、章士钊曾任北洋政府高官，梁漱溟称：“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多才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但陶铸仍然以礼相待。章士钊也做过好事。譬如 1920 年毛泽东等人组织湖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章士钊发动社会名流捐款，将两万银元交毛泽东作为经费。毛泽东后来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

1957 年，76 岁的章士钊抵达广州。陶铸请章士钊到“大同酒家”吃饭。他俩都是湖南人，乡音亲切，口味相似。加上陶铸曾在湖南省立师范学习，又上过黄埔军校，文史方面堪称章士钊的“知音”。在餐桌上，章士钊兴致盎然地讲起窃国者袁世凯、洋务派张之洞；从古到今，由北到南，指点江山，纵论天下。

由于年事已高，不胜酒力。几杯之后章士钊居然伏在桌上，发出鼾声！陶铸则轻轻脱下衣服，盖在章士钊身上。从提包中拿出文件批阅，等待章士钊醒来。章士钊事后大为感动，当即吟诗相赠。

【编者按：据《炎黄春秋》2008 年第 2 期周相唐文章“追忆章士钊先生”披露：章先生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但毛获此巨款后，仅拿出一千银元给了赴法留学的湖南同学，余款全部带回湖南自己处理。当时毛向章士钊求援的由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按理应该如数交给这些留学的人，才算是名正言顺，用得其所。但老毛却只转交了 5%。其余都贪污归己。这纯粹是利用当时社会名流们对去欧洲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的同情心和做慈善事业的心愿，大肆敛钱，中饱私囊。因此，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贪污犯、诈骗犯。】

【补白】

奥巴马在竞选获胜后的演说中说：

“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恰好是中国八九六四的二十周年）

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著名演说，阐述美国中东政策的性质与原则，表明支持中东民主，支持人民有表达的自由，有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不仅是美国的想法，而是普遍的人权。他还说：

“镇压思想的方法绝不会让思想消失”

“有些人不掌权的时候鼓吹民主，一旦上台就毫不留情地镇压别人的权利”

12、陈琏：陈布雷之女从高楼飞跃而下

在介绍陈琏之前，先应该介绍一下其父陈布雷。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策顾问”、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要职。就是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由于目睹国民党败局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自感一介书生，回天无力。乃于 1948 年 11 月 13 日，服安眠药自杀。蒋介石闻之悲痛至极，两次到陈公馆吊丧，后又亲率国民党在京全体政要参加公祭仪式。

南京公祭结束后，陈布雷遗体被送往家乡杭州安葬，护灵车队经过上海时，其二女儿即中共地下党员陈琏及丈夫、中共北京学生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在上海方面举行的公祭仪式上披麻戴孝，跪拜迎灵。陈琏哭得几近昏厥，父女情深可见。

历史竟然如此相似!仅仅 19 年后，女儿也被迫走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道路——自杀。

陈琏（1919－1967 年），浙江慈溪人。其母杨氏在她出生时获产妇热病亡，故原名为‘怜儿’，1939 年改名为陈琏。她年轻时很激进，她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由于她对国民党对日政策不满逐渐接触共产党。1939 年 7 月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共。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并在那里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袁永熙。1942 年转入重庆中央大学，于 1946 年毕业，赴北平贝满女中做教师。1947 年 8 月 10 日与袁永熙结婚。同年 9 月 24 日两人因涉嫌为共产党间谍被捕，解赴南京。在其父亲的帮助下，蒋介石亲自过问后，两人才被释放。

中共胜利后，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官至共青团少年儿童部长。但其丈夫、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的袁永熙却屡遭打击，并于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压迫下，在各级官员不断地对其劝说，劝告她千万要站稳立场。有位领导人还帮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感情总是带有阶级性的。你过去曾经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所困扰,党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还有一次,儿子在幼儿园受到小朋友们的欺侮,说他是"大右派、大坏蛋的儿子"。儿子回到家问妈妈："爸爸是右派吗?右派和地主、特务一样坏吗?"陈琏一下把孩子紧紧抱起,让他紧伏在自己的肩上,不让他看见妈妈眼睛里潸然流出来的泪水。但是孩子从妈妈胸部不停地颤抖中体验到妈妈在伤心流泪……从此,陈琏与袁永熙不断地进行彻夜深谈。在又一次彻夜深谈中,袁永熙提出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除了离婚,别无选择。陈琏最后只得应声道："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只好再做一次自我牺牲吧!"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陈琏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陶琴熏,这时候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几年中工作认真、小心翼翼,也突然被定为"右派"。总工会国际部负责人认为她不该划为"右派",但是上级领导人说："陶希圣(注：抗战胜利后,陶希圣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和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女儿,单凭这一点,也够了!"

当陈琏得知此事后，不能不产生如下的联想："那么我这陈布雷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开刀。他几次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亲自督战。多次揭批夏征农的大会,尽管很多人都气势汹汹,陈琏总是作沉思状,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会前会后,她也不贴一张大字报。处里的同事们问她对批斗夏征农有什么看法,她说："我觉得夏征农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搞!"

的确,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她不能理解;对于发生在全国的一片混乱和灾难,她更感到不安。她想：这就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期间,她有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她原来非常熟悉的团中央所在地。没想到这里也变了——大院里一片混乱,原先整洁的院墙糊满了大字报。她一向十分敬重的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脖子上都挂着黑牌子,被红卫兵抓着脊梁上的衣服,从窗户里拎出来,强行按头示众。她赶紧闭目转身,不愿多看,并含着热泪,带着无穷的困惑和忧虑,匆匆离开,离开同样乱糟糟的北京城。

1967 年 3 月,中共中央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立即刮起"抓叛徒"的狂风。4 月,华东局就在"一月风暴"的余威下,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上海的造反派们在《中央日报》上查到陈琏 1948 年为"反动父亲"披麻带孝的新闻照片，同时又在查抄陈琏继母王允默老太太家产过程中，找到了陈布雷日记。日记中有关于陈琏夫妇 1948 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动乱嫌疑"拘捕，后由蒋介石下令释放出狱的经过，也有一些陈布雷与女儿私人谈话的记录，于是，这一切都成了陈琏"叛变"的铁证。

1967 年 11 月 17 日,华东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一切污言秽语向她劈头盖脸地泼来。会后,她被押送回家。一到家,押送者就动手抄家,翻箱倒柜,从箱底翻出陈琏一直珍藏着的她和袁永熙的合影。"好大的胆子,她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陈琏沉默不语。押送者走后,陈琏放声痛哭,哭声极其凄惨。第二天,她来到已待过六七年的办公室,就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和她说一句话,都远远地躲着她……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用"革命"的姿态来包装自己。这一天,陈琏在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孤独中度过。19 日是星期天,她起床后,就忙于收拾房间,清点孩子们的衣物。午睡后,她洗澡换衣,还把脏衣服洗净晾

好,像平常一样丝毫不麻烦保姆。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小儿子和保姆两人在休息。她悄悄地问保姆,星期天了,大儿子怎么没有回来?这说明她很想和大儿子再见一面,而忘记了是她自己让大儿子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晚饭后,她问保姆还有多少布票,请她给女儿和小儿子添置衣服,又把两张银行存折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儿子睡后,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深夜,她从所住的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 11 层楼破窗而下,一声巨响,惨死在地。

杨刚之后又一个党内女杰惨死。悲夫!

1979 年陈琏被平反时，胡耀邦誉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补白】

梁启超：

“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

13、范长江：杰出报人投井自杀

范长江（1909—1970 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自幼即跟着祖父学习文史知识，也时常模仿祖父的神态和腔调，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朗诵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句。后来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教导团，随贺龙转赴南昌。有幸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随后在转战途中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与部队失去联系。

1928 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机构，蒋介石兼任校长。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范长江的梦想。范长江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才是出路，而国民党培养所谓人才的地方，并非他的理想归宿。于是，他脱下学校的制服，秘密离开南京。同时宣布脱离国民党。

1932 年秋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1933 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领导的注意。《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还亲自出马，请范长江专为《大公报》撰稿。《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欣然答应下来。这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长江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

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难以避免。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1935 年 5 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这次西北之行，历时 10 个月，行程 4000 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显然倾注了对红军的同情，甚至怀有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量突增。不久，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该书被誉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各界争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特赶印再版数千部，出书未及，复又售罄，而来函订购者尚多，当赶印 3 版，出售未及登广告，又经售罄，此书行销之广，前所未有。”《中国的西北角》在几个月内连出 9 版，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在昆明为学生选定的 20 种课外读物中，范长江的这本书被列为首选。受其影响，当时有的报馆也派出旅行记者，不少青年学生积极投入

新闻事业。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 51 军长的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前往西安。

1937 年 2 月 2 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 月 4 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 27 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采访后，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大公报》发表。一时轰动朝野，人们争相购买阅读。与此同时，被张、杨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后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下令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 年 2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范长江以笔作枪，写出了大量的战地通讯。这些文字一经《大公报》刊载，不胫而走，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从此，他的通讯成为《大公报》的一大亮色，使《大公报》名声大振。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

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率先打开国民党新闻封锁大门的范长江一鼓作气，连续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这些通讯为中共做了很多宣传。1937 年 11 月 18 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

1939 年 5 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介绍，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共，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成为中共的主要喉舌。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范长江因此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50 年 1 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长。

此后他还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全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

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长江被关押的地方——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农村的机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虽然多数媒体都用“自杀”二字来表述范长江之死，但事实真相如何？几十年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根据《新周报》周末版的两位记者郭丽萍、刘仁忠的文章“范长江之死”介绍如下：（该文还刊发了当年毛泽东接待范长江的照片以及毛泽东致范长江信的影印件。耐人寻味的是：该信的落款竟然是：‘弟毛泽东’。谦恭之态，尽在一个‘弟’字。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位于河南省确山县的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

与众不同的是，其它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年已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继续搬送砖头。

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然命令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范长江除了干苦活、脏活、累活外，更重要的是行动不自由，处处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它人可以买肉吃，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有剩的，就给范长江一点饭菜吃，没有剩的就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即使排队排在前面，也会被监管人员拽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但范长江不允许任何自由活动。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教材。他站在那里，其它人围坐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以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范长江实在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终于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1970年10月23日早晨，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今年75岁的李长俊，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他回忆说：“干校的领导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

呜呼！曾经笔走龙蛇、万众倾倒的一代才俊，竟然如此悲惨地、卑贱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哀其不幸，更怒其不幸之源！仰首天外，我们不能不悲愤地发问：究竟罪魁祸首是谁？

14、华岗：山东大学校长悲剧性的一生

华岗（1903 年－1972 年）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教

育家。

1930 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出版的《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结尾处第一次准确译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931 年在鲁迅帮助下出版《1925-1927 中国大革命史》。

1932 年初，被派往北方，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先到北平，后去唐山，视察指导工作。此时，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任命华岗担任特委书记。当年 9 月，途径青岛时，因叛徒告密，华岗与交通员张永祥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华岗化名刘少陵，并未暴露身份。虽然查无确证，但国民党当局仍对华岗、张永祥判刑 5 年。他们不服，提出上诉。11 月初，高等法院批复维持原判。11 月底，华岗便被送第 5 监狱服刑。1937 年 2 月 16 日夜，华岗等几十人又被送进山东省反省院，次日黎明，他们被押上火车，19 日抵达汉口，他们被送进武昌反省院。1937 年 9 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任作民。迫于当时的形势，反省院于 10 月 16 日，通知二人出院。出狱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筹办武汉《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编辑。

1943 年初，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派赴云南做统战工作，试图争取当时的云南王龙云。华岗化名林少侯，应聘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参加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团结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开展爱国民主运动。1945 年 8 月，国共谈判时任中共代表团顾问。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华岗奉命从香港乘船北上，计划途经上海，再赴北平，到中央某部担任领导工作。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正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继续北上，开往青岛。适逢华岗肠溃疡发作，经请示中央，暂留青岛养病。从 1950 年 1 月起，华岗以教授身份为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做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950 年 11 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周恩来用电话与华岗商谈，征得他同意后，中央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哲学研究》编委，创办《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

华岗在山东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凡是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都与两位副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等共同商量后决定。因此，学校呈现一派生气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山东大学建校以来又一个“黄金时代”。

华岗在山东大学的业绩概括起来有：（一）认真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二）主动抓教学工作。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哲学课和专业课。（三）发扬学术民主。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该杂志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仍然位于“核心期刊”的前列。此外，他还从事研究工作。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辩证唯物论大纲》、《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和《辩证唯物论与物理学》等。

华岗正值人生中年富力强、精神充沛的时段，本来可以运用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做更多工作，却意外地遭受诬陷。以强加罪名被关进‘自己的’监狱。罪名大得可怕：“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1955 年 8 月，华岗的夫人谈滨若先被隔离在单位，不准回家，后因“包庇华岗”的罪名，被开除党籍，行政连降四级。

1957 年秋，华岗被转押北京秦城监狱，在狱中仍然坚持写作并完成了《美学论要》和《规律论》。

1962年中共自己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到1963年均已先后甄别，向明也获释放。“胡风反革命集团”早已定案，华岗与此案所谓“反党活动”更是毫无关系。从 1955 年到 1965 年，整整审查了 10 年，始终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证”。按理应该恢复名誉和自由了吧？可是不行。1965 年 3 月 19 日，当局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华岗有期徒刑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 7 年。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62 岁的华岗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个地方恰恰是他 30 多年前被国民党关押的同一座监狱。

更为离奇的是：1968 年 8 月 24 日华岗 13 年刑期届满、按理应予释放，但却被继续关押。直到 1970 年，军管会才于 3 月 5 日签发了释放令，给他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但又不许离开监狱，而是被安排到监狱里的‘就业队’监督劳动。世上竟有如此无视法制、践踏法律的国度！

长达 15 年的狱中生活，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身患多种疾病，又缺乏起码的医疗和营养，终于病倒在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1971 年 1 月，他终于被送往青岛家中，责令家人负责看护。

1972 年初，临近春节，华岗的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被当局限制不得就医，只得返回济南以就地求医。不料到了济南，仍被拒绝入院治疗。3 月，其夫人不顾一切地请假到济南看望他，继续要求送他住院治疗，仍然不准。其夫人日夜守护着，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反复地说：“我一生无愧于党……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历史将证明我无罪！”4 月，华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但不允许家属陪护，夫人被迫返回青岛。

1972 年 5 月 17 日，这位曾经为中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卖力宣传、鼓吹的忠实信徒，终于在‘自己的’政权无情迫害下，凄惨地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是他留下的唯一遗言；可是他却始终无法理解：自己的冤案是如何造成的？这，该说是他的最大悲剧：死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

【编者按：死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的人多着哩，岂只是华岗一人乎？】

【补白】

20 世纪最著名的学者胡适语录：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5、顾准：倡导市场经济第一人的惨死

顾准是谁？他曾是官员，也是学者。而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顾准（1915—1974 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顾准有兄弟姐妹 10 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在职业学校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 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1930 年（15 岁）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 世纪 30 年代，已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成为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 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学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兼任教授。

此外，他还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 年加入中共。"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 年 2 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1949 年 5 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上海市的财税工作及经济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从国民党手里的烂摊子，转变成支撑新政权最大的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受到冲击，并以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3年后，又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以后，顾准表示不愿从政，希望钻研学术，于是被调去经济研究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在研究中，顾准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弊端从生，其农业、轻工业在革命后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此基础上，于1957年发表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废除市场制度。所以，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经济应通过价格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这个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范畴的理论，在当时却是一声惊世骇俗的呐喊。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那超前的经济观点和抵制前苏联在两国合作项目中对我国利益的粗暴侵害，因而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出党。1959 年 3 月，顾准被遣送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对他反思和认识极左路线的巨大危害有重要作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诞生在这里。1959 年秋冬间仅 4 个月内，这里饿死近百万农民。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下决心潜心研究，找出悲剧发生的原因。1962 年，结束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经济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糊口经济"即当务之急是解决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他认为这是"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这个观点到了'文革'后期则发展为"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的理论。看来顾准的远见卓识实在太超前了，所以才背负着'十字架'成为殉难者。同时他还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 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组织"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反动小团体"。顾准因此而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1974 年 12 月 3 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然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但他还研究过不受制约的权力所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比较、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蕴涵等等诸多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所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仍然有待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大力推进的迫切任务。

顾准失去官位后，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1957 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预见，因此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在上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顾准的观点还影响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他们在 30 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作的论证，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失去了一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官员，却换来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其思想光芒至今仍然在熠熠闪烁，令后人敬佩。

顾准逝世前，不顾巨大的病痛、险恶的政治局势和低劣的物质条件，研究中国和外国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思考中国的现实，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后，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得出了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走向英国式经验主义，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的结论。顾准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笔记、通信等形式保留下来，在“文革”结束和他本人于 1980 年获得平反以后得以陆续出版：1982 年，他的“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出版；1989 年，他与弟弟陈敏之通信写下的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名发表；1994 年出版《顾准文集》；1995 年，在北京举行顾准 80 诞辰纪念会。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还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笔记》、《顾准文稿》等。顾准的思想得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从此，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

王元化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潮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李锐说：“1959 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

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包括：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革命成功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等等。

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李慎之并说：“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著名学者易中天则认为：“鲁迅和顾准是上个世纪两位非常伟大的民间思想家。他们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娜拉走后怎么办？但鲁迅是‘预知’，顾准则是‘反思’。”

【补白】

鲁迅：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16、周居正：“红岩”革命志士竟被枪杀

一部叫《红岩》的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京剧、电视连续剧，反复放映，反复上演，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剧目。在白公馆、渣滓洞被杀害的人被称为“革命烈士”；从中九死一生有幸逃出来的人则被称为“脱险革命志士”，其名单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让后人凭吊和怀念。然而有个名字排在罗广斌后面叫周居正的脱险革命志士，没有死在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却死在他为之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中共政权的枪口下，这是一段被刻意隐瞒了几十年、因而鲜为人知的惨史。

周居正（1930—1964年）四川合川人，大学文化程度。1945年在武胜县就读师专时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还不足十六岁，后失去组织关系，孤军奋战于重庆。1948 年参与和领导“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蒋独裁斗争和“组织民变武装”时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共产党员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离休干部）等同囚一室。1949 年 9 月他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撕下被面欢欣鼓舞地同罗广斌等人一起，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此事迹后来却被张冠李戴、移植到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江姐”的身上）。

【编者按：在中共党史里，像这样张冠李戴的事情多着哩!例如：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是谁领导的？中老年人都知道是李立三和刘少奇。可是到了‘文革’期间，却变成了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毛泽东。‘毛主席去安源’纪念邮票发行了，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风靡一时。其目的就是要让青年们和娃娃们都以为：所有的功劳都是这个‘神’创造的。难怪有位学者直言：整部党史，尽是谎言！信然！】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们又对监狱看守人员做策反工作。（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写的《歌乐忠魂》和白公馆脱险革命志士付伯雍等人所著《狱中斗争纪实》、《浩气长存》等，均有记述。）在这枪林弹雨，命悬一丝的越狱脱险中，他不顾自己身体瘦弱，冒着生命危险，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4岁男孩（此男孩现已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非常英勇，品德十分高尚。

当年白公馆脱险志士，原重庆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离休干部、共产党员郭德贤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监狱。常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 年 11 月 27 日晚，白公馆未遭杀害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带着两个孩子仍被关押在楼上。平时受狱中革命志士教育的看守员杨钦典和李育生，经罗广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正义一边。他打开牢房叫大家赶快冲出去，并告诉罗广斌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两个孩子。罗广斌便派李荫枫和周居正到楼上帮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周居正背着闯出封锁线的……”

就是这么一位曾经为中共夺取政权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赤胆忠心的革命志士，1964年春，竟被中共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0 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岩忠魂》，在幸存者人员的名单中，仍称“周居正志士”，仍有上面那一段越狱脱险的如实记载。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周居正被分配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工作，后又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后改为中央第七中级党校）任教。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对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坚信不疑，在课堂上不断地向中下层干部大讲特讲马列主义原理。他仍然视毛泽东为“伟大领袖”，并且相信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谎言，所以在“大鸣大放”中向党倾诉心曲，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漫长岁月饥饿劳累的折腾，终于1962年初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但仍不能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做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位于四川永川县的新胜茶场（简称“劳改营”）“就业”。他性格内向，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他若不是“阶级敌人”的话，估计此书早已出版问世。

就在解除劳教前夕的1962年1月，四川省劳教筑路支队留下几名解教人员在广（元）旺（苍）铁路沿线处理善后赔退事务，他是其中之一。他和职工三队留队就业的魏昭等5人派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中间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抽烟，闲聊，各自畅谈自己被

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的看法。

谁知这些毫无戒备之心的人，随意闲聊，经人举报后，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竟成为全省以至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者达数百人。

冤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当时更是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时有发生。在强大“无产阶级专政”淫威的胁迫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分子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 69 名难友送进了监狱，周居正也从新胜劳改茶场被捕，还被臆断为‘首犯’。

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向案件的当事人魏昭和周居正亲属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吴某讲：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是沿袭反右派扩大化错误，强加于周居正、魏昭等人的。原判认定周居正、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的结果。全案查获的惟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一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这篇被当作“反革命纲领”的文章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先觉分子、工人阶级中的先觉分子和农民中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即：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发展工农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建立民主、富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全案就是根据这个所谓“反革命纲领”，根据长时间“刑讯逼供”所得到的“供词”强行判决的。

这位律师认为：周居正所写文字，虽然有对毛泽东攻击的言词，但是针对当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提出“三个坚持”和“三大目标”，提出依靠工、农、知识分子的先觉分子，建设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无不当。周居正所写文章，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因而不构成犯罪。

筑路支队的狱官们不少人为此而立了“大功”，加官进爵，封妻荫子。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潜规则结案，对‘供认’或是‘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右派，原沪洲军区中尉教官，共产党员）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别杀害于永川和灌县；魏昭（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九龙区政府卫生科科长）、陈仲伟（右派，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技术员）、廖廉康（右派，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三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彭恢荣（右派原某县粮食局会计）、杨全松（右派，南下干部原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朱文安（右派，原四川什邡县，单位职务不详）冉茂涵（右派，长寿县小学教师）等四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其它彭福志（右派，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长）等 14 名人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委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分别判处 10 年至 20 年有期徒刑，另外 46 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判决。此亘古奇冤大案，至今未获得“平反”，成为千古悬案。

据目击者事后说：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像在喊什么，但行刑的公安人员马上用毛巾堵住他的嘴。

【编者按：用毛巾堵嘴，比较张志新被割断喉管，还算比较仁慈。目的都是不许被害人申诉冤情。经常看到共产党拍的电影里，革命烈士临刑前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侩子手要等到烈士喊完了才开枪。令人怀疑：如果这样的场面是真实的，那就说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残忍、更野蛮。如此宣传的效果，岂不是适得其反吗？反之，如果是虚构的，那又说明：共产党的宣传是多么虚伪、纯属欺骗。二者必居其一。】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给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周居正被划右派劳教后，其长子周复生，次女周复苏受株连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当知青。周复生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视和生

活上的煎熬，用镰刀割喉身亡。文化大革命中，周居正的妻子曾昭英（教师）也被戴反革命帽子遭批斗……留在身边伴她的小儿子，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投江自杀。现在年逾古稀的曾昭英老师，在惟一的女儿周复苏的伴护下，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但仍然坚信历史会还她丈夫以公正。

值得庆幸的是：曾参与复查周居正一案的部分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检察院检察员，从不同角度分析，均认为该案不论原判认定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是否成立，都不构成反革命罪。（按：所谓“政治纲领”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构成反革命罪）。

另外，周居正当年蹲监狱的战友、老党员孙钢、杜文博、刘德彬、郭德贤、傅伯雍等也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信，为之呼吁复查。但此案至今仍未平反。

【补白】

106 岁的老寿星、著名学者周有光语录：

一个国家不怕骂才有希望；不许讲缺点是缺点当中的缺点。

科学不需要信仰，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信仰不许批评否定的，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可以天天批评它，哪天你能创造一个推翻它的理论，那你就了不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谁发动的？大家都说是德国发动的，但并非如此。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共同发动的，他们定了密约瓜分波兰、瓜分欧洲。一个国家发动和两个国家发动是完全不同的。

第 2 单元　科技精英

1、饶毓泰：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 文革中被迫自杀

2009 年初，网上评出“美国顶级名校知名华人”，居首位的便是饶毓泰。依次才是曾子墨、张朝阳、李政道、钱学森、宋庆龄等人。

饶毓泰（1891—1968 年）字树人，出生于江西临川。早年在上海求学时，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因胡适兼任英语教师，他又成了胡的学生。

1913 年饶毓泰考取了省派的公费留学生名额，远赴美国学习物理，1918 年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2 年又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他随 K.T.康普顿教授从事当时物理学前沿的气体导电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水银蒸汽的低压弧光和它对荧光的影响》就发表在美国权威的学术刊物《物理评论》上。这是当时气体导电研究的一项新成就。饶毓泰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先驱。

1922 年回国。适逢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主持南开大学，广为延揽人才，当即欣然应聘，并将其在美国定购之仪器全部献出。从此物理学乃有实验室，物理系亦正式成立。饶毓泰为该系创建人，担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

1933 年又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回忆道：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 1931 年前后的事。1933 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因为理科获得袁述之及美国罗氏基金团之捐助，已开工兴建科学馆——思源堂，美国的吴鲁德（P.I.wold）博士来授课一年，并帮助规划科学馆之实施。饶毓泰同时开普通物理、分析力学和初步光学等三门课。吴鲁德返回美国后，适陈礼教授来校。他是学电工的，讲交流电和无线电课。饶、陈同心协力，为新购置的仪器

进行调试与安装、电流导线的布置等均费心尽力。经他们几年谋划与改进，在科学馆建成了普通物理、电学、光学、热学等实验室，为后来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饶毓泰呕心沥血，培育人才。曾在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学习、曾受教于饶毓泰，而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有：刘晋年、江泽涵、申又帐、吴大任、陈省身、郑华炽等。有的优秀学生，后来在我国物理学界成为栋梁之才。例如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即是。

吴大猷，1925 年入矿科，次年转物理系。据他回忆大学四年他曾随饶师学习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学和高等电磁学等多门课程、吴大猷说：“学生由他获益处，不在流畅的演讲，而在其对学术了解之深，对求知态度之诚，对学术的欣赏与尊敬．以及为人的严正不阿的人格之影响”因此对吴大猷“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起到了关键的、亦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影响”。

饶毓泰十分关心年轻人，对他们多予鼓励、帮助。1927 年，正在读二年级的吴大任对现代物理兴趣极浓，课余常到阅览室去看物理杂志。那时宇宙射线刚被发现．对它只有初步观察和分析尚未定名。吴大任写了一篇《大宇中的高频率辐射线》的短文，加以报道，登在学校理科学会的小报上。饶毓泰看后异常兴奋，决定重点培养。饶毓泰对文科学生叶恭绍的帮助，更使人难以忘怀．叶恭绍青年时代就立志学医，1927 年她考上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而不能去，上了南开大学文科而不愿意读。当时，饶毓泰任理科主任，亲自帮她转科，还为她设计了选课方案，使她按医学预科的要求学习，实现了她学医的夙愿。她回忆道：“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南开大学前副校长吴大任则写了《赞“实事求是”精神》一文，盛赞饶师精湛的学识和高尚的师德。

为了培养现代物理学人才，饶毓泰还常在课内外向学生介绍物理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路。当年，吴大猷听过他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原理》演讲。大学三年级时，吴大猷就开始研读‘狭义相对论’。1929 年，吴大猷毕业，饶毓泰把这位成绩“极其杰出”的学生留校任教，让他挑起重担，并从中得到锻炼。饶毓泰还与叶企荪联合推荐吴大猷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深造。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1929 年—1932 年，饶毓泰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波茨坦天体物理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他在研究铷和铯的原子光谱线的反斯塔克效应时，观察到这两个元素主线系的分裂和红移。这一发现充实了量子力学应用领域中的实验数据，具有重大意义。其论文旋即在德国的《物理学期刊》上发表。

1932 年 8 月，饶毓泰从德返国。他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一年。翌年 6 月，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研究教授”，后兼任理学院院长，同时担任过中国物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物理学报》编委。

那时，北大物理系正面临着重重困难。饶毓泰花费很多心血进行物理系建设工作。据虞福春说，1934—1935 年，“在我二、三年级的时候，饶先生聘来了一批新教授，有周同庆、张宗蠡、朱物华、吴大猷等。此时，北京大学物理系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招收了研究生如马仕俊、郭永怀等。”

饶毓泰在北大除了亲自给学生讲课和指导实验外，为了改变物理系的面貌，他还制定了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特别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开展实验研究工作。他和吴大猷、沈寿春等人开展了斯塔克效应和喇曼光谱等研究工作；还建立了金工车间，利用进口摄谱仪的光学组件自制大型摄谱仪一台。当时系里教师少，教学任务繁重，饶毓泰就同时讲授二至三门课。饶毓泰还强调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坚持教学和科研不可偏废。在他的领导下，青年教师都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分子光谱理论和光谱学实验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教学上，他重视演示实验，并决定把原北大理学院的一个小礼堂改为阶梯教室，建立了演示实验室。1937 年 5 月底，被誉为“现代理论物理大师”的丹麦物理学

家 N．波尔来北大演讲。据郑华炽教授回忆：演讲前，波尔参观了物理系的实验室，他看到我国竟能制造这样大型先进的光谱仪，并能拍照出 984 谱线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经过饶毓泰和教师们的不懈努力，北大物理系在许多方面呈现崭新的面貌。那几年教出的学生，如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后来皆出国学习物理，大有成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奉教育部命令迁往长沙合组临时大学。饶毓泰偕同夫人，辗转跋涉，历经艰苦，才抵达长沙。11 月，他送夫人返沪岳母家，自己则随校到昆明执教，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不幸，夫人在沪旋得伤寒病去世。饶毓泰忍受着丧妻之痛，孤寂至极，又患胃溃疡病。但仍然坚持教学和科研。在滇六年中，他不辞辛劳，勤勤恳恳、孜孜矻矻，因而留下了许多“师生谊、世罕有”的佳话。

饶毓泰身体不好，住在离校很远的乡间，交通不便，他只能坐农村的马车或步行到校上课或办公，亲自讲授“光学”和“光的电磁理论”等课程。学生郭沂曾回忆说：“他讲课全用英语”，“喜欢课堂上向学生提问。他给学生打分也不单凭考试卷子，而是结合平时提问来打。”

饶毓泰主张在艰苦的条件下也不应放弃科研。例如：有的教师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一台光谱仪就可进行喇曼效应的实验研究。此外，他严格督促青年助教写出论文，优秀的可在《物理学报》和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

饶毓泰甚至为自己的学生吴大猷教授校对专着《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该书出版后即荣获‘文江奖金’并饮誉海外。他还关怀流落在沦陷区的研究生虞福春，帮助他辗转抵达昆明任教。为了扶植物理学的后起之秀黄昆，他设法腾出编制，聘其为助教。这些事情，他从不向人谈及，表现出高尚品格。

饶毓泰德高，资深望重，他是“部聘教授”。他和联大许多知名教授，如吴有训、叶企荪、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郑华炽、霍秉权等人齐心协力，精心培育了不少优秀人才，如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这在中国科学教育史上堪称辉煌的一章。

抗日战争前后，饶毓泰指导并与他人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1944 年，他自费去美访问，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高难度的研究。他精通英、德、法语，可以很顺利地与国外科学家交流、合作。例如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期间，与 A．H．Nielsen 等人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并获得公认的突出成果。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抗战军兴，弃教从政”的胡适，在被蒋介石解职三年后，又起用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随即扩建至文、理、法、医、农、工六个院，聘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同时还开设“理论物理”等课程。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 年底，平津战役尚未打响，饶毓泰已看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垮台，决心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年国民政府计划抢救的学者共 60 人，其中就有胡适和饶毓泰二位，飞机一直在机场等候。但饶毓泰不为胡适劝说所动，毅然留下，并劝其它教授不要南飞。

1949 年后，饶毓泰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潜心于教研，而淡泊名利。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他不再担任物理系领导工作，但仍以花甲之年关心系里的发展，亲自参加光学专门化建设工作。他体弱多病，医生只允许他半天工作。他除了指导研究生外。还亲赴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编写讲义，先后开设了“原子光谱”、“光的电磁理论”、“气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激光问世后，光学和光谱学得到迅速的发展，饶毓泰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专门为他们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等反映当时科学发展前沿的课程。“桃李成林师成叟”。饶毓泰终因健康原因，没有实现别人希望他写“光学”著作的愿望。他甘为人梯，愿做“铺路石”的献身精神，却留在人们心间。

“文革”狂飙袭来，玉石俱焚。即使是饶毓泰这样居功至伟、而又老迈年高的大科学家

也不能幸免。饶毓泰是物理学界许多人的老师，或者是老师的老师。但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充满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带高帽子，挂黑牌，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据北京大学文革期间的记录，文革中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除一人外，全部被“立案审查”。仅北京大学有 63 人被迫害致死，正教授中被害死的比例为 10%。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正好是‘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这是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原因是：1949 年后，不允许中国人出国留学或者旅行；而早年出国留学的饶毓泰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了。

1968 年 8 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 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家中是否有婴幼儿，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学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有的人还被单独“隔离”，或者遭到昼夜连续审讯和殴打。物理系的人则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在这座大楼里，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互相“揭发”。在那一阶段，先后有 24 人自杀。当时饶毓泰已经 77 高龄，但是仍然要承受这一切。当他无法承受时，只好亲自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了。196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饶毓泰在北大校内燕南园 41 号家中的自来水管子上吊身亡。

中国物理学奠基者人生的最后一幕，居然是如此残酷！

【补白】

梁启超语录：

我国万事不进步，唯独防民之术超过先进国家，此真可痛哭也。

2、叶企荪：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晚景凄惨

“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的尊号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封赠的，更不是官方可以‘御赐’的，应该具有无可争辩的世界性成果，并且为学术界权威人士的一致认可。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科学奖的李政道博士无疑是一位‘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家’。他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叶老师才是真正的“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那么李博士的评价依据何在？

叶企荪（1898~1977 年）出生于上海。其父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事业，为时半年。1914 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荪于 1913 年进入清华学校。叶的少年时代讷于言、慎于行，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1915 年在清华同学中发起组织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开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演讲。“范围极广，如天演学说、苹果选种、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废物利用，等等”。该团体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在那种青翠欲滴的朝气里，充盈着中国大学里刚刚起步的青年们的勃勃生机。

叶于 1918 年毕业后即出国留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教授。1920 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 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在系主任和院长的岗位上，从 1926 年到 1937 年，他先后为物理系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

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知名学者。此外，在理学院其它系还聘请了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位。总计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是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或科学院的院士。

中央电视台女记者柴静在她的随笔“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中这样描述这位大科学家、教育家：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认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此外，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 年任会长。他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于 1948 年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7 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第二年，他刚满 30 岁时即当选为评议员。便锐意进行改革，实行教授治校。后来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 1929 年至 1931 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钱学森就是那个时候受业于叶企孙。他最了解了那段历史。因此不难推断：他最应该知道：教育的规律是什么？钱学森临终前的那一问，肯定有他自己的答案。也可以说此问是他的回头一望，当然也是他的、整个国家的世纪之问。

1952 年实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荪被分配到（在中共政权下，教授没有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只能像毫无生命的物资一样被‘分配’）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据其学生岑超南先生的回忆，在北大期间，又聘请了国内著名教授施汝为、潘孝硕以及刚从美国回来的李荫远及向仁生等位教授为本科生开课。

叶企荪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项：一、早年和 W•杜安、H•H•帕尔默合作，用 X 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 h，得出当时用 X 射线测定 h 值的最高的精确度。这一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 h 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 16 年之久。这一年他才 23 岁。许多大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听到“普朗克常数”这个名词。须知：量子力学是物理科学的前沿学科，而普朗克常数又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叶企孙先生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不言而喻。二、他是我国研究磁学的第一人，他开创了高压磁化的正确方法，把压强从 200 多个大气压提高到 12000 大气压，取得了不同于前人的新成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新途径。这是本世纪 20 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他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是成绩卓著。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从他的门下走出了 79 位院士，桃李满天下，应非虚言。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周培源、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受到他的提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的称号，对于叶企孙来说，无疑是当之无愧。因为他是中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他对中国物理学研究、理科研究、教育事业乃至世界物理科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叶教授并不是躲在象牙塔中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能够坐言起行、勇于实践的专家。叶

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兵工建设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为抗日战争伟大事业奉献青春和热血。其中还有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 1942 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学子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

叶先生还有一位学生叫熊大缜，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在中共御用文人们胡乱编造的电影《地雷战》里，几个“思想觉悟特别高”的农民就可以“捣鼓”出来地雷，甚至造成侵华日军大量伤亡。长期以来，无数观众对此情节经常津津乐道；于是以讹传讹、积非成是。在这部电影里根本就看不到爱国学生们的身影。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这部电影和其它许多御用宣传片一样，纯粹是向壁虚构之作。真正的地雷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历史的真相是：在抗战初期，正是这位叶企孙教授最器重的学生熊大缜出于爱国热情立刻投笔从戎，参加了吕正操将军所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熊先生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来叶企孙教授又派一批清华师生和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军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叶先生本人还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 TNT 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当时有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在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教授甚至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抗日军队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据其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毅然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叶企孙教授挺身而出。但是，在另一场更惨烈的灾难中，智商过人的叶企孙却未能幸免。

熊大缜从军后不久，竟然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当时弹药奇缺，所以是用石头砸死的）。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文革”开始后，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刺探情报的。而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技术援助，则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蓄意所为。1967 年 6 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先生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 年 4 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那时候的国务院、军委，乃至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有权‘逮捕’任何一个平民百姓，真是应了毛泽东那句名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他只是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1969 年 11 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北大当局（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直接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叶企荪继续戴着“中统特务嫌疑”的帽子，受到歧视和监视。从此，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政府发给叶企孙每月 50 元生活费。1972 年 6 月才恢复其教授待遇，也恢复了每月 350 元的工资，在北大中关村园给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有一次，叶企孙在马路上遇上钱三强，钱过来打招呼，叶马上叫他离开，以免影响到他。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叶教授已是年逾 70 的老人，又是一介书生，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腰弯到了近乎 90 度，但

仍然被迫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其情其景惨不忍睹。在超负荷的强迫劳动中，体力实在不支，因而屡屡受到责罚，处境非常狼狈。他的一位学生后来透露："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刘克选、胡升华合着的《叶企荪的贡献与悲剧》一书中，曾描述先生的凄凉晚景："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荪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悉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见到此情此景，铁石人也要伤心落泪！由于长年的运动折磨和营养缺乏，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到了最后疾病缠身，前列腺肥大，两脚肿胀，小便失禁。

叶企荪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人照顾。加上他是"特务案"，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可谓孓然一身，贫病交迫。有时坐在一张旧藤椅里，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了此残生。

在他生命的尽头，昔日的学生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大意是：由于我的狂傲不羁，终于招来杀身之祸，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也应该把我当作罪人看待，抛弃我吧。但平我平生的言行举止自己心里最清楚，应该可以追寻的。至于能不能被理解？我的本意，你们后人恐怕未必完全理解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叶企荪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光，借用古人的语言想表达什么？无疑是想通过古人的语言来宣泄自己多年积压在心的满腔悲愤和无限哀怨、无尽冤屈吧？

在贫病交迫、万众冷漠的晚景中，物理学一代大师度过了极其凄凉的余年，死于 1977 年 1 月 13 日。

历史这个东西"道是无情却有情"。叶企孙教授死后哀荣备至：1987 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当即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1990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1992 年，海内外 127 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提议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 年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铜像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2000 年，《中国科技的基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忠实地记录下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传记里还详细揭示了叶企荪所谓"特务案"的真相。传记作者非常真诚地为叶企荪辩白，说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2000 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等五位物理学界前辈，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叶企荪）、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学奖，其中叶企孙物理奖授予凝聚态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2010 年 12 月 7 日，纪念叶企孙的同名话剧《叶企孙》在清华大学首演。

谨录叶先生的弟子张耀西的诗作为本章的结束语，同时也表达我们的悼念：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何罪之有？相煎甚急！

山河动容，松柏含悲。波涛呜咽，飞雪六月。

品格贤达，国人悉之。去邪尊正，国人能之。

功如泰山，国人敬之。君子之风，国人铭之。

呜呼！安息吧！敬爱的叶企孙先生！

【编者按：在'文革'狂潮中，多少学术权威、大师都受到无缘无故的冲击和迫害，何止是一个叶企荪？'文革'的迫害从规模上来说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从方式上来说则是空前残酷、野蛮的。'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当时发布的命令件件俱在、昭昭可考，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文革'对打击目标和方法都是预先设定的、有计划进行的。他们还具体指导了在全国同时、同步地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和虐杀。'文革'害死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民。用国际法律术语来说，这叫做"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即"群体性灭绝罪"。'文革'绝不仅仅是对个别人因弄错了而造成的什么'冤案'。用'冤案'二字

来概括和描述叶企荪之死，显然是隔靴挠痒、没有抓住要害。】

清华大学树立叶企孙教授铜像

3、熊庆来：一代数学大师之死

提起熊庆来这个名字，也许人们感到有些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华罗庚，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其实，华罗庚的功成名就恰恰是由于熊庆来慧眼识珠。在熊庆来的发现、培育下，才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初中生一跃而成为名闻中外的大科学家。

熊庆来(1893.9.11～1969 年)，中国著名数学家，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字迪之。1907 年，考入昆明方言学堂。1909 年，升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1911 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 年获得公费名额，赴比利时学习采矿专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得转赴法国，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他用法文撰写发表了《无穷极之函数问题》等多篇论文，以其独特精辟严谨的论证获得法国数学界的交口赞誉。1921 年，学成后回国，先后在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 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 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于 1957 年由巴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熊庆来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再加上非凡的记忆力与天才的语言接受能力，常令教过他的中外教授们惊叹。

熊庆来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由于他在“函数理论”领域造诣很深，1932 年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1934 年，他的论文《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发表，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在这篇论文中熊庆来所定义的“无穷级函数”，被国际学术界以其姓氏来命名为“熊氏无穷数”，被载入了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熊庆来同时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数学教育家，几十年来，可谓桃李满天下。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都曾是他的学生。熊庆来很早就立志从事教育工作，把培育人才当作头等大事。特别是对于有培养前途、但家境贫寒的学生，他经常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因得到熊庆来资助才得以出国深造。为资助严济慈，当时自己也经济拮据，熊庆来不惜让夫人当去自己御寒的皮大衣。在 60 年代，他不顾 70 多的高龄，仍然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那就是杨乐和张广厚。所以他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能够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30 年他在清华大学任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一篇《论苏家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的短文中，敏锐地发现了作者非凡的数学天才。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此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数学天才和自学毅力。面对校委会的质疑和劝阻，熊庆来力排众议，不惜以“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震慑性语言，终于赢得校方同意，打破常规，让其进入清华大学，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员，破格担任助教工作，后直接升为教授，并前往英国留学，终于把他造就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此人就是日后名闻中外的数学大师华罗庚。因此而成就了数学界、乃至整个教育界津津乐道、流传甚广的一段佳话。

熊庆来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著述，他编写的《高等数学分析》等 10 多种大学教材是当时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数学教科书。他还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

算学研究部和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 3 所大学的数学系，以及中国数学报。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在缪云台、龚自知、方国瑜等人的推荐下，熊庆来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为云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云大，只有 3 个学院，39 个教授，8 个讲师，302 个学生，教学设备极其简陋，教学质量也不高。熊庆来利用抗战初期各方人才大量涌入昆明的机会，广延人才，延聘了全国著名教授吴文藻、顾颉刚、白寿彝、楚图南、费孝通、吴晗、赵忠尧、刘文典、张奚若、丘勤宝、方国瑜等 187 名专任教授和 40 名兼任教授，还延聘了一些外国教授，使云大成为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又一个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教学质量因此跃升至全国名牌大学之列，并被《大英百科全书》收录于世界名校之位。在熊庆来主持校务期间，云南大学已扩充成拥有 5 个学院，18 个系，3 个专修科，1 个先修班的多学院、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学生人数达到 1100 多人；1939 年又创办了云大附中。他还不断充实图书和教学设备，使图书馆藏书达十余万册，理科各系都有比较完善的实验室和标本资料室，医学院拥有附属医院及解剖室，农学院有实验农场，数学系在东郊凤凰山建立了天文台，工学院有实习工厂，航空系有飞机 3 架，如此规模在全国高校中也是罕有的。

他还注重建设校园文化：亲自撰写《云南大学校歌》（“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森森，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诚、正、敏、毅”的四字校训，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诚实、正直、聪敏又有坚毅的学习精神。在熊庆来任校长的 12 年里，云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异，被认为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l949 年熊庆来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不幸患脑溢血而致右半身瘫痪，但他并未向病魔屈服，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用左手写字，艰难地继续投入数学研究工作。1957 年熊庆来在周恩来的一再邀请下，不顾台湾当局的利诱与威胁，毅然回到大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熊庆来以残而不废之身“尽瘁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并培养了杨乐、张广厚两位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这样一位贡献卓著的知名学者，在“十年浩劫”中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熊华(罗庚)黑线”人物，受着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摧残。20 世纪 50 年代，不善言辞的他外出视察时，也学会了写下“前景无限好，处处见光明”这样歌颂祖国的诗句。然而，这般表态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使他避免被打倒的厄运。在延绵不断的批斗和屈辱折磨下，心力交瘁。终于在 1969 年 2 月 3 日的深夜，在凛冽的寒风中，熊庆来这个曾经为中国数学教育事业做过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毅然决然地从无限痛苦中脱身，与世长辞。一代数学泰斗就如此凄凉地离开了人间。在他的桌前仍然摆放着没有写完、也永远写不完的交待材料。

熊庆来死后，华罗庚闻讯奔丧，从熊家直奔火葬场。见到恩师的遗体时，这位在国际学术讲坛上曾经侃侃而谈、议论风生的数学大师却抚尸痛哭、老泪纵横。他哭什么？哭恩师之死，还是另有其它难言之痛？

【编者存疑：熊庆来到底是如何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自杀，又是采用什么方式？编者查阅了好几篇资料，都语焉不详。但可以断定的是：他是在逆境中怀着一腔悲愤、满腹委屈而死的。何以见得？且看如下表述：“在他的桌前仍然摆放着没有写完、也永远写不完的交待材料……”】

4、赵九章：“651”卫星设计院院长服安眠药自杀

赵九章（1907—1968 年）浙江吴兴人，是国民党某高官的外甥，后来又担任这位舅舅的机要秘书。拥有如此背景的他，若要走向仕途，自然是前程似锦、无可估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和学问的道路。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舅舅时常发生矛盾，后来干脆离开国民党机关。靠着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用三年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术水平，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成问题。可他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并开创了我国动力气象学的研究。

1949 年后，赵九章对于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的发展和海浪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还担任‘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的卫星事业殚精竭虑、兢兢业业。

‘文革’之始，他便因为亲属关系而被勒令‘靠边站’，接受批斗。1967 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力统统被剥夺殆尽。除了在学习班反省，便是夜以继日、没完没了、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更为难堪的是，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斗一番；游斗时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牌子，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游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部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熄灭为止。可他的腰还是弯不下去。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会好”的幻想渐渐消失，随之涌出的是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还能偶尔打听一下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这个权力也被剥夺了。焦虑、空虚和失落齐上心头，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危难之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人，又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但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追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助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据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所有纸片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但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电话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一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泪水汩汩而下……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也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同样的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

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还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其动机无非是为了表明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更无权过问，涉及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不已，潸然泪下。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细铁丝，因此，脖子上很快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机会来折磨他：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受伤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消耗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去接受批斗。

虽然身陷困境，但他那颗对人造卫星关注的心，依然不改。这就是科学家对事业的执着和痴迷。然而，1968年6月8日，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在武斗盛行，一切工作停顿的情况下，由于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热爱，坚持照常上班。当他下班回到家中，一群造反派破门而入，拳打脚踢。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打。几个小时后，在野兽们的残酷虐杀下，姚桐斌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位邻居发现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更粉碎了赵九章那最后一丝幻想，对赵九章既是沉重的一击，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此后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每当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对着繁星点点的夜空。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栗，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

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1968 年 10 月 10 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然后起身走进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这个恐怖的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据网上资料统计：在赵九章自杀的 1968 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 20 个！可惜编者目前尚无法搜罗齐全，实在有愧于这些先烈的在天之灵。

【编者存疑：赵九章先生是谁的外甥？网上几则资料都称：他是特务头子戴季陶的外甥。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外甥，或者是戴季陶（不是特务头子）的外甥。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一律被认为是敌特嫌疑，应该同敌人一样对待，则是那个年代的‘潜规则’。】

【补白】

“崇拜的背后其实就是恐怖；没有恐怖也就没有崇拜，至少没有如此广泛的崇拜。政坛人物毕竟不是宗教里的神，要想达到拜神一样的效果，没有若干不敬者的人头落地，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

——北京大学教授张鸣（引自《随笔》2009 年第 3 期 156 页）

5、黄万里：没有院士头衔的科学泰斗壮志难酬

黄万里（1913—2001 年）祖籍原川沙县（今上海）著名爱国志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第三子。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坚信：贫困、愚弱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

黄万里具有深厚的数学和力学功底。1932 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任浙赣铁路见习工程师。1931 年长江发大水，水淹武汉三镇 100 天，死亡人数超过 7 万；1933 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和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打算学成后治理黄河与长江。1934 年出国，在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爱沃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水利工程的科目，更潜心研读有关的水文、气象和地理等学科。1935 年、1936 年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937 年回国后，任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工程师，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他是从最基层实际工作做起的，终于在 1947 年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主持陇西农田水利工程。

从严格意义来说，黄万里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少，而大江大河的治理却始终没有找到勇于担当的人才。1937 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的黄万里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高超实践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 年，这种实践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短暂。1949 年后，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可是当地领导既不顾也不问，使他无事可做，难以施展才干。后来只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水利人才。

进入了大学校园的黄万里，其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 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 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也不了解黄河的习性；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居然没有一个敢于仗义执言出来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只有黄万里孤军奋战、力排众议。他认为“高坝栏沙”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与其它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最后三门峡工程还是上马。黄万里却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 100 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 年陕西省 5 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 50 年一遇的大灾，225 万亩良田绝收，500 万人受灾。这一切，无疑都是三门峡水库所造成的恶果。

1957 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还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这种谬说实际上是出于政治需要，甚至是阿谀奉承，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8 年 11 月 25 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 年 6 月高坝筑至 340 米，开始拦洪，同年 9 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 80 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背井离乡之路。这一切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之中。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揭示了黄河泥沙与三门峡大坝相关性的科学真理。

1957 年 6 月 19 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这篇小说语言辛辣、内容深刻，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讽刺两类知识分子：歌德派（歌功颂德）、但丁派（但只盯住党员，随声附和）。该文被毛泽东看了并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此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当清华大学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仍然在绕着太阳转。”此言气贯长虹、掷地有声。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只有黄万里这样的人敢于直言无忌。

作为右派，于 1961 年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动，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其实，1964 年黄万里曾有一次摘右派帽的机会。毛泽东在一次与黄炎培的会面中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希望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顺势“摘帽”。出人意外的是，黄万里没写检讨，却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而 1957 年三门峡 70 人辩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它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为的是什么？”从此，摘帽一事自然无法再提了。这就是黄万里的风骨和人品！

历史无情。1960 年 9 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 13 亿元，但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 40 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 1959 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频临崩溃边缘，广大农村大量饿死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

的特别优先保证。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 40 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 800 亿斤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 40 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 15 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照黄万里的预言实现了。但黄万里作为右派的身份却始终无法改变。

1969 年，黄万里与清华大部分师生被下放去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里是血吸虫疫区，很多下放的学者都死在该地。这时黄万里已是 58 岁，却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令人气愤的是：黄万里竟被工宣队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开批斗会，由于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务罪行"，工宣队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既久，身心俱疲。最后，神志恍惚，以至于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居然给大女儿黄且圆写信，叫她帮助回忆。1970 年，黄万里在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因中暑而昏倒。当他自觉不久于人世时，曾留下绝命诗：

七绝《梦吟绝笔》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岛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苍天眷顾他，又起死回生。但活罪不免：1974 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他在此期间仍然坚持研究水利，并勤奋写作，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为之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央视 2003 年 10 月 31 日《经济半小时》节目谈到三门峡工程时，竟然歪曲史实，只字不提当年反对工程上马的黄万里。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又一个重大工程——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但没有邀请黄万里教授参加。但黄万里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心出发，先后 6 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监察部写信，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只需要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但是这些信件都如泥牛入海。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高坝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 1992 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 1767 票通过，反对 177 票，弃权 664 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极权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机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和道德的全面摧毁，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仅仅给我 30 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他们不给我这个机会。当年三门峡工程上马前，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却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被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2001 年 8 月 20 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 90 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 天之后，8 月 27 日，黄万里走完了 90 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在断流，而长江三峡也紧锣密鼓地准备上马。

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前，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

万里老朽手书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 年 8 月 8 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

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和痛苦的江河。

最近有史料记载：黄万里曾两次亲赴李锐家里，留下这样的话：“三峡建成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一样）也将铸三个跪着的历史罪人：中间是钱正英，两边则是张光斗和李鹏。”

在 9 月 4 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沉痛地断言：在国内水利学界，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2011 年 8 月 20 日上午，清华大学校方主持召开黄万里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有一面“十万青年致敬”的纪念牌，上书：“甲子炎黄少铁骨，万里中华真脊梁”。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遗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一切的是非功过，让历史来做作证吧，让实践来判断吧！让后人来评议吧！

6、张宗燧：张东荪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迫自杀

张宗燧（1915～1969 年）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次子。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出生于浙江杭州，1930 年，张宗燧以 15 岁的低龄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清华大学，有幸受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的面授。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攻读学位。同年报考庚款出国留学。因为物理专业名额仅一人，吴有训建议张宗燧改考天文专业，张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庚款赴美的名额，后去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张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时国际学术水准，欧洲高于美国；他竟然放弃“美庚款”，次年报考“英庚款”数学专业，第四届“英庚款”数学专业仅仅录取两名，张宗燧名列其中。

1936 年，张宗燧入剑桥大学数学系，受业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福勒（R．H．Fowler），两年发表了论文七篇，获博士学位。张宗燧在“合作现象”领域，特别是关于“固溶体的统计理论”方面，取得优异成果，《贝特的有序—无序相变理论在合金上的推广》及《一个系统的位形数目与合作现象》等优秀论文，使他开始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崭露头角。1938 年，福勒举荐张宗燧去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发源“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他有幸会见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罗森菲尔德（Rosenfeild）、维克（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A.H.Wilson）等国际著名学者。在这些现代物理学先驱的影响下，张宗燧进入量子理论最前沿的研究。

1938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赴丹麦、瑞士进行科学研究。1939 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身边工作，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论的学术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对于方位角的依赖》。玻尔研究所的自由学术气氛，诸多大师的指导和合作，使他的学术水平迅速飙升；而狄拉克方程的美丽简洁，午茶时无拘束的讨论，是他经常的回忆的往事。这段在丹麦和瑞士的美好时光，使他终身难忘。年轻的张宗燧受到玻尔全家的关怀，而且得到了玻尔本人的赏识。1939 年 1 月，在一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突出的水平，他

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内涵。

1939 年秋，欧洲局势严峻，张宗燧受中央大学之聘回国，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在重庆任教的六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及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篇。他为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论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如《标量介子的性质》、《$\delta A_{\mu}/\delta x_{\mu}=0$ 的量子电动力学》，和后来的《含有高阶导数的场论》等，都受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1945 年，抗战胜利，受李约瑟推荐，张宗燧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时年三十岁。1946~47 年期间，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大学的讲坛。有鉴于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50 年版)。1948 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及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等职。张宗燧在北京大学讲授热力学和原子核物理，并指导研究生，后来为中国国防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他擅长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1951 年开始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 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学部委员。

张宗燧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教学中成绩显着，获得大家好评。他先后培养研究生多人，他的好几位学生都在我国各有关科研领域内发挥着骨干作用。张宗燧热爱祖国，因此在解放前夕毅然回国，他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他热爱科学，刻苦钻研业务，在理论物理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30 年代在国外对统计物理进行了不少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取得创见性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于回国后继续在合作现象和量子系统的各态历经问题等研究方面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是中国较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学者之一，30 年代后期即进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方面很有创见，取得多项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40 年代后期，在理论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物理、层子模型等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有《电动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等专着。

张宗燧的父亲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母亲吴绍鸿贤惠持家。在学术世家的长期熏陶下，在父辈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形成了张宗燧的学者性格和作风。

张宗燧是我国最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的科学专着和论文中曾多次被引用。1965 年还参加了层子模型的工作。他一生勤奋，30 多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科学著作三本。

张宗燧从 1937 年起，他就在国外从事统计物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方面发表的主要论文有 10 余篇，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从 1940 年起，张宗燧又开始研究量子场论，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高价微商、高自旋粒子的场论等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工作达到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并卓有创见。1949 年之前这些方面他曾发表论文 10 余篇。1949 年我国解放时，正值量子场论取得一大进展以后，1948 年出现了避免量子场论中发散困难的重正化理论。因此解放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国量子场的研究是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的。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方面，可以张宗燧的《On•Weissistheoryoffields》(《物理学报》，7，1949)、《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物理学报》，14，1958)两篇文章为代表。1952 年以后，重正化理论的研究及其应用，基本告一段落，量子场的研究转入别的领域。在非定域的研究方面，张宗燧的工作具有代表性，

曾经比较了二种含有高价微商的量子场论。这可参见他的论文《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由于进一步讨论高自旋粒子波动方程时感觉有消除辅助条件的需要，张宗燧写了《分析力学中正则方程的简化》(《物理学报》12、1956 年)。张宗燧具有代表性的另一工作是应用狄拉克在 1938 年提出电子的古典理论时所创造的方法，讨论粒子在标量介子场作用下包含有辐射阻尼效应的经典运动方程。《质点的经典运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 年第 1 期。此外，在洛伦兹(Lorentz)群的表示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相对论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和第二篇(《数学学报》3，1953)两篇论文。在统计物理学方面，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张宗燧与王德懋、许永焕为研究合作现象而建立的一个方法，它可以用来求固溶体(或类似的物体)的位形自由能。张宗燧在《量子系统的 Ergodic 定理》(《物理学报》14，1958)一文中做了有关于量子系统的各态经历(Ergodic)定理的讨论。他在《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及第二篇中，考虑了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与不齐次罗伦兹变换群的表示之间的关系。

1951 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张宗燧受父亲张东荪的株连，遂成为北大批判的重点。他无法理解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就是“不爱国”的道理，因此不断地检讨，却又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1952 年，更进一步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宗燧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值“反美亲苏”的政治年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校方安排张宗燧去做教辅答疑工作。张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人才的自信心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幸好苏联专家早知张宗燧的学术水准，对其敬重有加，不仅推荐张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竟精诚合作，相得益彰。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要见张宗燧。当英菲尔德听说张宗燧在师范大学任教，大呼：“浪费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影响下，华罗庚建议把张宗燧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张宗燧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到数学所后，张宗燧才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因而十分高兴。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着重进行研究，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张宗燧求才若渴，今天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侯伯宇、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作为一个科学家，最大的特点和性格就是实事求是，对事对人都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因此容易得罪人。他平时讲话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饰，因而常常被认为不识时务，甚至招来无妄之灾。例如在大跃进期间，他和数学所的许多人一起去参观徐水人民公社的万头养猪场，回来后大家开会谈体会和所受教育时，他却说：为什么那里的猪那么多，而菜市场上却买不到猪肉？这当然引起纷纷的批评，视为另类。又有一次，在大跃进开始以后，中、苏关系出现紧张，并日益恶化，在数学所的一个会议上，大家批判苏修的技术、科学是“老、大、黑、粗”。他却说，不要以为苏联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领域还是很好的。当然又招来一阵批判。

在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宗燧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1962 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 Bohr）来华讲学。张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张宗燧从不过问家务，根本就不知道天下竟有‘布票’一说，于是随

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一来，竟成了“里通外国”的大罪证。

张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法入眠，身体逐渐衰弱。再到后来，武斗日盛，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把张宗燧揪出来，在身上挂上牌子并戴高帽子，在从前的计算所与数学所的大楼前面开了一个斗争会，然后由红卫兵押送他在中关村游街示众。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法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在万念俱灰、求生不能的情况下，他决定一死了之。通过服用过量安眠药来结束自己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

张宗燧兄弟三人，大哥张宗炳（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并取得生物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时，讲课效果非常好，往往讲得台下的学生掌声四起）和父亲张东荪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但二人互不知道对方。三弟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在‘文革’中屡遭“批斗”后，身心交瘁，愤而自杀。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 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也因为政治思想问题而被送进监狱，长达 16 年；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也被关押 10 多年。一代哲人张氏，一门几乎全部遭受摧残，或死，或勉强苟活而已。

写到这里，读者自然要发问：中共当局为什么对张东荪一家如此严厉处置呢？问得好，应该问！

其实，中共掌权之初，曾经和所有的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在内，有过一段很短暂的蜜月期（例如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张东荪是出了大力的。毛泽东公开称赞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但后来却变脸了）其中的奥秘，编者也无法提供一个唯一准确的‘标准答案’。只能通过多方搜集提出以下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合乎逻辑、更符合实际，还请读者自择：

答案 1、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文史精华》2003 年第 11 期）

答案 2、1950 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注销卖情报的情况。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载《北京公安史志》1992 年第 3 期）

答案 3、张东荪“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专制，所以蒋介石那么优待他，将他奉为座上客，他也不买账”。中共建国前夕，邀集党内外各界人士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上共计 576 名代表，在选举新政府主席时，毛泽东以 575 票当选。在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没有投毛泽东。当时大家还以为这是毛泽东自己谦虚的表现。其实，毛泽东毫不谦虚地投了自己一票。那么，是谁没投毛泽东的票呢？经过调查核实，不是别人，恰恰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

虽然毛口中说：‘不选就不选吧’，大家都以为他不会计较这件事。但是人们猜错了。善良的人们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毛泽东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他是“游刃于儒、法、道、术，经千年提炼而成就的‘人精儿’”。怎么会轻易忘记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此严峻的挑战？所以在 1951 年毫不客气地判定张东荪犯有‘叛国罪’。不仅此也。就是到了 1978 年，当几乎所有人都先后被平反时，邓小平亲自决定：张东荪不能平反。

（学者戴晴的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补白】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 1956 年 11 月 10-15 日举行的 8 届 2 中全会上，在分析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时说：

1、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2、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

3、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群众，不能悬殊；

4、资产阶级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而是更退步了）。例如华盛顿干了 8 年（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

人权是硬道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

7、傅种孙：数学教育家一个‘谔谔之士’的悲惨遭遇

傅种孙(1898—1962 年)字仲嘉，出生于江西高安县珠湖村。左腿因童年生疮微残，举步微跛。身材瘦小，显得文弱；但两眼炯炯有神，声音宏亮，出口成章，气韵不凡。其父傅元弼字子良，晚清秀才，号商岩。深知此儿聪颖，大可造就，教了他不少古籍。积学渐进，作得一手桐城派古文。1910 年傅元弼去世，遗嘱妻子：即使万般困难也要让种孙上学。但身后仅留下 3 亩薄田，家中又无力耕种，只得靠其母陈氏勤劳纺绩以糊口。高小毕业后入省立二中，特别喜欢几何。幼时就写过一篇关于‘轨迹’的论文。1916 年从宜春省立八中毕业。家庭经济无力供他自费读大学。有位老师告诉他，可以享受公费读书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在南昌市招两名江西籍学生。他仓促应试，居然被取在该校数理部。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后，留在母校附中任教。这是他步入社会后的第一个教职；在这个岗位上傅种孙已经展示自己不凡的教学能力。几十年后，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回忆说：傅老师讲几何讲得好，他使我后来爱上了几何。由于教学业绩突出，次年又调回数理部，破格以讲师录用，仍在附中兼课。同时考入母校的数学研究科，1923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由于北洋政府停发教育经费，对国立学校教师长期欠薪，他手无积蓄，不得已于 1926 年回南昌省立二中任教，十多年前他那篇关于‘轨迹’的论文，仍在学生成绩展览室里陈列着。1928 年冬季，北平师范大学当局接纳学生意见，请他重返母校。经物理系教授张贻惠推荐，以教授名义致聘，数学系事务由他代行处理。在他的指导下，北平师范大学数学学会又发行《数学季刊》。该学会半年改选，他是第二届副会长，第三届正会长，直到 1921 年他都是杂志的编辑。杂志共刊出 15 期，发表他的论文 16 篇。他对中国数学史与中国古算术都很有兴趣。他的《大衍（求一术）》就是国内用现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术的首例。他所译 O．维布伦（Veblen）的《几何学基础》是中国读者见到的第一部几何基础理论著作。1920 年英国数学家 B．A．W．罗素（Russe11）来华，次年 3 月在北京大学讲新兴的数理逻辑。傅种孙事前给罗素的《数学哲学引论》（Introductionto Mathematical Philos 0phy）写了一篇摘要《罗素算理哲学入门》刊于《数理杂志》，后来又与张邦铭将全书译为中文，书名《罗素算理哲学》。这是植入我国的第一株数理逻辑学的新苗，学术界一直公认为傅种孙是中国数理逻辑和几何学的先驱。

直到抗战时期，我国理工科教材一直使用外国原本。学制改革后，又增加了几十万高中生，也不得不用外文书。而外国书价太贵，对经济落后的中国学生来说，实在难以承受。为此傅种孙于 1929 年联合附中教员，集股筹款，创设“厂甸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影印一些流行较广的大学及高中英文数学课本，按中国书市价格出售，不及原版书价三分之一。既减

轻学生及家长的经济负担，大、中学有了中文教材可用，从刻社也获得盈利。一举三得！

同时，他用从刻社的盈余，聘请专家，编写初、高中数学课本。他自己任总编辑，每书必经他认真审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数外，已经全部问世。这是我国第一套数学教科书。他自己着《高中平面几何》即是其中一册，1933年初版，到1937年共印刷了四版，每版都经过认真修订。口碑甚佳，风行全国。教师普遍认为该书使教学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他从毕业生的来信中，察觉他们还不能用高等数学统摄初等数学，便于1928年在数学系三年级创设《初等数学研究》来弥补这个缺憾。他最初设想的课程内容十分庞大，以致不能实现，乃改为只讲《平面几何研究》。讲义的初稿中有总论、基础、证题、作图、轨迹、极大极小及极限诸篇。后因抗战中没有印刷条件，此书未及完成，此乃终生遗憾。

1936年末，傅种孙任教授的年资达到了教育部规定，可休假1年。他决定趁此机会赴德国留学，可惜此计划因日寇入侵而无法实现。1937年10月下旬，他只身投奔西安临时大学。从沦陷区到后方，必须穿过敌军的封锁线，行路万分困难。逃出来的教员，几乎没人带书出来。他却不惜运费，不怕风险，带来几百册外文书籍。因此他的卧室，成了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的书库。1945年，他服务的年资又符合出国考察条件。于是秋季赴英国，先后在牛津、剑桥两大学访问两年。抗战西迁的北平师范大学，于1946年改称北平师范学院。院长袁敦礼力邀傅种孙担任数学系主任。乃于次年11月回国履新。在此期间，傅种孙破格提拔王世强为讲师，次年，他又留下3名毕业生替换两位助教和一位讲师。并邀请汤璪真教授，劝退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教授。从此，系内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数学系师资力量大为提升。由于扩大招生，不得不让几位青年教师讲授基础课。晚间自习时，他们设座答疑，他常旁坐谛听，事后为之指点更正。有时当着学生的面告诫教师。这办法他执行多年，又建立助教进修制度，使青年教师不敢懈怠。

1948年4月9日凌晨，北平宪警闯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宿舍，殴打10人，劫走8人，押入警署。当日学生赴“行辕”请愿，营救被捕同学。傅种孙身为教授会主席，坚决支持学生，并代教授会拟定“罢教宣言”。宣言书写得有理有据，文情并茂。1949年后傅种孙以其勇于任事的精神，挺身而出，为保存北平师范大学元气，立功甚伟，一时众望所归。1949年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及北京市人民代表。1952 年晋升为副校长，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1956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由于职衔太多，不得不辞去数学系主任之职。

北平解放不久，毛泽东特备两桌酒席到顺城街北京师范大学教员宿舍访问早年的同学汤璪真和业师黎锦熙二位。该校应邀作陪的有黄国璋先生及傅种孙夫妇。席间傅种孙发言特别多，这次会见给他很大鼓舞。此后6年里，由于各方支持更增加了他的办学信心。特别是对于培养自己成长的母校，傅种孙尤其尽心尽责，颇以振兴母校为己任。但由于胃溃疡缠身多年，常常过于疲劳，食少事繁，以至于疾病缠身。

而更大的打击则来自1957年。当他的病体初见平复，全国发起“鸣放”运动。6月末，人民日报社记者来他家采访，他对知识分子问题，口述一些意见，别人笔录，写成《中共失策之一》。记者带回报社，未及发表，就被好心人把文稿要回来还给他。后来还是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内部刊物《师大教学》上。这些意见充分反映了他作为共产党的诤友、挚友可贵的精神风貌。在文章中他写道：

“为了爱护中共，我愿意谈谈中共失策的地方。首先要谈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失策，这是中共近几年最大的失策之一。每次政治运动，都给知识分子造成伤害。虽然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

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给知识分子扣上“旧”的帽子。1956 年 1 月，周恩来根据建国后 7 年的社会实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评价，强调要关心、爱护、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深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和赞同。然而，到了 1957 年春，毛泽东又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

“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骂了。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原注）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因此，“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他反问道：“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在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虽然，现在没有知识分子失业，都在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呢？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

北师大党委偏听偏信，党群关系紧张在于党员独断专行。他说：“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还是不够的。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团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是有责任的。”

北师大党委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不信任他们。他说：“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师大。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么能办得好呢？”

要学生批判地学习老教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难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党是青年教师的家长，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老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傅种孙早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又留学海外，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以才敢于披肝沥胆、直陈己见。另外他还经常针对当局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学术领域里思想理论的争鸣"的风气，在不同的场合批评这种乱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他说："我学的是数学，数学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

根据以上言论，被划为极右分子，削去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派到数学系资料室工作。1958 年，在'拔白旗'运动中，他理所当然地又被作为数学界的"白旗"再次遭受重创。从此打入了另册，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同事的疏离，学生的冷眼，使他在屈辱之中度日如年。作为一个学者的傅种孙既然心系中国数学的发展，又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他就只能为坚持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付出沉重的代价，蒙受着苦难的折磨。

由于内外交迫，身心俱疲，心力交瘁，终于在 1962 年元月 14 日脑溢血不治身亡。傅种孙从教一生，庭前桃李，馥郁成行。解析数论名家闵嗣鹤和数理逻辑专家王世强，是他早期赏识的学生。在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时，他提携许多新秀，或送他们去苏联学习，现在都是知名教授。按他的学术功底，足可以利用教授的优越条件，追逐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数学领域插上几面中国旗帜，为国增光。但历史无情，他不是倒在三尺讲台上，而是倒在众多批评者盛气凌人、口诛笔伐的狂热气氛下。

"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谔谔"，这是老一辈数学家傅种孙的慨叹，也是他对极权专制主义的强烈谴责。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一介谔谔之士的独立品格"。这是著名学者张允若先生的评语，颇有见地。

【补白】

"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与介入性的双重质量，即专业精神和社会良心相结合。知识分子不仅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更是对社会发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佐拉于 1898 年在法国《震旦报》发表《我控诉》，为犹太人军官德雷富斯无罪辩护。后被迫流亡国外，直到 1902 年去世。

8、谢家荣：发现大庆油田的大功臣之死

说起大庆油田，人们习惯地以为：这个功劳应该记在大科学家李四光的名下。实则不然，真正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是谢家荣。

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李四光的意思。谢家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由于李四光慧眼识珠，在担任国家地质部长期间，相继挑选了谢家荣、黄汲清来做他的左膀右臂。打一个比方：彭德怀是毛泽东派遣去朝鲜抗击美国的，朝鲜战争的重大部署也是通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下达的。但是绝对不可以因此把朝鲜战争的胜利说成是毛泽东指挥，而不是彭德怀

指挥的。同样道理，谢家荣做出的贡献也不应该全部都归在李四光的名下吧？

谢家荣（1898—1966 年）出生于上海，1913 年，在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属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考入了农商部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地质研究所）。1916 年，地质研究所结业时，共计 22 人全部进入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这些人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工作者。

在地质调查所工作一年多，由于成绩突出，于 1917 年被选送留学美国，最初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学习。1918 年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作研究生。1920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立即回国，仍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职。

1920 年底，甘肃海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 8.5 级大地震。1921 年初，谢家荣参加了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随翁文灏、王烈等去甘肃考察。他们最初在兰州附近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工作。以后，翁文灏去震中区调查，派谢家荣穿过河西走廊去甘肃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工作结束后，他发表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一初步成果。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该地区最早的石油勘察活动和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28 年谢家荣被借调到两广地质调查所任技正，又兼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1929 年，他到德国考察与进修，先后在柏林地质调查所和弗莱堡大学攻研煤岩学与金属矿床学。1930 年回国后，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技正职务，并兼任沁园燃料研究室名誉主任，该研究室为著名实业家金沁园捐款所建，专门从事煤炭、石油及有关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研究。1931 年，谢家荣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并曾代理系主任。1935 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主体迁往南京，留在北平的部分成立北平分所，谢家荣被任命为所长。1936 年，他还兼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谢家荣当时未来得及离开北平，日本占领当局企图聘请这位著名地质学家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及校领导。被谢家荣拒绝，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后得到翁文灏通知，几经周折离开了北平，同年下半年，他到湖南江华矿务局任总经理，后来也是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他在湖南、广西一带做了大量锡矿地质的勘查和研究工作。1940 年 6 月去云南，担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同年 10 月，该处改名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勘测处，谢家荣任处长。1942 年 10 月，该处扩大为中国性的矿产勘测机构，去掉了“西南”二字，谢仍为处长。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谢家荣率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返回南京。同年底，赴台湾调查石油地质。以后，又发现了安徽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凤台磷矿及福建漳浦三水型铝土矿等矿床，这些矿床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1948 年，谢家荣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南京解放前夕，胡适召集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动员他们去台湾。但谢家荣不从，并组织矿产勘测处的职工坚守岗位，保护设备和资料。

1949 年后，谢家荣先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华东工业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1950 年 9 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副主任兼计划处长。他首次对中国地质与矿产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部署。1952 年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他被任命为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1954 年，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对于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和指导，他与黄汲清主持编写的《普查须知》是野外地质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1955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是首批学部委员之一。1956 年，地质部成立地质矿产研究所。翌年，改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他担任副所长。他与孙云铸、黄汲清等一起拟定了逐步进行中国地质和矿产研究的总体规划，并取得了若干成果。他本人发表了若干重要论文与专着，如《中国大地构造问题》、《论矿床的分类》、《地质历史中成矿作用的新生性、再

生性和承继性》等。他还指导了大批研究生，培养了不少高级地质人才。1964 年，他任地质部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综合研究室主任，着手编着《中国矿床学》。

谢家荣是资深的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在基础地质科学与应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是中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是中国经济地质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并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培养了好几代地质矿床方面的人才。

谢家荣为人正派，具有强烈的是非感、正义感。例如抗战胜利后，他在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担任矿产勘测处处长，在处里公开宣布：不允许建立国民党组织，不许挂蒋介石肖像，不许唱国民党党歌。理由是：这里不是政治机关。他对中共充满希望，并热情迎接新政权。南京面临解放时，他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毅然放弃了去新西兰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同时也拒绝了胡适动员他去台湾的意见。

1954 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李四光部长兼，刘毅、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谢家荣还兼总工程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产油区》，对石油前景做出了更加肯定的判断：“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具体点到了 8 个地区：“从大地构造推断……包括桂滇黔地台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等”。在近60 年的实践表明：他所预测的几个区域，以后陆续都被证实。

可见第一位指出“北满”有油的是谢家荣，第一位提出对“北满”实地勘察的是谢家荣，第一份勘察设计书是黄汲清起草谢家荣修订的。那时，黄汲清和谢家荣都是地质部石油普查委员会的常委。可是到了 1959 年，大庆油田发现时，举国欢腾，举世惊愕，庆功会一个接一个召开。中国人使用‘洋油’时代结束了，帝修反的封锁打破了。然而，那位本应坐在庆功会主席台上的谢家荣，却寂然地坐在北京一间小小的书房里，一会儿闭门思过，深挖自己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一会儿奋笔疾书写检讨。这个时候，谢家荣已经变成了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57 年他说了什么？不必考证。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况且谢家荣的头上还有一顶很不光彩的帽子：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地质部门官员的‘旧知识分子’。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只是夺去他的人格和尊严，文化大革命却要夺去了他的生命。1966 年 8 月 8 日，地质科学院爆发了一个叫“八八暴动”的事件。地科院所有的头头和学术权威都被一锅端，端到院子里，令全体下跪。谢家荣跪在最前面。他已是 68 岁的老人，身体也不好，行动不利索，下跪时动作慢点，便被按头，并遭呵斥。虽然他也经历过当右派的屈辱，但这次的屈辱，则令其心灰意冷，感到绝望。

五天后的一个晚上，谢家荣独自睡在门厅里，他对妻子吴镜侬说，他晚上睡不好，老翻身，就不和她同睡卧室了，以免影响她休息。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发现丈夫死在门厅里。她的悲痛和恐慌无法用文字描述。那时的自杀，一概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加数等，祸及子孙。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家的保姆显示了政治智慧：她首先通知的不是公安局和单位，而是死者的儿子谢学锦。造反派和公安部门的人来后，谢学锦报告说：“谢家荣死于心脏病”，他不敢说“我父亲死于心脏病”。造反派和公安部门初步认可了谢学锦的报告之后，送谢家荣的遗体去解剖。医院最后认可了谢家荣是死于心脏病猝发。但不久，谢家荣自杀的传言出现在大字报上。

几年以后，谢家荣先生诞辰 90 周年，他的儿子为父亲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他对推动我国矿产勘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地质学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代很少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相信随着一个时代的极左思潮的暗淡与消亡，父亲所做贡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眼前。”

一位老地质学家看了文章后说：谢学锦终于为他父亲说话了。他还说：“谢家荣先生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莫说和谁‘伦比’，就是他的名字，也是一个禁忌。”

地质界的李四光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是现代中国地学界提及、援引

最多的理论。中国地质科学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这本来是件极好的事。但是再好的事如果一旦推向极端，便会引出荒谬乃至荒诞，地质力学理论也不能例外。大庆油田的发现，本来与地质力学没有多大关系，却硬要说大庆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导而发现的。对此，黄汲清态度鲜明地提出异议，并在 1978 年向邓小平反映。

黄汲清是老一辈地质学家中依然健在，而且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一位，他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对于地质界捧红李四光、棒杀谢家荣的现象，深为忧虑。他说：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他晚年致力于“统一场”的研究，却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对论，也从未被推向“言必”的高度，“统一场”研究也没有成为禁忌。现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对论”提出挑战了么？而“统一场”的研究，也对爱因斯坦付出的艰辛和表现的毅力使无数科学家深为感动。科学要顺利发展，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证伪。先验的把一种理论当作终极真理是科学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这种做法运用到科学家本人，更是极不正常。李四光的理论包括他的地质力学，在中国科学史上应该有其地位，所有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其地位。人们不愿看到的仅仅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搞张冠李戴，偷梁换柱。人们更不愿看到，宣布某一种学术理论和观点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襟怀不仅容许而且提倡不同理论、不同学派的争论，应当允许“异端”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没有异端，就没有科学。地质找矿有一个奇妙处：拼全力寻找地表、地层的异常现象。凡有异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矿。‘异常’的另一个说法不就是‘异端’么？现在，人们终于敢说：谢家荣是位有功之人。

著名学者王仰之先生在翻看了大量历史记载和有关资料之后，特别提到 1949 年谢家荣对“北满”有油的预测，他指名道姓写道：“对于东北松辽平原的油气预测，许多人往往认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实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油气资源的摸底工作应该进行，是在 1954 年。从时间上说，比谢家荣晚了好几年。”

谢家荣是世界公认的国际煤岩学研究的先驱。在矿床学领域，他的成果为国际矿床学权威史奈德洪盛赞，并作为经典引入自己的著作。他在金属矿物显微镜研究领域的成果为著名学者兰姆多尔多次援引，至今闪闪发光。然而，他更大的成就却在矿产勘查上，在地学理论向找矿的转化上，在找矿的组织和领导上，他都创造了许多“第一”，有一个“第一”便是地质找矿应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这是他在 40 年代提出的、即便在今天，在市场经济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模式的今天，对于地质界的仍然具有启蒙的意义。

谢家荣的平反和追悼会都已成为往事，梵蒂冈直到四百年后才为伽利略平反。相比之下，表明我们对真理的认同比教皇快。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那份悼词只是泛泛而言，没有向谢家荣道歉。保罗二世代表教廷为伽利略平反的同时也向科学家道歉。道歉与不道歉是不大一样的。在科学史上，谢家荣的地位难以与伽利略相提并论，但这不能成为不道歉的理由。

【编者按：道歉？笑话！共产党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道歉’这个词儿。无论是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当众下跪，还是中国台湾马英九为‘228’事件的公开道歉，都昭示着一种精神。什么精神？那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现实表明：这种精神至今尚未被中共领导人所接受。根本原因何在？因为与他们一贯自我吹嘘的‘伟大、光荣、正确’说法相悖。既然是‘伟大、光荣、正确’，而且一贯正确，难道还会出错吗？既然不会犯错误，何需道歉？反过来说：如果公开道歉，那个‘伟、光、正’的神话岂不就霎时破灭了吗？这是当局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指望中共向被迫害者公开道歉，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9、曾昭抡及俞大絪：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教授双双死于‘文革’

曾昭抡（1899 年--1967 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曾广祚是前清举人，

母亲陈季瑛出身名门，兄弟姐妹 13 人，曾昭抡排行第二。1915 年考入学制为 8 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成绩优异，插班入四年级。1920 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三年内修完了四年的课程。其后又转攻化学，于 1926 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获化学博士学位。1926 年，曾昭抡回国后，先在广州兵工试验厂当技师，因决心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1927 年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后又兼化工系主任。1931 年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他在中央大学，特别是到北京大学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

由于他的倡导和带动，北大化学系形成了浓厚的研究气氛，在晚上和星期天，仍有不少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在实验室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并做出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曾昭抡本人在 1932～1937 年间，就发表了 50 多篇论文，其中“对亚硝基苯酚”的研究成果，已载入《海氏有机化合物词典》，被国际化学界所采用；他改良的马利肯(Mukkiken)熔点测定仪，曾为我国各大学普遍使用。

在有机理论方面，曾昭抡和孙承谔等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指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只需将原子半径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化合物的沸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

在分子结构方面，曾昭抡等测得四氯乙烯的偶极矩为零，证明了该化合物有对称结构。他还测出了已二酸的偶极矩为 404D，并推断该酸有桶形结构。

曾昭抡在制备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卤代物方面，发表了 10 多篇论文，在谷氨酸、醌、有机氟化物及有机金属化合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制备胺类化合物、盐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以及合成甘油酯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对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曾昭抡还做过炸药化学研究，并发表过论文和出版《炸药制备实验法》专着。他献身科学事业的忘我精神深受师生敬佩。有一次他带领学生做炸药试验，在爆炸前，他做了认真检查并让学生们先离开试验地，他亲自点燃导线后还在那里仔细观察。当时，一个学生看到冒烟了，便高喊：“曾先生，快离开!”他这才离开，刚走出不远，炸药就成功地爆炸了。在场的学生都为他捏一把汗。

曾昭抡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他对化学名词、化学文献和化学史等方面也做过不少研究，并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论文。

近代化学科学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曾昭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 30 年代初，就将《国际有机化学名词改良委员会报告书》和《日内瓦命名原案》译成中文向国内读者介绍，并发表了不少有关命名的文章。中共建政后，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领导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1953 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化学物质命名座谈会，曾昭抡主持会议并做了《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的总结报告》。竺可祯、吴有训参加了会议，并对曾昭抡等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化学物质种类繁多，命名和统一的工作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曾昭抡对此项工作认真、细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对我国化学界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曾昭抡一生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中国化学会于 1932 年 8 月 4 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中国化学会会志》。以后又连续被选为 16 届理事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其中还曾担任过 4 届会长和 1 届理事长，为该会和所办刊物，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化学会会志》(今《化学学报》前身)于 1933 年创刊，是我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曾昭抡的精心编辑和扶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办刊条件极端困难，有时甚至面临经费困难。曾昭抡省吃俭用，任凭衣鞋破烂，把积攒的钱，几乎全部都用到这个刊物上。

他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长达 20 年之久，为办好这个刊物，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钱。

除《中国化学会会志》外，曾昭抡还担任过《科学》、《化学工程》编委，《化学》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主编和美国《化学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时局多么动荡，他始终坚持积累资料、撰写稿件，从而博得了《化学》总编辑戴安邦和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赞赏。由于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化学撮要”栏被誉为《化学》的最精彩部分，同时能使中国人做出的化学研究成果及时在《化学文摘》中得到反映。

1949 年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根据建国初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德、智、体方面向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古老的北京大学焕发了青春。为了使刚入学的大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亲自为化学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1 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 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后，他担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 1957 年。在这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长后，在三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高校，到各地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求等，然后提出解决办法，深受各地师生欢迎。AA 曾昭抡一贯主张高校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重。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1957 年 3 月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他在会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中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此，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一要保证科研经费；二要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要求大力改善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

1957 年，毛泽东搞了一个“阳谋”，最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和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理所当然地应该积极行动。他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光明日报》在 1957 年 6 月 9 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

这个报告指出了当时在我国科技体制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办法和建议。例如：针对一些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提出要协助他们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针对科学院、高校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本位主义，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协调彼此关系的建议；针对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时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了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等建议。

曾昭抡主持起草的这份报告，与后来官方所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高教工作六十条》等科学、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见他们是有远见卓识之士。然而这些宝贵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

为了帮助党整风，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右派六教授。”

曾昭抡从进步教授到领导干部，忽然间又成了大右派，许多人都感到惶惑不解。在批判曾昭抡的会上，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当局便特意去找曾昭抡的学生唐敖庆，让唐揭发他的问题。唐敖庆说："我不能揭发我的恩师，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后来又要求唐敖庆写揭发曾昭抡的书面材料，唐敖庆实在无奈，只好写了一份他从 1936 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 1950 年留学回国这一段时间与曾昭抡接触的历史。他写了与曾昭抡参加步行团、由长沙到昆明的情景；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认真讲课、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积极搞民主运动而深受学生敬佩的情况，以及曾昭抡教授带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情况。这哪里是揭发材料，分明是回顾师生之情的赞歌。

被划为右派后，曾昭抡并没有悲观失望，但撤销职务、停止工作却给他带来莫大痛苦。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十分理解曾昭抡的心情，曾两次给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昭抡到南开大学工作，但未能如愿。1958 年 4 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虽然因做行政工作而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但终于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事业。此后，他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从早到晚在图书馆、资料室如饥似渴地查阅文献资料。他经常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说："图书资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主要依据。"曾昭抡在武汉大学除了上讲台、实验室外，其余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患高度近视，但查阅资料的速度却异常惊人。曾昭抡住的地方较远，来回上班要翻过一座小山。有一个深夜，他从实验室回家时，因看不清路，翻山时竟撞在树上，摔倒在石头上，碰得满脸是血。但他从未发过怨言，师生们都为他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高校。他主编了 200 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化学文献、元素有机化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并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等科研组。

更令人钦佩的是，1961 年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所采取的态度是倍加努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工作。学校领导让他回北京看病、休养，但他从未好好休息，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他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撰写了 100 多万字的科研论文，并自学了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接替他开的课程。这期间，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还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每次 3 个月左右，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3 年 12 月，在天津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讨论会"。身患癌症的曾昭抡抱病参加，由两人扶着走上讲台，向大会做"元素有机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使到会代表十分感动。1964 年 11 在武汉召开教育部直属高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讨论会时，他带病亲自写信，邀请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参加，共同交流学术思想、检阅科研成果、讨论发展方向，为促进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均做出了成绩，除发表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论文外，曾昭抡还顶住癌症的折磨，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共七章 24 万多字。该书出版后，当听到同行们一致肯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成功著作时，他心里充满了和死神斗争获胜的喜悦。

按照他的雄心壮志，本来还能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0 年、20 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再次降临到他和妻子二人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斗争，由于不甘屈辱而含恨自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生命时，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甚至还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摧残，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终于在 1967 年 12 月 8 日默默无闻的离开了人世，终年 68 岁。

俞大絪，女，（1905—1966）出生于浙江山阴，幼年在长沙、上海生活。1927 年与化学家曾昭抡结婚。1931 年毕业于沪江大学。1934 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6 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 年至 1937 年，在巴黎大学进修。抗战爆发后回国，任教于重庆大学。1946 年赴哈佛大学进修。1948 年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任教。1950 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52 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一级教授。

俞大絪教授对英国语言文学有很高素养和深入研究。在 1931 年曾研究过约翰•曼斯菲尔的作品，1943 年又研究英国当代诗歌倾向。从事英国语言文学教学近 30 年，曾开设过英语选读、英国小说等课程，主要从事高年级英语教学。她素以饱学多识和擅长教学而闻名于教育界。她极为重视英语基础阶段学习的关口，一方面巩固并加深学生的语言基础，同时又善于引导学生逐步从语言学习过渡到英、美文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等不同体裁）的学习。与此同时，俞先生还为北大英语专业青年教师制订每个人的进修计划和阅读书单，为他们讲课，组织课堂讨论，个别批改作业，进行辅导、检查。她的热情、认真、细致和严格而又循循善诱的态度和方法，为北大英语专业造就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英语教师队伍。晚年则集中精力编写教材。她运用多年英语教学经验和英国语言文学素养，潜心编写全国统编教材《英语》受到各方重视和好评。这套教材被认为是‘中国最好、最流行的英语教材’。最早是由许国璋先生编写第 1、2、3、4 等册，以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使用，一直被称为“许国璋英语”。但三年级使用的第 5、第 6 册则由俞大絪及其学生吴柱存教授合作编写。

俞大絪先生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其兄俞大维，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说要送到台湾去。但后来事情并未朝着人们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所以她作为统战工具也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只是挂了一个空头的政协委员头衔。

由于丈夫曾昭抡被划成“右派份子”，又被分派到武汉大学工作，不住在北京。‘文革’期间，她独自在家，面对汹汹而来的造反派，不得不沉着应对。

民间有句俗语：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当时俞大絪正是处在大批汹涌而来的‘红卫兵’包围之中。这些学生娃娃，听了领袖的号召，发疯似地捣毁一处处房舍、教室，揪斗一个个无辜的教师。像俞大絪教授这样老迈年高，论年龄足以当这些人的奶奶的人，也绝不放过。他们不但抄家，而且蛮横地责令她下跪。这种侮辱太过分了。俞教授不从，便招来毒打。

在万般屈辱之后，俞教授决定以死抗争。次日在北大教工宿舍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含恨而亡，终年 61 岁。

【补白】

专制的稳定，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第一，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性，它必须不断地镇压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从“肃反”到“六四”，中共的专制已经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第二，专制很容易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大跃进”便是一例。如果你要歌颂今天中共经济路线的正确性，那么，你不应忘记这是用几千万条人命替中共“交学费”才换来的，所以你无权将此正确归功于中共。第三，专制脱胎于残酷的内战。因此在计算其所付代价时，必须把那笔庞大的预付成本也包括在内。那些称赞现在中共治下社会安定的人，怎么能把他们当年武装夺取政权而造成的弥天战祸给忘掉了呢？第四，专制孕育着大动乱。所以，贪图专制下的稳定实际上是把子孙后代的生命作了抵押。

——引自学者、媒体人胡平《从自由出发》一书

10、徐璋本：科学巨星的悲剧人生

徐璋本（1911—1988 年）著名科学家。他与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而且都是学导弹的，区别在于：钱是搞导弹制导，徐是搞反导弹的。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 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 1940 年获博士学位。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突飞猛进的时期。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才开拓出物理学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曾深深地吸引着一大批中国的青年才俊。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因而获得 1938 年物理学诺贝尔奖。两年后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9 岁的徐璋本已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中国的亿万人口中，真正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只有几十位，绝对是凤毛麟角、珍稀品种。20 世纪 40 年代积贫积弱的中国，多么需要如此杰出的科技精英人才啊。那时的徐璋本肯定怀抱着科学救国的宏伟理想和远大志向，所以才早早回国。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才华、智慧，为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可惜的是，1957 年的一场“阳谋”无情地改变了这一切，命运注定了要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追求，只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位精英人物的人生轨迹最初有许多相同点：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后来的经历和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史册；一个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监狱中度过 20 年囚徒生涯。他的历史定位注定了与科学无缘。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徐璋本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被调入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

徐璋本 1957 年成为右派的根据何在？大致有以下几点：“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类似言论还可以列举许多，但以上两条就足够被划为右派了。这些言论被搜集起来，冠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的醒目标题，并被编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 年）上报中央。

如果仅仅是以上言论，倒也不至于把他抓进监狱。谁知竟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后一个月，全国的“反右斗争”已经雷厉风行、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7 月 8 日徐璋本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着手组建“劳动党”，公开征集党员。在他写的《登记启事》中说：“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组织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其次，他为自己的“劳动党”所拟定的党的宗旨——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共享的社会。此外还有党的纲领和理论：《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从略）

不仅此也，他甚至公然地、积极地进行组党活动。首先是“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动员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建党宣言。8 月 4 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宣传。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它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还向物理八班的学生宣传，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高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

就是要争取青年！”甚至见了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也不失时机地问道：“你拥护我还是拥护毛主席？”这位在西方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下熏陶既久的知识分子竟然试图把西方政治游戏模式‘克隆’下来，再嫁接到自己的祖国；可是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脚下这块土壤仍然处于“中国特色”之下，根本就不能容许那个模式的存在。照搬在西方可以合法做的事，显然无法和‘中国特色’接轨。能不碰壁吗？

事情发展至此，中共当局再也无法容忍了。1957 年 12 月 25 日，徐璋本在清华园被逮捕，同日被抓的还有孙宝琮，曹垂训两位教师。

入狱后辗转来到河北邯郸市南郊的曲周劳改农场。据说：周恩来总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只要他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是否确有其事？不详。

投入监狱后，认罪服法教育是中国监狱特有的、主要的课题。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被要求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永恒话题。案由属于“右派、反革命”者，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的社会地位。虽然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的理论水平、修养、口才等方面大都与众不同。在不得不说些冠冕堂皇话语的时候，也能够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徐璋本则是一个例外。据同在一起的难友回忆：在和他同狱的 17 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先生登台演讲。徐先生在每晚必开的小组会上，轮到他发言时，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其真实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发言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力回避对自己“罪行”的承认。可见其聪明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从不在任何场合谈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他深知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无论你说深说浅，都可以挑出毛病来，都是危险话题。他如此保护自己，用心良苦，事非得已。如若不信，请看下面的例子：1970 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所在的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此人名叫吴纪仁，也是 1957 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据同狱的人回忆：吴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 1957 年到 1970 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果然，在一次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宣判大会上，宣布处决的名单中，吴先生赫然在列。

在处决这批‘反改造分子’的会后，为了扩大影响，教育其它犯人，监狱当局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叫他们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的 20 多人中当然会有徐璋本。平时的徐璋本由于性格比较开朗，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衰老的印象。但此时的徐璋本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一个饱经沧桑的垂垂老者，一个深受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的形象，令人不胜唏嘘。

在狱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据目击者回忆资料）1970 年 4 月 25 日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那个晚上。卫星上天的消息在晚间 8 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第一时段播出。狱中犯人从高音喇叭中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新闻联播节目还没有结束，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率 20 多名狱警进入高墙狱内，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第一中队旋即集合。黄大队长将一摞宣传卫星上天的海报递给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让他分发到各个小组。黄大队长手中留下了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违命，认真地念。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黄大队长厉声说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的说：“惭愧，惭愧”。

1973 年至 1975 年秋，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似乎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上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 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者。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在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暗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于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如果折算成行政级别，也绝不会低于‘县团级’，因而也被集中起来。这次莫名奇妙的‘赦免’尽管有些滑稽，但毕竟算是暂时的解脱吧。

1979 年春季，中国才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数以千万计的冤案得到平反，冤情得以昭雪，被迫害者相继回到亲人的身边。对于徐璋本老人来说，当这一切降临时，20 多年的光阴已荒废和抛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的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 20 多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做出和他才华、能力相称的贡献，显然不可能。

徐教授于 1988 年去世，似乎可以说是‘寿终正寝’。那么算不算被毁灭呢？从肉体生命来看，似乎还不算；但从更高层次精神生命来看，无疑应该算是被毁灭了。一个本来应该做出巨大贡献的大科学家却如此屈辱、卑微地苟活了几十年，浪费青春和年华，虚掷大好光阴，难道还不算是被毁灭吗？这正是本书收录其事迹的理由。

有位学者谢泳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文内这样写道：“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渡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而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

谢泳的判断是非常中肯的，尤其是说他“死后方生”四个字无比深刻。

【“死后方生”者，何只是徐璋本一人？】

【补白】

现任国家总理温家宝语录：

1、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2、我们不仅应该让人民有言论自由，更重要地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批评政府的工作。只有当人民能够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时候，政府才能做得更好，公务员也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

11、黄国璋：中国地理学界权威之死

黄国璋（1896—1966 年）1911 辛亥之年，在湖南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里，同时走出两

位“奇特”的学生，并同时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其一是毛泽东；另一位是英语成绩特优，走“科技救国”之路，后来成为中国地理“三杰”之一，被誉为地学先师与泰斗，同时又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理事长黄国璋。1926 年黄国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 年 10 月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 年 8 月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 年底,与许德珩、潘菽等人共同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翌年 9 月 3 日更名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在上个世纪的 30 年代，中国地理学界有“南胡北黄”之说，南方以胡焕庸教授最为著名，北方的权威则是黄国璋教授。

黄国璋字海平，祖籍湘乡县城北郊黄泥坪，出生于上海。其父黄抚九曾经在上海谋事，目睹帝国主义强盗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感到十分气愤；同时，看到满清末期，洋务运动的兴衰沧桑，又觉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深信“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有出路。他聘请家庭教师，教儿子从小学习英语，以期将来成为“通晓西事”，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为国家发展工业做出贡献的人才。黄国璋受此熏陶，从小以父亲的期望作为自己的志向，努力学好英语，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打下基础。故从小学到大学，其英语尤其是口语水平，稳居全班第一。清末民初，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里有不少留学日本和英美归来的学子担任教师，民主科学空气甚浓，学校学风严谨，以关心国家民族命运，革新教学内容闻名遐迩，学校还开设英语课。黄抚九因此慕名将儿子送到这里读书。

从东山高小到驻省湘乡中学，再到雅礼大学，黄国璋一直把英语和理科作为重点，以实现父亲嘱咐和自己的志向。1919 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中学部教英语和地理。“五四运动”的伟大潮流，不仅给他以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更使他懂得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前途息息相关的道理。在地理教学中，他接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德国学者洪波德、李特的著作，逐渐认识到要报国图强，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地理科学，觉得我们太落后了。国家疆界混乱，被列强不断蚕食，令人痛心。他想，如能掌握西方地理科学，改变国内地学落后状态，将有利于守土卫国，有利于开发资源，有利于提高大众爱国热情。他欣喜地认为，这就是报国之路，强国之策。他在《学习本国地理第一要义》一文中写道：“学习本国地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明了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国家的可爱，唤起民众和一般国民的国家观念。”

1926 年，黄国璋怀着振兴中国地理科学，改进中国地理教学的雄心壮志，毅然辞去教职，赴美留学，成为我国出洋学习经济地理第一人。在轮船上，他望着浩瀚无边的海洋，经受着滔天巨浪的颠簸，感叹外面的世界之博大、精彩，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恨不得马上登上美国的大学课堂，去接受那些认识海洋，认识高山、平原、湖泊、河流，认识大千世界的地理学知识。

在美国，他举目无亲。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祖国迥异，人们的穿着五彩缤纷，夜晚霓虹灯闪烁，茶楼、酒馆、歌厅、舞厅、夜总会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女成双成对，或牵手，或拥抱，或翩翩起舞……黄国璋无心领略这些异国风情，他不去任何娱乐场所，也不吸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只是专心致志地学，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科学知识。1927 年入美国纽芬雅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当年毕业；次年入芝加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师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亨丁顿，当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的导师和同学，对他在如此短期内完成学业并取得优秀成绩赞叹不已。在美国，他阅读了大量欧美近代科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学到了先进的野外考察方法和绘图技术，并到美国的港口、草原和峡谷考察，获得了丰富的地学知识。对此，他感到极大的欣慰。他想，我们的国家太需要这些知识了。我们的国家还有多少草原、森林、峡谷、港口有待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啊！他下定决心，献身祖国地理科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绝不动摇。

毕业后，美国的一些学校留他教学，一些科研机构劝他留在美国搞科研、做学问，薪金比国内高得多。他都一一谢绝。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的需要来学，学到手了就要回祖国去服务。"1928年底他满怀报国图强之志，带着丰硕的学习成果，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留美归来，便决心献身地理教育事业。从此，在近40年的地理教学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理科学中坚人才。他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担任教授并兼系主任，是我国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人。

在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期间，把几经周折争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捐赠的两万块银圆，全部用来采购图书和仪器。"凡有利于中等学校地理教学之事项而本系人力物力所及者，无不规划周详，亟图充实"(《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概况》)。

多年教学实践，黄国璋深感基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重要，他力主创立了地理丛刊委员会、中小学地理教学研究会、中小学课外读物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亚洲地形图》、《河北地形图》和其它教学用图。他主持编辑出版的《地理教学》双月刊，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学刊物，对指导中学教师教好地理课，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北师大地理系在黄国璋主持下，系风突变，百家争鸣，在全国声誉日隆，为培养高校地理教学人才，推动全国中小学地理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各大学西迁，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他受命筹建联大地理系。在国家艰危、烽火连年的岁月里，他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奔波操劳，使地理系在短时间内筹备就绪，并及时开课。

1948年底至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极力网罗人才，当然也包括像黄国璋这样的精英分子。但他不为所动，拒绝赴台。他与广大师生一道参与护校，使北师大地理系完整地保留下来。

但是，在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有人抓住他曾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40年又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任所长，后任国民政府设计局委员、区划设计组组长等所谓的'历史问题'，说他站在反动政府一边，给予猛烈批判，撤销其九三学社中央及中国地理学会一切领导职务。"多亏竺可桢等一批老前辈力保，年近花甲的黄国璋先生才免于西出阳关。"(《民主与科学》1996年6期）应本人请求派到陕西师院（后为师大）筹建地理系。

在陕西师院，黄国璋先后主讲《世界地理》《北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地理学原理》《地理教学法》及英语等课程。他的讲授内容充实，语言风趣，引发学生对地理科学的浓厚兴趣。他在教学中不断吸收科学新成果，充实教材内容。他常说："地理学家的思想，随着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而演变，而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又随着人类活动范围而与时俱进。"同事们评说，黄国璋的地理学思想、地理教育，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他经常注意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阐明学习本国地理的要义。他常说："一个近代公民对于自己国内的山川气候等自然形势，人口聚落、物产交通等人文现象及相关之理应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共同的国家观念，才能激发出爱国激情。"

1934年黄国璋曾主持考察团赴云南边陲地区进行艰苦的野外考察。足迹所到，翻越海拔2000-3166米高的哀牢山脉，再递降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下澜沧江边的卑湿低坝，勘查西双版纳全境。步履之艰难，难以想象。沿途常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没，处处有险情。考察团绕西双版纳一周，考察滇缅、滇越边界，勘察了澜沧江河谷。搜集到的文字资料和图片极为丰富珍贵。

此次考察开学者考察西双版纳之先河。黄国璋着的《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资料翔实，描述生动，曾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引起各界极大兴趣，为

解放后对该地的考察与开发起了开拓性作用。考察团带回的图片实物，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赞叹不已。民族学家凌纯声、马长寿等，认为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除地理农林学外，还丰富了民族学和社会科学，使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名扬中外。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国璋多次率队翻山越岭对川康、汉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陕南进行考察。1938 年率 30 多人的考察队，历 6-12 月的酷暑与严寒，步行或骑马翻越麻日雪山，拜会月孜土司和已故九世班禅大师肉身像，并给德钦汪母活佛摄影留念，观看藏民族天葬大礼。1958 年，虽身处逆境，仍以 62 岁高龄之躯，率陕西师大地理系师生到秦巴山区作考察。他着的《西康边防问题及解决途径》，其意义已超出单纯的地理学；他的《汉中地理志》被国家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地理志的范本推广；《渭水河流域报告》《陕西经济地图》等，对陕西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黄国璋不怕艰苦，不辞辛劳，巍巍青山，滔滔江河，莽莽草原，皑皑雪域，到处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的这种实干求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同事和莘莘学子！

积极参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建工作。二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有一个进步组织——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和居理分任英、法分会负责人。1944 年春，在中共支持与领导下，黄国璋与潘菽等 40 多位科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筹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 年 8 月 1 日，在重庆沙坪坝正式开会成立，推举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藩菽为常务理事。1948 年，黄国璋与钱伟长、马大猷等发起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为反对独裁，争取人民民主而奋斗。

此外还积极参与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并进而发起组建“九三学社”。1945 年 8 月 28 日，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黄国璋与各界人士到机场迎接。9 月 3 日日本签字投降，民主科学座谈会开会庆祝，定名“九三座谈会”，进而成立九三学社筹委会。次年 5 月 4 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开成立会，黄国璋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秘书长）。解放后他经常找党组织汇报思想，并积极申请入党。

1966 年，70 高龄的黄国璋，申请去农村社教与贫下中农“三同”，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回校后，正准备向校党委递交入党申请书。却不料“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夫妇两人被轮番揪斗。在不堪屈辱的情况下，于 9 月 6 日红卫兵抄家的当晚，二级教授黄国璋与夫人范雪茵（外语教研室讲师）双双自尽。他们用自己微弱的生命向专制极权统治下的法西斯暴行作了出最后的抗争。

12、束星北：李政道之师的坎坷一生

“1972 年 10 月 17 日，是我 1946 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1957 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言。

“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期间致信当时在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的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 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24 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 年拒绝父亲希望他继承和接手掌管家族企业（包

括盐业、纺织业、钱庄、面粉业和教育等庞大的企业集团）的愿望，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27 年 2 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1927 年 7 月，因慕爱因斯坦之名，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研究助手。1928 年 10 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 E．T．惠特克（Whittaker）和 C．G．达尔文（Darwiner)。1930 年 1 月获硕士学位，随后由名师引荐，考入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对物理学有着多方面的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利用日全蚀现象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早在国内上大学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系列观点，吸引着年轻的束星北，以至浮想联翩，兴奋无比。如今能够在爱丁顿身边，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这个人类当代最伟大的发现，真是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由此更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志在必得。1931 年 5 月再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 9 月回国探亲，并奉母命完婚。

时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乃投笔从戎，于 1932 年 1 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半年后因触犯蒋介石而离职。1932 年 9 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5 年 7 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愤然辞职。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任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 年 4 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 1936 年 8 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在很多人的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其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国际物理学界的权威玻尔曾经对要求出国深造的中国青年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学呢？”

面临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束星北，为打击日寇拯救民族，防范日军飞机空袭，于 1944 年 10 月应当时国民政府之邀，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并于 1945 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民族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个爱国者所应有的贡献。抗战胜利后，束星北被授予“抗战英雄”称号。

抗战期间，他随校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其间曾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1946 年随校复员回杭州，此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

束星北在浙江大学共计任教 16 年，教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物理讨论乙（与王淦昌合开）等课程。他讲课时物理概念清晰，富于思想性和启发性，引人深思。他着重讲透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受到他理论启蒙的学生，都会有这种经历和感受，即理解一个基本原理的真谛时豁然顿悟的乐趣，欣赏到理论思维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统一性。例如，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使学生对力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把艰深的相对论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中共掌权后，1952 年实行‘院系调整’，他被‘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担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在山东大学期间，许多教师都对当时学校里浓厚的政治气氛表示反感。其中反感最为强烈的人就是束星北，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公开表达这种不满。他认为：马列主义只是哲学，根本不能指导自然科学，当然也不能指导物理学。他还说：“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想做政治家，那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为此，束星北还曾联合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为一场轩然大波。

恰好这时又开展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束星北首当其冲被打成‘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因而被停职审查，审查结论认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虽然如此，但在被审查者的心灵深处，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点芥蒂吗？不可能！到了1957 年中共号召鸣放，束星北以一介书生的头脑，怎么能够识别什么“阳谋”、“阴谋”呢？于是天真地轻信了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许诺，在学校召开的鸣放大会上侃侃而谈，题目就是“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所谈内容主要有：所谓“双百方针”纯是多此一举。只要切实遵守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文，就足够了。如果不遵守宪法，再多的‘方针’都必然成为空头支票，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应该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依法办事，实行法治，代替人治。在发言中难免涉及一些违法的具体事件。因此他又呼吁：对于违反宪法、大搞逼供信的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等等。他万万没有料到，鸣放很快就转了风向，变成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席发言，换来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后者的根据何在？翻开档案一查就有了：抗战期间，他被重庆国民党的军令部临时借用担任技术顾问，为时仅仅一年。就凭这个，再上纲上线，罪名不就成立了吗？何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之谓也。

结果是：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 年转到青岛医学院，干什么呢？不是搞科学研究，更不允许上讲坛。而是当勤杂工，扫厕所。束星北，这位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重量级科学大师、曾经培养过像李政道、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不得不屈服于权势，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从事最简单、最卑微的体力劳动。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此期间，他的专业知识也曾‘牛刀小试’发挥过一点作用。那纯是偶然：某次学院里一台进口的高精尖仪器——脑电图机坏了。请了几位高手，都束手无策。于是想起了这位‘勤杂工’束星北，叫他试试吧！束星北是国际闻名的大科学家，其天职是从事理论研究以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修仪器是工匠的任务，根本就不是束星北的强项，但他还是同意试试。当他仔细阅读了原文的有关资料后，把脑电图机全部拆开，逐一检修后再重新装配。奇迹出现：机器竟然起死回生。再一件事是海军某部的雷达坏了，无人能够修复。再次想起了这位‘勤杂工’束星北。当然也是手到病除，得胜归来。两次小试身手，使他的名声大振。随后，其它省、市级的大医院和各部队院校，遇到技术上的难题，有的是跑遍国内各大城市都未能解决的难题，一旦找到他，都能迎刃而解、手到病除。他也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他登门服务的足迹，遍及全国的 50 多个单位。经他修复、改进的设备，有 X 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机、同位素扫描仪、水箱、保温箱、电子共振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等，都在他修理范围之内。为此，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轻轻叹息道：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的确，他的专长是理论物理学，而不是工匠。他的价值远远超出这种微不足道的手艺活。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他只能在这无足轻重的小小手艺上略显风光而已。

1972 年李政道回国时曾表示希望会见自己的恩师束星北，但当局竟然不予批准。

1979 年终于得到彻底平反，虽然名誉得到恢复，但那无辜被剥夺了 20 多年的青春和大好时光如何恢复？更重要的是精神损失如何补偿？

更令人敬佩的是，晚年的束星北仍然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他到海洋研究所，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提出首要任务是要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物理队伍。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举办了有 28 名经过他挑选的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习班。针对多数学员理论基础不牢，他比较系统地讲授了张量分析、流体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等课程，还边学边教，讲授了动力海洋学。后来，他所培养的 28 名学生，大部分成为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研究课题中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所创建的研究组，成为我国从事海洋内波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0年代末，七机部准备在公海试射‘东风5号’，需要计算弹头落入大洋打捞数据舱的最佳安全时限，国家海洋局将该任务交给第一海洋研究所，束星北仅凭计算器就完成了计算，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它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被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受到政治打击后，他仍然坚持科研活动，并于1965年完成《狭义相对论》书稿。该书很有特色，但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始终难以出版。直到30年后的1995年，由他的老同学、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为之写序，才于这一年的年底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他病重期间，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病逝于青岛，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由于束星北对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被学术界尊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在他的家乡——头桥乡乡亲们的口碑极佳，故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头桥历史上的重要乡贤，在江苏江都县头桥镇红平村的“头桥市民广场”上，专门设立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生平事迹宣传牌。人民群众的纪念要比任何官方那些言不由衷的评价更重要、更有意义，更值得记载。

（本文写作时曾参阅王贤才发表在《往事微痕》第47期的文章“束星北教授百年追思”及《往事微痕》第61期的文章“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选自1957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特此致谢）

13、董铁宝：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老前辈“被自杀”

董铁宝(1917—1968 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9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大后方，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他曾冒着日本飞机轰炸，出生入死和桥梁工人一起劳动、生活和战斗。由于长期参加工程实践，充实了工程科学的知识和才干。1945年去美国深造，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参加研究工作，并在1949年取得博士学位。在和纽曼克等著名学者一起工作时，他有机会参与了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学的训练、先进的计算工具、个人对于数学的钻研，使他对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1956年，当国内开始大规模向科学进军的时候，强烈的爱国心促使董铁宝毅然放弃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积极筹划回国。并且冲破重重障碍，和夫人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祖国。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等好几家单位都极力邀请他，他考虑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学子是科技发达和国家兴旺的希望所在，乃决定留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

回国10年，除了在北京大学固体力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外，他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单位兼职，也曾多次参与有关的全国性规划、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专业活动，如水坝抗震、防护结构的研究规划等。这些活动使他的才能和科学卓识有了用武之地；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进一步激发他献身于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热情。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力学和计算机两个方面。力学学科的发展，受到非寻常环境、新介质、新材料、先进计算工具等几方面的影响。董铁宝熟悉的老本行是古老的结构力学，但他不囿于此，而是不断地从以上三方面吸取营养，及时发觉那些刚露出的“苗头”，成为一些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先行者、开拓者。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出了抗地震、抗核爆炸结构分析的难题。董铁宝在国外曾作过抗震结构的分析研究。1957 年，在全国力学报告会上，他帮助起草了关于抗地震结构的综合报告。后来，他还在全国性的第一次、第二次抗震会议上作过学术讲演，介绍国外的研究概况。他还注意解决国内的具体问题，例如，对新丰江水库蓄水后出现的诱发地震提出了力学模型和计算方法；邢台地震后，他极其关心房屋的抗震措施；他积极筹备和参加国家防护工程专业会议，对有关单位提出了建造大型激波管和添置计算机的具体建议。

60 年代初期，电子计算机在工程力学上的应用刚开始，董铁宝为此作过不少努力。在一个暑假里，他到哈尔滨为工程力学所举办电子计算机应用的短期训练班。他强调搞工程的要有数量概念，要学会数值计算。在北京的计算所，他对不少工程中的力学课题作过指导。他对具体的计算方法十分娴熟，对这方面的文献了如指掌，说来如数家珍。有一次，在一个压力容器热应力的计算任务中，工作人员遇到了困难：这个容器的力学模型中，有不同性质的两个区域，无法运用统一的计算方法。董铁宝建议采用一种混合方法，即在一个区内用低松弛迭代而另一个区内用高松弛迭代，其计算效果良好，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有限元法名称出现以前，他已带领学生们阅读阿吉里斯等人关于结构矩阵分析的前驱性文章，并用来解决具体问题。

在材料的力学性能方面，董铁宝在北京大学力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指导过好几个青年人从事疲劳和强度方面的研究、进行疲劳寿命的试验、完满地解决飞机残余寿命的估算等一类新课题。在中国，他们是开展这类研究比较早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要从材料的位错、空穴的运动、裂纹的扩展等方面来研究材料的疲劳问题。他在断裂理论方面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早年留学时期。那时，他曾准备分析裂纹附近应力场的奇异性。回国时，他复印了格里菲思 1920 年关于断裂的经典文章，准备回国后用以指导青年。

对 50 年代中期的断裂力学来说，他这种思想无疑是超前的。他还曾表示过：他的学术抱负之一，是在材料的力学性能研究中努力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他曾要求跟他写作论文的学生们去学习统计力学、金属物理等课程后才写作论文。有一次，他邀请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给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的师生作流变学方面的报告。那时，他已经感到高分子材料会对力学带来新的课题。他还努力在教学中，加强材料性能方面的内容，并尝试将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合成一课，亲自讲授。他还讲过金属材料力学性质的课程，贯彻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观点。

从 1956 年到 1966 年的 10 年中，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当时计算机科学这个名词还未形成。董铁宝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从计算力学、计算数学，一直延伸到程序编制、计算机设计原理等，都是他关注的领域。

从力学中提炼出的问题中，董铁宝及时地抓住了一些重要的计算数学问题，引导青年去钻研。病态方程是个突出的例子。60 年代初，国内有关单位提出了常微分方程求解中的病态问题（这个问题 60 年代中期在国际上成为常微分方程数值解中的重要课题），他积极支持，组织计算所第四组的研究人员进行学习和讨论。其中有些人今天已在这个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他们深深地感激董老师的栽培。董铁宝在指导椭圆型方程边值问题的求解中，由于他熟悉结构力学，就借用力学中一些手法进行离散化，从而避免了用差分法而带来的困难，并且启发大家从新途径去寻找更有效的办法。除了解决计算方法和计算数学的具体问题外，他还积极宣传计算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和宽阔前景，并倡导编制程序自动化和建立程序库，做出解题规范和应用算法语言；在当时国内计算机硬件比较差的条件下，董铁宝倡议用小机器解决大问题，为国家建设多解决实际问题。

在计算机的初创阶段，有些人了解到董铁宝在国外曾接触过伊利亚克机器，因此在计算机的设计工作中也向他请教。由此董铁宝在机器设计中也显示出他的才能。1958 年北京大学开始制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通过这台小机器的制造，

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在北京大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无疑有董铁宝的一份功绩。他对于计算机设计制造的关怀，不仅是出于个人专业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从工作需要出发。1964 年，中国有些计算机因为外部设备而被“卡脖子”，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重视外部设备；有一次还亲自动手，去请教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师傅，以便迅速解决问题。1965 年，他积极提倡、关心筹办信息处理转换专业（即现在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认为不宜再耽搁了。

20 年前，董铁宝所预测的科学技术发展新方向，今天都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新部门、新学科。20 年前，受董铁宝教导和熏陶的青年学生，今天已是业务骨干了。抚今忆昔，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董老师总是能抓住新动向。”是的，见微而知着，需要学术上深湛的造诣和科学上敏锐的洞察力，董铁宝的这种能力的“谱”又比较宽——从工程力学一直到计算机原理。

董铁宝教授的专长是善于应对物理学、工程力学等方面的难题。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仅仅依靠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弱项恰恰就在于：不会应对社会、政治环境方面的新动向、新问题。

什么新问题、新动向？伟人又要搞什么“继续革命”了，据说是要消除“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于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战略部署付诸实行。像他这样从美国归来的人，当然都是‘美国特务’，一律被定为敌人，被关进“牛棚”。在 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 年 10 月 18 日，董铁宝自杀身亡。

为了给自己的战略部署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毛泽东曾咬牙切齿地骂道：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而军代表又进一步发挥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于是一个有 4000 多教职员工的北大，竟有 900 多人被“重点审查”。董铁宝当然被列入“重点审查”的名单中。他被关押在北大 28 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这种状态当时十分普遍，俗称为“关牛棚”。

据活着走出“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体罚和殴打乃是家常便饭。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求被审查者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连续打耳光。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悄悄地离开 28 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据《北京大学百年纪事 1898-1997》所记载，在董铁宝自杀的 1968 年 10 月，在北大，还有两人自杀。一个是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10 月 16 日自缢身亡。另一人是曾担任“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崔雄昆从“清理阶级队伍集中地”的 28 楼出走，10 月 17 日被发现死在游泳池内，法医鉴定是自杀。

校史写作还有另一条规则：对于北大在文革中的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只记载系级领导人和教授级以上者。其它一律忽略不计。可见被迫自杀者之众，董铁宝仅仅是因为教授，才有资格被记录下来。

【编者按：按照这个规则，整个中华大地，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直到 80 年代末那场血洗天安门事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整死、饿死、打死的普通老百姓都成了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痕迹。像一缕清烟、一阵清风那样消逝。这真是历史的大悲剧。】

【补白】

《571 工程纪要》部分内容：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

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

14、傅作恭：起义将领傅作义之弟 水利专家惨死在夹边沟

1949 年北京和平解放，基本上保存了这座古城的许多历史遗存和文物，免遭兵燹之灾。其功绩可谓不小，参与其事的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功不可没。作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高级将领的傅先生，其女傅冬菊竟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力劝其父尽快起义，以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些都是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了。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傅将军还有个亲弟弟名叫傅作恭（1903—1960 年），是位水利专家。曾经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定居多年，生活稳定安逸。本来可以好好地生活一辈子，功成名就。

但命运实在太无情。50 年代之初，身为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力劝弟弟回国，以报效祖国。在哥哥的劝导下，傅作恭终于回到新中国，最初在水利部担任工程师。恰逢傅将军昔日的部下、同为起义将领的邓宝珊先生赴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立下宏愿，要尽快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打算先从兴修水利入手，因此，广为搜罗人才。为此向老上级傅作义求助。傅作义则动员自己的亲弟弟前往支持。

1953 年 2 月，傅作恭被调来甘肃，被安排到省水利厅担任工程师。本来也可能大干一番，施展自己的学识和才干。可是到了 1957 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党整风，鼓励大鸣大放；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好得很啊！帮助党整风，完全应该嘛！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熏陶、在欧风美雨中长期浸淫下成长，单纯、善良的傅作恭，哪里懂得中国的“国情”？更怎能识破伟人的所谓“阳谋”？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善良愿望，直抒胸臆，坦然而谈，向当地领导提出了几点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

这一很正当的行动，却得罪了领导人。于是，招来了领导的不满和批评教育。他又不会见风使舵，仍然坚持自己意见。结果被认为态度恶劣，抗拒运动，必须从严处理，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甘肃省有个著名的劳教基地，名叫“夹边沟”。在那里集中了全省大部分“阶级敌人”。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夹边沟农场总共去了 3000 多人，其中有女性 160 人。最终活着回来的大约 500—600 人。死亡率之高，居全国之冠。

在这些死亡者的名单中，就有傅作恭。本来是 1.80 的高个子,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但是经过几年超负荷劳动的摧残和饥饿的折磨,早已形销骨立了。因此,不得不写信向大哥傅作义告急和救援，述说自己饥饿难耐，劳动太重，顶不住了，希望哥哥伸手援救。

身为高级干部的傅作义,按照当时的政策,享有特殊待遇,根本就不知道民间疾苦,哪里会相信弟弟信中所言,认为这是污蔑党的劳改政策，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义正词严地回信训斥弟弟，教育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云云。为此，傅作恭还遭到一场狠狠的批斗。至此，傅作恭绝望了。

据说：在他临终前连续 8 天，清晨 5 点半就得起床去背草�童。到了第 5 天，开始拉肚子，实在干不动了。有位难友、画家高尔泰向管教干部求情说：傅作恭真的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是黑屎。（这‘黑屎’就是死亡前的最后信号）可是管教干部竟然毫无人性地说：“谁叫他当右派？如果他不是右派，就可以住在他哥哥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谁能管到他的头上？再说了，他哥哥傅作义与人民为敌，不知杀了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

好东西。”

就这样被迫继续劳动。他背着草筢勉强挣扎走了几步，实在无力前行了。只好哀求：“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事还可以申辩嘛！”这句话更激起管教干部的怒火，听罢大怒：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于是命令其它犯人用草绳套住傅作恭的脖子，向前拉，逼着他一步一步挪动前行；由于体力实在不支，只能前倒后仰、颤颤巍巍。这种做法，对于人来说，纯粹是活受罪；从劳动效果来看，更是毫无实效。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折磨人呢？只有一个解释：那些人天生的兽性发作，是一种虐待狂，一种以虐为快、以虐取乐的变态心理作怪。马克思在 1843 年 5 月旅途中给友人信中就曾经愤怒地批判过：“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兼容的。”、“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414、411 页）。拿马克思这些话和当时那些管教干部的嘴脸对照一下，多么确切，多么恰如其分！

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孟轲曾经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傅作恭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些人竟然连最起码的一点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还是人吗？这也难怪。长期以来，毛泽东就是用那套“阶级斗争”理论和对阶级敌人要狠等等说教来不断地为自己的部下‘洗脑’，因此这些人都是吃了所谓“狼奶”、因而具有“狼性”的动物。对于人，尤其是被认为‘敌人’的右派分子，更是敢于狠下毒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来了。管教干部根本就不愿多费口舌，按照惯例，命令其它犯人找来一只草笆子，把傅作恭裹起来，由一名犯人用草绳拉着，回到住地，人已僵硬，手足冰凉、没有呼吸了。前兰州工学院教授、右派分子刘逢举过来一看，叹口气说：“已经死了 2—3 个小时”。

一代天骄，就这样殒命荒郊，尸骨无存，死时年仅 57 岁。

1960 年末，一位国家领导人偶然得知：甘肃省酒泉地区夹边沟劳改农场大量死亡事件，反映到最高当局，才派出中央检查团急赴甘肃，该团由监察部长钱瑛带队，成员有公安部副部长以及民主人士多人。周恩来特批准傅作义的要求与队同行。当这些高级干部听过了酒泉地区夹边沟农场负责人的汇报以后，傅作义开口问道：“这里有的傅作恭吗？”该场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再问：埋在何处？场长刘振宇打算推脱责任，就说：“听说他可能跑掉了”。傅作义忍无可忍，大怒道：你这哪里是共产党做的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一个 50 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了，他就是有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为什么要跑？场长无言以对。

毕竟手足情深，已经 66 岁的傅作义，痛悔莫及。他哪里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劳动情况又如此超负荷。一介书生，岂能胜任？回忆当年弟弟求救信件，自己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训斥一顿。追悔之情，难以言表。遥想当年，如果不是自己写信，把弟弟召唤回国，又动员其赴甘肃以发挥所长，何至于饿死在这荒郊野外？连尸骨都找不到？思前想后，往事历历，不觉悲从中来，老泪纵横，痛不欲生。

又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就有人反映大量死人的情况。有个地区的领导人竟然说：“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如此“人民公仆”夫复何言？悲夫！

（根据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杨显惠《夹边沟纪事》、申渊《五七右派列传》（第二卷）等书中有关资料综合而成）

【补白】

摧毁一个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特别是自己制定的宪法。

——美国大法官克拉克的名言

15、姚桐斌：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 惨遭毒打致死

姚桐斌（1922--1968 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黄土塘镇。童年依靠父、兄从事粮食生意的微薄收入读完了小学，1934 年 7 月在黄土塘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校长再三劝说下，其父才同意他考初中，同年 8 月考取无锡县立初级中学，因家境贫寒，曾辍学两年，靠摆摊卖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兼做收发员、家庭教师和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带着做生意的一点积蓄，于 1937 年 8 月只身到上海，入私立成康中学、私立汇南中学读高中。又因缴不起宿费和学费，处境艰难，他同其它四位同学一起辗转来到江西吉安。1939 年 2 月，就读于吉安国立 13 中学高中部，靠学校的贷款作为学习费用。高中毕业后靠校长的资助赴湖南衡阳、长沙参加各大学的入学考试。在考完后的两个月内，靠其在衡阳湘桂铁路局机务处修理厂工具室做小工维持生活。最终以优秀成绩同时被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正大学、湘雅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等 6 所高校同时录取。论考试成绩，他是江西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个人总分第一，因而获得 13 中学的一笔奖金，这才使他有了上大学的路费。

出于对矿冶专业的酷爱，他选择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1 年 10 月，赴贵州平越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学习，最后一年学校迁至四川璧山。当时交大唐院拥有一批教学严谨、学问卓著的教授，如担任院长的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讲授力学的是著名的罗忠忱教授，矿冶系何杰教授、王钧豪教授也是蜚声中外的名师。名师出高徒，姚桐斌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于 1945 年 7 月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被遴选为美国斐陶斐励学会会员。1945 年 8 月至 1947 年 3 月，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该所原在重庆北碚，后迁至北平（今北京）。在此期间，他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一边准备出国留学考试，1946 年 10 月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1947 年 6 月启程赴英，10 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后期兼做实习指导员。1951 年毕业时，以“对于液态金属及合金的粘性与流性的研究”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工学博士学位。1952 年 1 月至 1953 年 6 月，在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深造，并兼做实习指导员，以《对于液态金属在铸模中流动时的垂直运动研究》的论文，获帝国学院文凭。在留英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当选为夏令会常务委员，分管总务工作；还曾担任进步刊物《循刊》的编辑，并协助主持留英学生会的工作。1954 年 2 月起在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铸造教研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6 年 9 月，在瑞士的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共。

1957 年 9 月回国后，被安排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这位才华横溢、热血沸腾的青年学者，怀着献身祖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雄心壮志，开始从事导弹与航天工业的工艺、材料技术工作。历任第一分院第七研究室（材料与工艺研究室）工程师、室主任；第一分院第六研究所（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并于 1961 年 11 月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1965 年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他仍任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一直从事导弹与航天的材料、工艺技术的组织领导、研究和试验工作。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他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粘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1962 年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在此前后的 4 年中，他除向国内各兄弟单位提出大量研究课题外，在所内开展的研究课题多达 500 多项。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

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因为姚桐斌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一。

‘文革’狂飙袭来，把这位忠心耿耿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成绩，并将继续做出更大贡献的专家逼上了死亡之路。

1968年6月8日，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敢上班了。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心，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实在放心不下，只得回到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人物便破门而入，架着他就往楼梯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搧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地上……

“造反派”的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时年仅46岁，如此年富力强的精英本来可以为国家建设事业继续工作30年甚至更多，不料惨死在乱棍之下、暴徒之手。天理何在？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更震惊了国防部。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时，周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事后姚桐斌被追认为‘两弹一星烈士’，但那如火的热情和青春活力却无法复制，一去不复返。悲夫！

【补白】

“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而奋斗的宪政梦想。”

——引自高尔基1918年1月5日发表的文章

16、董时光：海归博士被毒打致死

董时光（1918—196？年）四川垫江人，留美教育学博士。在留美期间因大量发表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1955年被强制驱逐出境。回国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迎接他。由于他一门三兄弟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当时几所著名大学争相聘请。后因其三哥董时恒是西南师范学院体育学教授，经三哥引荐，再加上对故乡的感情使他选择了西师。这位长期受西方民主意识熏陶的知识分子，对现实国情却茫然无知，又有一身士大夫的傲骨，因此，几年来与校党委关系搞得很僵。

回国不久就碰上了被称为“阳谋”的那场“整风运动”。习惯于西方政治、天真而又单纯的董时光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是诚心诚意邀请各界人士帮助中共整顿歪风邪气。于是慷慨陈

词、口无遮拦、侃侃而谈。结果如众所周知，落入了陷阱，给当局提供了大量的“罪证”。

1957年5月11日，西南师范学院党委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教师座谈，《重庆日报》派记者采访。董时光发言，开口就声明：自己“从解放前就一直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着，现在西师的领导以为我不积极，这只能证明他们不要民主。”他就学校领导层存在的党群关系等问题，批评校领导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举例说：当他回国不久，和几个学生在毛主席塑像前拍照，为校警干涉，说领导规定不准拍照。双方争执起来，校警报告领导。他写信给校领导，抗议这种没道理的禁令。院长办公室回信责备他“不敬爱毛主席”。他说这是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类似的言论很多，当然惹起学校当局的不满，视为‘另类’。

5月29日，《重庆日报》以煽动性语言和断章取义、篡改、拔高等手法，对他的批评言论进行歪曲报道。文章冠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标题发表。事后董发现与原意不符、出入很大，要求更改，报社却不予理睬。他认定这是要“阴谋”，侮辱人格，于是写信指责报社断章取义，应该向他赔礼道歉。他说要是在美国，他还要向法院起诉……《重庆日报》毫不客气一字不漏又登了出来。一个从美国跑回来的知识分子竟与中共的党报叫劲，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一时间把整个山城闹得沸沸扬扬。

在20多天大鸣大放期间，董时光鸣放的大块文章、讲话，先后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多次刊出。在西师，他几次主持民主论坛，每次都有校内外几千人参加；校内几乎每天都有他写的油印短文，张贴在各主要路口。

董时光成了重庆高校中大受师生欢迎的大鸣大放“重炮手”。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师范等十多所高校纷纷请他去演讲。

据《右派分子董时光的反党言行录》、《李天德日记1957——1958》和李天德及其老同学的回忆：上午九时，董时光由学生会主席引领到寅初亭。董先生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妙语连珠，令同学们倾心不已。

他首先说：重庆是我的家乡，我去了西师，学校只给我一个讲师待遇。我没有计较，因为我是回家乡献身教育事业的，不是来争待遇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讲人人平等，机会均等吗？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可惜我的想法错了，我碰到一个外行，是学校党委书记兼院长方敬(时任副书记兼副院长)。他不是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而是制造麻烦。几乎每天都敲打我们，一遍又一遍喊“学习马列主义”啦，“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啦。就像《西游记》的唐僧，自己一点本领没有，人妖不辨，只会对孙悟空念紧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这样一个外行管理学校，注定了我们教师无所适从。他不懂教学，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爷架子，特别是对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人，就像周身都带着帝国主义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难。在他看来，不脱胎换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学生！真是荒谬之极，奇谈怪论！在美国，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样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吗？按他那一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10年出不了，20年、30年也出不了！这些年来，对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们“脱裤子洗澡”，“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真是无聊至极，侮辱人格嘛！知识分子尽心竭力搞社会主义建设，头上却戴顶紧箍咒，真让人心寒。

方敬不像领导，倒像是唱赞美诗的。举件小事让同学们看看其人品：学校有一对青年人结婚，请他主婚。他却大说官话和套话：今天两位新人能幸福地结成终身伴侣，应该感激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们才有今天的相爱结合，你俩要牢记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讲完这些肉麻的话，他转身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学们，这说明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年轻人结婚，关毛主席什么事？莫非毛当了红娘牵了线？今天结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怀孕，生小孩，还是毛主席的功劳？这种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阳救星，下管人间烟火，实际是搞个人崇拜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教训：搞个人崇拜，就会把中国引向造神时代，就会产生个人独裁！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

新局面。这次整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作风。

台下学生极为亢奋，有学生高喊：董老师，讲一讲美国民主是啥样子吧！

董时光谈起中国民主建设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他说：美国是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靠人民的选票轮流上台执政。台下在野党死死盯住台上的执政者，一旦发现违背法律和民意，就群起而攻之，直至把总统赶下台。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家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协调人民利益，保护人民安全的社会权力和结构。有史以来，统治者用暴力荼毒苍生，野心家或造反者用暴力流血夺天下，搞得天下大乱，血流成河。这样的代价太大了！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为什么？就因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是以和平、有效、理性、最低成本的方法，选择国家执政者和管理者。国家者，全体公民之国家，非一人一姓一党之国家。民主制度是每个选民，以手中选票，来选择真正能够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的执政者，全体选民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全体公民自己的事情。解放前，共产党批判蒋介石以党代国、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并以民主自由为自己开国纲领。一党执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主席真伟大啊，整风运动就是要还权于民，让人民先拥有监督权，然后走向民主选举的共和制度，这是根绝几千年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我举双手赞成……

董老师的学生李天德回忆说，董时光关于民主的一席话，对他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启蒙影响。

董时光还谈到对学习西方，特别是美国，好的东西好的科技都可以学，不能一切只学苏联老大哥，搞"一边倒"！他敞开心怀，滔滔不绝，博得大学生们阵阵掌声。

正当大鸣大放如火如荼之际，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进军号。

《四川日报》、《重庆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对董时光的批判火力尤猛。6 月 11 日，《重庆日报》报道《董时光继续散播反动言论，西师师生员工群起驳斥》，说董时光对"卢郁文匿名恐吓信事件"提出疑问，认为这可能是当年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翻版。董因此而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西师为斗倒大右派董时光，向各大学发出邀请。重大学生会挑选了一批党团员和口才好的学生，李天德入选其中。西师批斗会场坐满了人。主席台上，拉起"揭发、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大会"的横幅。

李天德回忆说：董时光被带上台时，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但"士可杀而不可辱"，仍不失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这种气度对自己的一生都具有人格的示范作用。根据《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主席台上，大会主持人同董时光争执好久。董时光怒气冲天，走到麦克风前，极力克制了好一阵，语气沉闷地说道："主持人要我交待攻击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不明白，我的哪些话是攻击污蔑？共产党要整风，叫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怎么又说我是攻击污蔑？攻击污蔑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制订？总不能随心所欲说人是攻击污蔑、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哪有这么不讲理的霸道作法！"随后，他的声音被台下群情激奋的批判所淹没。台下口号声四起："不准董时光继续攻击污蔑！"

"董时光必须老实交待，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

董时光理直气壮地对着麦克风大喊："如果你们认为我攻击污蔑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攻击了又怎么样？！执政党犯了错误，难道还不准公民批评吗？在美国，公民不但可以批评总统，还可以叫他下台。中国到底还是不是人民共和国？我们到底还是不是公民？公民到底还有没有权力批评执政者？！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力，到底还生不生效？！"

于是更激起台下几千人的情绪，喊声更加高昂："不准右派分子嚣张！"、"右派分子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

董时光蔑视地喊起来："既然喜欢呼口号，你们就喊吧。至于说低头认罪，我向谁低头？向谁认罪？我有什么罪？你们有什么权力宣布我有罪？你们是法官？不是法官，怎么可以指控一个公民有罪？真是岂有此理！"

主持人抢过话筒宣布："董时光是一个顽固坚持反党反人民立场的右派分子。在这里，我要严正地警告董时光，你想抗拒这场伟大的反右斗争，决没有好下场，到头来只能粉身碎骨，身败名裂，自绝于党和人民！现在大家来揭发批判！董时光，你好好听人民的吼声吧！"

几个人站起来高喊："我来揭发！"有个男子不等主持人允许就上了主席台。他满腔激愤说："我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声讨右派分子董时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一是污蔑我国没有民主，不如美国民主；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搞个人崇拜；三是攻击我国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四是攻击我们教学大纲学苏联，是教条主义死搬硬套；五是污蔑我国不尊重人权，大肆贩卖资产阶级人权观；六是污蔑校党委独揽大权……."

台下不少人举手要上台揭发。主持人不假思索地要一个女同学上台，她就是当年新婚夫妇的女主人。她一脸激动地说："当年我结婚，敬爱的方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毛主席三鞠躬。董时光害怕我们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限崇拜，恶毒攻击污蔑方书记是搞个人崇拜。我们就要无限崇拜我们的伟大领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能够猜到：重庆几千个"劳动教养"的极右派，都到大山里修内（江）昆（明）铁路去了，董时光和好些有名的大右派都名列其中。那里劳动强度和生活艰苦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刚去不久，就有人跳悬崖绝壁自杀。

李天德为此感叹不已：董时光放弃美国的高薪厚饷，回到大陆建设祖国，想不到竟落到劳动教养修铁路的下场，真是悲剧！

这些右派分子，先是被集中到转运站。一百多人挤地铺，连高粱米饭也吃不饱。呆了半个月，然后送到峨边县沙坪农场白夹林中队劳改。宿舍是三大间山茅草盖的长草棚，四周墙壁用稀泥涂上，穿风透雨，还不如解放前地主的牛马圈。山上砍下树棒用草绳捆成长长一溜，铺层山茅草，几十人挤在一起睡统铺。一日三餐喝苞谷水粥。在这几千人中，除董时光外，还有西南作家协会创作部委员刘盛亚，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汪子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民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李康与苏军等知名人士。这些民族精英，现在却成了猪狗不如的阶下囚。由于饥饿和过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患了水肿，据从劳改营出来的人反映，绝大多数"犯人"，相继死于大饥荒，成了弃尸荒郊的野鬼。

1958 年 4 月 15 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调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年轻力壮的"右派"建立了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董时光被调入该支队，编入 27 分队。内昆铁路要在崇山峻岭中放炮炸石开山劈岭架桥修路挖隧道，"罪该万死"的右派当然是最佳人选。不少人因此摔下悬崖绝壁，尸骨难寻。1959 年 10 月，内昆铁路停工下马，"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又转战凉山修成昆铁路，此时口粮下降，菜里看不见一点油星，劳动强度极大，饥饿再次向他们袭来，大批右派水肿，工地上经常发生猝死现象。

1960 年 3 月，成昆铁路下马，"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部分右派和反革命被送到雷波、屏山、马边三县交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那里是大凉山和五莲峰山脉交界的大山区，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董时光当养马的马倌。当时大饥荒席卷劳改农场，董时光也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把他折磨得完全脱了人形，严重时走路都摔跟头。一天，他偶然发现：在马粪蛋中，竟有一两颗没消化了的胡豆！他赶紧动手，在一堆马粪里找胡豆，然后淘洗干净，比人参还宝贵地放进了口中。从此，董时光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马粪中寻找那无比珍贵的胡豆，并将找到的胡豆洗净晒干，积攒起来，以备更严重时充饥救命。一段时间，他竟积攒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点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时，被"同犯"发现，立即向干部汇报，说大右派董时光"偷吃马粮"。批斗会上，干部安排的"改造积极分子"带头，其它犯人一拥而上，将

他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农场劳改医院后，不治而死，终年 48 岁。

80 年代初，其家属反复申诉，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据说当地的领导人认为："如果给董时光改正了，重庆市就没有人算得上右派了"。也就是说，他们准备把董时光作为典型和样板，用以证明：反右派斗争"不是搞错了，只是'扩大化'"。

幸亏他大哥董时进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农学家，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经他向最高当局正式申请，这才引起有关方面重视，直到 1984 年 5 月 13 日，西师才勉强为他正式平反。

（据《往事微痕》第 64 期余习广的文章及《巴山夜雨》第一期资料综合写成）

【编者存疑：董时光先生的出生年月和终年一直没有弄清楚。好几则资料都肯定他是 1918 年出生的，余习广先生的文章称：终年 48 岁，那就应该是 1966 年去世。但该文最后那段说的应该是 1960 年后不久的事情（吃胡豆），可能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死于 1961~1962 年，那其终年就只有 43~44 岁。这只是个枝节问题，并不影响其被毁灭的整个事实真相。故存疑】

【编者按】董时光在 1957 年就预言："照共产党那一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十年出不了，20 年、30 年也出不了。"

他说此话距离现在 55 年了，大陆仍然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董时光不幸而言中。

17、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在文革中惨死

刘允斌（1925—1966 年）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长子，本来也属于'红色贵族'人物。可是他生不逢辰，恰恰出生在极其紧张而又危难之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安危系于一旦。因此，刘少奇夫妇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送回湖南宁乡县老家寄养。1938 年 7 月，中共组织把母亲早已牺牲的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这年秋天，13 岁的刘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学读书，心灵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滋养。一年后，中共决定选送一批领导人的子弟去苏联留学。因工作繁忙无暇照料孩子的刘少奇，将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送上了赴苏的飞机。1939 年 11 月，刘允斌等到达苏联莫尼诺，在那里就读一学期后，搬到距莫斯科 300 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读书。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物质条件逐渐恶化。伊万诺沃市民每天只能领到几两黑面包，冬天里没有取暖的煤和柴。在国际儿童院学习的刘允斌每顿只能用半片面包、几个蘸盐的小土豆果腹。然而，刘允斌的热情不减，仍然情绪饱满地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开荒种地、伐木、搬运木柴等劳动，并主动为前线将士献血……表现突出的他被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不久，刘允斌加入共青团，担任国际儿童院团组织负责人。

成绩优异的刘允斌高中毕业时，考虑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而钢铁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跨入钢铁学院那年，品学兼优的刘允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美国爆炸第一、第二颗原子弹 4 年后的 1949 年 8 月 29 日，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才试爆成功。关心时政的刘允斌注意到，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国对苏联的强硬政策缓和下来，并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观察和思索中，刘允斌认识到：原子弹不仅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而且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原子弹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

刘允斌的想法得到许多同学和老师的支持，他做出人生旅程中第一个重大选择：改学核

专业，搞核研究。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的刘允斌转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系的研究生。1955 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

颇为赏识刘允斌才华的苏共高层领导人用优厚待遇和条件挽留他，但刘允斌却说："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不回去，因为我那贫困的祖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这大概就像你们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种感情相信你是会理解的。"为了回国，他还不得不与不适应中国生活的苏联妻子离婚。

1957 年 10 月，32 岁的刘允斌毅然踏上回国的旅程。不久就被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四〇一所。该所设在距北京 50 多公里的郊县。在那里的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人，沿着宿舍——食堂——研究室的固定路线匆匆而行。食堂的师傅们注意到，他常常一次买足一天的饭菜，钻进研究室就不再露面。围棋桌前、乒乓球室里、运动场上都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周围的人发现他的皮鞋不亮了、头发不光了、衣服不整了……后来，人们终于打听到：此人乃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热核材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对中国核能研究有突出贡献，获得国家授予的副研究员技术职称，是中国年轻的核专家。

1957 年，原子能所研制成功第一台能量为 2.5 兆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 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式加速器开始运转。新中国的核事业在艰难中起步、拓展、前进！作为核专家的刘允斌，为中国的核能研究、核工业的起步奉献了智慧与辛劳。

1959 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中国人喊出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悲壮口号，来激励人民，众志成城，以加速这方面的工作进度。

1961 年，原子能研究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入中国核燃料组件厂，刘允斌所在的原子能四〇一所组件工艺室并入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刘允斌奉调前往中国西部二〇二厂组建第二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〇二厂位于横亘中国西北部某高原的大山脉中，一条僻静的公路连接山外。1962 年隆冬，一辆轿车载着年轻的刘允斌一路颠簸来到这里。不久，他被任命为第二研究室主任，即同其它负责人一起，全身心投入研究和组织工作。

刘允斌对原工程方案深入研究后，与汪德熙教授等人提出了新方案。在新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刘允斌终日忙碌、头发蓬乱，一双磨掉毛的翻毛皮鞋从未脱下来，一件蓝布上衣伴随他度过了春夏秋冬。日常生活更随便、自然，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除要事外，他很少乘轿车去厂区上班，总是背着装有饭盒的黑色书包，同普通工人一起匆匆行走在崎岖的厂道上。在物质生活上非常随便的他，在工作上却一丝不苟。科研攻关时，在研究室里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饿了，到食堂打些饭；困了，盖上大衣躺在办公室里睡。再婚的妻子李妙秀生孩子那天，正值刘允斌科研紧张之时，他买了大堆营养品回家，拜托护理人员照顾产妇，亲了亲宝贝，安慰妻子几句，就匆匆赶回厂里。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戈壁滩腾腾升起。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强烈的冲击波撼动整个世界！喜讯传来，刘允斌全身热血沸腾，纵情欢呼："爆炸了，中国人研制的原子弹终于成功了！"他和所有参加核研究、核试验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群众一起，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其间蕴含着刘允斌的智慧与奉献、奋斗与牺牲、欢欣与艰苦。

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刘允斌的前途真是无可限量，可以说是前程似锦，一片辉煌。

但是，历史老人太喜欢作弄人了。毛泽东忽发奇想，要搞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第一个目标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的亲密战友、被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刘允斌的命运在劫难逃。他很快就被下放劳动。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他诚心诚意地接受监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长期生活在已变"修"的国家，也许自己真是沾染上意想不到的需要改造的东西，也许这场运动真的是为了革命的大业永不变色，于是，

他努力使自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积极劳动。打扫卫生时，每个角落、每个垃圾点都认真清扫。掏污水沟时别人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干；搬砖时手都磨破了，找块旧布包上继续干……

越来越消瘦的刘允斌拼命干活，常常累倒在工地上。监督他劳动的工人冬天里仍然穿着单鞋，他从家里拿来新棉鞋递上……尽管这样，周围的人还是渐渐疏远、回避他。沉默的刘允斌尽量少与别人接触、说话。工休时独自躲到一边，在僻静处蜷曲着身子躺下。心情十分烦闷时，就将工作服遮在脸上，时而拉开衣角凝视着天空发呆。

当他劳动后回家时，憔悴疲惫的妻子迎上来，刘允斌心里涌起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彷徨。他强咽下苦痛，装出笑脸宽慰妻子："我相信，这一切会过去的，误会定能解除！"

形势的发展，远非如刘允斌所预想的。刘允斌所在的第二研究室属国家机密单位，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能乱，责令其造反派头头赴京汇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民族和国家已陷入疯狂和混乱中，二〇二厂这个孤岛也不能幸免。随着运动的推进，全国各地、各种报纸载文诋毁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父亲刘少奇倒台了，刘允斌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遇皮肉之苦、忍受人格侮辱……面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批斗和无理追问，刘允斌只能忍受，强咽苦水；既不能辩解，也不想辩解。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无理可讲。辱骂、唾沫、拳脚、棍棒终日袭来，时时相伴。他明白在北京的父亲刘少奇和继母王光美的处境不会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更难；几个弟妹也难免和自己同样的遭遇。

这天，又一次挨了批斗的刘允斌步履踉跄地回到家里，妻子拥抱着满脸伤痕、浑身血污的丈夫不禁失声痛哭："允斌，那些人为什么要如此摧残你？你……"泣不成声的李妙秀为丈夫擦去血迹，抚摸着伤痕，极度痛苦。"妙秀，我让你受牵连了，真对不起！"忍着疼痛的丈夫挤出一丝笑容，噙着泪说，"不要难过，你还记得普希金的诗句吗？"两人轻轻吟诵：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伤心，也不要抑郁。……

相信吧，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

"是的，'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李妙秀哽咽着、重复着，把痛苦和希望寄托在美好的诗句中。凝视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刘允斌感到抑郁的心里忽然射进一丝阳光，淌着鲜血的心灵得到一点慰籍，绷紧的神经顿感放松！

不几天，刘允斌被造反派挂上黑牌，强行推上汽车，押解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区游斗。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刘允斌的心彻底破碎了！

1967 年 11 月 21 日，风雪之夜，刘允斌拖着饱受摧残的身子回到家，妻子迎上来，拂去丈夫浑身的雪片。看着新伤旧痕累累、被凌辱、受践踏的丈夫，作为妻子却无力排忧解难，她痛苦的眼泪似决堤的洪水，肝肠欲断、心如刀绞……

夜深了，刘允斌和衣躺在床上对妻子说："我来到世界上 42 年，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不起的是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罪，你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我就无憾了……"刘允斌的话格外多，李妙秀以为这是他对过分痛苦的吐露和宣泄。夫妻俩回忆前天、昨天、寄托明天，谈得很多、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从墙壁缝隙吹进的寒风惊醒了李妙秀。发现丈夫不在家，顿感不妙。她急忙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爷，四处寻找…….天亮了，人们在家属区北面的铁路轨道上发现了刘允斌的遗体。

42 岁的刘允斌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造反派在他诸多罪名中又加进一条："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编者按：刘允斌是高干子弟，为什么还要收入其事迹呢？首先因为他是科技精英；其次，他是被政治运动所毁灭的，这两条都符合入选本书的标准。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他是刘少奇的儿子，而刘少奇曾经是中共的高干、毛的接班人；但后来失宠了，被毛泽东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雄辩地说明：在极权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游戏规则：成王败寇，你死我活。在中国历史上这类‘游戏’不断地上演：秦二世的“沙丘之变”、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宋太祖赵匡胤和其弟赵匡义之间的烛影斧声迷局、明英宗的“夺门之变”……等等。到了中共，也未能改变这种残酷的游戏规则。与之相对照的是西方法治社会下的政治游戏规则：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甚至可以成为新的合作伙伴（例如希拉里曾经和奥巴马竞争总统候选人资格，失败后却可以被邀请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主要助手——国务卿）。比较之下，优劣立现。

还有另一层意义：想当年第一个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的是刘少奇。1945 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曾 104 次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早一些，在 1943 年 3 月 20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书记处。又是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毛有最后决定之权。还有：到了建国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有段时间对毛不满，就公开散布毛那些风流韵事。刘少奇知道后下令‘把叶子龙枪毙了’。可见刘是多么热衷于对毛‘忠心耿耿’。所有这些，雄辩地说明：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这位‘二把手’。中国有句俗话：请神容易送神难。神既然稳稳地占据着要害位置，就害怕别人早晚觊觎这个位置，当然要不断地清洗、消灭所有可能威胁自己的、潜在的对手，并祸及子孙。看来，这个悲剧的祸根正是刘少奇当年自己埋下的。如此说来，刘少奇算是自作自受了，而且祸及下一代——无辜的刘允斌。这些道理正是本书收入该篇的深层意义。】

【补白】

中国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没有一个是为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而奋斗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老毛除外 》。

第 3 单元　政法之星

1、储安平：正在复活

储安平（1909 年－1966 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望族之家。1928 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学习，于 1932 年毕业。1933 年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 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 年 8 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这一时期作品有《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等。《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此外还兼任桂林《力报》主笔。1945 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又赴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 年春赴上海，于 9 月 1 日创办《观察》半月刊，继承《客观》周刊的风格，自任社长和主编，该杂志封面的英文是：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无派）、THEOBSERVER（观察）——这三个词恰好代表着《观察》的基本立场。在《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公开提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项基本原则，并表明刊物将采取“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这些就是刊物的“基本原则和主张”。到 1948 年底，共出版 5 卷 113 期。《观察》聚集了一大批五四以来最著名的自由

主义思想家。如曹禺、胡适、卞之琳、周子亚、宗白华、吴晗、季羡林、柳无忌、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朱自清、钱钟书等。这些人认为：知识分子以言论报国，责无旁贷。文人有权用言论的力量批评政府及各方面的措施，抨击时弊。该刊以坦率、公允和智慧的笔调吸引大量知识份子读者群，销量从最初 400 份迅速飙升到 10 万份，左右着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

《观察》文章多以精英知识份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评论。自许“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储安平在《观察》上所写的政论时评，主要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给学生运动以同情与支持，维护言论自由权利和价值，及讨论美国对华的有关政策等。《观察》是当时中国进步民主运动的一面重要旗帜，影响极大。同时储安平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 年 12 月 25 日因言论过激，《观察》被国民党查封。

可以这样说：《观察》代表了储安平人生中第一个黄金时期。

1949 年 11 月《观察》在北京复刊，改为半月刊，储安平仍为主编。然而，复刊后的《观察》，原来的自由主义的风格荡然无存，封面形式也面目全非。他为复刊后的《观察》写过三篇署名文章，已毫无昔日的思想锋芒。他在文章中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刊物的基调则由过去的以“暴露性、批判性”为主变成了以“积极性、鼓舞性”为主，侧重介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等新人物、新气象，这和储安平原来的办报宗旨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1950 年 5 月第 14 期后，改名为《新观察》，主编为黎澍。储安平调任新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从此离开了自己倾尽心血创办的刊物。

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储安平敢于冒着杀头的风险向当局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复刊时，他却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真诚的反思？抑或是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做出的表态？无疑是值得后人玩味和思考的大课题。

储安平，这个中国最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从此锋芒收敛。当人们发出“储安平昔日的风格何在？”之类慨叹时，恰逢 1957 年中共号召鸣放，要求各界人士积极建言。6 月 1 日，在统战部反复启发、循循善诱之下，储安平终于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内容包括：“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他还把议论的矛头对准国家领导职位的安排：“1949 年开国以后，中央人民政府 6 个副主席中有 3 个党外人士，4 个副总理中有 2 个党外人士，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几个非党副主席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国务院副总理有 12 个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出来担任这样的职务？”接着又说：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现在我就要给老和尚提点意见”。他最后总结说“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此言既出，石破天惊，震动朝野。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这篇 1200 字的发言成了当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代表作’。人们惊喜地发现：昔日那个敢说、敢言的储安平又回来了。次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着位置全文刊登他的发言。《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看来，储安平这篇发言代表着他人生中第二个黄金期。仅仅根据这篇发言，他必将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可是该文的发表，却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6 月 8 日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斗争开始。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在众多揭发、批判者中有一位的发言不能不记录下来，供后人参阅。这位发言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晗。他厉声驳斥道：“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说共产党也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而且用心恶毒。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由于背后有人支持。”可是仅仅过了 9 年，这位积极发言的‘左派’吴晗先生竟然也跌落到被批判的地位，并且被投入监狱，折磨致死。悲夫！历史老人总是喜欢作弄那些‘左派’人士，让他们自作自受、自食其果，让他们啼笑皆非、里外都不是人。

还有人揭发储安平，经常在报社里公开说：“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事情就在于揭露，至于分析和解决问题那是共产党的事。”其实这个话并没有错。鲁迅先生早就说过：“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还认为：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但根据储安平那一天的发言，足以证明：他就是这样的知识阶级，当之无愧！

但是，重压之下，安敢不低头。6 月 21 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他说：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的言论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 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8 月，储安平、徐铸成等人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职并送郊县劳动改造。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理所当然地成为被“横扫”对象。8 月 31 日投湖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9 月上旬神秘失踪，从此生死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对于储安平的失踪，各界人士议论纷纷，各有不同的说法：有出家说、自杀说、被打死说等不同的版本。有位学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作为 1980 年‘不予改正’的 5 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无数人已为此写过无数的文章，从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到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再到徐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1999 年第 2 期），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杀”、“蹈海而死”，还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虐杀毙命”），或者是出家当了和尚。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无论怎么死的，储安平终究是在 1966 年“文革”爆发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但是人们永远忘不了他那些掷地有声的政论，忘不了他先知般的预言，忘不了他给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时代所下的著名论断。

储安平死了？

“储安平正在复活”。饱经忧患、才气纵横的章诒和女士如是说。（引自“储安平在时间中复活”作者：傅国涌）

【补白】

储安平语录：

1、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其主办的《观察》被查封之前，说过这样的话：政府是可以更换的。自然，政府也更是可以反对的。

2、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

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

3、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

2、罗隆基：书生从政政灭书生

罗隆基(1896～1965 年)江西省安福县人。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二号大右派，也是中央级不予改正的五名右派之一。

其父罗念祖是清末秀才，饱读诗书，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有名气。他教书很特别：遵循孟子之言：聚天下英才而教之。因此，只教“尖子生”，凡是顽劣、庸懒之辈，即使家长出大价钱他也不收。1903 年他在江西省吉安开馆，反复挑选，只选到四个学生，进行重点教化。果然后来都成了名人：其一就是自己的儿子罗隆基，另外三人分别是：吉安人刘峙，后来当上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成就比较低一点的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也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人称“三朝元老”。

罗隆基从小天资聪颖，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有神童之誉。1913 年以江西考区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五四运动”时，罗隆基以清华大学辛酉级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队伍的前列，成为勇敢的“五四”战士。1921 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的名额，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论家拉斯基的仰慕，又从美转赴英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 年学成回国，即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而被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皖南事变”后，罗隆基积极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中共，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并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同时宣布脱离国社党，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在昆明主持创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员、积极推动昆明抗日运动的开展，为民族民主革命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并得到他们的许多鼓励、帮助。在重大问题上和中共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因此上了国民党保密局行刺的黑名单。后经国民党起义将领杨虎、阎锦文的保护才得以脱险。

1949 年 9 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来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对于这个安排，罗隆基的冤家对头章伯钧曾经说过一段非常客观的评语：

“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胡适就非常佩服他的本领，连沈钧儒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罗隆基就可获得答案。假如让他去外交部当个次长，有何不可？可偏偏让他去管木头。……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只要我们和英美尚未处于战争状态，叫他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是有利的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啊！”

章伯钧先生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十分到位。以罗隆基的才干和能力，本来可以担当大任，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即使屈居‘管木头’的地位，罗隆基也还是可以为新中国做一番贡献的吧？

谁料风云突变，毛泽东搞了一个所谓‘阳谋’三部曲。具体来说就是：第一步先号召、动员、鼓励各界人士大胆建言，并且信誓旦旦地允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无数知识分子轻信，以为中共真的要改弦更张、从此倾听民意、检讨错误、改进工作。第二步：各界人士纷纷建言，披肝沥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中共的各级官员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硬着头皮地听，不反驳；最后也就是第三步则是：“收网”。当那些不久前还在仗义执言、慷慨陈词之士纷纷落马，被收入网中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误入了《水浒传》里高太尉那森严的‘白虎节堂’，醒悟过来刚欲回身时，才发现已被高府的众多家丁们包围了。到这时已是百口莫辩，成为新时期一个个的‘林冲’。

那么，罗隆基的‘罪状’是什么？或者说中共兴师问罪的借口是什么？

1957 年 5 月 22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年在评论德国农民战争时就曾经指出：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侩子手，最后却成了这场农民革命战争遗嘱的执行人。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早已有之：慈禧当年扼杀了百日维新运动之后，不也搞了个‘新政’，把那些维新党人的主张一一付诸实践了吗？当年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被中共一棍子打下去成了大右派、“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是 22 年后，中共自己却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只不过名称叫做“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55 办’，因为所要落实的政策就是中共那个 55 号文件。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工作的对象大大超过当年罗隆基所建议的范围。因为在错误的道路上，毛泽东滑得更远了，对中国人民残害的数量成几何级数上升了。

其它各位‘右派’的‘遗嘱’大都一一被中共自己先后‘执行’了，此处不必赘言。

既然执行了罗隆基的‘遗嘱’，那就应该恢复人家的名誉了吧？不行。为什么？道理太奥妙了。据说，邓小平生前曾经有言：反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应该留几个吧！也就是说：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形象，不能把反右全部否定，只能说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如果连罗隆基这样的大右派都‘改正’了，岂不是一风吹、一个不剩了吗？岂不是全部错划了吗？那还有什么‘必要’呢？那还如何维护毛泽东的面子？看来，毛泽东的面子比那几个人的命运和名誉重要得多啊！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吧？

除了以上“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外，还有许多中共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言论。例如：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却要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呢？（其实,毛泽东根本就没上过什么北大，只是当过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而已，他那样说实在是在恭维、抬举老毛。）另外，关于储安平的‘党天下’议论，从源头上说，也是来自这位留美博士。罗隆基早在 1930 年就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的雄文，严厉抨击国民党的‘党天下’。当时罗隆基是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而储安平则在该校当学生，听过罗隆基的“比较政治”和“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无形中接受了罗隆基的思想影响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罗隆基在划为右派以后，1958 年 1 月 26 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 日，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消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从此淡出政治舞台。昔日风流倜傥、恃才傲物名士派头不得不收敛起来，低眉俯首、‘夹紧尾巴’做人。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可想而知。有的时候，实在无处倾诉时，也想去找个人说说心里话。找谁合适呢？

由于毛泽东公开讲话中定的调子：“章罗联盟”，把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冤家对头严严实实地捆在一起，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名的两个大右派，而且升级成为‘集团’了。据章诒和的回忆：罗隆基得知“章罗联盟”结论，气冲冲地闯进章家，在大厅里当着家属子女们的面，

大声咆哮，厉声质问章伯钧："我什么时候和你搞联盟了？"章伯钧无言以对，因为他实在无法回答。所谓"章罗联盟"，本来就是'钦赐'的帽子，非戴不可！最后罗隆基把专门带来的一根手杖疯狂地敲击地面以至于折成三段，抛到章伯钧的跟前，拂袖而去。

几乎所有民主同盟的人都了解：他们两个人平日见面就争吵，势如水火，更不可能搞什么联盟。这一点连中共高层（当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也是深知的。但毛泽东就有这个本领：硬是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干的人捆在一起。例如对党内的高岗、饶漱石是如此；对党外的章、罗又如法炮制。

事情的发展真怪：原先势如水火的两个人，在戴了右派帽子后，反而走得更近了。罗隆基经常登门造访章伯钧，还逗趣地说：暂时和你'联盟'一回吧。或者说：又来'联盟'了。他俩在密室悄悄私语，可以海阔天空，还可以粪土王侯，不必害怕。因为都是君子，不会像小人那样去做告密的勾当。可惜这些谈话没有流传下来，否则必将是十分深刻的思辨录，一定会给后人以莫大的启示。

其二：这期间，香港有人邀请他到香港办报，他却未去。周恩来也多次表示：如果你想出国，只要不去台湾，任何国家、地区都可以。没有路费，我们可以安排。罗隆基却表示：死也要死在中国。这个很不符合罗隆基作为长期受西方政治文化熏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性格的抉择，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不远走高飞，去西方挺起胸膛与脊背、堂堂正正地做个公民，却要留在这个仇视他、轻贱他的地方做政治贱民？过着'夹紧尾巴'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好过吗？真是奇矣怪哉！事后再一想，有了初步的答案。

绝顶聪明如罗隆基者不能不慎重掂量一下：一个政党，前几年听不得几句有分量的话，竟然大动干戈，大施报复。而今却突然有如此海量，允许一个持异端政见者出国。难道就不怕这个人在国外说点什么吗？根本不可能!莫不是又来一个什么"阳谋"吧？我罗隆基可再也不上你的圈套了!是耶，非耶？都只能成为无解之谜了。

1965 年 12 月 7 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身边没有妻子和子女，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编者查阅过许多资料，几乎众口一词为他惋惜、叹息。但编者愚见却认为：不必惋惜，而应该庆幸。试想：如果他再苟活一年半载，那场'文革'风暴袭来，罗隆基会怎样？不是被打死，就是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决不会有第三种结果。他恰恰死在'文革'前夕，难道不是值得万分庆幸的事吗？

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等。只有这些著作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的存在和价值。正如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在"纪念碑"那首诗开头那句："我为自己竖立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有的译本翻译成'非人工的'纪念碑，那是直译）。罗隆基也为他自己竖立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不是安置在地上，而是竖立在无数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人们的心中，永远、永远……

在罗隆基的身后，还发生过如下一幕，值得记录：

今天我们都知道'隐私'一词。隐私属于个人秘密，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否则可以诉诸法律。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想当官就要准备牺牲一部分隐私权，官越大，牺牲越多。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因为私生活那点事情，几乎丢掉总统宝座。可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官员可以拥有私密，老百姓却不能享有。最大的官就可以拥有无限的隐私权。例如毛泽东和女人在床上说的悄悄话被别人偶然听到；此事曝光后，引起龙颜震怒，下令追查。结果查到杨尚昆头上。据杨尚昆说：这是正式会议通过的，为的是把毛在出巡期间对各地领导人说的每句话完整记录下来，以便遵照办理。虽然如此，那也不行。于是勒令检讨、再检讨，没完没了。（参见李志绥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 281-282 页、352—354 页）

罗隆基是'牛鬼蛇神'，当然更不允许保留任何'隐私'。在他死后，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情书中竟然有史良写的。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有一次（大概是冬天）红卫兵拉章伯钧

去批斗，章却发现自己是陪斗而已，主要批斗对象是史良。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众大声朗读，然后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坦然地说："我爱他。"史良此时已 66 岁。"我爱他"这三个字似乎是电影中定格的大特写，将那个时代大背景下一个女人的柔肠与无奈历历呈现。（引自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第 22 页）

3、王造时：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瘐死狱中

王造时（1903--1971 年）江西安福县人，出身于平民之家。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14 岁考取北京的清华学校，1930 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拒绝从政，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作斗争，是我国抗日救亡的先驱之一。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王造时不惧于威，不诱于名，两次被捕坐牢，一次遭到暗杀，多次失业，但他为真理而战，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中共政权建立后，蜚声中外的爱国"七君子"中，除邹韬奋于 1944 年病故、李公朴于 1946 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健在的 5 位中，有 4 位陆续调往北京高就：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惟独学历最高，年纪又最轻，功劳更为突出的王造时却被长期冷落，在上海"待业"。直到 1951 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闻讯，才聘请他去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个'饭碗'。其中玄机何在？

后来史良对他透露说："据说中央某领导对你执笔给斯大林写信的问题有看法。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说清楚，有机会你得主动找有关领导说明一下，消除误会"。1956 年初，张孟闻从北京开会回沪后也对他说，中央某领导说是一个什么条约问题，对你有误会，有看法，还点了你的名。就是这些误会和看法，使王造时白璧蒙冤。

1941 年，正是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殊死搏斗的年代。我们北方邻国苏联却与日本联手和好。4 月 1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陛下，为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内容共 4 条：1、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2、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应始终遵守中立。3、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自动再延长五年。4、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尽快在东京交换。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条约还附了一份《共同宣言》：遵照苏、日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缔结的中立条约之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条约"和"宣言"公布后，中国人民震惊，世界舆论哗然。

1941 年是中国人民反对日寇侵略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日寇占领了我国半壁江山，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国内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再度紧张。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世界上反法西斯大国苏联，突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震惊。"条约"的签订，就意味着日寇侵华，苏联将不顾国际准则，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任何一个有着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都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宣言"中还居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真是荒谬至极！

所谓"满洲国"，乃我国东北三省的神圣领土，那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强行占领后扶

植起来的傀儡政权。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坚持斗争。除日本及其几个法西斯盟国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义的国家承认过，而苏联怎能“尊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还要承认伪“满洲国”呢?这个条约理所当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苏联的这一举动，给法西斯分子及其日伪汉奸们以极大的鼓舞。南京汪伪政权的报纸在刊发这一消息时，以大字套红出版，还配以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他们无耻地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之日益失其根据。”德国原驻苏大使舒伦堡也得意地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事实表明，其后果极其严重，使亲者痛、仇者快。

为抗日救国而战斗不息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同仁们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反响强烈。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大家对此事发表看法。这些人中，不少就是政治法律、国际外交方面的专家，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苏联当局如此举动，性质是严重的，不可等闲视之。

早在两年前，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了把“祸水”西引，使自己置于所谓帝国主义战争之外。当时，它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反而成了战争的受益者。不过苏、德两国的“蜜月”为时不长。1940 年冬，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期间，根据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建议，苏联应当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国同盟一边，4 国订立一个为期 10 年的合作协定。只要订立这个协定，德国便完全承认并尊重属于苏联现在所有的领土范围。苏联当时也很想签订这个协定，但又有很大的风险。因为美国尚未参战，战争的胜负未定。一旦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英、美一方，与 3 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同盟，不仅使自己完全丧失其“中立”的立场，而且处境不利。苏联经过仔细权衡后，向德国提出了“协定”的 4 个附加条件：一、德国军队立即从苏联的势力范围芬兰撤出；二、苏联同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并长期租借达达尼尔海峡的陆海军基地；三、确认巴统及巴库以南至波斯湾地区为苏联领土所希望的中心；四、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开采石油的权利。苏联的上述扩张要求，对于一心想统治全世界的希特勒来说，显然不能接受。果然，1941 年 6 月，德国悍然出兵侵苏。

德苏谈判破裂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为了日本既定的战略目标，紧步德国后尘，以调整日苏邦交为由，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两国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背着中国达成了《苏日中立条约》，使中国成为这两个国家互相妥协的最直接受害者。

这次座谈会的参与者一致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帮助。但是，当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在令人遗憾。这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更是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大业一个不小的打击，确有必要对他们发表意见。对此，国民党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反应。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座谈会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交给张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里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名字。公开信全文如下：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公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诚，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 4 月 13 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

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国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我们很殷切的希望，阁下对于该项协定，能就下列三点，在相当的时机，用相当的方式，作一补充的说明，以袪除我国国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伪满洲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 1924 年中满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中国抗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敌人。对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于友邦一时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的期待。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们必然全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我们为主张抗战之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其抱有无限期望。故谨以致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考虑。此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

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签名）

中华民国 30 年 4 月 17 日

大家签名之后，由沙千里誊写两份，并由沙送至苏联驻华大使馆潘友新大使转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第二天王造时便离开了重庆，回到江西吉安继续办他的《前方日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到信件后，转由中新社发表。大陆和香港不少报纸、杂志、电台不仅作了报道，还进行了评述。肯定了他们写信的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苏联和日本签订的这个“条约”和发表的“宣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忱与决心，任何时候看都是错误的。然而，王造时执笔写的这封信，他既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感到“莫大的遗憾”；但又考虑到苏联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支持过中国的抗战，这次与日本签约也许有策略上“一时的苦衷”，因而在信件的内容上十分克制，摆事实，讲道理，语言和措词都很委婉、谦恭，心平气和地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任何时候看都没有什么错误。

公开信见报之后，正在重庆的中共某领导人找沈钧儒、章乃器等谈看法时说，救国会的朋友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虑到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反苏分子所利用。两人的回答却迥然不同：沈钧儒当即表示，我们考虑问题不全面，有些欠妥。章乃器则坚持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他答复斯诺的话完全是同义语反复、外交辞令：“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持，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以后发生的上述情节，王造时早已回江西，因而并不知情。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随着中苏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与加强，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按照苏联《真理报》所定的调子解释说，苏日条约的签订，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让苏联集中力量在西线对付德国侵略者。也就是说，要以牺

牲中国主权的代价来牵制日本，保护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公开信”自然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当时的所谓“反苏”实际上就意味着“反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听风就是雨，不作认真细微的调查研究，对王造时抓住不放。一位领导人说，这封信是给斯大林的抗议信；另一位则说，这是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甚至还有更离奇的说法：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起草好了，然后强迫救国会负责人签字的。这些说法虽然绝对与事实不符，但却没有及时地、负责任地澄清，使这位执笔人成了“反苏”的罪魁祸首。王造时感到极大的冤屈，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1957 年 2 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造时被邀列席会议。借此机会，他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关于写“公开信”的问题，要求澄清事实，分清责任。上海市统战部长刘述周会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听取了王造时关于写“公开信”的详细过程，29 日又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顾了这件事。他们说当时写那封信，是我们召开座谈会后共同商量决定的，信的内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写那封信是错误的，也应该由我们 8 人共同负责，不应该由王造时先生一个人担当。

周恩来对王造时的“包袱”早有所闻，但对整个过程又不完全清楚。他决定抽时间单独找王造时谈谈心。3 月 27 日下午，周恩来共进晚餐。二人碰杯喝酒，并回顾早年在重庆的小饭馆里吃阳春面、抗战时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约见的历历往事。周恩来谈笑自如，气氛融洽轻松。晚饭过后，周继续与王促膝长谈，仔细地倾听王的陈述。一面问清某些过程，一面向王作些解释。周对这场误会表示完全理解，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归咎于先生一个人负责是不公平的。周恩来风趣地说：潘大逵先生说你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嘛！希望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工作，眼睛朝前看。

交谈结束后，周恩来把王造时送到门口，他紧紧地握着王造时的手说：对于王先生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学识才华，应当妥善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话，待会议结束后，将考虑调到北京来。

对周的谈话及最后表态，王造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一回到上海就给周写信说：“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的私衷及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宽广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你提出我来北京工作等问题，我定当从祖国需要上慎重考虑。”

不料王造时返回上海两个多月后，一场政治风暴袭来，王造时被点名打成了大右派。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当然成为“历史上的反苏、反共罪行”的铁证，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6 月 22 日，王造时再次给周写信，表明自己爱国爱党的心迹，也是求助的最后一线希望。然而，这封信不管周恩来收到与否，在那种情势下，周恐怕也无能为力。除了那封所谓“反苏”的公开信以外，还有诸如“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进一步建立民主法治秩序”等言论，都成为王造时被划右派的根据。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苏关系已成敌对状态，当年那封公开信应该不再成为‘罪状’了吧？善良的人们又猜错了！当权者为了整人的需要，再次抛出这颗“重磅炸弹”对王造时进行狂轰滥炸，并于 1966 年 11 月 21 日由上海市公检法以“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王造时百口莫辩，有冤难申。

在狱中，受尽折磨，几年后精神失常。监狱当局任他便溺满身，不管也不治疗。直到病情危急，才勉强送医院抢救，医生却无回天之力。终于在 1971 年逝世，终年 68 岁。在他的死亡通知单上，没有姓名，只有代号：1416。

据彭文应先生的长子在回忆文章中说：在监狱中他失去了自已的名字，只有一个号码，1971 年病重被送入医院，8 月命归西天，次日火化后才通知家属来领取骨灰。据说遗体骨瘦

如柴，遍体鳞伤，手臂亦被折断，十分凄惨。他的骨灰当时只好用化名寄放乡下。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而今只留下一堆化名所代表的骨灰。可悲，可叹！

王造时一生命运多舛，全家不幸：妻子朱秀芳英年早逝，长子因精神病入院，次子在反右运动中受刺激而精神失常。长女复旦大学毕业后入司法部门工作，肃反时也得了精神病。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幼女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中得了不治之症，死时还不到 30 岁。

在当年‘七君子’中，王造时最具有才华、最活跃；而在中共统治下，王造时却是命运最悲惨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共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人才适合在中共统治下生存？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4、彭文应：绝不低头认错凄然离世

彭文应（1904 年－1962 年），江西省安福县人。1917 年夏，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二千多人的会考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他们二人与另一位同乡罗隆基后来被国人称为“安福三杰”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学业优秀，思想进步，先后赴美留学，罗、王二位获博士学位、彭则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三人积极投入各项爱国政治活动，活跃在中国政坛。在 1957 年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极右分子”。

彭文应在清华求学期间，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参加五四运动。1925 年毕业后，按公费生资格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攻读政治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政治硕士学位。曾担任哥伦比亚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1931 年 9•18 事变后，组织中国学生发表声明，写文章，抗议日本侵华，呼吁国人团结抗日。

1932 年回国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担任教授，并与王造时合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成为主要撰稿人，发表《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1936 年，彭文应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1938 年参加宪政协进会和民主同志会等组织，曾担任《民主》、《宪政》半月刊主编。“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营救工作，并随宋庆龄进行爱国入狱斗争。上海沦陷后，彭文应赴江西，任《前方日报》主笔，在此期间，曾任江西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省立永修高级农林学校校长，南昌大学教授、总务长等职。

自 30 年代起，彭文应便积极同情中共，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1939 年在南昌因抨击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对进攻苏区”而险遭不测。后来周恩来专程前往彭文应担任总主笔、王造时任社长的《前方日报》社慰问，紧握着彭文应的手说：“彭先生，我代表党向你表示感谢”。

30 年代之初的某日，彭文应在沪探望朋友。正言谈间，忽有一位仪表非凡的不速之客来访。见室内有人，不肯进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谈。友人匆忙走入卧室翻箱倒柜寻找什么。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换眼色，但未经友人介绍不便招呼。几分钟后，友人急步进入房间，对彭文应说：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而自己的钱和钥匙都被太太带上街去了，问彭身上有钱吗？彭文应立即倾其所有交给朋友，二人都未点数便交给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后才告之：来人正是国民党当局所通缉的要犯周恩来。当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须行贿方可免送警备司令部。据彭回忆，钱并不多，相当于人民币百多元，此事早已淡忘。

上海易帜不久，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一次座谈会，彭应邀参加。周一眼就认出了他。及至散会，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称“彭先生”。彭正惊愕，周向他回忆了 30 年代初的那件往事。恰好陈毅走来，周对陈说：这位彭先生曾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帮过我们的忙，嘱咐陈毅“要记住这个朋友”。陈毅调京后，彭去北京开会，曾被邀请至陈毅家便饭，欢谈甚久。

抗战胜利后，彭文应回到上海，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由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投入民主运动，1947 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解散时，彭文应临危不惧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组织主任委员，领导民盟上海地下组织进行民主斗争。1949 年 5 月初，上海易帜前夕，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在申江医院被追捕，躲至屋顶后化妆逃脱，死里逃生。但被抄家，财物被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赶出家门。

上海易帜后，6 至 8 月彭文应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 11 月在民盟中央一届四次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0 年 1 月至 10 月彭文应又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工委副主任委员，1951 年 10 起彭文应历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民盟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历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三届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委，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彭文应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会批判右派份子大会上，他仍然大义凛然地自辩，历时二个半小时。他一方面声明自己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作用和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会上有人斥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顽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种种“检查”中，他始终不认一个“错”。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哪怕只要低一下头，认一个错，就可“从轻发落”。彭文应不领这份情，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负隅顽抗”。他义正词严地说：“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份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当年在 55 万右派份子中，很少有彭文应这样的‘顽固份子’。在上层爱国人士中更为罕见。他“拒不低头认罪”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柯庆施。这便是他被定为极右份子的原因。

彭文应受到最严历的惩罚：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仅保留盟籍，但取消工资，从此断绝了生活来源。还要监督劳动，逐出南昌路 55 号花园洋房，八口之家迁入一户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儿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厕所搭床睡觉。妻子邓世瑢曾是刘海粟美专的学生，1957 年 7 月 19 日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时，猝死于医院，时年仅四十四岁。此时彭正被批斗，不允许见最后一面。次子彭志平因不堪家庭变故患上精神分裂症后自杀，才十九岁。据彭文应的长子回忆文章说：弟弟的夭折，对爸爸是又一次身心重创，悲愤之情，唯对天表！

在如此凶险的处境中，中共统战部的官员和民盟代表乘机上门“劝降”。见到他和家庭的悲惨处境后，有一位统战部官员规劝说：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造时摘帽后也来劝过他。二女儿薇薇曾跪在彭文应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在原则问题上，彭文应的信念异常坚定，坚持“……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他背负着极右份子沉重的十字架，在家破人亡的绝境中，仍不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建言之责。于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秉笔直书，上万言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份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这年的 12 月 15 日，彭文应贫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败血症，入住上海广慈医院。难友王造时闻讯赶来，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多多关照。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但此时的彭文应已是油尽灯枯，无力回天。终年 58 岁。

毕生追随中共，赤胆忠心的彭文应竟然是不予改正的 5 名中央级右派之一。当年周恩来那句‘要记住这位朋友’的话早已被当局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但是，他的子女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他们于 2004 年 6 月，在上海市奉贤区杭州湾畔面南临海、景色优美的《海湾寝园》内，将彭先生及其爱妻和次子的骨灰重新安葬；同时为他树立了一尊全身铜像，并编印了“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1904-2004)纪念册”，以表缅怀之情。

彭文应站立在那儿，面向大海，不分昼夜，不避寒暑，不计利害、不畏强暴，默默地倾诉着，倾诉自己的冤屈和不平。

历史就这样永远定格在那个令人深思的镜头。

【补白】

毛泽东论群众闹事：

1、罢工、罢课、请愿，宪法上有的规定了，有的也未禁止。群众有道理的请愿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2、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就可能闹事。因为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这样对于改正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

3、对闹事怕不怕？我看还是不要怕……怕有何用？……有理的应该闹，没有理的也闹不长，闹不出 12.9 来。

4、闹得对的，承认错误，满足要求；对闹得不对的，不能迁就，要给以批评，争取群众，孤立坏人，除行凶杀人以外不要乱捉人，对人民绝对不要轻易开枪、捉人，要开枪只能对天上开枪。

5、预防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

孔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5、浦熙修：一代女杰黯然消逝

浦熙修(1910-1970 年)女，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1933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担任北京志成中学教师。后来随夫袁子英到南京。由于不愿意沦为家庭主妇，乃四处寻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赶紧去应试。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有很多的思路可以发挥。考试后自我感觉良好，但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社，最初被安排在广告科工作。恰逢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在中山陵旁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此事，可是记者都派出去了。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结果，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预料，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文笔流畅洗练，吸引读者，并博得同行的赞许”。这次成绩，使她从广告科调到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社的第一位女记者。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 月 13 日上海顿时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敌机的大轰炸。战火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 月 27 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重庆。

经过几年的奔波，浦熙修终于 1939 年 1 月回到重庆的《新民报》上班，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真正让浦熙修出名的是对 1945 年国共和平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和采访成果。她对于整个过程分阶段的深入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水平，也使这位女性在全国新闻界崭露头角。

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重大会议后，以她对新闻事业特有的敏感，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并不很了解；如果能够对这次会议进行一次密集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 38 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出许多风云人物的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采访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 20 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深度报道成为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和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危急和新闻记者采访的艰难。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暴徒殴打。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医院探望，给她以莫大的慰藉和支持。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及早离开南京。根据她在近期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当局害怕舆论的抨击不敢对她有什么非法举措，但却严格控制她写的新闻稿不让发表。这一招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见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她的"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非比寻常。

1947 年，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制造了'五二〇'大血案。浦熙修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报道事实真相。1948 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嫌疑'为由将她逮捕入狱，后经各界救援而获释。由于挨过打、坐过牢，因此声名鹊起，被称为大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这几位女杰都曾为中共夺取政权而积极奔走效力。但在中共掌权后，前二位先后被打成右派，杨刚则提前自杀而免于受辱。至于最后那位戈扬女士，也被打入右派行列；1989 年的 6/4 事件中，又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追查，不得不远遁美国以避祸。

从 1937 年到 1957 年，从《新民报》到《文汇报》，'浦熙修'这个名字在全国新闻界几乎风靡了 20 年。在重庆的岁月里，周恩来称她为"我们的亲戚"，固然因为她妹妹是彭大将军的夫人，更因为她鲜明的政治倾向。1949 年 9 月，她以"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身份出席全国政协一次会议，10 月 1 日，她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金口玉言"称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真可谓备极尊荣。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从"左"的峰颠跌入"右"的深渊。

1957 年 6 月 8 日《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标志着反右运动的开始。7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点了浦熙修的名："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帅上有帅，……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就在几个月前（3 月 10 日），毛泽东还亲口夸奖："《文汇报》办得好"还说：我每天午睡起来都要先看《文汇报》，再看其它报纸。还说浦熙修是"坐过班房

的记者”，嘉勉之词，言犹在耳。转眼之间，却变成了反党的“能干的女将”，从荣誉的顶端突然跌落到毁灭的边缘，面临灭顶之灾。一位多年来真诚地追随共产党多年的新闻记者，从此被永远地逐出了新闻界。

借助《人民日报》社论的杀气，《文汇报》当天即在头版发出《本报工作人员连续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浦熙修反党活动》的新闻，副题为“同章伯钧罗隆基串通一气篡改本报方向执行右派分子方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罪名进一步升级了。同事们纷纷揭发她“对罗隆基唯命是从”、“处处听罗隆基摆布”，曾和她在北京办事处共事八年的记者谢蔚明说：“浦熙修有很多事情都是找罗隆基商量的，她和罗隆基的私人交情很深，还把罗看成政治家。”

7 月 4 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站出来批判她的人中有当年下关惨案中和她一起挨打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老同事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联合发言等，他们都勒令她“猛省”。

7 月 5 日继续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除了谢蔚明，还有王芸生、徐铸成的发言。一时间，万炮齐发，必欲置她于死地。7 月 6 日，《人民日报》刊出华君武的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成为 7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注脚。画面上的浦熙修怀抱琵琶，露出半个脸，琵琶上是罗隆基的漫画像，还写着“罗隆基立场”五个字。这幅轻佻的漫画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和那些无情的揭发一起构成了罩在浦熙修头上的天罗地网。她那高贵的自尊心理防线终于被冲破。在蒋介石政权面前曾经高高昂起的那颗倔强的头颅，终于在中共政权淫威下屈辱地、低低地垂下了。7 月 10 日，她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交代了罗隆基与文汇报的关系”，并揭发罗隆基 1949 年后想当外交部长、司法部长、高教部长的野心等等；7 月 19 日，她还揭发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等等；8 月 31 日，在民盟中央批斗罗隆基的会上，她读了罗当年给她的一封信，内容明明是讲李宗仁可能向蒋介石“逼宫”，她却解释为“罗隆基想做王莽”……至此，浦熙修终于完全按 7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意图“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当年那个纵横恣肆的‘女中豪杰’已经黯然消逝了。同时她这一击也彻底击跨了罗隆基。8 年后，67 岁的罗隆基含恨离开人间。浦熙修又过了 5 年的屈辱生涯，1970 年 4 月 13 日，不堪造反派的凌辱，愤然自尽，终于结束了 60 年的惨淡人生。

当我们今天反思这段令人诅咒的历史时，应该承认：那个时候反右运动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罗隆基等人的悲剧早就注定。早在 1947 年 10 月 27 日，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就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992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

浦熙修卷入这场无法抗拒的灾难，首先是因为她与罗隆基的私人感情，1949 年后，她想和罗隆基结婚，但“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与她相依为命 18 年的妹妹浦安修为什么“反对尤力”？因为她是彭德怀的夫人，她完全有可能知道党内的这些安排。

此后的生活，不必细表。大致是这样：1959 年 11 月被摘帽，但从此永远离开了《文汇报》。从 1960 年到 1965 年的 6 年里，她一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最初主编《文史资料选辑》，先后担任文教组长、副组长。她说：“新闻记者当不成，当了旧闻记者。”“硬气”的浦熙修变得不愿多见人，话不多，活动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协开会，见到周恩来也躲着走。

读书和思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据她女儿袁冬林回忆：她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反复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为写好文化史，她阅读了《史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为了掌握收集

材料的方法，她还阅读了《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书信集》。浦熙修觉得鲁迅的杂文对自己的业务有帮助，为此还阅读了《鲁迅全集》，其它书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书也在她的阅读范围之内。因读书而思考，因思考而觉悟。她终于悟出："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自己却不懂得政治"。

1980 年 5 月，浦熙修获得平反。1981 年 3 月 19 日，全国政协为她举行了迟来的追悼会。追悼会前夕（3 月 16 日），华君武给浦熙修委员治丧办公室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因有会议，不能去参加追悼会。但有一事请向她的家属转告。57 年反右时，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久压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

这是个姗姗来迟的道歉。但忏悔不分早晚，忏悔总比不忏悔好。许许多多曾经落井下石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至今还没有站出来公开道歉的。因此，华君武的道歉就更突显其可贵、难得。

当年那些狠批、狠斗过浦熙修的人，后来大多也成了右派。侥幸躲过"反右"的人，也未能逃过"文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经历了无数灾难、浩劫之后，知识分子中有几个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

更进一步来说，浦熙修也难以抗拒政治的高压，最终出卖了她所敬、所爱的挚友罗隆基。她内心的痛苦今天已无法猜想。当然，即使她不揭发，罗隆基同样在劫难逃。但这不能成为她揭发罗隆基的理由，罗隆基不在乎其它人的揭发，只有在他深深热爱着的浦熙修站出来揭发时，他的精神防线才彻底崩溃了。

每个人都对时代的悲剧负有或大或小的责任，没有人可以幸免，浦熙修也不例外。

6、梅汝璈：代表正义为国争光晚景凄凉

梅汝璈(1904～1973 年)江西南昌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大法官。

1924 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即赴美国留学。1926 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 年夏～1928 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璈曾与同学施滉、冀朝鼎等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以配合在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活动。

1929 年春，遍游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祖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主讲英美法系、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重要课程，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同时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院校兼职讲授英美法课程。

1946～1948 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对 20 世纪 30～40 年代发生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同庇护日本战犯的极右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在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共计开庭 818 次。在这段马拉松式的、漫长的司法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问题上，坚持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赢得了世界正义人士的赞赏与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务，获得中外各界人士高度评价。时任教育次长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先生曾赠剑与梅先生，并称他为"壮士"。

上面涉及几个关键问题的详细情况如下：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等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的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法律权威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是同意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均按照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来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祖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其次，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受日军侵略和践踏程度比较轻微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所收集到的日军暴行资料，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者必须处以死刑。表决结果以 6 票对 5 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从 1946 年 5 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虽然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 1948 年 12 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不久，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4 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社会职务，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梅先生着有《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告日本人民书》、《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等著作，遗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其后人梅小璈先生于 1988 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抗日战争之始，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他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校友顾毓琇之邀，担任该校法律系教授。

"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周恩来这段话，言犹在耳，风云突变。1957 年"反右运动"中，梅先生竟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 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造反派先是严辞质问他："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璈义正词严地回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真要是复辟了，我的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有些红卫兵又要烧掉法袍，梅汝璈更是严肃地告诉这些娃娃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

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服，是民族尊严的见证……”。梅汝璈义正辞严的回答，使对方顿时失去了烧掉法袍的勇气和傻气。经过梅汝璈有理有节的应对抗争，巧妙周旋，反过来教育了这群不懂事的小娃娃，从而保存了这件历史珍品。

1973 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 69 岁。

1976 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历史，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人民所经受的屈辱和苦难。

7、钱端升：政法学泰斗卑微的后半生

钱端升（1900——1990 年）出生于上海，祖上行医。自幼勤奋好学，17 岁即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 岁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不久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24 岁获哲学博士学位。当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 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评论，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国行政系统。1930 年，回清华任教并在北大兼课。1934 年，日本侵略势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加紧“文化围剿”，民族危机日益逼近。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因抨击时政被通缉，离职他去。钱端升继任主笔，数月间发表评论 170 篇，针砭时弊，辛辣尖锐，击中要害。柳亚子作《怀人》诗，赞“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

这时的钱端升已蜚声中外。1937—1949 年，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47 年底，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1948 年，坚辞美国著名学府的聘任，返回北京大学。

北平解放前夕，钱端升与中共地下党主动联系，保护革命学生，维持学校秩序以待解放军接管。中共掌权以后，先后任北大法学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并致力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1954 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

1957 年，钱端升被错划为右派，并被迫离开他心爱的讲坛。从此“钳口幽居二十年”。要了解钱端升可怜的后半生，不妨先看看钱端升前半生是何等辉煌的形象：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参政会议上，慷慨陈词、仗义执言。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毫无惧色。他和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的四位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中国当时最高领导人，但面对这几位学有所成、学有所长的大学者，依然不得不表现得十分谦恭有礼。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钱端升一直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勇士形象。这位具有浓厚自由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始终秉持学者的天职，及时而又勇敢地发出独立的声音，不管他面对的是热情的笑脸还是冰冷的枪口。

钱端升的这种独立精神更多来自于其洁身自好，他压根就不愿意做蒋介石的官。“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著名学者谢泳之评语）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10 月 1 日，钱端升和西南联大另外九位教授，联名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双

十协定”在桌面上签字后，背地里内战却箭在弦上，即时待发。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由于国民党的干涉，原定于是年 11 月 25 日晚上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召开的时事晚会被禁止，云南大学被勒令不得提供场所。后来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行。除了西南联大的学生外，社会各界人士勇敢地冲破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挠，前来聆听时事演讲。当时听众多达 6000 多人。在主持人王瑞源简短致词后，钱端升便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钱教授的话音刚落，西南联大草坪上掌声雷动。

突然间枪声大作，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企图鸣枪驱散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先生临危不惧，泰然自若，继续自己的演讲。国民党军警此计不成，又突然停电试图中断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和其它师生一道，点亮汽灯，时事报告会继续进行，直到胜利结束。11 月 27 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 19 日的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行动。12 月 1 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12•1”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 4 人当场死亡，重伤 20 多人。12 月 2 日联大教授集会，一致推举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等 5 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当局。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人士的纷纷响应。此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应该说，面对国民党的极权统治，钱端升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勇气，他从来没有退缩过，正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这就是 1949 年前的钱端升。一个具有正义感、使命感、爱人民、爱祖国、无私无畏的知识精英。

再看他的学术成就：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做出了下述两个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1)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又称“国家主义政治学”。它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研究国家主要是研究国家制度，而国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宪法条文的集合，所以归根结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宪法条文，比较政治也就是比较宪法。在此意义上，人们也将这种政治学称为“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较之传统的思辨政治学，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政治学终于把目光从概念中的事物转向了现实中的事物，政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导的新阶段。

(2)建构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它未来的发展，完全视其能否成为经验科学而定。

政治学距离成为经验科学的理想甚远，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只要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长此以往，政治学当不难成为科学，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也。”钱端升分析了政治学和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应该成为政治学研究之工具，心理学更有助于分析政治行为之心理基础，均不可忽视。钱端升对政治学下了一个完整的、经典的定义：“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事的一门科学”。钱端升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具体化，构建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第一层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国际关系三大块。这应该算是中国政治学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将政治学理论体系化的努力。

钱端升列举了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可见，钱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奋力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和制度的昌明。

相比之下，钱端升的后半生却显得非常暗淡、卑微，当年口若悬河的风采、面对枪口镇定自若的气度等，都成为过去的记忆。勇士不复当年，可叹!可哀!

1957 年钱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此后就鲜有文字留世。被打成“右派”之后，除了保留政协委员这个虚衔以外，其它的职位一律撤销。不久后，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儿子回忆道：“后来听父亲说起那里的情况，还比较轻松，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开‘神仙会’，就是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任务，管理上也是比较松散。但是父亲很苦闷，因为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没事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 1973 年。”

自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建交问题出现端倪。就当时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决的首个难题就是双方资产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冻结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财产，而美国亦以美国境内的中国财产属于中华民国为由，拒绝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要建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对于当时的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他们以前没有碰到过。周恩来对他们说可以去找钱端升，这样，他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条法司，研究档案资料，应该根据什么法律、条约来进行谈判。外交部给钱端升派了个车，每天接他到那里去上班。

1973 年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缪云台归国，受到周恩来的盛情宴请。席间有钱端升等人作陪。由于这个机缘，周恩来才见到多年蒙尘的钱端升。此后周恩来决定让钱端升出任外交部顾问，并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钱端升自述：“也正是由于他的厚爱，我方能在动乱尚未结束时的 1974 年就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1972 年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随同尼克松来华，有幸见到钱端升。费正清的回忆是这样写的：

当乔冠华设宴款待我们时，他的老师，逻辑学家金岳霖和钱端升一起参加了宴会。他们穿着新制服，坐着轿车到来。他们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自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乔冠华以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建议让钱端升、金岳霖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们。显然，这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安排这件事。当他们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我向他讲述了当年我被指责与钱端升交往而同麦卡锡主义者争吵时，他却闭口不谈当他被指责与我通信时的相同经历。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 5000 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这就巧妙地向我们透漏了一个信息——是‘恰恰相反’吗？历史发展决不会这样！

中国有句成语：噤若寒蝉。用来形容钱端升和他的难友们的心态和表现，应该说是十分贴切的。如果我们对钱端升保持同情和理解的话，钱端升的这种“加强语气强调”可以看作是针对公安人员的监控而故意做出的一种姿态，乃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得不为、不能不为的策略。当然此种状况恰恰证明了费正清先生的另外一个判断：“正如我现在所知道的，在 1972 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专业知识阶层的迫害和折磨远远没有结束”。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很难堪的事情。1982 年，钱端升不顾自己老迈年高、体弱多病的状况，硬是参加了一个很特殊的追悼会。这是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为国效力、由于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死的学生。

此人名叫田保生。

田保生当年曾和凌其翰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据凌其翰说：田保生出身清华，是钱端升的高足。后来参加第一届高等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40 年代末期又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眼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许多人劝他留下来，胡适也劝过他，但钱端升还是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中国。不仅他自己回来，还动员自己的学生田保生也回来。田保生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回归新中国。回来后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凌其翰回忆说："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着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可惜后来田保生和钱端升一样，也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杀。

钱端升在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来送别自己的学生。这个学生是"钱端升的高足"，其回国又是由于钱端升本人的劝说和动员。那么，在钱端升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田保生之死于非命，对于钱端升内心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欲说还休"啊!是后悔？还是歉疚？或是无奈？……如此复杂的感情，其中味况，何人能解？

应该说，就中国政法界人士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期间的遭际来说，钱端升的经历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他还算是幸运的：藏书和日记被毁了，但人还活着；自己花钱买的四合院被占了，但钱端升一家人还能相聚；他大声宣布马克思主义还有五千年的寿命，但并不能完全掩盖其早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光芒；他的学生被迫害而死，但钱端升毕竟还能在'文革'结束后以老迈之躯送别一程。这恐怕正是劫后余生的钱端升勉强活下去的动力和理由吧？

如果和钱端升前半生的经历和辉煌来比较的话，从1949年开始，他又是极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这20多年时间中，钱端升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术无缘，与知识无缘，所求不过"饥即食、病即医"，已经不顾知识分子尊严的底线，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对于后人来说，这只不过换来一声叹息。'文革'中此类悲剧，包括比钱端升还要悲惨千万倍的亦不下千万人。只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20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来说，岂止是一声叹息所涵盖得了的？

为什么当年那么勇敢面对强权、粪土王侯的文化人竟然一个个都俯首帖耳、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像小媳妇、小丫鬟、像婢女、侍妾，就是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字。为什么？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党和国家垄断了一切生存资源，按照毛泽东发明"皮毛论"的解释，如果知识分子公然与党国体制背离，那么知识分子必将因缺乏生存空间而无法生存。毛泽东是名言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恐惧心情的由来。他说："不听话就不给饭吃！"

【编者按：老毛这一句话，还真顶得一万句。因为他把那些御用文人绞尽脑汁所编写的、冠冕堂皇的宣传口号都抛掉，也就是把一切伪装统统剥去，而暴露出赤裸裸的真相。把真相说破，本来面目暴露无遗。这就是此话的价值所在。】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引自《史记》

第4单元　文坛巨擘

1、"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冤情震惊中外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上升到政治审判高度的大冤案。最初仅仅是因为胡风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而引起局部性的争论，但后来逐步升级，胡风及其追随者和以周扬等官方人士的文艺争论升级到政治上敌我斗争的高度。随着事件的恶性发展，毛泽东的亲自介入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

治定性，涉案的这些人最终遭到司法审判，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该事件是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首次‘以文定罪’、‘以言定罪’典型的文字狱；并为此后中国大陆一连串的思想批判运动开启先河，发展为1949年后文化界以至于学术界、政界、军界全面的、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受害人之众多、之惨烈，均令人发指。

胡风先生原名张光人（1902—1985 年）湖北蕲春县人，1923 年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还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1929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同时还参加左翼抗日文化团体。因此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胡风继续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初任‘左联’宣传部长，并继茅盾之后担任‘左联’常务书记。后因有人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为了在政治上负责，毅然辞去此职，并与‘左联’断绝组织关系，专门从事写作。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交往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张扬个性。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等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但同时也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赞同，在创作上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因此形成对中共官方文艺思想及毛泽东文艺观点的严重挑战。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就曾出现关于“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等人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胡风和周扬又发生过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1938 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左的观点。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实际上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948年在香港出版《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等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秉承这一主题。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对胡风等人的批评更日益骄横，甚至达到盛气凌人的程度。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被排挤的地位。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仍然坚持，并且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因此对于来自官方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性情直率的胡风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反批评。这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却未料到此后竟成为被围剿的、被批斗的对象，乃至最终诉诸专政手段。企图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来解决后者所未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创了极端恶劣的先例和非常可悲、可耻的记录。

为了贯彻党的意志统帅一切的方针，在文艺界首先要清除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当局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位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着左翼文学权威势力对胡风等’异端’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发表在1953年第2期和第3期《文艺报》上。此前，还有舒芜所写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在最高权威的《人民日报》上（1952年6月8日）。在该文之前并加了编者按语（据说出自胡乔木之手笔）。该文的作用在于直接将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推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置身于‘被告席’。

当时仍然是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对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30 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

的建议。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述自己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胡风先生“30 万言书”的中心论点概括起来就是：文艺的本质是人，是人道主义。因此，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即只有完美无缺的一元化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传统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决定作品价值。这就是所谓‘五把刀子’。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是对最高权威的公开挑战，而且击中要害。至于‘宗派问题’，一直被当局所批判、也被扭曲。实践证明：创作需要相近、相吸的群体，观点倾向理想相同，互相切磋，有利于激发创作的灵感，助推优秀作品的产生。现在的人艺、八一、总政歌舞团等……不都是这样推出新人新作，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吗？

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错估了形势，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官方对文学强制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做了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的主持者。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却将斗争的矛头转向胡风。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 年 1 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 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 年第 1、2 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首次把胡风问题升级到政治上敌我的高度。不久，胡风原来的朋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反戈一击、紧紧跟进。随后并交出了在 40 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立刻上升为“反革命集团”。

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 月 13 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加写按语后公开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 年 5 月 13 日至 6 月 20 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的按语中出现了许多杀气腾腾的文字：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从 5 月 18 日到 6 月 8 日的 20 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 12 版的篇幅刊登表态性的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

上方安排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大标题。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连续一个月类似报导约占 15 个版面，版面大标题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大量宣传书籍甚至政治漫画开始在全国范围涌现，宣传机器在全国开动。

官方主流媒体宣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文艺界人士也开始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 年 5 月 26 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巴金文章——《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成为颇具典型的一例。同时检讨会、座谈会在各地、各部门纷纷召开。

1955 年 5 月 16 日胡风被捕，【编者按：此时胡风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是不能逮捕的】。直至两天后即 5 月 1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做出逮捕决定。如此公然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动，竟然无人敢于提出质疑。这种现象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 3 个月，后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里，直到 1965 年底被判刑为止。另有许多人由于牵涉“反革命集团案”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 1980 年 7 月 21 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 年全国共审查了 2100 多人，逮捕 92 人，隔离 62 人，停职反省 73 人，到 1956 年，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 人，其中骨干 23 人。比较著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默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10 年后即 1965 年 11 月 26 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由于已经服刑 10 年，剩余 4 年刑期监外执行。

同时，按照当时中共“因人废言”的思想言论控制制度，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所有作品均被停售。甚至波及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所翻译的，均不得在市面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文化大革命’之初，，胡风夫妇被押送到四川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督劳动。1967 年 11 月四川省公安厅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将胡风收监。1970 年 1 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处写诗，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年胡风事件的官方代表人物——周扬及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遭到整肃；周扬甚至入狱，被关押在曾关押过胡风的那个秦城监狱。而曾被毛泽东表扬过的舒芜，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就被定性为右派，‘文革’中也历经磨难。

【这种现象证实了毛泽东那句名言：“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如果有人暂时没有被整肃，请不要高兴得太早，也许下一个就轮到阁下您了。在毛泽东“不断革命理论”的全局战略眼光看来，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暂时的朋友，或者叫‘同路人’，只能同行某一段路程。也许下一段就该分道扬镳、兵戎相见了。】

50 多年来，各界人士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胡风自己在回忆中就遭到整肃的原因时坦承：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周正章先生在《胡风事件五十年祭》里的分析非常精彩：

“如果把胡风案件放到毛泽东施政方略这个高度，去寻觅至今尚存的谜团，似乎才能够破译这个事件的密码…….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于是，一雷天下响，各个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纷纷做出思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层单位的芸芸小人物则一一仿效。这个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大规模的以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

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达到让斯文扫地，从思想到行动绝对服从中共及其最高领袖的目的，几乎到了要人人表态过关的地步。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纷纷缴械投降、以对毛顶礼膜拜为核心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共及其领袖毛的威信与权威在全社会的大幅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被动的与主动的、真诚的与敷衍的、公开的与未公开的书面检讨资料，真是堆积如山。

但是到了 1954 年，在这堆积如山的检讨书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合格检讨书始终未到。这就是生性倔强，恃才傲物，自以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胡风。即使 1952 年 9 月，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1953 年又继而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并向其施压的文章，意欲彻底打掉胡的”气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按照口径，全面检讨。但胡软硬不买账，执意坚持，拒绝检讨。这样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当时实属罕见。连当年对独夫蒋介石都绝不买账的马寅初，都带头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思想改造“了；更不必说许多从蒋政权之下走过来的硬汉子了。而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抵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时任文艺界”奴隶总管“的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主人毛也芥蒂于心呢。

【编者按：所引文的下划线是编者所加。文中所云”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乃是毛泽东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物质基础。作为旁证，可以参见毛泽东 1957 年 1 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 800 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置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按照“不举手就没有饭吃。”的指示，此后便形成了“不听话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恩赐’原则。】

另外，以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如果追究责任的话，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争执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必然产生政治定性，群起而攻之的历史悲剧。进入 21 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 50 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沦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一致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政权易帜，民国时期的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惊胆跳“，”畏罪自杀“事件屡屡发生。虽然 1955 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在批判后的萧条景象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件发生后，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30 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常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内容贫乏、枯燥，公式化现象严重。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所造成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感，更令知识界心中极为不满。‘肃反扩大化’后来成为 1957 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办案过程中，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据负责承办此案、一度主持正义，

后来却被打成”三反分子“的王康先生回忆：

“后来专案组查阅了南京敌伪档案馆的机密档案，却发现胡风不仅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任何秘密联系，而且是他们严密监视迫害的对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CC 系统的特务头子之一的张道藩，甚至一再密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和严厉打击胡风出版的刊物，务必迫使它停刊。与此同时，我还听到参加审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说，审查和摘录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的“密信”工作有片面性，坏的内容就摘引，反之就不摘录，摘录时又采取掐头去尾的办法。因此，我对第三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经过几位同事的酝酿，本来准备开一次 10 人小组的会，互相交流看法，重新研究一番。但几天后周扬用电话通知我说，他和罗部长商量了一下，认为“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呢？我只好自慰地想：反正我已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至于整个案件，我也无能为力了。

看来整个案件的主持人罗瑞卿和陆定一都是忠实贯彻毛泽东的最高意图的“好干部”，他二人根本就不管案件的当事人怎么申辩，怎么想，也不关心事实真相如何，只关心如何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意旨。

【编者按：历史老人的幽默就在于：仅仅过了 11 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罗瑞卿和陆定一都先后被打成了“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他们最大的罪名当然是反对毛主席，这同样是一个黑白颠倒、天大的冤枉!他们在明知毛泽东错了的时候都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反对。罗瑞卿越来越想不开，终于从高楼上纵身一跃，自杀未成，却摔断了腿。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

被胡风案件牵连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备受摧残、死里逃生，而有的人却未能逃出来。例如张中晓（1930-1966 或 1967？）由于政治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 37 岁。例如方然（1919--1966 年）在‘文革’初期即愤而自杀。其中最为惨烈的有以下几位：

路翎（1923-1994 年）祖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37 年即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少年亡父，故改随母姓，寄居于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抗战逃难中接触到苏联著作，开始尝试写作。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17 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开始在文坛初露头角。此后便成为 30 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1940 年之后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颇有成就。

1940 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2 年后，未满 20 岁的路翎进入创作高峰，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 年发表）、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1945 年），表现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49 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路翎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揭示社会的复杂内涵，描写人物心理的多面性。他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是非常罕见的。

文学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乱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 年 7 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巅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的思考和创作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作品激发了胡风的理论思考？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可以这样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则是无疑的。

路翎不断地发表小说，在沉寂的大后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惊喜。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佐拉”。其实更准确地说，路翎应该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龙去脉，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1946 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 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天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也就是作者自我改造的过程，竟然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 年，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看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 40 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要求的。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 年 5 月，他送给新中国第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这个剧本描写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护厂斗争。

题材、主题都是无可挑剔的。剧本送到文艺处，大家一致说好，可是要上演时却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到底怎么修改，上面既无具体意见，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路翎从 5 月改到 10 月，依然没有通过。

这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0 年，路翎调到北京。但这个剧本最终还是没有上演。

路翎积极反映新生活，歌颂新时代，又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两个剧本也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

路翎有着非常纯洁的品质。1952 年，实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只领以前供给制时的 20 元工资。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钱。

但是，路翎不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结果搞得作家手足无措。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1952 年 9 月，《文艺报》加编者按发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芜反戈一击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指路翎属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在各方的批评压力下，1952 年 12 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 年 7 月回国。先后写出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送到安全的后方。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巴人高度评价《初雪》。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牢记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了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冲劲，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着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其实，批评路翎目的并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风。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由于文艺创作一再遭到政治批判，胡风在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时，路翎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也参与讨论和提供意见。同年 11 月，路翎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又写出四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此文被《文艺报》作为反面材料刚连载完毕，路翎便于 1955 年 6 月 19 日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质刚烈，性格刚强。他夫人后来说：”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路翎对强加于身的罪名无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直至吵闹冲突，被捆绑起来关入黑屋子里。在单身监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头撞墙。路翎先被关了 10 年，1965 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路翎感到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每日被施以电疗，还服用药物冬眠灵，为的是抑制狂躁的心情。电击和药物极大地损害了路翎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他头脑变得反应迟钝，整个人从此有点痴呆。1975 年路翎出狱，监督劳动，发配在街道扫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酒精严重损害了他的大脑，路翎已经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照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当人们听了这样半痴半醒的话，怎不令人心酸？

这时路翎已经 57 岁，从 32 岁被关进监狱到 57 岁平反，人生中创造力最旺盛的 25 年就这样白白消耗了。当年那个英俊、智慧、激情的青年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擅长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聂绀弩曾说：路翎是个美男子。但是现在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学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此后路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1994 年 2 月 12 日，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17 岁就闯入文坛，写短篇、写长篇、写中篇，写剧本、写批评，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不过人们都会记得：他的天才曾经闪光，那么亮，像一颗流星。

阿垅（1907—1967 年）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生于浙江杭州，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别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上世纪 30 年代初，阿垅多以笔名”S•M“发表作品。他当过职员、编辑，思想追求进步。”九一八“以后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1934 年，阿垅出于抗日激情，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因有远亲党国高官陈仪担保始被录取，入步兵科学习。毕业分配到首都警卫师（88 师）为见习排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 87 师、88 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在”八一三“战争打响后，他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他两次负伤，

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70 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但他们粉碎了日军‘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狂妄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 1937 年 11 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几年后，他调任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1938 年 8 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1939 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中共效力。他还编辑地下刊物《呼吸》，并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1946 年底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方面为他安排了工作。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市文联委员、创作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1955 年 5 月 28 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 1967 年 3 月 15 日瘐死狱中。

阿垅虽是职业军人，但气质上实在是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 1938 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 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是当时唯一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不久就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直到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 1987 年，才由后人将当年的旧稿（修改稿已找不到了）重新整理后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读者见面。几年后，又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和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精神向日本人民作了迟到的介绍。1940 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上述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所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 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并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象奇特、风格遒劲着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曾这样评价说：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

附：阿垅在去世前两年所写的申诉书，实际也就是遗书的部分内容：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

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吕荧（1915—1969 年）原名何佶，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北平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骨干。1941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40 年代在文学评论与译介普希金代表作方面卓有成就。50 年代初任教于山东大学，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名编外特约翻译，陆续出版一系列译着与文艺论集。1954 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被聘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

1955 年 5 月 25 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第二天，在北京东城贡院西街北总布胡同的新闻总署礼堂，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了有七百余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问题”。在此前九天，胡风夫妇已被逮捕。从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在北京及其它省市，陆续有人因受株连而失去人身自由。

上述会议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中国作协秘书长陈白尘报告说：

近期中国文联和作协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文艺界二百余人签名的六十九封来信，信中一致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并彻底揭露这一集团的全部阴谋活动“。大会以掌声通过了如下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革命队伍里。因此一致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 38 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它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本来会议完成了既定任务就要闭幕了，却有一位‘不识时务’的人——吕荧，接连三次要求发言。他上台后开口便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会议出现这样的插曲，令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特别是主持会议的人，更是如坐针毡。坐在台下的张光年站了起来，冲着吕荧大声说：“你不要讲了！……”“你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了，要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接着人们跟着起哄。郭沫若说：“吕荧先生，我以主席身份请你停止发言……”吕荧面色灰白，嘟嘟囔囔地很不情愿地慢慢走下台去。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后人是如何评价的呢？

张光年回忆说："那时候，整个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开始也理解不了，然后就紧跟，犯错误，经过'文革'才认识了。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

八十年代初，吕荧的长女潘怡前往探视胡风夫妇，胡风说："我傻，你爸爸比我还傻"。

八十年代初骆宾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家吕荧之死》的文章。提及吕荧那次令人难忘的发言，骆宾基说他不愧为"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1955年6月至1956年5月，吕荧因反胡风运动中受株连而被隔离审查，出现轻度精神分裂症状。1966年6月被公安部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由收容强制劳动，1969年3月5日病逝于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终年54岁。

【编者按：吕荧显然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在他的身上却体现了作为人的最高贵的品质和尊严、最难得的良知、最无畏的冲劲。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惜的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里，多少人的是非观念早已付诸东流，剩下的仅仅是犬儒主义的苟活而已。而这正是当局所最需要、因而极力营造的大环境。当局最害怕、最不喜欢的恰恰就是人们保留那怕一点点是非观念。因为有了是非观念，就会"说三道四"，就会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这种现象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当然是允许的、合法的，是一种天赋人权。但在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度里，却是当局最大的威胁。威胁什么？威胁到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的所谓"和谐"等等。因此，像吕荧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生存。其被整肃、被毁灭，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我们把吕荧收录于此书，是因为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一大批这样的'傻瓜蛋'。因此，吕荧的被毁灭，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不幸!】

傅雷（1908--1966年）出生于江南望族。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字为其名，以"怒安"为其字。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1928年出国赴法国留学四年。首站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欣赏和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1932年认识了也是留法的庞熏琹和在上海美专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而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同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

1937年，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这部译着令傅雷名声鹊起。

在中共政权下。仍然专注于自己的翻译事业，成果甚丰。主要是翻译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以及《巴尔扎克全集》第5、6、7、11、13、14等卷。这些作品都是属于"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因此文学家公认："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此外，他翻译的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

小说的精湛点评，为文学界做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出版以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已达一百多万册，感动了数百万读者。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 年)，足以证明这本小书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内心活动的生动写照。在该书里有许多至理名言。例如：“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艺术家与行政工作，总是不能两立的！”、“只要是先进经验，苏联的要学，别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也要学。”（50 年代的中国人能有如此“反动”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艺术特别需要苦思冥想；老在人堆里，会缺少反省的机会；思想、感觉、感情、也不能好好的整理、归纳”。

1957 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十次之多，但傅雷却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他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无法‘戴帽’。到了 1958 年“反右补课”，傅雷再也无法幸免了。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回家见到夫人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在他的家书中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情：“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比较了解傅雷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说：“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

如此看重‘人格’二字的傅雷，到了每个人都人格扫地的‘文革’期间，当然无法生存下去。1966 年，从 8 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傅雷觉得自己不可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毅然决然地离开这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和国度——自杀。9 月 2 日的晚上，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布带，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在那个遍地灾难、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死亡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慢的片区警察来了。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没有机会向父母的遗体告别，就匆匆地被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傅雷身后有两个儿子：

傅聪：1934 年 3 月 10 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氛围和学术气息的知识分子家庭。傅雷对中西文化和多种艺术的渊博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缜密严谨的学风，对艺术和真理的执着追求等待，无不直接地、长期地、深远地熏陶着、影响着傅聪的演奏艺术。1953 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潸然泪下。1955 年 3 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74 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也是音乐资历最浅的选手。经三轮比赛，他以和前两名相近的成绩获得第三名，还获得《玛祖卡》演奏最优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虽为第三，但傅聪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为这一届比赛中最引人注目的选手之一。

赛后傅聪继续留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 1958 年底提前毕业。这期间，傅聪曾于 1956 年 8 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此外，还在东欧各国许多城市演奏。到 1958 年离开波兰前，已达五百余场。这些国家的广大听众领略了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傅聪也积累了专业钢琴表演中宝贵的舞台经验。

1958 年 12 月傅聪毅然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在此后 20 年间，先后举行了约 2,400 场独奏音乐会；与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许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 50 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就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傅敏：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的大门。1958 年 4 月 30 日，父亲傅雷被错划为“右派”。1959 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坚持到 1962 年暑假毕业。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材生，你们不要，我要！”。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但他本人却不以为然。万万没有想到，竟给父亲在十年前言中了！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一接触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

但是，1966 年 9 月 3 日晚 8 点，“父母亡故”的噩耗传来，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悲痛万分。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他断定：百分之百地是死于非命！不幸连着不幸。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又失去了心爱的人。他们早在北京外语学院时便开始相爱。傅敏被分配到北京女一中时，那个名叫‘小蓉’的女孩常常来看他。

料想不到的是，1966 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暴风骤雨式的考验”：9 月 3 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北京外国语学院马上就贴出大字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

这年年底，小蓉参加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连”后，回到上海。

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就不再来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从此不再往来。

傅敏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同学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他立刻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肿，脸都变样了，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这时，又被红卫兵发现了。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被人急送北大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溜过。

1979 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兄长傅聪。同事们挥泪相送，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然而，1980 年 8 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此后，傅敏一直从事教学生涯，直到退休。

【编者按：全部书稿完成后，偶读旧报又发现一则资料，颇有意思。‘文革’期间，红卫兵折磨他三天四夜。‘罪名’是什么？原来就是在其妻的三姐寄放在他家的两箱杂物中，抄家者有了“重大发现”：找到‘一面小镜和一张旧的画报’。镜子的背面是宋美龄的画像，而旧画报上则有蒋介石的头像。于是这两样东西就成为“反党”和“幻想变天”的铁证。傅雷

本人也感到“百口莫辩”。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儿戏，但当年却是了不得的“罪行”】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说：

1、国家的根本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也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保护弱势群体不被淘汰。这才是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经济是国民的事情，政府只是通过政策调整各方的利益。如果国家赤膊上阵自己去做，岂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焉有不腐败的？

2、统一的前提是：自由、民主、均富，统一才有意义。否则只好维持现状。

3、老舍：“人民艺术家”投湖自尽 以身殉难

老舍（1899—1966年）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这期间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 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 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1938 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共政权建立后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热心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特别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着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群众口语，大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1966年初夏，有人发现：“太平湖里突然出现许多大红、墨黑的金鱼”，后来知道：当时人们为了抛弃和“四旧”沾边的任何生活喜好，就在太平湖放生养的金鱼。再后来，经常还能从湖里捞起字画、瓷器，甚至三枪牌自行车，再后来就会漂上来一些死人，从此，小孩连林子也不敢进了，怕里面有吊死鬼。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几十名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这是全国出现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7月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中央在北京设立‘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8月23日“红卫兵”以扫“四旧”名义，在北京国子监(孔庙)大院内大批量地焚烧戏装、道具，揪斗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和干部，其中就有老舍。可他是勇敢正直的人，永远不肯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并且满腔悲愤地把手中的牌子向地上砸去，结果皮带，拳头，皮靴，口号，唾沫全朝他铺天盖地落下来。

据“八二三”事件亲历者张林琪和白瑜所写的文章称：“人群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萧军后来曾写

文章称：8月23日在国子监同被批斗，老舍和自己有目光的交流，老舍眼中发出奇异的光，那光让他不寒而栗。学者傅光明还采访了在国子监参与揪斗老舍的当年女八中的近百位红卫兵“只有一个人隐瞒姓名接受了采访，不断地哭，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希望转告自己对老舍家人的歉意。”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人生终点站，舒乙说这也是个谜，因为当时家里在灯市口附近，距离太平湖很远。8月25日清晨，舒乙去太平湖认领父亲的尸体。他认为“父亲应该是24日一整天在太平湖边徘徊，他是一个作家，最后应该留下点文字性的东西，但是我没有看到。”

老舍先生的最后一天，常见的文本叙事细节是：老舍拉着3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冰心后来跟舒乙说，“你发现没有，你父亲作品里的好人大多姓李，姓李的人大多自杀，自杀的方式大多选择投水。”最经常被提及的《四世同堂》中的祈天佑最后也难逃被羞辱而死。老舍写道，“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仿佛向他低声地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了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再让我们追述一段往事：1941年，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文人们酝酿设一个‘诗人节’。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5月31日的《新蜀报》上。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这最后一句简直是在预告他自己的未来——“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他是比较早以身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问题吗？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还是看不甚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丰富的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极个别的例外。那么，老舍先生呢？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这是舒乙回忆和父亲最后那次谈话中，老舍的问话。显然，他早有答案在胸。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吼，在反抗！他还说：“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又要死人了！”、“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舒乙断言：“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并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没有第二种选择。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因为，他已经把一切事都看穿了。

根据老朋友马松亭先生的回忆，8月初他们最后那次见面，老舍就有了决绝之心。可见投水只不过是他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早已勾勒好了。

它说明，人比动物伟大之处就在于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

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它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更挥毫写下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原委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预言——“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见舒乙：《爸爸的最后两天》）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结局，至今，还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

【补白】AA 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相反，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4、田汉：国歌歌词的作者瘐死于监狱中

田汉（1898—1968 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原名寿昌。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既擅长写作话剧、戏曲，电影剧本、小说，又兼具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的才能。他既是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更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少年时代的田汉深受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革命志士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从小就具有反帝、爱国的宏大志向。1912 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 年得舅父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 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咖啡店之一夜》。1921 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 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 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从此，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1926 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打算编导拍摄《到民间去》，因故未成。1927 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同时还写作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1928 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时，田汉主编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 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剧本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峰。《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推动话剧由校园走向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 1929 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 年 3 月，他以发

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 7 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6 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1932 年参加中共，从此开始参与中共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华全面展现的时期，同时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也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 年 2 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12 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 18 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并给予经济补助。翌年，改编并演出了 6 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1937 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 5 幕话剧《阿 Q 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 5 幕话剧《卢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8 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又转赴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 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成立宣言。1938 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1938 年 2 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 10 个抗敌演剧队、4 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1938 年 11 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的演出，并亲自写作《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1940 年应第三厅之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1944 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 1946 年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1949 年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曲学校首任校长。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 60 余

部，电影剧本 20 余部，戏曲剧本 24 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 2000 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他的创作成果，是为了证明其过人的才华、旺盛的精力、以及对政治的耿耿忠心和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但是，对于像他这样既有才华又具备知识分子良知和执着个性的人，很难为政治所接纳、所包容。尽管他忠心耿耿，但‘上面’仍然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果然，到了 60 年代初，田汉的地位就开始受到挑战，他的仕途生涯也开始走下坡路：1962 年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在广州联合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驱散了反右以来弥漫在戏剧界的一些阴云。与此同时，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田汉也公开赞同戏剧题材应该更广阔的论点，号召在写实的话剧与写意的戏曲之间建立起一座金桥，相互学习，建立起一套具有民族气派的话剧体系。他这种无视阶级斗争观念和革命色彩的‘调和’论调，在当时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政治气氛中，显然不合时宜。尚未得势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敢公开批评总理，但对田汉却无需手下留情，他们把这次会议定为“黑会”，把田汉定为文艺黑线人物。紧接着在上海举行的华东话剧观摩演出，身为全国剧协主席的田汉被毫无理由的剥夺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资格，并禁止其发言。张春桥等人把持会议，大肆宣传“大写十三年”，以否定其它文艺成果。此时的田汉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竟然跑到江苏去作报告，传达周扬在剧协常务会议上的指示，以反驳“大写十三年”的观点。殊不知：这绝不是一场文艺战线上的争论，而是有着严重的政治背景。张春桥等人把他的讲话定位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污蔑田汉是“叛徒”，最后迫使田汉在会议尚未结束时，便黯然离场，到苏州散心去了。在苏州期间，田汉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断裂腰身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飙风总不移。”（《题苏州司徒庙古柏》）由此可见，田汉在意识到政治上失势后，想到的并不是如何进行反扑，而是抱定坚持真理，不惜牺牲的文人风骨。多么天真！

政治赐给田汉的最后一次机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 1965 年。当时，江青正苦于没有足够分量的艺术家支持她搞现代革命样板戏，于是便找到了田汉，声称只要田汉不再坚持以往的历史剧观点，就可以对其网开一面。面对诱惑，“暴雨飙风总不移”的田汉断然拒绝。于是，阴谋和悲剧开始上演了……。

由于长年忘我的工作，田汉的身体早就跨了：严重的糖尿病和精神上的郁郁不得志，使得暮年的田汉宛如暴风中的孤烛，奄奄一息。1966 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田汉被率先打倒，关入“牛棚”，忍受着暴风骤雨的摧残。

人们也许会问：倔强的田汉为什么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呢？其一：老舍坚持的是人性的尊严和道德的崇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田汉坚守的除了人文的骨气外，还有政治上的信仰；第二，田汉 90 多岁的老母尚在人世，他不忍因自己的轻生而毁灭掉老母盼儿归来的一线希望。

他默默地忍受着，期待着。不久田汉走出了“牛棚”，但等着他的却不是自由，而是被正式逮捕入狱。此时此刻的田汉依然天真地坚守着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在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首诗中写道：“先烈热血写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如果和他早年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对比，早年作品中的豪迈激昂气概已是荡然无存了。悲夫！

被政治无情抛入命运谷底的田汉没能见到日夜思念的老母，便于 1968 年 12 月 10 日含冤而去,连骨灰都没有留下。AA 一代戏剧大师，就这样戏剧般地离开了人生舞台，而抛弃他的正是他深深热爱着的那个时代。

与老舍先生之死比起来，世人对田汉先生之死，显然存在着多种看法，其中不乏反思的意识。也许这是他对政治的幼稚，甘为政治旗手所付出的代价。政治对于文人来说是就像一

片充满诱惑的泥潭，生于乱世不问政治未免有些冷漠，但一旦迈入，稍有差池便难以自拔。聪明而狡猾的政治家会利用爱国意识把文人引入这个泥潭，然后再把这种爱国意识狭义化、功利化，任你如何挣扎，只能愈陷愈深。郭沫若如此、老舍、田汉、巴金、周扬……无不如此，哪一代的知识分子能够例外？……唯一的区别是，老舍是卷入政治泥潭的文人，周扬是政治家兼文人，郭沫若是文人兼政治家，而田汉却是个典型的不愿意放弃文人风骨、因而不称职的政治家。

【编者按：直到今天，每次重大会议都必奏国歌。在奏国歌的时候，人们还能不能想起这位国歌歌词的作者？是否知道这位作者被国家政权迫害致死？】

独裁者把国家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们就代表着国家；这样说实际就是要求人们把他们自己看成至高无上。……如果主权自己侵犯人权，这样的主权要它何用？

把国家利益看成比人民利益更重要，造成这个颠倒的原因在于政治家的故意宣传。

——著名学者茅于轼

5，树赵理："山药蛋派"著名作家的惨死

赵树理（1906～1970 年），原名赵树礼，出生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赵树理在农村中长大，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民间艺术。青年时代外出求学和流浪，曾就学于长治的山西第四师范学院，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1930 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1937 年投身抗日工作，编报纸副刊，同时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1949 年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笔耕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因而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1937 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担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赵树理虽然拥有这么许多头衔和光环，但他的性格和气质却与当时的风气格格不入。这种矛盾很早就暴露出来。1955 年 11 月，赵树理和剧作家张万一看了一场戏《柳毅传书》。这是一出传统戏，说的是洞庭龙宫中的龙女和书生柳毅的爱情故事。但是，在当时突出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下，这出戏被改编成地主压迫农民，农民愤怒却苦无对策。正好有个名叫'柳毅'的勇士，公开揭露剥削关系，领导农民清算地主。龙女和柳毅的爱情也因此建立在受压迫的阶级感情基础上。看完戏后，别人问他戏怎么样？他突然反问："柳毅入党了没有？"又说："如果还没有，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张万一等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大笑。他却非常幽默地进一步说："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分好，立场鲜明觉悟高。"最后他坦率地表明：《柳毅传书》这个戏，故事完整，情节优美。如果一定要塞进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叫强奸民

间故事。在那个“一切为政治服务”的荒唐年代，这种‘强奸民意’的事情，发生得还少吗？以赵树理的性格，势必与当时的形势发生尖锐的矛盾。他的悲剧就在所难免了。

1966 年 7 月 1 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污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预示着倍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也在劫难逃。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 1966 年夏天，当时他在山西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7 月 20 日、7 月 21 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全面“揭发”批判。8 月 8 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判。8 月 9 日，《山西日报》用了一个半版刊登了韶宝、宏光《从赵树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动实质》的批判文章。接着，赵树理的家乡晋城县、长治市、晋东南地区就开始了对赵树理的揪斗，然后全省的造反派组织拉着赵树理，到全省各地城镇乡村去游斗。

1967 年 1 月 8 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迅速升级。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当时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会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打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然摘下牌子和头上的高帽子，使劲掼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久，对赵树理的批斗再度升级，他被“揪回”太原。太原的造反派轮流批斗赵树理。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上拉下来，朝他胸部拳打脚踢，赵树理的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断的肋骨刺穿。1969 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在一次批斗时，赵树理被人从高高的桌子上猛然推下，髋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上不能自理。

1970 年 6 月，江青在一次会上又点名要批判赵树理。6 月 25 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批判，并抽调人员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赵树理的“黑材料”，下发各地，供各单位批判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28 日赵树理被投入监狱。从 7 月开始，山西各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工农兵群众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到了年底，《山西日报》发表的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已达 70 多篇。

这时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被打断的肋骨，摔断的髌骨等等。但因为他是“反动作家”而得不到有效治疗，发炎化脓，引起了肺部感染，最后发展成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9 月 17 日，山西省革委会又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前有人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一个借‘文革’而得势的掌权者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已奄奄一息的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实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让他双手撑着。勉强维持了半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9 月 20 日，赵树理开始不能进食。9 月 22 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呼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被送到医院。9 月 23 日凌晨 2 时 45 分，离他 64 岁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也脱离了无边的苦海。

临终之前，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 9 月 6 日抄好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交给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的。”为了不给他人留下任何话柄，不给家人带来任何不测，他只能用毛泽东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来表示自己的心迹。

毛泽东的《咏梅》是仿陆游的《咏梅》而作，反其意而用之。陆游的《咏梅》末句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也许才是赵树理发自内心的声音吧。

在‘文革’期间，整个文艺界先后被整死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不知凡几。仅仅根据网上的资料，摘录部分名单如下：

陈笑雨：1917 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1949 年后历任《文艺报》副主

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据《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第31~34页资料，‘文革’期间仅《人民日报》社就有7人先后自杀)。

叶以群：1911 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 年加入中共，同年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1949 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金仲华：1907年生，浙江桐乡人。新闻出版家、国际问题专家。曾任《文汇报》社社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8.4.3逝世。

彭慧（女）1907年生,湖南长沙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中国作协会员。1957 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文革’开始后即遭受残酷迫害。1968 年 7 月 11日晚上被批斗后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被送回到一间无人照顾的小屋。次日中午死亡，终年61岁。

杨朔：1913 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 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尸骨无存。

闻捷：1923 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 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71年1月13日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侯金镜：1920 年出生，文学评论家。‘文革’初期即上书中央，希望以史为鉴，不要把彭德怀当成敌我矛盾。再一个罪名就是指着林彪的画像骂曰：政治小丑。被揭发后，打成现行反革命。1971年夏天在苦役中猝死于干校。

刘克林：1924年出生，当年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即入《大公报》担任编辑。李慎之以16字赞曰：“才思敏捷，倚马成文，采写编论，无所不能。”后来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他是当年中共和苏共论战的‘九评’文章执笔人之一。《九评》被定位为“文革”之理论基础，而他本人却被‘文革’的大潮所吞没。1966 年 8 月 6 日，愤然从办公室 4 楼上飞跃而下身亡。

戚学毅：《北京日报》社记者，因拒绝揭发刘宾雁而从5楼飞跃而下，以死抗争。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小记者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坚持自己的‘志’。不惧于淫威，不屈于权势。戚学毅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极其壮烈的伟大行动，值得记录，以警当代，以策后人。

【补白】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想不出比“心碎”更恰当的了。心碎是因为：献身以求的理想破灭；内心感受被逼迫承认并不存在的错误，侮辱自己的人格，用自己的手把心灵彻底打碎，在精神上再也站不起来。

——引自学者赵复三着文《怀念李慎之》

第5单元　文科名师

1、潘光旦：著名社会学家惨死于文革

潘光旦（1899—1967年）字仲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于

1927 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另有译着《性心理学》等。

（《性心理学》原著作者英国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是与弗洛伊德齐名的性心理学泰斗。）

回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他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 1941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潘光旦先生一生学问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中共政权下，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于中共当局的无知和粗暴，竟然荒谬地撤消社会系学科。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改行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必须首先着重研究潘光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之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著名教育家。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相结合最早的成功范例。潘光旦一生都在极力倡导的‘通才教育’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当我们走过了近 50 年专业化教育的弯路，目睹这一弯路造成国民人文素质严重滑坡的时候，重温这位集科学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文采于一身的教育家的思想，对正在呼唤通才教育和人文关怀的当代中国教育界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必须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最终目的。教育就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让受教育者完善“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业教育必须在完成人的教育之后，在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才谈得到进一步专业化，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而已。当我们深入了解潘先生的全面教育思想以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近代中国教育会背离对人的全面培养这一根本原则？为什么会出现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工具化等等不良倾向？

根据潘教授的长期观察和思考，在专制主义政体的国家里，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专制主义政体要求‘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政治’、‘政治统帅一切，当然包括教育在内’。这就是祸根，就是所有扭曲现象的源头。50 年代，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非常坦率地公开说：清华大学培养目标首先是要听话，其次还要有用。‘听话’和‘有用’四个字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中共政权对教育事业的最终目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潘先生的教育思想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视为‘异端’也就不足为怪了。

潘先生还十分准确地使用 3 个 S 来概括中共政权下知识分子的命运：Surrender、Submit、Survive。头两个 S 是：“屈服”和“投降”。第三个 S 则是活命。这三个 S 既是事实的概括，又具有震撼人心的意义：只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须投降和屈服。事实正是如此。当一个政权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和职业的资源，甚至粮食，再由这个政权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知识分子和所有普通人就只有“屈服”和“投降”，没有别的活路。

托洛茨基曾经批评斯大林把“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法则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里曾引用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中国所有大学里也是如此。更具体地说，就是“不检讨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每个人的控制手段上，从 50 年代开始，逐步收紧，逐步严密、细化。最后甚至深入到每个家庭、每个月只能消费几两油、几斤米，都得听命于‘上级’和领

导。

早在封建时代里，还允许某个人遁迹山林，不食周粟、耕读为生。可是在中共统治下，这种可能也没有了。如果不听话、不检讨，就只有饿死一条路。中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这也许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过去敢于‘横眉冷对’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共政权下却一个个乖乖地低眉俯首、夹紧尾巴的主要原因吧？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本领高，实在是高！他实现了历朝历代皇帝所梦寐以求而未能做到的梦想：控制一切，包括思想、语言在内。每个臣民如何思考、如何说话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和模式；否则就不给饭吃，让你饿死。

潘光旦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和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等被称为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五大右派’。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

1966 年 8 月，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开始，学生红卫兵控制了各个学校。到处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者“专政队”。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铁定进入“劳改队”的人物。潘光旦又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伤而截肢，平时走路要撑双拐。当时潘光旦已是 67 岁的老人。1966 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在夏天赤日炎炎下暴晒，就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牛鬼蛇神”天天、时时刻刻地‘示众’，以便来来往往的革命群众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蹲不下，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竟然不准许。于是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过往路人，目睹此景，不胜唏嘘！潘光旦的家被抄了，所有的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受潮湿，以致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又得不到应有的医疗。

1967 年 6 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10 个月后，潘光旦去世。6 月 10 日的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救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潘光旦停止呼吸。

临终时，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才有了‘四个Ｓ’的说法。从 1951 年开始，他使用前三个 S 的对策：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为的是活命，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彻底的毁灭的命运，也就是最后一个 S（Succumb）。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另一个女儿嫁给北京大学的程贤策，这个女婿在遭受三个月的“批斗”后，于 1966 年 9 月 2 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夫妇俩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夫妇间的悄悄话）。这个女婿就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胡寿文。据胡寿文晚年的回忆：1966 年 6 月 18 日，北大校园里开始了大规模暴力“斗争”，斗“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因此，几乎窒息昏死过去。幸亏急中生智，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到学生们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乃是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被“批斗”。“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 90 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坚持不住而倒下，则遭毒打。

和潘先生同样著名、也是社会学家的吴景超（1901—1968 年），也是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章罗联盟”的谋士。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折磨后，于 1968 年死于肝癌。

像吴景超、费孝通、储安平、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钱端升等等，他们都是

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新时代的到来充满幻想，可是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自己整个人生的信念，最终产生了莫大的悲剧。这显然不仅仅是某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大悲剧。而制造这个大悲剧的罪魁祸首今天仍然在被人们顶礼膜拜，其高大的头像仍然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这实在是对全中国人民莫大的侮辱和讽刺。他几乎毁灭了整个国家，当然也差一点毁灭了整个党。但令人莫解的是这个党依然奉为至尊，是耶，非耶？智乎，愚乎？

【补白】

伽利略被烧死了，但地球还是在绕着太阳转。

——1910 年出生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关于选举：有备选叫人家选，这是尊重；没有备选叫人家选，这叫侮辱。

——著名学者陈四益《读书》2011 年 1 期

2、陈梦家：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不堪凌辱愤而自缢

陈梦家（1911～1966 年）笔名陈慢哉，出生于南京，祖籍浙江省上虞县。他最初爱好文学，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后来改行成为古文字学家，最后又改而从事考古学研究。

陈梦家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1932 年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1934 年改攻古文字学，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37 年在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4 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 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

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 年 1 月，年仅 19 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 1 卷第 7 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公开宣告自己关于诗歌创作方面整套的艺术主张：

首先，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其次，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为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要有哲学意味。”

第三，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把“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

1931 年，刚满 20 岁的时候，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一时好评如潮，陈梦家从此诗名大噪。1931 年 7 月，《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

1931 年 9 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 月 19 日，这位中国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坠机身亡。导师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

1932 年 1 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

活道路时，“1•28”战争爆发了！19 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来到 122 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后来甚至亲临火线，抢救伤员。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员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蕰藻浜的战场上》。1934 年 1 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闲适自如的意趣。

陈梦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

1936 年 9 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4 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 年夏，游历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 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中共掌权后，于 1952 年搞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大压缩文科学科，‘古文字学’被迫取消。陈梦家这一次是被迫改行，转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

50 年代初，中共开始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学校一律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做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则被“隔离反省”。

1957 年，在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和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四位并称为史学界著名的‘五大右派’。其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还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当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学者。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做踩水车等项劳动。

‘文革’开始，1966 年 8 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斗”。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

1966 年 8 月 24 日，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野蛮、最疯狂的阶段。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 6 位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如是说。被折磨者的凄厉惨叫在夜空中回荡。邻居们

听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成批地运走大量尸体。

这一天的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这时，考古所的造反派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被关在考古所里的陈梦家，一定听到了被打者死前的惨叫声。那时候，他所面临的已不只是诗歌和学术的毁灭，也不仅是体面和尊严的丧失，而是面临生命的殒灭，甚至死得不如一头猪。在农村，猪养大了，要聘请会杀猪的人来，一刀杀死。杀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 1966 年红卫兵的八月的大杀戮中，被害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而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残忍手段进行虐杀，虐杀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延长数日。显然，这种杀害方式也更为残酷、更令人感到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 1966 年 8 月 24 日晚上的大规模虐杀，只是因为找不到更好文字来表述和形容。

夜已深了，陈梦家仍然在奋笔直书。他在写什么？写遗书！然后服用大量安眠药。这一次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未死。但 10 天以后，陈梦家该为自缢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死于 1966 年 9 月 3 日，年仅 55 岁。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尽侮辱和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愤然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地运转，而陈尸依然堆积如山。所有被打死和自杀者，当局一律不准留骨灰。无数的冤魂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就顿时化作一缕青烟，从人间消失了。什么叫'人命如蚁'？请看'文革'中这一幕。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 年 9 月 5 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根据这份《简报》的统计：到 8 月底，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原本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在最高当局的秘密档案库里，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中所谓"累累""战果"，实际就是无数无辜老百姓生命的被毁灭。'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 年》作者的预见。

【编者按：】《1984 年》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 1948 年创作、次年出版并风靡全球的一部政治小说，也是具有强烈预言性的幻想小说。令人叹服的是：从来没有到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奥威尔，竟然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能够预见到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荒诞和残忍。在小说中，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街道上永远贴满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老大哥'的巨幅画像。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叫总统，也不叫国王，而叫'老大哥'，听起来就像是所谓的'公仆'、'人民的儿子'那样亲切，但人们所承受的却是最高领导人最无耻、最无人性的极权统治。全社会的根本信念只有一条：

'老大哥'是全能的，'党'是一贯正确的。

在这个国家里，最严重的罪行是'思想罪'。穿着便衣的思想警察混迹于人群之中。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逮捕。

每天的工作间隙有两分钟'仇恨'时间。所有人必须放下工作来观看：又一个从党的高层揪出来的叛徒、变节分子被丑化的嘴脸。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叫喊，有人声嘶力竭地叫骂着"猪猡！"……

党是不应该讲'人性'的，因为'人性'会脱离党的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应该把它转化为对战争狂热和对领袖顶礼膜拜。

谁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篡改历史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如果'老大哥'说过某句话、党所做的某个预测与后来的事实不

符，相关的报纸便会悄悄收回来销毁，经过修改的内容会被重新翻印。报纸的日期没变，但观点变了。要证明‘老大哥’和‘党’曾经犯过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找不到任何证据。过去的印刷品全部被更新了，没有留下如何痕迹。

这个政权下面设有‘真理部’，任务是负责修改历史；还有‘和平部’任务是发动战争；‘友爱部’则专门对老百姓严刑拷打。人们在阅读之余，不能不惊讶于：作者如何能够在 40 年代末期就栩栩如生地、精确地预测了、并且生动地描绘了极权制度下的景象及其未来的必然走向？

当中国的读者读完这部小说后，难道不会感到“似曾相识”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难道不是时时都感觉到那个所谓‘真理部’无处不在的阴影吗？

3、刘盼遂：被抄家毒打致死

刘盼遂（1896~1966 年）河南省信阳市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曾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师。1925 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考试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辈。1928 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刘盼遂曾与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尚严、傅振伦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学文”学社。1946 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的一生从事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造诣精深。尤精于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曾出版《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等著作，对古音分部和段王学的整理与研究，远迈前贤，达到新的境界。他还善于将小学的学问运用于笺释、校勘、辨伪、辑佚、考古等方面，着有《论衡集解》。此书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笺》等著作，以及《穆天子传古文考》、《嫦娥考》等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人们研读、征引的重要依据。刘教授学识渊博，博闻强记。他的同事或学生，要查典故时常常不必翻书而直接问他，都能给予满意的回答。所以大家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活字典”。

他的代表作是关于李唐为蕃姓的考证。在 30 年代李唐族源的争论上，刘盼遂先生曾发表《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为蕃姓考》、《李唐为蕃姓续考》、《李唐为蕃姓三考》等，力主“李唐为蕃姓”之说。这些文章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众多文献中有关史料证明“李唐为蕃姓”之立论。其立论之依据前后共达 17 条之多，读者不得不为其扎实的史料功底而称叹。

他还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曾任河南通志馆编纂，参与编写《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着有《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着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征》、《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

刘盼遂先生做学问可以用“朴”字概括，朴实无华，而又博大深邃，可谓继承了乃师王

国维的风格。而他做人也可以一个“朴”字概括，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动，也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他在清华的老同学谢国祯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些活动，而刘先生则讲了句很有趣味的话：“谢多情，刘寡欲！”颇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但刘盼遂也不是不懂情趣的人，春秋假日，他常带学生野外郊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却在 1966 年 8 月下旬被红卫兵揪斗致死。对于刘盼遂先生的死，谢国桢先生写有一篇《记清华四同学》，谈到刘盼遂之死时，他说：“66 年秋……余于 8 月 21 日晨，访君（按：指刘盼遂）于其保安寺寓庐，时夜雨初过，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荷叶迎风，花红映日……而余家中……蕙兰，含苞待放，清香扑鼻，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酌以清酒，君饱餐而归。当时余有句云：‘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葩；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门外即天涯。’孰知竟成谶语。8 月 23 日余受冲击，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过君保安寺之旧居，则见夕阳在墙，板扉洞开，出入无人。犹闻笛声，《广陵散》自此遂绝，无异读潘岳之《怀旧赋》也。”可谓字字含情，句句催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心酸。

斯人已逝，但无可否认，刘盼遂作为近现代少有的古典文献学家，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另外，刘先生还是一位藏书家，其丰富的藏书也是一份珍贵遗产。刘先生在‘文革’被打死的时候，家中的丰富藏书被洗劫一空。康生听说刘的死讯，立即派戚本禹到刘先生家里去抄家，实际上是去挑书。刘先生所藏的几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图书全部被挑走。‘文革’后，这些书有一部分还了回来，放置在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其中一部宋版的《十三经注疏》被国家图书馆拿走，只给了刘先生儿子 5000 元。2002 年 6 月，刘先生那一批二千八百余册的藏书，由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转赠给北师大图书馆。

人们可以稍感欣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教授花了 20 余年，悉心整理出版《刘盼遂文集》。该文集搜罗到的文章涵盖了刘盼遂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他遍征古代文献，出入于语言文字与文学、历史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聂石樵教授在前言中的精辟概括：《文集》体现出刘盼遂在小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目录方面的专心研究成果。他继承了干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而又将其发扬光大，不仅以小学通经，更以小学通史、通一切古籍，从正经、正史到戏曲、小说，乃至敦煌曲词与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反映了民国学人在学术认识上的现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献学在新的时代的发展道路。

关于他的死，经他的学生仔细查询结果是这样的：刘盼遂先生的家在北京西城区西单商场斜对面的一个胡同里。他从教多年，倾其所有，买下一个小四合院。院门上有小匾，匾曰：“安之居”。这三个字和居住在这里的人被残酷打死的惨状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几乎成为一种无言的讽刺。

8 月下旬某日，北师大的红卫兵“勒令”所有的“民主党派”成员到学校集中。刘盼遂是“民盟”成员。当时教员们家里都没有电话。他的一个“民盟”同事为此打电话到他家附近的公用传呼电话，那边的回答是刘盼遂已经被抄家，胡同里别的“牛鬼蛇神”也被关在他家，因此不能传达这个电话。这个同事不敢再多问，更不敢前往他家。

刘盼遂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儿子结婚后和他们一起住。女儿结婚在外，当时因怀孕而来娘家住。刘家的院子不大，正房是他们夫妇住，厢房住着儿子媳妇，还有两间破房子是书库。刘盼遂有很多书，放在高至屋顶的书架上。

来刘盼遂家抄家的是附近的中学及小学的红卫兵学生。刘盼遂有自己单独的小院，是他被抄家的最初原因。红卫兵乱翻刘家的东西，在刘盼遂女儿的褥子底下搜出一张几百块钱的人民银行存折。红卫兵认为：刘家人隐藏存折，必定也藏有金子。于是开始殴打刘盼遂夫妇，要他们说出金子埋在哪里。刘盼遂一生当教师，所有的积蓄就是自己的住房和藏书，实在没有金子。因为交不出金子，他们夫妇被毒打。他们被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子，不准吃饭，只给他们喝院子里自来水管的生水。

红卫兵又开始挖掘刘家的地面，他们猜想刘盼遂一定是把金子埋在地下。在屋子里和院子里挖来挖去，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一边挖，一边殴打折磨刘家的人。经过几天的折磨，刘盼遂的妻子先被折磨死了。

刘盼遂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识字不多。家里有同事或者学生来访，她一般不参加谈话。人们称她“师母”，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这里无法记录她的姓名，非常遗憾。

刘盼遂看到妻子死了，非常难过。他头朝下扎进了家里的一个水缸。水缸不大，里面的水也不多。红卫兵发现后，把他从水缸里拖了出来，继续殴打。刘盼遂很快就被折磨致死。

关于刘盼遂之死，还有另一种版本：在抄家时，红卫兵把他家的藏书全部付之一炬，在熊熊的大火中，他毕生珍爱的藏书毁于一旦。他感到锥心般的疼痛，在万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纵身一跃，扑向火海，毅然和所爱的书籍同归于尽。但被红卫兵拉出来痛打，终于被打死。编者宁愿相信后一种说法，因为扑向火海这一外在行动完全符合一个虔诚书生的内在性格发展逻辑：视书如命，既然书被烧了，人也就没有再活下去的意义了。

刘盼遂夫妇的死亡日期，是 1966 年 8 月“二十几号”。到底是几号，现在仍然无法查清。但是人们记得是“二十几号”，因为那是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而刘盼遂的家，他们夫妇被打死的地点，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一公里。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古代文献研究，在考查和研究千年以前的事情上颇有成就。但是他自己被折磨致死的具体日期竟然无法考证、成为“不可考”。这是‘文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局长期禁止披露‘文革’罪恶的证明。

当时，红卫兵还把临近街道上抓来的“阶级敌人”也关在刘家的小院里。其中有的被打死在那里，但是他们的身份和名字，现在还无法查出。

刘盼遂的女儿也被打。她正在怀孕，被打以后，当然就流产。她在一个学校的教务处工作，逃到学校，幸免一死。其儿子溜出家门，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请求学校派人去家中说明刘盼遂不是“地富反坏”分子，这样红卫兵就可能释放刘盼遂和他的妻子。当时，北师大文革前的领导人已经被“打倒”，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而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却置之不理，听任红卫兵把刘盼遂夫妇打死。

实际上，北师大当局如此做法，事非得已。毛泽东刚刚于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给毛泽东献上袖章的人，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宋彬彬的中学在 8 月 5 日打死了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这所中学距离刘盼遂家非常近，走路只要 10 分钟。在 8 月 18 日以后，已经开始了的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红卫兵在北京全市抄家打人，显然都是在权力当局支持和纵容下进行的。那时候的北师大当局，紧跟最高领导的“伟大战略部署”犹恐不及，岂敢公然干扰红卫兵的‘革命壮举’？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北师大当局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他们当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同样住在西单一带的北师大中文系杨敏如老师，也被外贸学院外语专科的红卫兵抄家，砸毁他们的唱片、钢琴、图章、书籍、画和碗碟，拿走了他们的首饰。杨敏如老师的丈夫是电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曾在著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当时在单位也遭到大字报的攻击，但电子工业部当局派人来告诉红卫兵：他不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尽管杨敏如的家里被砸得一塌糊涂，很多东西被拿走，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刘盼遂夫妇那样被毒打致死。虽然他们的财物无法找回来，但是他们这样想：人活着就不错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肖璋教授，也住在城里。红卫兵巡逻的时候，发现他偷偷把银器丢掉，就把他捆起来殴打。他说他不是坏人，请求红卫兵打电话给北京师范大学当局查证他的身份。据说北师大当局帮他说了许多好话，他才没有被打死。

有人在为刘盼遂之死惋惜之时，又认为刘盼遂和他太太都不善于表达，不会给红卫兵说好话，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在‘文革’前，刘盼遂曾经多次被林彪和妻子叶群接去他们家中，为他们讲课，讲解古文。有人说，林彪当时刚刚当上了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如果刘盼遂能利用一下林彪的地位，也许就能自救。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也太天真。北京当时发生的红卫兵大屠杀，就是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共同支持和鼓励下进行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对红卫兵的行为给予热烈支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林彪会给刘盼遂特别的面子吗？未必！

周恩来当年曾拟就一个“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文革’后一直被当作他“保护干部”的善行的被反复嘉许，甚至津津乐道。但是那份名单上，只有 13 位声誉最高的“民主人士”，远远轮不到刘盼遂，尽管他也是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又据目击者云：抄家打人者是北京 34 中的红卫兵。今天再来追究打人者谁，似乎毫无意义了。

其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人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没有保障的时候，投票权更无从谈起。这个国家能有多高的国际地位呢？

如果仅仅依靠武力，人多势众，恐怕难以称得上是真正强大，更谈何对世界的影响力？

4、王重民：宁死也要捍卫学术尊严的古文献学家

王重民（1903—1975 年）字有三，号冷庐主人。出生于河北高阳西良淀村。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敦煌学家。早在保定直隶第六中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1923 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回保定六中筹设团支部，被直隶省军阀曹锟发觉下令通缉，1924 年改名为‘重民’，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国文系，专攻文史，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1928 年，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将原北海图书馆并入，王重民亦随之进入该馆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成就显着，于 1934 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国和欧洲的敦煌遗书、太平天国资料、明清间来华传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国古籍等。二战爆发后，来到美国，将北平图书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 3000 余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又为国会图书馆和其它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写提要。在海外数年，他对总共近 6000 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这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很大。1947 年，王重民回国，出任北平图书馆代主任，并在北大兼职，参与了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两年后，中共政权建立。他作为北平图书馆代馆长，负责将全部图书移交给代表新政权的军管会。不久，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并兼任北京大图书馆系主任。

此时，王重民已是敦煌学、目录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公认的权威。但在办馆方针上与主管领导人的思路不同，以至于在处理馆务上的某些设想无法贯彻，在 1952 年断然向文化部提出辞去副馆长的要求。他的辞呈立即获准，于是在北大专职任教，仍任系主任。

王重民一生从事文史方面许多学科的研究，著述颇丰，共有专着、论文 160 余部(篇)。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四方面：

1、研究和传授目录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中文系主讲《普通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版本学》、《中国古典目录学》等课程。着有《普通目录学》(1957 年)、《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 年)、《〈校雠通义〉通解》(1987 年)等。他多年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的成果大部分收在《论丛》一书中。

2、编着和主编大批目录索引。他编着的《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 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 年)、《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 年)、《国学论文索引》初编(1929 年)等和他主编的《国学论文索引》续编、三编(1931～1934 年)，以及《文学论文索引》初编、续编(1930～1933 年)等，都是研究文史的主要参考工具书。

3、搜集、研究和介绍流散于国外的中国珍贵文献。他把 1934～1945 年在国外搜集到的大量中国珍贵文献加以整理，并对敦煌文献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着有《敦煌古籍叙录》(1958 年)、《敦煌遗书论文集》(1984 年)等，编有《敦煌曲子词集》(1950 年)、《敦煌变文集》(1957 年)、《太平天国官书》(1936 年)等。在他所著的《图书与图书馆论丛》(1949 年)一书中，也收有国外访书记多篇。

4、校辑整理文化遗产。经他收集、校勘、整理出版的有《徐光启集》(1962 年)、《孙渊如外集》(1932 年)、《越缦堂文集》(1930 年)等。此外，他本人还着有《徐光启传》(1981 年)、《李越缦先生著述考》(1932 年)等。

1957 年，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工作的领导提出一些应该改进的意见，后来又在中共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图书馆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评、改进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同时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并撤消系主任职务。

“文革”开始，王重民自然被关进“牛棚”。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曾记述了他被迫害的具体事例。

1974 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因其古籍目录、版本学方面的知识而突然大获‘上面’的青睐。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1974 年 6 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即李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所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学的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文革典型”中的“两校”，“两校”领导人则是“通天”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其夫人刘修业女士后来回忆说：“两校”领导指着王重民，大发雷霆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 年 4 月 15 日下午 2 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重民‘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重民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他的冠心病复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重民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缢于颐和园长廊上。”他还留下一封遗书：“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临走前，他还在书桌上留下自己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其妻子事后解释：“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的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

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竟然默默忍受。而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

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伟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和真理的亵渎。

在王重民看来，学术上的是非问题，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更值得去捍卫。举目当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有几个像王重民这样的‘傻帽’？王重民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因此更值得我们尊敬。

5、刘绶松：武汉大学教授夫妻双双自缢

刘绶松（1912～1969 年）原名寿嵩，笔名刘濑流、宋漱流。原籍湖北省洪湖市（由湖北省荆州市代管）。中国新文学史专家。1935 年入清华大学，1938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此后任教于重庆南开中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1949 年后，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教授。1952 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1955 年出版《文艺散论》(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曾于武汉大学讲授毛泽东诗词，深受学生欢迎。1956 年加入中共及中国作家协会，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被选定为高等院校教材。1958 年出版论文集《京郊集》。1961 年赴北京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委、副主编。次年当选为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武汉市文联常委、文学部部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受高教部的委托而出版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在绪论里，他阐发了研究现代文学的三大任务：第一、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第二、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不过，在当时政治文化的主导下，他强调说：“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在这样的文学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显然必须进行‘低调处理’。

到了 1958 年，留给这位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任务只能是“检讨”。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写道：

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它原因解释的。

即使如此自我贬低的检讨，但也无法逃脱“文化大革命”这一鬼门关。1968 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夫妇都被“隔离审查”。审查的理由仅仅是：其妻张继芳是该校职员。因为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及参加过“三青团”，于是被指控为“特务”。刘绶松元人则被指控为“交代问题不老实”。当时有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领导“运动”的“军工宣队”威胁说，要把刘绶松当作“坏典型”，予以“从严处理”。

在无法摆脱的阴影下，他和妻子张继芳二人忍着强烈的悲痛走上了黄泉路：1969 年 3 月 16 日，他们回到家中，在楼上堆杂物的小阁楼中竖起一张单人木床，然后一边一个，在木床栏杆和床腿上，双双自缢身亡。他们的骨灰不准留下。留下的二个孩子（分别上中学和小学）

只好由其母亲、孩子的祖母抚养。但武汉大学强行收回宿舍，刘母只好随孩子们“下放”农村。

刘绶松，这位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的命运，竟然如此悲惨。

【编者按：刘绶松教授的研究专业是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文学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女词人李清照无疑是异彩闪烁、最为耀眼的一颗。刘绶松应该不会忘记她那首著名的《声声慢》。该词开头就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如果用这 14 个字来概括和总结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一开始是‘寻寻觅觅’，寻找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经过反复寻觅，终于寻觅到中国共产党。可是，事后却发现大失所望。当年那些豪言壮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天堂变成了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当年那些花言巧语所许诺的民主、自由、共和国等等变成了无法充饥的画饼；当年那些甜言蜜语所承诺的‘民为主、官为仆’，现实却变成了‘主仆关系大颠倒’。上个世纪 90 年代曾经流行的顺口溜说：‘一等人是公仆，老婆孩子齐享福；……十等人主人翁，继续革命学雷峰’。这段顺口溜就是‘主仆关系大颠倒’非常形象的、通俗的注解。

原来的理想破灭了，只好心灰意冷，过着清贫的日子。但这种‘冷冷清清’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最后是无情的打击、摧毁，导致’凄凄惨惨戚戚’的结局。本书用近百位精英被毁灭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结局。

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女词人的英明和远见，她在 800 多年前就为我们‘量身定做’地预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命运。她太有先见之明了，真不愧为词人翘楚、女中豪杰。】

刘绶松平反以后的 197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82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绶松文学论集》。

这两部书是刘绶松教授的永恒的纪念碑。任何权威也批不倒、砸不烂、毁不灭！

“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引自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

6、张若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投水自尽

张若名（1902—1958 年），出生于河北清苑县。其祖父是清苑县的首富，父亲是晚清的小官。1919 年，17 岁的张若名同本校的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以及南开中学的周翔宇（周恩来）、马骏等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当“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即将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群情鼎沸。5 月 5 日，天津第一女师的学生郭隆真在该校大会上宣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张若名头一个响应号召，争先报名。很快，“女师”联合“中西”、“贞淑”等女校，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会上选举张若名、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为评议委员。后张若名又被选为评议部长。6 月 27 日，她在北京新华门前与各省代表一起请愿，在烈日下不吃不喝，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为的就是迫使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10 月 7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曾以《两周间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为题，报道了张若名主持评议部开会的情况。那时张若名常化装成一个农村姑娘，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她两次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会”签字请愿活动，并加入觉悟社，她的代号为 36，在《觉悟》创刊号上，张若名以代号“衫六”署名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文章呼吁：“女子解放要从女子自身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她提出的破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观念，铲除男女心理上的隔阂，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等女权主张，代表了中国知识女性的共同声音，也反映了广大知识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觉悟”水平。10 月中旬，为了更好地统一行动，觉悟社还组成了一个执行机构叫“执行部”，张若名任执行部部长。12 月 10 日在天津北马路总商会大院召开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张若名担任大会主席，她在开幕辞中说：“奋斗的精神是人生观不可缺少的精神”，应当“与黑暗势力相斗”；“奋斗的精神，进化的精神，男女平等及互助的精神，这是今天的新学生会开会最要紧的几项”。后来张若名被选为“新学联评议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 11 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造成“福州惨案”。为抗议这一暴行，天津爱国学生于 12 月 28 日在南开学校前广场举行了万人群众大会，反动当局进行镇压。直至次年 1 月 23 日至 25 日学生相继被打，“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被查封。26 日至 28 日，“觉悟社”秘密到法租界绿牌电车道上的维斯礼堂连续开了 3 天的紧急会议。决定 1 月 29 日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向省公署请愿。

1920 年 1 月 29 日下午，数千名学生云集于省公署门前，强烈要求恢复被查封的“各联”、“学联”，释放被捕的代表。人们怒吼着，金钢桥畔人山人海。请愿队伍与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峙着。忽然，从人群中走出 4 位学生代表，他们是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与于方舟，4 人昂首挺胸，登上省公署台阶，从大门下面钻了进去，但立刻被隐藏的警察逮捕。此时，省长曹锐和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下令军警用刺刀、木棒驱赶、殴打爱国学生。顿时刀棒乱舞，血肉横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一二九”（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惨案。

2 月 6 日，周、于、郭、张 4 人被送到警察厅关押。

张若名和郭隆真在狱中饱受折磨，不断患病，但她们的斗志从未减弱。她们互相照顾，彼此鼓励，成为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难友，并为以后的革命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个月后，张若名之父张绍文来到拘留所，向女儿“劝降”，想单独取保释放。但张若名义正言辞地说：“学生抵制日货游行请愿是应该的，是爱国的，是合法的，是正义的！”其父听罢大为光火，当即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你们把她枪毙算了！”

7 月 17 日，经几个月的预审、公审，经北京名律师刘崇佑义务出庭辩护，周、郭、张、于 4 人被指控为“骚扰”罪，交罚金后便被释放。这天清晨，三马路的法院附近，早就站满了各界爱国人士来迎接周恩来四人等出狱。当看到他们走出后，大家欣喜若狂，立即为被捕的所有代表胸前佩戴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然后大家来到天津市总商会召开庆祝反帝爱国斗争胜利大会。会后并合影留念，人们把郭隆真和张若名拥到第一排中间。照相后，国货售品所和公教耶稣教慰问会赠送每人玻璃一面；爱国绅士冯俊甫送每人一把折扇，扇面上亲笔提写“志士同心光历史……瀛海澄清捕鳄鱼”等诗句。最后由商务会长卞月庭、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在会宾楼饭庄请全体代表吃“压惊饭”。

8 月 16 日，觉悟社部分社员到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还有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等进步组织的代表。会上李大钊论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向，周恩来介绍了觉悟社提出的联合进步团体共谋改造中国的主张，觉悟社的郭隆真、张若名、邓颖超和刘清扬等了都作了发言。

1920 年 11 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轮船离沪赴法。1922 年张若名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开始与周恩来相恋；由于张若名法语口语流畅，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她在少共组织内担负与法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任务。

但是不久她便离开了巴黎前往里昂，并与周恩来分手。

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

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但少共主要负责人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发言，结果张若名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跟踪盯梢。加之因自己的出身问题，又在党内受到审查。

由于她父母对其投身革命极其反感，曾多次劝说，要她放弃那些“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念书。她非但没有接受，反而“闹”得更凶，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的情况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竟然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反复思考后，做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攻学问。

1927 年，张若名考取里昂大学，并准备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1930 年，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获得奖金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在欧、亚、美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从未谋面的纪德在致张若名的信中说：“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张若名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盛赞：张若名是纪德的‘伯乐’。从此，纪德的声誉日隆；他于 194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1930 年 5 月 31 日，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婚。1931 年元旦刚过，张若名、杨堃戴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

1937 年至 1945 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效力，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回校讲授“法国文学史”、“法国戏剧”等课程，并继续研究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发表了《纪德的介绍》(载《新思潮》，1946)、《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载《新思潮》，1946)、《漫谈小说创作》（《文艺先锋》，1948)，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 年春，张、杨夫妇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举家南迁，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文系讲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讲授法语。

1955 年 4 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外长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径昆明作短暂逗留时，看望了张若名、杨堃夫妇，周总理代邓颖超向张若名问好，并互致问候和鼓励，五个小时的亲切会面与交谈，使她受到极大鼓舞——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张若名决心在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并发表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云南大学学报》1956)、《试论文学中型典性的创作过程》(云南大学《人文科学》，1957)两篇学术论文。

1957 年，“反右”运动中，她因早年退党“问题”而遭受迫害。（据周恩来后来对她的解释，当年她所退出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少共’即相当于‘青年团’之类的组织。但这种解释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

【编者按：周恩来的解释只是澄清一个事实——她不是退出共产党，仅是退出‘青年团’之类的外围组织。但他没有也不敢触及价值判断，即是非问题。难道退出共产党就成为一大错误吗？否！按照现代政党理论：政党是志同道合、具有相同思想、观点的人们自愿结合的组织。第一、参加必须自愿（不可强迫），第二、退出可以自由（不可限制）。如果参加后想要退党竟然受到制约，甚至成为被迫害的借口，那说明这个组织决不是现代政党，很可能是旧社会的会道门，或者是现代的黑社会。难道共产党也是这类组织吗？】

1958 年，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就思想改造问题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压力，难以释怀。

1958 年 6 月 18 日，中文系召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羞辱，她饱含着泪水，拒绝承认所有的“罪名”，愤而离开会场，独自走到昆明郊外的龙盘江投河自尽。她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同时也是对当时那种不断整人运动无声的抗议。当周恩来了解到张若名的屈死时，异常愤怒。在周恩来、邓颖超的过问下，中共云大党委才承认对张若名的批判是错误的，并向家属赔礼道歉。这是反右运动中唯一的例外。原因仅仅是因为周恩来位高权重，说话有分量。至于其它几十万被划为右派的人，还要等到几十年以后，甚至生命终结后，才盼来迟到的“改正”二字。

张若名被历史尘封了近半个多世纪，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 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张若名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还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的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1921 年，19 岁的张若名在法国被《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她寄回国内发表的文章不下 20 多篇，如《德意志赔偿问题与美国》、《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英吉利之诡秘的外交策略》、《英国煤矿罢工别记》、《土希战争与德国形势》等。1922 年到 1924 年，她又以“一锋”笔名发表了《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浅说》、《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和《两个“旅居”法国朋友的信》（后两篇被编入《天津女星报》一书）

一代女杰，香消玉殒 50 多年后，才被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这是幸，还是不幸？

【补白】

“尽管多党竞争下，政党宣传带有广告欺骗性质……但是没有多党竞争，欺骗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则少得多。”一个国家政治自由越多，其代议机构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众越便于查明真相、揭穿骗局。

——列宁

7、吴兴华：被‘红卫兵’强灌污水 中毒身亡的北大教授

吴兴华（1921-1966 年）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塘沽；笔名兴华、钦江，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主任；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被公认为“学贯中西，博通文史”的奇才，通晓多国语言及文字。

1937 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 岁时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他的诗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在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作为翻译家，他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进中国的人，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

作为学者，他写下大量诗歌理论，并翻译了大量文艺理论，可惜由于岁月的湮没，他的大部分文稿散佚不知去向。

吴兴华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留日的医生。吴兴华从小功课就特别好，很多文章能过目成诵。这种超常的记忆本领使老师大为惊奇。1937 年，兴华考取了燕京大学。他入学考试的作文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惊叹：一个 16 岁的孩子能

够写出如此水平的作文，大可造就！

在学校期间，他写了很多诗。兴华自己说：当时有激情，也有灵感，加上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觉竟然写下了那么多的诗。他的诗后来经过同学宋淇的介绍，辗转到了一些国外的专家那里，获得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包括叶维廉、贺麦晓等人，这些专家认为兴华的诗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还在吴兴华当学生的时候，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就已出版，吴兴华敢于提了一些意见，而且竟然都被钱先生接受。兴华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锺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兴华去世之后，钱先生对兴华全家一直很照顾。当时吴兴华的大女儿才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钱先生就让她帮着抄一些东西，变相给他家一些帮助。兴华在学校里修的是英国文学，他并不满足，又加修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结果一学期下来，四门语言的第一名都是兴华。

吴兴华诗歌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大致是 1941 年前后，当时中国诗歌主流一是解放区如贺敬之类似民谣的创作，一是以穆旦等九叶诗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风格。吴兴华却和两者都不相同，他虽然精通西文，却有意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养分，最后雕琢出一种既具古典之美，又有现代诗歌自由风格的新古典诗歌。可以断言，这样的写作要求诗人在穿透语言的能力之外，同时具有极深的中西古典文化修养，这也就注定了这种写作方式不可能复制，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流派。吴兴华在这条诗歌道路上只能独自前进。如果不能登顶，就只有湮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吴兴华虽然诗名不显，但他的诗却推动了当代华语诗歌的进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诗人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吴兴华的好友宋淇在港台地区以梁文星的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大量诗歌和诗论，这些作品甚至影响了当代大批文人。

吴兴华是诗人，更是学者，同时还是著名的翻译家。但和他的诗歌一样，他的译作和论文同样只在小圈子流传，很久没有再版。虽然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普通读者却很难见到。在 10 多年前《尤利西斯》同时出版过两个译本，但译者都没有提到中国第一个译介这部作品的正是吴兴华。同时吴兴华还发表了对乔伊斯更晦涩的著作《芬尼根守灵夜》的研究文章，这部作品到现在也还没有翻译出来。

最近 10 年关于吴兴华的研究开始升温，有学者认为吴兴华的修养可以与钱钟书相匹敌。这样的说法读者当然无从比较和判断，只能从留存的《吴兴华诗文集》中一窥天才诗人的创作生涯罢了。如今的读者，知道吴兴华的已经不多了。他的诗论、译着和文学批评文章早已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这时，当我们看到《吴兴华诗文集》引用诗人当年在燕京大学的老师谢迪克先生对诗人的评价，不免感到唏嘘：“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布鲁姆如今已大名鼎鼎，是西方主流文学的批评大家，而吴兴华却只留存在少数人的记忆中。

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年龄最长的院士夏志清教授有言：20 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钟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

京城有名的文物专家王世襄也曾经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钟书式的人物。”而曾经教过吴兴华的英籍导师谢迪克则这样追忆他的学生:他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

他学贯中西，博通文史，一手写出《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一手又能写出《读通鉴札记》和《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因而被海外学者誉为现代中国真正学贯中西的少数几位学人之一。

北京大学是‘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源地。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下令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当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接着，“工作组”进驻北大，支持聂元梓执掌校政。从此，全国学校相继停课，

以北大为样板轰轰烈烈地开展‘文革’。

10 天后也就是 6 月 11 日，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钱在学生和工作组长时间“斗争”后，在家中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临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以头撞墙。其邻居和同事都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嚎叫声。

继汪钱之后就是吴兴华。西语系的红卫兵到吴兴华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点火烧掉。手稿中，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译稿，有他接近完成的一部关于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小说，还有他翻译的一本希腊文艺理论，是本来计划要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之一。像吴兴华这样的懂希腊文的学者很少，该书是出版社指定要他翻译的。这些稿子统统被付之一炬。

早在 1957 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吴兴华被错划为“右派份子”，1962 年“摘帽”；‘文革’中又被划入“劳改队”并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殴打和抄家。1966 年 8 月 3 日，吴兴华和西语系的其它老师们被勒令“劳改”——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在劳动中由于体力不支，被红卫兵们强行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直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校医院医生又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次日凌晨，这位学贯中西、壮志未酬的文学天才离开了人世，年仅 45 岁。

关于吴兴华的死因，医生说是死于急性痢疾。而红卫兵却说是自杀、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因此下令解剖尸体。吴的妻子谢微一女士多次请求不要解剖尸体，但是无效。他们不顾家属的反对，强行命令医生解剖尸体。

在吴兴华死后 20 天，另一位英语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殴打、侮辱后，服毒自杀。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大学西语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程远和徐月如，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发表的一批关于文革死难者的纪念文章中，几乎千篇一律地只写死难者生前如何优秀，如何贡献等等。这些文章对于给死者“平反”无疑是有意义的，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人被整死的具体过程和情节大都语焉不详。这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不准提他们死亡的经过。其真实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文革’的罪恶历史以避免深究当时领导者的责任和追究‘文革’产生的根源。俗语云：“恶恐人知，必是大恶”，诚哉斯言！

【补白】

“你可以暂时欺骗多数人，也可以永久欺骗少数人，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

——美国第 16 任总统林肯

第 6 单元　史学泰斗

1、陈寅恪：‘三百年来唯一人’　被折磨致死

陈寅恪（1890—1969 年）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陈三立；其祖父曾任湖南巡抚、是支持变法的开明派领袖人物陈宝箴。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1905 年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 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被迫回国。1918 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 年，

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积蓄了广博的知识。能够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因此，陈寅恪的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可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 年陈寅恪回国。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特地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时人称‘清华国学四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陈，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1926 年 6 月，只有 36 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在 1929 年为王国维而作的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脱口而出。其引文出处，无不准确。进一步的阐发更是精当、深刻，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 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干嘉学派治史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疑难问题，求得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大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独到见解的史学家。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愤而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 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亦随之。

1942 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断然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陈寅恪深感痛心，却又无能为力，只好独善其身。恰逢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力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不幸的是，经英国医生诊治，几近失明。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 1949 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后又迁至广州，是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恳切邀请他赴台湾、香港等地，被陈拒绝。从此，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后，移教于中山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陈寅恪

坚决辞谢，并举荐陈垣代之。1956 年以来，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共权要先后看望。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 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 年，其右腿又骨折。陶铸派多名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继而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而作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着《柳如是传》，最后撰写《寒柳堂记梦》。特别是在失明、腿折之后，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多部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其令人佩服和敬仰。其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他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其旧体诗词亦是卓然大家。傅斯年对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即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 年官方决定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于 12 月 1 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纸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接受我的意见。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方公之于世，陈师之风骨如此，昭昭可鉴。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扬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文革'骤起，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手稿，多被洗劫。加之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之死，"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沉入湖底……,众多友好人士先后告别人世。而自己则躺在南方的病床上辗转呻吟，虽奄奄一息，仍然难逃一劫。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名。随着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陶铸命令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复盖。面对此情，陈的老伴唐贺无限感慨地叹息曰："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造反派更是变本加厉，索性进行抄家。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贺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经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丧失殆尽。"革命者"还别开生面，把几只大号的高音喇叭吊到陈宅的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的怒吼批判。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嚎叫不止，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更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顿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又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极度衰弱，已不能进食，只能进汤水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看到他僵卧病榻，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流泪而已，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命如悬丝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陈师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写道：“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这位‘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死得何其惨烈！他的死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尚未有终期，中国人民仍将承受无尽的灾祸、无穷的苦难。

2、吴晗：因紧跟而荣、因紧跟而亡

吴晗（1909～1969年）浙江省义乌人，著名历史学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一年后之江停办，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吴晗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衣被，迈进了上海中国公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在该校读书。后来其父因病卧床不起，经济条件日益恶化，不得不依靠亲友接济，再加上他的勤奋做学问，写稿卖钱来维持学业。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的长文，深为时任校长的胡适所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发表，因此收到80元稿费。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开支，每月只需要4~5元就可以维持。这80元稿费，实在很可观。他便用来做旅费，只身北上，投奔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平。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打算直接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但是，燕京大学非常重视英语水平，而吴晗在中国公学的英语成绩仅为丙等；更为难办的是：经过考试，他的数学成绩为零。因此，燕京大学拒绝了他的转学请求。在上学无望的情况下，80元旅费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经过上海中国公学教授的介绍，他找到了燕京大学中国史教授顾颉刚。在顾老师的推荐下，在该校图书馆谋到了一份工作。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充分利用了该校丰富的藏书资料，苦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胡应麟年谱》。在这项成果中，他勇敢地纠正了顾颉刚的一项考证错误，并证实了胡适原来的学术假定。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才促使清华大学在第二年破格录取了这位以文史见长的偏才学生。

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清华大学好是好，可学费从何而来？又是胡适帮了大忙。胡适出于爱才之心，于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请求给以特殊照顾；为了证明这位得意弟子的学力和潜在能力，还随信附上吴晗的研究成果《胡应

麟年谱》。就是凭借着胡适的地位和影响力，再加上信中对吴晗的高度赞扬，翁、张二位立即照办。8 天以后，吴晗就被安排做‘大内档案’的整理工作，月薪为 25 块大洋，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维持日常生活还绰绰有余。这样，吴晗才可以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并在胡适的指导下，走上了专治明史之路，成为中国有名的明史专家。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顾颉刚等许多大学者的慧眼相识、破格照顾，就不会有吴晗日后的一切成就，也就没有这位明史专家辉煌的学术生涯。

在大学期间，吴晗就写下四十多篇学术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的青睐。因此，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在清华大学专门讲授明史。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随后转入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 年 7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需要罗致大批人才。特别是像吴晗这样具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更被新政权视为珍宝。这一年吴晗正好 40 岁，恰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年纪。当他以一个知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步入新政权统治下的北平时，立即受到热情欢迎，并委以重任——北平市的副市长。早在解放战争末期，吴晗就以中共军代表的身份派人与其恩师胡适接触并希望恩师能留下来迎接解放，留在大陆。而胡适的态度很坚决，并且他也希望吴晗能够坚定立场，不要左右摇摆不定。胡适表示自己所向往的是“面包与自由皆有”的国度。吴晗数次劝说不成，随着解放军驻进北平，吴晗接管了北大与清华，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除了行政职务之外，吴晗还热心从事各项文化事业，如主持出版明清之际杰出的历史学家谈迁的名著《国榷》、标点《资治通鉴》等等。他满以为：在新中国可以大展宏图、大显身手。但是，出乎他的预料，有一个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他。

1954 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李希凡、蓝翎）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评文章开始，又进一步开展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因为胡适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向来拥有“百科全书式学者”之誉。所以这次对他的批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而是要从文、史、哲、社会、政治等全方位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全面围剿。为了组织这次围剿，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如胡绳、艾思奇、任继愈、罗尔纲、周汝昌、李达、向达、侯外庐、范文澜、何其芳……等等，当然也需要吴晗这样的人才来参加。但是，吴晗和他们都不同，因为他是受过胡适大恩的人，也可以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

这时，摆在吴晗面前有两种选择：

或者紧跟形势——也就是紧跟领袖的意图，参加到大批判的行列里来。如果这样做，他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享不尽荣华富贵。同时，大批判的组织者也可以收获到特别的宣传效果：瞧！连胡适曾经施恩的吴晗都反戈一击了，可见其不得人心云云。

或者是牢记师恩，牢记“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德信条。这个道德信条乃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有价值、最广泛认同的道德底线。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忘恩负义”四个字向来是最为人不齿的品格。如果他做如此选择，起码可以这样：拒绝参加大批判，用沉默来表示对恩师的怀念和报答。但是，其后果却是不言而喻，肯定要被领袖视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失去一切，包括显赫的名声、重要的职位、丰厚的收入……

以吴晗的为人、治学，应该说都是一流的水平。他的勤奋、刻苦，都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学术造诣，更为举世公认。但是，在这一严峻的考验面前，他却选择了前者。他做出如此选择，在当时可能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原因，有他的难言之隐，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据最

近所出版的《禅机：1957 年》一书的作者胡平所记载，吴晗“曾在朋友中多次流露，胡适的仁爱之心，如同他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都是难以抹杀的”（见该书第 223 页）。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是一种背叛。他所背叛的，不仅仅是早年的恩师，还有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中国人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最珍贵的核心价值观。

吴晗的选择的确收到了丰厚的回报：1957 年春天，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的日子里，也曾风光了好几年。有人研究称：吴晗是学者从政而地位仅次于郭沫若者。

1959 年 4 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当然要闻风而动、星夜劳作，立即跟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毛泽东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风头最旺、知名度最高的文化人。

可惜好景不长，风云突变。伟人毕竟是伟人，不甘平庸，总要不断推出新的剧目，拿到政治舞台来上演，再热闹一番、风光一番。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而拿来为“文化大革命”祭旗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风光没几年的吴晗。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突然对多年来受到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并进一步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文章最后断言：《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1966 年 4 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从此，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被拉开了。

1968 年 3 月吴晗被捕入狱，1969 年 10 月 11 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早就于 1969 年 3 月 18 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 1976 年 9 月 23 日在狱中自杀身亡,真是家破人亡。惨矣，悲夫！

我们看到：50 年代的吴晗，由于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因而尝到了甜头。可是到了 60 年代，还是这个吴晗，还是因为紧跟形势、紧跟领袖意图，却大吃苦头。其中的玄机和奥妙，真是深不可测、妙不可言！

【我们从吴晗一生的为人和治学当中，看到的是一个大悲剧，一个大知识分子如何被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惨剧。

如果我们以历史眼光来回顾和观察一下现实，就不难发现：被 20 多年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人，何只一个吴晗？】

3、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夫妇服毒自杀

翦伯赞（1898－1968 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1916 年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不久转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于 1919 年毕业。1924 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却改而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1937 年 5 月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期间，他撰写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对内独裁、对外实行亲日的卖国政策。中共建政

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2年至1968年）并兼历史系主任。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历史学界历史主义派的主帅，研究了古代的许多历史事件，著作等身。但其所持的历史观点与毛泽东的历史观点相左。这可以说是远因，也是宿怨。近因则是：1965年底，他对到访的《文汇报》记者公开批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认为姚文纯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并指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这些话当然和伟人的“战略部署”相冲突。因此，从60年代后期即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初，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毛泽东曾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出“最高指示”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可能还有某种用途，所以要批，也要保，要给出路”。

历史的发展也真是变幻莫测，即使是专门研究历史学的权威如翦伯赞者，也未必能够看透、看清楚。就在毛泽东那个“最高指示”发表两个月后，他所要‘保’的翦伯赞却突然自杀了。人们自然应该问一问：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把毛泽东指名要‘保’的翦伯赞逼到非死不可的绝境？说起来还真是诡谲（音 guijue）。

江青为了彻底搞倒刘少奇，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派人专门找到曾经和刘少奇有过工作联系的翦伯赞，要他交代与刘少奇的关系，并揭发刘的叛徒罪证。此人名字叫巫中。

巫中本来是“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又和军方有过密切来往。他可以绕过所有看管人员，直接接触翦伯赞本人。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有紧急情况要调查翦伯赞”。历史系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就批准巫中和翦伯赞接触。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一直没有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那年翦伯赞已是70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翦伯赞站着，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20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巫中立定身子，即喝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 3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3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

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但对方的态度却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连续几天里，翦伯赞与夫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在这几天时间里，他夫妇俩的心态如何，他们所思所想，都没有人知道。但可以从当时北大的政治氛围看出一点眉目来：历史进入1968年，“文化大革命”需要深入、再深入，深入干什么？深挖走资派！而头号走资派就是刘少奇。在是政治斗争的大方向，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干扰。

小环境则是：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不断地重复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

的批判实际上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是“脱胎换骨”的肉体‘批判’。每当夜幕降临，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严刑逼供。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 40 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下去，被打者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女教员倒在地上仍然不叫喊，并且两只血眼直直地看着打手，打手被这双眼睛吓了一跳，于是抓起她的衣服包住她的头再打。

现在可以断言：在翦伯赞头顶上日夜悬着的那根利剑说不定那天就要劈下来，那将是无情的、残酷的、无限痛苦的……。在面临死亡考验时，他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决不允许说假话、诬陷别人；那就只有走别人所不愿走而又不得不走的那条路了。经过几个日日夜夜的痛苦思索和反复权衡，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十分无奈、十分痛苦的决定。

次日，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由于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次的用量，但没有监督翦伯赞当场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瞧！他以一个学者的慎密，竟然筹划了十多天……够了，十多天安眠药的剂量足够夫妇两个人走上黄泉路。

1968 年 12 月 19 日晚上，他们夫妇俩穿上自己认为最好的衣服，安安静静地、坦然地安卧下，而且是永远地卧下了。

第二天，毛泽东得知翦伯赞的死讯后，龙颜大惊。震怒之下，把公安部长谢富治叫来臭骂了一顿。他为什么要震怒呢？难道是为痛惜一位学者的死亡吗？人们如果这样猜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位一世枭雄，向来不在乎几个、几百、甚至几万、几百万人命的殒灭。他甚至说过：即使中国人死了一半，还剩 3 个亿，仍然可以搞革命嘛！如此嗜血狂徒会在乎某个人生命的消失吗？不会的，绝对不会！那么他的震怒所为何来？前面说得非常清楚、非常到位：要保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还会“有用”!“可能有某种用途”。什么用途？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没有，也不会明说。但人们可以心领神会：翦伯赞的唯一用途已不再是研究历史学了，而是从他的口中挖出有用的材料，作为炮弹，用来轰击政敌。

毛泽东这个十足的功利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道主义，一切都是为了‘实用’。当这件有用之物被部下损毁了，失去了一个“活口”，能不震怒吗？

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许多人自杀时都有这个动作：或高喊，或书写“毛主席万岁”。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发自内心的、衷心祝愿吗？显然不是、决不可能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封建专制统治下，皇帝处死大臣或任何人，都必须三呼万岁，还要“叩谢圣恩”。怕的是连累亲属、子女，以免追究无辜。那么，没有子女或亲属的，也如此这般，又为什么？恐怕是一种习惯、一种传统。至于当事者出于何种心态，许多学者曾经做过多种研究，但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只好期待未来的学问家了。

【补白】

“不可无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父，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

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

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土豆却没有了。”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4、向达：博古通今著作等身在‘文革’中惨死

向达（1900－1966 年）字觉明，湖南省溆浦人，土家族。1919 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 年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北京大学讲师；1930 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完成力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该文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盛唐时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在这篇被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誉为“论述唐代长安西方人的卓越论文”里，通过长安这个当年的国际大都会，展示了东西文化交相辉映和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该文于 1933 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轰动一时，从此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为中外学界所瞩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1935 年向达因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素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于是远赴欧洲，到牛津大学鲍德利（Bodley）图书馆工作；在英国博物馆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获得丰富的中外交通史、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1937 年赴德国考察从中国劫掠而去的壁画写卷。1938 年秋，向达携带数百万字的资料回国。回国后，先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1941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所属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与其事。他于 1942 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返重庆后，针对某些名流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这一建议对促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起了重要作用。

1943 年 7 月～1944 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后来陆续发表。1947 年，他与王重民教授等学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在中文系）、博物馆学专修科（附设在史学系）。现在这两个专修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与文博学院。

中共政权建立后，向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等职。在其主持下，不断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他个人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蛮书校注》。

向达是一个近乎纯粹的学者，他用童真般的激情，践行着一个学者的良知，追逐着学术梦想。这种理想与性格显然与当局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向达还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甚至公开倡言：“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坏。”如此天真，焉有不碰壁之理？

1957 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 5 个方面的学术争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么说得清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而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一级教授翦伯赞起而怒斥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攻击性言论”，具体说来就是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又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等等。

【编者按：耐人寻味是：这位党员、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仅仅过了 9 年，自己也扮演

了被批判的角色，而且被整死了。走笔至此，令人想起夏衍的打油诗，有这样两句：“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妙哉此句！】

他出言无忌的后果可想而知：而最严重、也是最具有杀伤力的说法是诬蔑他‘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于是，新账、旧账一齐算，向达被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中的第二号“大右派”。从此，这位热心公益事业和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者，不得不销声匿迹，“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研究学问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一幕：“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 1966 年 6 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已是 66 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此时的向达，尽管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盘，获得新生”。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1966 年 11 月 24 日，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代历史学巨匠向达先生含冤离世。

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是有‘前科’，因此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一代学界宗师，竟然是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告别了多舛的人生！

向达先生为人忠厚、性格刚烈，平日好直言，放言无忌。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颠倒的年代，必然为当局所不容。同时他又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学者，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成果颇丰：计有学术译、着共计 30 种，学术文章百余篇。这是他给后人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补白】

“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但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

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

5、丁则良：自沉于未名湖的北大教授

翻开大陆出版的任何一部辞书、词典，根本就看不到‘丁则良’这个名字。如果去问一问大学历史系在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茫然，无可奉告。一个桀骜不驯的灵魂，就这样淹没在历史的烟云里，默默无闻，销声匿迹。可悲亦复可叹！

如果要问杨振宁是谁，那恐怕妇孺皆知、如雷贯耳。因为他是誉满天下、名震中外的大科学家、1957 年诺贝尔奖的得主。但如果要说：丁则良曾经是杨振宁的老师，那恐怕更没有人相信。因为杨博士是物理学大师；而丁则良是历史学的教授，两者隔行如隔山，何来师生关系？

但这却是事实，有书为证：

根据《杨振宁教授谈教育》一书中杨博士自己的回忆：其父杨武之先生是颇有成就的数学家，他非常注意对子女教育的科学性、全面性，尤其重视‘平衡儿子的知识结构’，所以

“他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数学，也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的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个时候雷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说，你可不可以找一个学生，来教振宁《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他一位得意学生，叫丁则良。丁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杨先生还回忆说：那一个暑假的家教使自己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后来杨博士功成名就、载誉归来之时，在当局刻意安排的鲜花和掌声包围中，未必还能记得起这位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被政治运动无情扼杀了的老师吧!不过，即使记得起来又如何？聪明绝顶的杨博士总不至于甘冒得罪当局的风险，哪壶不开提哪壶，令当局感到尴尬、无奈，如此不识时务、自讨没趣吧？

丁则良（1915—1957 年），祖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出生于北京。1933 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 年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任联大师院史地系助教，不久，改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1947 年以中英庚款留学生身份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

1950 年，丁则良放弃赴美深造的机会回国，本来是希望以自己的专业成就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同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 年院系调整，响应号召远赴东北高寒地区，在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

1957 年 5 月，丁则良出席在苏联境内塔什干召开的东方学国际会议，8 月回国，暂时住在北京大学。当他听说自己被划为“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三人右派反党集团”时如五雷轰顶。随后又接到电话，校方严厉地要求他立刻返校接受批判。一介书生，对于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猝不及防，毫无思想准备。但“士可杀而不可辱”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信条，在无理可讲的形势下，毅然决然地纵身一跳，跃入北大未名湖，时在 8 月 8 日，年仅 42 岁。消息传来，全校震惊、愕然，暗中浩叹不已，全校师生深感惋惜。

丁教授的主要著作被收入《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还有译着《朝鲜近代史》、《东方各国近代史》等。

丁则良教授是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早年受业于陈寅恪、张荫麟、雷海宗、姚从吾等，被史学界寄予厚望。他性格豪迈飘逸，对祖国和学术有虔诚的热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有敏锐的洞察力，文笔优美，议论精辟，在宋史、中国近代史、苏联史、印度史等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特别是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筹建工作，为吉林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西南联大时期，丁则良还只是史学新秀，但已初露峥嵘。他和一些老师同学组织了“十一学会”，进行自由演讲和讨论。他与大多数联大知识分子一样，一方面从事专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另方面也关注现实，以自觉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发表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发表了一些思想、政治和文化评论，如《顾亭林》、《缄默的尊严》、《近代化与现代化》、《论现实外交》、《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等。这些评论显示出作者深邃的目光、卓异的见解和炽热的情感，是非常可贵的思想遗产。

尤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是，最具有时代意义的《缄默的尊严》一文。该文可以说是丁则良的代表作。该文就抗战时期沦陷区人们怎样对待入侵者而发的议论。文章认为：在沦陷区，人们对待入侵的敌人，无非是三种态度：反抗、投降和沉默。反抗的人是民族的脊梁和英雄，最为可贵可敬。投降的人是民族的败类，为人不齿。三类人中，沉默的人可能占了极大的比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不合作态度，守住了民族大节的底线。丁则良希望沦陷区“日寇铁蹄之下的人们”，至少要保持缄默，“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些孤芳高洁的气概”。抗战时期的知识界，一大批精英分子逃离敌占区，从事抗战建国的事业；一些人如周作人、钱稻荪等

则亲日附日，为虎作伥，受到正义人士的同声谴责；还有一大批杰出人物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得不留在敌占区，如陈垣、齐白石等，但他们始终与日伪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不与对方发生任何关系，以缄默维护了尊严。这类人怎样自处、国家和社会公众怎样看待他们，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丁则良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应该得到理解、受到尊重和保护的。

丁则良在文章中议论风生。他指出，"到了一个特殊环境之中，站立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眼看着暴力横行、巧取豪夺的现象不断发生，正义消沉，自由饮泣。这时，又没有力量去纠正这些乱像，我们除了保持缄默，还有什么办法？在一个一切都违反人性的世界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缄默反而是一种可取的态度。"这段议论就使文章的思想得到扩展和升华，成为该文的最核心的内容。

在 1949 年以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告密和倾轧层出不穷，就因为很多人没有保持缄默——没有守住底线，因而所有人最后都失去了尊严。丁则良毕生都以'忠于党、忠于国家'自许，如今却被划为右派分子（实际上也就是反革命）。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无反顾地跳入未名湖，既是一种刚烈的行为，也践行了他的思想——以缄默捍卫尊严。"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些孤芳高洁的气概"。据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书中回忆，其父伯钧先生在世时曾经说过：死是一种摧折，也是一种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是的，人们从其死亡中，看到了丁则良那"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志和存在。这种意志正是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财富，是任何权势、淫威都永远压不弯、砸不断、摧不跨的脊梁骨。

伟哉，丁则良！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
是敢于说'不'的人。
——当代著名作家沙叶新

6、李季谷：著名的清史专家文革中惨死

李季谷(1895——1968 年)，原名宗武，著名历史学家，清末会稽县(今绍兴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17 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成绩优异，得到时任校长的上虞籍教育家经亨颐的赏识和器重。1920 年，与瞿秋白等赴苏联考察。次年又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习外国史。1924 年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讲师。一年后转任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并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7 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翌年，赴英国留学，初入布列斯多大学，后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专攻近代史，获硕士学位。1930 年游学西欧诸国。归国后仍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绍兴籍教育家许寿裳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特聘他兼任该校文史系主任。在此期间，李季谷与同校任教的鲁迅关系密切。鲁迅曾在杂文《"寻开心"》一文中提到过他。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只身南行。1938 年，赴兰州西北联合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39 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40 年，与顾颉刚等共同发起创办《史学季刊》。1941 年任成都四川大学教授。1943 年后，任国民政府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筹办鲁苏皖豫边区学院，招收战区失学、失业青年。1946 年，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在台北成立，李季谷为首任院长。1948 年 6 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49 年随国民党政府从杭州撤退到宁波后，趁机滞留下来并转移到上海。中共政权建立后，李季谷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生平著述颇丰，主要有《西洋近百年

史》、《日本通史》、《高中外国史》等。1955 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撤销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职务。

‘文革’中长期遭到“批判斗争”并被关入“牛棚”。1966 年 8 月 4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有 100 多名教师和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游街”后全部跪在该校的“共青操场”接受“批斗”。李季谷是其中之一。后来这些人都进了校园“专政队”中“劳动改造”。据曾经和李季谷一起在校园里“劳改”的一位历史老师回忆：给他们划定了任务，轻的是搞卫生、拔草，重的是挑粪、挑水。有的人还必须挂着写有“罪名”的牌子劳动。任何人都可以打骂侮辱。不但华师大的大学生常来训人骂人，附中和附小的学生，也成群结队地来，往他们身上吐口水，扔石头，有的人还动手打。在“专政队”里的人，有人往你吐口水，只能唾面自干。另外，他们还得“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看到有红卫兵在附近训人或者打人，趁早设法走开。华东师大的旁边是“南海中学”。那里的红卫兵学生每天早上命令该校老师爬到楼顶上，一个一个把头伸到烟囱上被烟熏黑，然后命令老师一起念《毛主席语录》里的一段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行为的一句俗语。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些蠢人。”念完了这段语录，红卫兵命令这些‘分子’们用石头砸自己的脚，砸得鲜血直流。

戴稼祥先生是古文字专家，1957 年就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华东师大历史系在 1957 年有九名教员被划成“右派分子”）。1966 年时，随便怎么被骂、被羞辱，他都不反应：目无表情，也不说话。和他一起被“专政”的同事说：他不懂红卫兵的心理。红卫兵期待有反应，要听到被打被骂的人表现恐惧和屈从，要这些人说“我有罪”“我该死”，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看到戴家祥没有反应，红卫兵大发火，对他大喊“老混蛋”、“老牛鬼”，威胁说要把他丢到河里去。这时他才哀告说：“小将，请别。”红卫兵从中才得到了满足。

教授中国近代史的陈旭麓先生身体不好。有一天下雨，地上有积水。“劳改”的时候他带了个塑料片子放在地上，跪在塑料片子上面拔草。红卫兵发现后，没收了塑料片子，把他训斥了一顿。1967 年，学校里面建立了巨型毛泽东塑像。因为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在 1966 年 9 月 15 日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们把这个有毛泽东塑像的地方命名为“915 广场”。他们命令“牛鬼蛇神”每天早上必须到毛泽东塑像前“早请罪”。（当时一般人则在毛泽东画像或者塑像前每天“早请示”和“晚汇报”，用词不同。）因为怕见人，“牛鬼蛇神”们越来越去得早。早到天刚刚亮，他们就到“915 广场”毛泽东塑像前，低头“认罪”，再念一段毛泽东的语录。那时候，红卫兵还没有起床，不会来骚扰他们。

1968 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设立了“牛棚”三个，按“问题”性质分类。“大牛棚”26 人，除了三个干部，其它全部是教师，他们是“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次等“严重”的，则在“中牛棚”，有 12 人，大多是比较年轻的教员和几个学生。第三个叫“学习班”，有 10 人。这个系 96 名教职员中竟有 40 多人入了“牛棚”。所谓“牛棚”，实际上就是原来的教室。称之为“牛棚”，是因为其中关押的人都不再被当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在“牛棚”里，毒打和侮辱时常发生。有一次，该校原负责人常溪萍被抓到历史系的“牛棚”来毒打一顿，说他是历史系“牛鬼蛇神”的“大黑伞”。打完后，常溪萍出了文史楼就倒在地上，走不了路。该校另一个负责人被抓来打的时候，紧紧抱着自己的头。第二天，他贴了一张条子在墙上。上面写道：“被打是应该的，但是要求别打他的头，让他能去农村劳动改造”。该校数学系主任曹锡华的妻子是历史系的中共总支书记。看到妻子被打时，他说了一句“流氓”，因此曹锡华被抓到历史系来打。红卫兵第一棍就把他的手表打飞了。他则被打得在地上乱滚。打他的拖把木柄都被打断了，他的耳膜也被打破，脸肿得很高。

‘文革’期间，确定了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同时，当时每天每人都必须多次呼喊“毛

主席万岁”。林彪是开创时时、处处呼喊“毛主席万岁”的人物，也因此高升到最高权力圈子中第二的位置。历史系的一名教员，私下却说：林彪说毛主席万岁，那么他还怎么接班？

【编者按：这句话还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看来‘牛鬼蛇神’当中还真有能人啊，能想出这句话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能人。】

这句话被告发，他为此被“斗争”。红卫兵命令每个“牛鬼蛇神”每天必须写一篇“劳改日记”。每人有一个本子，挂在墙上，红卫兵随时来检查。怎么劳动，怎么受“批斗”，都必须写清楚。开始，大家买的练习本都不一样。有一天一个红卫兵下了命令，让他们把本子的封面都用墨涂黑。“牛棚”的墙上挂了一长排黑色封面的“改造日记”。在“牛棚”中，“牛鬼蛇神”们排队到大食堂去吃饭，要先在毛泽东像前“请罪”，完毕以后，才能吃饭。普通人不用“请罪”，但当时也要先挥挥《毛主席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才能吃饭。1968 年 6 月 30 日，也就是共产党生日 7 月 1 日前夕，红卫兵命令“牛棚”里每人写一份“认罪书”，回家贴在家门上。那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在“牛棚”，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那天晚上七点多钟时候，有红卫兵踢开门进来。红卫兵团长说：“你们写的什么认罪书？你们一个个都想变天。现在要对你们实行制裁。”有四个学生用棍棒和电线编成的鞭子，轮流殴打“大牛棚”中的 26 个人。他们打过一个，就命令那人“滚开”，跪到毛泽东画像前面去，再叫下一个过来。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打到深夜才结束。被打的老师，有的脸肿得眼镜都戴不上了，有的衣服都被打成一条一条的，有的被打得走不了路，只得用手扶着墙，才能慢慢地蹭回去。一位被打的教师说：那一天深夜他回到家中，已经两三点钟了，他的妻子没有睡觉，坐着等他。他进门后，仰天大笑说：今天是“满堂红”，全部挨打。“仰天大笑”似乎难以理解。但设身处地一想，这未尝不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吗？

在“牛棚”里，李季谷曾和一位比他年轻 30 岁的教员坐一张桌子。那位教员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红卫兵要他俩每天背诵毛泽东语录，而且规定同桌的两个人互相检查。你背我检查，我背你检查。在李季谷死前的几天中，“专案组”天天来“提审”他。（“提审”就是当时用的词。“提审”他的人是学生红卫兵。他们很为这样的事情感到骄傲与满足，因为这意味着掌握权力，以及使用权力、甚至暴力的机会。）有一天李季谷问他的“同桌”：“我今天思想混乱，头昏，能不能不背？”又说：“我 73 岁了，眼睛有白内障，医生说两三年就失明了。”他的“牛棚同桌”无奈地说：那就尽量多念几遍吧。1968 年 7 月 25 日那天，“专案组”又一次“提审”李季谷。他从早到晚，跪了一天。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用燃烧的香烟头，烫他的头颈和后背。直到深夜，才准许李季谷回家。

可是，李季谷并没有回家，却在校园里丽娃河投河自尽。他死后，他的一把伞和一个水杯还放在“牛棚”的桌子上，但是不见人。如此三四天，“牛棚”中人知道他一定出事了。华东师大校园里的河里面捞出一具尸体，大家都听到了，但是“牛棚”中没有人敢谈，大家都不作声。后来，红卫兵来了。红卫兵进“牛棚”，总是用脚把门踢开，高声吼叫。而这些“牛鬼蛇神”都得站起来，作恭敬样。红卫兵开始训话：“你们都是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李季谷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就是死硬分子的下场。”然后他们宣布要开“批斗会”，“批斗”李季谷。李季谷已经死了，怎么“批斗”呢？红卫兵自然有办法：他们画了一张李季谷的漫画像，上面还打上红色的大叉子。“批斗会”上，命令历史系的两名前负责人、那时的“牛鬼蛇神”手拿着那张漫画像，站在会场前面。历史系其它所有的“牛鬼蛇神”都站在李季谷的漫画像旁边，给死去的李季谷“陪斗”。这种“批斗”死人的场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别的地方，也都发生过。为李季谷的死，“牛棚”中的一位教授说了一声“惨”。被别人听见报告了上去。因此“斗争”他。他不承认。被斥骂和体罚之后，他承认了，但是继续被折磨。因为他们强迫他承认他说的是“惨惨惨”，一连说了三声“惨”，而不只是一声。‘文革’后他说到这件事情，确实仅仅说了一声。当人像李季谷这样被整死的时候，说一声“惨”都要受到这样大的折磨。多少个“惨”字才能描述这种血腥的‘文革’历史呢？历史

系教员谢天佑，当时还很年轻，被指控为“漏网右派分子”。他投河自尽，幸好未死。好几名历史系的教师都在文革时期患癌症死亡，长期生活在恐怖和压抑中，显然是他们患癌症的重要原因。历史系的一位老师说，华东师大在 1957 年把 400 多人划成了“右派分子”。但是‘文革’后“改正”的时候，院方说只有 100 多个。实际上，历史系的教师就有 9 个，中文系也是 9 个，这还不包括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在内。南林越原来是光华大学总务长，随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大。他成了“右派分子”以后，被送到青海酒泉劳改。当他平反回来后，他的华东师大同事去看他。他们看了电影《天云山传奇》，据他说：哪里有电影上那样的好事啊。他去的地方，上海去了 176 人，回来的只剩 3 个。“右派分子”们在那里，在铁道兵的监督下修铁路。那里一片沙漠，每隔十里八里就是一个劳改营。他运气好，没有叫他修铁路，叫他放羊。因此总算活了下来。这位老师还说，华东师大在‘文革’中被害死了 70 多人。可是文革后学校的一个报告中说 30 多人。不知他们是怎么统计的。他说，坏人可以做坏事，但是只能一时一事一地一人地做。如此长久地大规模地进行迫害和虐杀，只有掌握大权的‘文革’领导人才能做到。

第 7 单元　乐坛名师

1、杨嘉仁及程卓如：音乐指挥家夫妻双自尽

杨嘉仁（1912-1966 年）音乐指挥家，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生于南京。1935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教育系。1937 年赴美留学，1939 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院研究部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硕士学位。1940 年回国后在上海之江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圣约翰大学、沪江书院音乐系及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教育局音乐中心站主任。1947 年起在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音乐理论及指挥法教授，并兼任沪江大学音乐系教授。1948 年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组主任。

1949 年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合唱队指挥。1956 年上海音乐学院创设指挥系时，他负责建系工作，并任该系主任。

杨嘉仁有较高的音乐秉赋和坚实的钢琴与音乐理论基础。他的指挥能抓住整个乐曲的情绪，对乐曲风格的处理细致入微，独具特色。1953 年在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指挥的无伴奏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获得合唱银质奖章，后又应波、德、苏等国邀请访问演出，均获好评。1957 年 9 月被邀请为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竞赛评委会评委。他听觉敏锐，排练风格细致而又生动有趣，对作品有独特的理解和丰富的指挥经验，常被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邀请担任指挥。1956 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指挥家樊承武、卞祖善、陈燮阳、夏飞云，钢琴家顾圣婴等均曾受教于他。

杨嘉仁教授和其夫人程卓如合编的《曲式学大纲》，于 1952 年由上海音乐公司出版。

“文革”狂飙骤起，上海市各界人心浮动，人人自危。天天有可怕的坏消息：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楼。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屡屡发狠话，并组织力量整闻捷，他感到无路可走。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动魄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 48 岁。

那时的自杀，有个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例如：来自延安，拍摄过“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 1969 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他们内心的痛苦之甚，必须夫妻相携才得以解脱。

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在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后，这所学校竟有 17 名教师先后死于非命。其中最为著名的教授就有 5 位：杨嘉仁，这位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在被批斗得无路可逃时，于 1966 年 9 月 6 日与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时打开煤气自杀。此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教授、系主任陈又新、著名的音乐史学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沈知白教授、钢琴演奏家顾圣婴、著名的音乐指挥家黎国荃先生等。

2、李翠贞：以高雅的方式结束生命的音乐大师

李翠贞(1910—1966 年)上海郊区南汇县人。1929 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她的钢琴入学考试是按老师随机要求演奏贝多芬 32 首钢琴奏鸣曲的某个乐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她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提前毕业。1934 年李翠贞远赴海外，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又以突出的成绩提前结束学业，并于 1936 年 9 月被吸收为英国皇家音乐协会会员。1942 年后，曾先后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系任教。

最近，上海的艺术人文频道连续播放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的纪录片，其中说到李翠贞是贺绿汀院长力邀而来的杰出钢琴人才。据前院长办公室主任的现身说法：当年整理档案时，还发现三封贺绿汀写给李翠贞的信，在信中情真意切地邀请她回国执教。他还说李翠贞的琴艺如何如何了得，能背谱演奏所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云云。

李翠贞终于被说服了，毅然回到国内，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后因和丈夫两地分居（丈夫在香港）多有不便。丈夫劝其留在香港，她又放不下学院的教学工作，为此而苦恼。1959 年曾经写信给她所信任的好友傅雷，征询他的意见。傅雷力劝李翠贞留在上海为国效力，李翠贞听从了傅的建议，继续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文革’期间，这封信在红卫兵抄家时被发现，并作为“反革命罪证”用来批判傅雷，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在 1966 年 9 月 2 日晚上自杀身亡。

【编者按：傅雷劝李翠贞留在上海为国效力，这本来是爱国行为，怎么能够成为‘反革命罪证’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来，这些娃娃们连一封很普通的信都读不懂，最多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吧？小小年纪，能判断是非吗？毛泽东恰恰是利用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们的无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仅仅相隔一周，李翠贞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方式很特别。据李翠贞的邻居事后回忆：1966 年 9 月 9 日，他父亲忽然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愈来愈浓的煤气味，顿生疑窦。于是，从一楼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煤气是否关好。唯独李翠贞家敲门不开。他父亲更觉得事态严重，立刻报告居委会。居委会又与房管所联系。他们派了两个师傅来撬门。李翠贞所住的那个单元的后门与厨房相通。他们撬开门以后，看到李翠贞面朝门坐在沙发上，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看起来她做了最后一次化妆，目瞪门外，把那两个师傅当场吓晕。李翠贞自杀前把门窗都用报纸密封，所以她自杀时没有被立即发现。

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呢？一般人很难理解。“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人所遵奉的信条。但是，李翠贞曾经留学和生活在英国，接受那个国度绅士风度和做派的熏陶和影响。在绅士们看来：没有尊严的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苟活。到了那种境地，就是‘生不如死’了。

在国外有一部纪录片，谨慎小心、很有分寸地显示：李翠贞在‘文革’中遭受了极大的污辱，红卫兵强迫她趴在地上爬过桌椅，还用墨水涂黑她的脸。对于视人格与尊严高于生命的李翠贞来说，这种污辱比死亡更不能忍受。这位高贵的女士不堪屈辱，毅然选择了高雅的

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并且精心的化了妆，然后才拧开煤气……

她的生命定格在那个化了妆的、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面门而坐、死不瞑目的美丽形象中。壮哉，斯人！她活着时，无限风光；她的死同样庄严、凛然、神圣，不可侵犯，不许污辱。

仅仅在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中就有5位自杀的。在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之后，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

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有17名教师先后死于非命。

【补白】

2010年秋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说：

“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贫困”。

法国17世纪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也说过：

“缺乏正义的武力就是暴政。”

3、顾圣婴：最年轻的钢琴演奏家一家三口同时自尽

顾圣婴（1937－1967年）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原籍无锡，生于上海。她从小具有音乐天赋，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9岁时受到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的亲自辅导，琴艺大进。学琴之外，喜好书法、绘画，并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籍此扩展自己的感情世界，以促进钢琴演奏艺术的提高。她文学方面的素养则较多受惠于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

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后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并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学钢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掌握欧洲各种流派和风格作品的演奏技能，并从马荣顺、沈知白教授学音乐理论和音乐史。

在那个政治冲击一切、艺术沙漠化的荒谬年代，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系统性和纯洁性都是绝无仅有的，同辈中自学成才为主的其它钢琴家更无法与其相比。

1953年，16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美丽娴静的她和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合作，演出取得了极大成功。在顾圣婴面前展开的是灿烂而又前途无量的道路。第二年，17岁的顾圣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同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首次演出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荣获盛誉。1955年2月26日在沪举行首次独奏音乐会又大获成功。1956年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后又去莫斯科学习。

其父顾高地先生是爱国将领，曾任19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因受“潘汉年冤案”的株连，被判处无期徒刑。当顾高地突然被抓走的时候，顾圣婴只说了一句话：“我爱祖国……更爱爸爸！”。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能够在危急关头说出这样的话来，说明她具有最起码的良知和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家庭的不幸和变故并没有影响她事业上的成功。1957年，这个20岁的小姑娘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荣获钢琴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40多位评委认为这位中国小姑娘的演奏“是一个奇迹”、“那种快

速的触键技巧令人赞赏……”

1958 年，这位中国小姑娘又在日内瓦引起了轰动，她在第 14 届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

获奖后，顾圣婴应波兰政府的邀请在波兰举行巡回演出，在美丽的国度波兰，顾圣婴得到了她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件礼物：肖邦的石膏手模。——她曾以弹肖邦的名曲而震动世界琴坛，被她视为生命的、由波兰政府赠送的“肖邦手模”，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摔得粉碎。什么叫‘野蛮’？什么叫‘疯狂’？这就是！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

她的人品，更是有口皆碑。无论老师或同学，同事或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优雅的家教，谦逊的品格，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似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这一切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理由’。

1967 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昔日学院的老师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

‘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无情地向她袭来。造反派们在一次批斗会中将她拽了上去，声色俱厉地要她第二天交代自己的罪行，明确告诉她：明天的批斗会主角就是她，就是她这个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的苗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那一顶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向她飞来。

一个只知道音乐，不知阶级斗争的弱女子，如何能够应对这一切？

1967 年 1 月的最后一天。天黑了，顾圣婴踽踽回家，昏暗的路灯映着她那孤独的身影，路边贴满了大字报，那些“火烧”、“炮打”的字迹触目惊心地映入她眼帘，风吹着大字报破损的边沿，发出轻微的声音……她踽踽而行，那样纤弱又那样迟缓……顾圣婴此时的内心感受，也许是愤懑；也许是悲怆；也许是麻木…….

她终于回到了家，母亲已经不安地等待许久了……。

后来的一切，我们都只能猜测了，因为死亡将所有的秘密都带走了。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母亲和女儿、儿子具体交谈了什么？以至于他们做出了如此决绝的决定……

1967 年，顾圣婴快到 30 岁，还没有品尝过爱情的甜蜜。她是那样端庄秀丽，像荷花一般散发着宁静优雅的芬芳。她的弟弟顾握奇，正是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刚刚踏入大学的大门……也许，他们想躲避，躲避这个令他们迷惑，令他们不解也令他们恐惧的社会，于是他们选择了死亡这一极端的方式。也许，他们是出于向邪恶势力的抗争，用最昂贵的代价——生命的付出来表达出内心的愤懑和抗争……

1967 年 2 月 1 日凌晨 3 点，一辆救护车朝着愚园路 749 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从担架上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被推进太平间。这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本人。尸体火化后，没有亲属保留骨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只能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 30 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其父亲顾高地先生于 1975 年被释放出狱，并恢复名誉，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

民政府参事。然而，这一切对于顾老先生已经毫无意义了，他没有了家，没有了老伴、爱女、爱子。凄风苦雨伴随着这位老人走完了一生，1990 年在上海去世。

《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于 2000 年出版，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发行了《珍藏顾圣婴》的唱片专辑。算是这位才女留给这个世界一点点贡献吧！任何人都只是、只能是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什么也带不走，但应该留下些什么？有的人留下了罪恶、仇恨、诟骂；而有的人却留下业绩、贡献，让后人长久地缅怀、纪念、崇敬…….顾圣婴显然属于后者。

4、陆洪恩：优秀的音乐指挥家被公开枪杀

陆洪恩（1919--1968 年）出生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所以有“洪恩”之名。1943 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0 年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 年起任乐团指挥。

1965 年 1 月，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贤县农村参加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运动又被称作“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把他绑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把他送回上海。上海交响乐团派了一辆中型汽车，该团中共支部书记陈彦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等五人一起陪陆洪恩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上海精神病医院最好的医生和陆洪恩谈话并观察之后，诊断陆洪恩患“精神分裂症”。陆洪恩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两个多月，病情大为缓解，于是出院，回团上班，但不再担任指挥而已。

1966 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晚上不睡觉，总是怀疑有人迫害他。他给在北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上万字的长信诉苦，写后又撕掉。他的妻子胡国美告诉弟弟胡国安，要他帮助把陆洪恩再次送进精神病院。胡国安是上海外语学院的俄语教师。他立即给上海交响乐团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对陆洪恩，不能送医院，不用你们管。

原来陆洪恩曾公开表示：反对批海瑞，反对批三家村，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说得激动时，他甚至高呼“修正主义万岁”等等口号。这样一来，他不仅没有被送医院治病，而是在 5 月 28 日，被送进了监狱。罪名就是“现行反革命”。

曾经和陆洪恩关在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先生（即被中共政权枪杀的刘文辉之弟）在《风雨人生路》一书中回忆：由于陆洪恩“被揪斗频繁，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前次老伤未好，后面又添新伤。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脚步，被打得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又肿又胀，疼痛刺骨钻心。看守还在牢房中狠狠地训斥：‘1598 每次批斗，每次不老实，还继续放毒，非得反铐不可！’（在监狱里，每个犯人都有一个代号，而不叫名字。1598，就是陆洪恩的代号）

批斗，毒打，反铐，几个月下来，这位文弱书生背已弯驼，头发全白、脱落。”“这位音乐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耳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呆木般的比一个九十岁老翁还衰老。”书中还说，和陆洪恩在同一监房的人多次劝他隐忍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以后还能有机会出去。陆洪恩总是苦笑着摇头。后来，他发高烧，讲胡话，精神意识失控了。并且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见到有“毛”的东西就咬，毛巾，毛衣，毛裤……。

终于有一天，监狱当局把他们监房里 14 个囚犯叫到“训导室”坐在地上，“接受教育”。他们厉声训斥陆洪恩“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最后，审讯员凶狠地问：“1598 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训导室内静默了大约一两分钟之后，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临死之人回光返照，骤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始“表态”。他毫无顾忌、滔滔不绝地直抒胸臆，一口气演说了二十多分钟，发表了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他最后表态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见《风雨人生路》第 136 页）

陆洪恩口若悬河，激昂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在座的所有罪犯，连主持审问他的三个人也听得目瞪口呆。他们在仔细地倾听，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头。可以断言：这几位身为审讯者，实际上心中也非常佩服和赞同陆洪恩的演说，只是由于身份所限，不能公开表示支持罢了。刘文忠先生看了墙上的挂钟，陆洪恩足足演讲了 25 分钟。

狱方记录了他的全部谈话，并叫三四个囚犯签字作证。这个演讲一个星期之后，陆洪恩被带出了他们的监房。四天以后，难友们看到了《解放日报》头版陆洪恩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消息。

枪毙一个精神病患者，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在‘文革’期间非常多，不足为奇。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当时的背景。1968 年 4 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红卫兵们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张春桥在震怒之余，决心揪出几个所谓“幕后的老家伙”来杀一儆百。张春桥从当时“公检法造反派”报送上来的黑名单里，看到了陆洪恩的名字，眼睛一亮。但有人说陆洪恩关在监狱里已经近两年了，恐怕与“炮打张春桥”的事件无关吧？张春桥却说怎么会联系不上？社会上的那根黑线又粗又黑，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悔改的老家伙身上，陆洪恩这样的罪大恶极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浪费人民的粮食，你们的屁股坐到谁的板凳上去了？杀陆洪恩就是杀一儆百。于是陆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中成为了替罪羊。

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对陆洪恩的死刑判决。上海电视台还转播了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枪决他的布告贴在上海街头。和他一起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共计三十多个。

陆洪恩被枪决后，公检法方面的代表到陆家通知陆洪恩的妻子胡国美，并向其索取‘子弹费’。这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段小插曲，是古今中外不曾有过先例的创举！

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曾是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应该听过陆洪恩所指挥演奏的音乐，或者至少知道作为著名音乐指挥陆洪恩的大名。当他们挥笔批准陆洪恩的死刑判决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斥着的是“革命”的狂热，还是残忍的快意？

在‘文革’年代，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了几句和当时主流意识相违背的言论，就被枪杀。这种处罚实在是太荒谬。甚至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1979 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许多人只是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根本远未达到“侮辱”程度，就被枪毙。可见‘文革’时期刑法残酷到何种程度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继续无产阶级革命”冠冕堂皇的目标下进行的，就更显其荒谬了。

【补白】

我们的优越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危险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坏事。

——著名文物收藏家、‘文革’博物馆馆长樊建川

第 8 单元　梨园名角

1、周信芳、马连良：京剧大师 “南麒北马”双殒命

周信芳（1895—1975 年）著名表演艺术家，艺名麒麟童。原籍浙江慈溪，出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市）。其父周慰堂、母许桂仙均为春仙班的演员。

周信芳 6 岁随父旅居杭州，从陈长兴练功学戏。7 岁登台演出。1907 年在上海演出时改用“麒麟童”的艺名，并一直沿用下来他曾两度赴北京、天津演出，将《鸿门宴》、《鹿台恨》、《反五关》等戏介绍给北方观众，人称“麒派”。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沦陷之前，周信芳编演了《明末遗恨》和《徽钦二帝》等表现亡国惨痛的戏，并在自己演出的舞台两边墙上挂出演出预告《文天祥》、《史可法》（明知其不可能演出，却要以此来显示民族抗战的精神，以激励广大观众的斗志。上海解放前夕，还曾保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姜椿芳。50 年代初期，热情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演出。1959 年加入中共。

马连良（1901—1966 年）字温如。回族，北京人。8 岁入喜连成科班学戏。先从茹莱卿学武小生，后从叶春善、蔡荣桂、萧长华等学老生，一年后即登台演出。17 岁时，学艺十年期满出科，应邀去福州担任主演。18 岁北返，声誉鹊起。21 岁，即以谭 x 派须生初演于上海。当时变声尚未恢复，嗓音较低，但已赞声四起，灌制唱片数张，风行各地。后离开富连成社，自己搭班演出期间，为追慕谭派艺术，时常登门求教于王瑶卿。

艰辛的广征博采与不断的舞台实践，使他的表演艺术不断精进，24 岁演出《打登州》、《白蟒台》等戏，被观众誉为独树一帜。25 岁开始整理改编、演出传统剧目。1927 年 26 岁时挑班演出，名挂头牌。1930 年组成扶风社。翌年与周信芳同台演于天津，技艺精湛，各具风采，被誉为“南麒北马”。

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多次参加义演。受周恩来劝导，于 1951 年 10 月 1 日从香港回到内地。离开香港前，曾请著名星象家袁树珊算命卜卦，结论是：你还有 15 年大运（不料真的被言中）。1952 年 8 月建立“马连良京剧团”。1955 年，马连良京剧团与谭富英、裘盛戎之北京市京剧二团合并成为‘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任团长。次年底，张君秋领衔之北京市京剧三团并入。此后，该团与中国京剧院合作排演《赤壁之战》，与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人合演《秦香莲》、《赵氏孤儿》、《青霞丹雪》、《官渡之战》、《海瑞罢官》、《状元媒》等戏，广受好评。

周信芳和马连良是我国京剧界久负盛名的两位大师，时称“南麒北马”。马连良被称为“四大须生”之一，而周信芳一直被誉为“海派”京剧的领军人物。上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海瑞戏，被人们誉为舞台上的两位“活海瑞”。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出戏，在“文革”中，两位大师同遭厄运，被迫害致死，成为中国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

响应号召周信芳编演“海瑞戏”

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编演于 1959 年。那年年初中央及地方一些报刊根据毛泽东提倡‘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话’的民主风气，发表了不少颂扬海瑞、魏征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人称之为“海瑞精神”。

1959 年 4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来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他通过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他建议周信芳编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他说，从反右之后，许多人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他还送给周信芳《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本书，供他编戏时参考。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人物，为人刚正不阿，敢讲真话，甚至冒死直谏的行为非常感人。再则，周信芳演海瑞这样的角色又十分“对工”，故而周信芳欣然接受了周扬的建议。

周信芳把这一创作任务带回来，立即得到文化局与京剧院的支持。京剧院领导集体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全力以赴把这出戏作为重点剧目搞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同时决定由周信芳和陶雄副院长负责，立即成立创作组。剧本采取集体讨论的方法，由编剧许思言执笔。文化局李太成副局长和刘厚生处长都亲自过问，参加讨论，对明史素有研究的蒋星煜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海瑞的资料。

创作组很快就开始工作，他们认真阅读、研究了《海刚峰奇案》、《治安疏》、《丘海二公合集》和其它有关海瑞的史料，以及传统戏曲中的海瑞戏。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主要以历史素材为依据，兼采用传说和戏曲传统剧目中现成的形象，来丰富这一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4月到5月，创作组编写出剧本提纲。就在同年4月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针对反右以后不少人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倡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有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敢想敢说的勇气。他强调指出，实行正确的工作方法的根本保证就是敢于坚持真理，而真理又往往“是在少数人那里，所以坚持真理就必须有反潮流的精神”。

会上，毛泽东又作了关于《工作方法十六条》的讲话，再一次提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有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号召“干部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以后，又大大称赞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受到领袖讲话的鼓舞，他们更加积极投入。创作组先后搞了三个提纲。经过大家讨论最后选择第三个提纲，即以海瑞上本“直言天下第一事”为中心事件，描写海瑞冒死直言诤谏，突出他的“五不怕”精神。

周信芳不仅是这出戏的导演和主演，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剧本的创作活动。他埋头书斋，翻阅研读大量史籍，并综合大家的意见、点子，酝酿完整的方案。剧本既然以海瑞上本作为中心事件描写，以此表现海瑞的不畏权势、不顾安危、敢于为民请命讲真话的崇高精神，那么就必须写好海瑞为什么要上疏、海瑞如何上疏、海瑞上疏引出了怎样的后果——这三个重要的环节。周信芳认为必须充分揭示当时的时代背景，戏要从海瑞离开兴国县调任京师写起，先写海瑞沿途目击老百姓遭受外患兵祸的荼毒，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的悲惨情景；接着再写大臣们面对外侮内患纷纷议论而束手无策。这样就为海瑞进京后的为民请命，埋下了伏线，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初稿得到了各级领导和京剧院的肯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文汇报》负责人陈虞孙和李太成、刘厚生等人都认为基础较好，给予肯定。同时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要求把海瑞的形象塑造得更突出一些，海瑞的忠心与皇帝的昏庸对比应表现得更尖锐一些，并希望能更多地从发挥周信芳的演技上考虑，如上殿奏本时不必乘轿，可让其夫人紧追其后，这样不仅有戏，而且可以发挥类似《徐策跑城》中的身段演技。

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剧本，在京剧院二团去青岛演出时，周信芳与许思言也带了初稿去修改加工。周信芳与许思言逐场逐段、逐字逐句详细讨论，推敲修改，有些地方还亲自动笔修改。8月，《海瑞上疏》剧本二稿在青岛完成。定稿后，他们立即赶回上海，投入排演。

为了确保这一重点剧目，京剧院调集了强大的演出阵容。经过全体演职员的紧张工作和通力协作，只花了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海瑞上疏》已经排演就绪了。当局安排国庆十周年演出重点剧目和参加国庆游行彩车时，都将《海瑞上疏》列入其中。

《海瑞上疏》“南麒”尽显麒派风采

1959年国庆前夕，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演出拉开了帷幕。9月30日，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这次献礼演出有十六个剧种，一百多个剧目参加。《海瑞上疏》独树一帜。周信芳虽然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他再次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魅力倾倒了全场的观众，引起轰动。

剧本围绕海瑞冒死上书一事，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剧情发展跌宕起伏，人物感情波澜不断，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中国封建社会是极端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皇帝一言九鼎，他的决策关系到广大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历代有不少忠臣贤相，他们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犯颜直谏，为民请命。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需要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因此仍然需要提倡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潮流的精神。

其次，共产党一贯主张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为坚持真理而献身，也应该是共产党人的本色。1957 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浮夸风；1958 年反右扩大化，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空气。在有些人当中形成了只讲大话、空话、假话，上骄、下谄之风。在这样的情况下，写这出海瑞戏，歌颂海瑞的坚持真理、敢做敢为的精神，古为今用，很有现实意义。因此《海瑞上疏》的主题是积极的。这出戏对主人公海瑞形象的塑造也是成功的。戏中海瑞刚正不阿、敢作敢为的性格十分生动突出，同时又刻画得有血有肉。周信芳所塑造的海瑞形象生动，充分发挥了麒派艺术的长处与特色。周信芳以其特有的幽默乐观的精神气质和饱满的感情，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和细节，以及节奏强烈的表演动作和唱腔、念白，使海瑞的舞台形象显得活龙活现。

《海瑞上疏》正式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京、沪两地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分析《海瑞上疏》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称赞该剧的创作和演出获得成功。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其剧本便在《上海戏剧》上公开发表，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个戏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都给以了肯定的评价。

马连良在北京排演《海瑞罢官》

就在《海瑞上疏》上演不久，在北京的马连良也开始了海瑞戏的编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一向敬重海瑞，对吴晗这些作品也十分喜爱。

1959 年冬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马连良和吴晗相遇，两人谈到了海瑞。马连良先是问吴晗：为什么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宣扬海瑞的文章？

吴晗告诉他：1959 年 4 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曾称赞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畏权势的精神，号召大家要学习这种精神。后来钱俊瑞、胡乔木来找他，要他写些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对吴晗说：“我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出过《大红袍》，对海瑞十分佩服。我看了您写的那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更有兴趣。您能不能给我写一出描写海瑞的新的京戏？”吴晗有点为难地说：“我是搞史学的，写书、写文章还行，戏可不会写啊！因为我不熟悉京剧，又没有写过剧本。”马连良说：“不要紧，您先拉一个初稿，剧团帮着一起搞。至于戏词好办，您先按古诗写就行！”于是吴晗答应试试看。

过了不久，吴晗果真写出了《海瑞》剧本初稿，给马连良送来了，并希望剧团加以修改。大家觉着内容很好，就是剧本有点像昆曲传奇，戏剧性也不够强，平了一些。马连良与大家共同研究，作了修改，于 1960 年夏天进行了排练。彩排时特地请几位专家、学者来提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吴晗又修改了一稿。原来海瑞被罢官后，百姓为他饯行，以此结束。这样海瑞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灰溜溜一走了之，马连良的表演技巧也难以施展，后改为罢官作为戏的结尾，剧名也改成《海瑞罢官》。

1960 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由王雁担任导演，马连良饰演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李毓芳饰海夫人，周和桐饰戴凤翔，郭元祥饰徐瑛。这个戏主要写罢官，海瑞上任应天府巡抚，察访民情时得知：告老还乡的太师徐阶，霸

占了洪阿兰家的民田，纵子（徐瑛）行凶，强抢了洪阿兰的女儿赵小兰。海瑞秉公而断，判徐瑛死刑，徐阶退田。徐阶买通朝官，诬告海瑞鱼肉乡里，罢了海瑞的官。海瑞毅然在交印之前处死徐瑛，为民除害。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了某些情节，以揭示明代社会阶级对立的状况，生动地刻画了海瑞不畏强暴，为民伸冤的刚直不阿的精神。戏中的海瑞已经54岁，官至应天府巡抚。马连良在表演中突出他的阅历已深，强项未改。采用安详的神情、稳健的动作，浑厚的声音表现他内涵热情而外表沉着镇静，并注意刻画海瑞复杂的思想活动。

最后“罢官”一场尤其精彩，在前几场稳练沉着中又加进了从容不迫、豪迈果敢的特征。他命令中军：先斩囚犯，再交印信。马连良在此处特别提高声调，加重语气，一字一句如斩钉截铁。海瑞杀了徐瑛、王明友，徐阶昏倒下去，新巡抚戴凤翔也呆若木鸡，此时海瑞举着巡抚大印，昂然屹立，岿然不动。至此，才徐徐落幕。

《海瑞罢官》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人们称它为马派艺术又一杰作。吴晗原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副市长，他跑到京剧行当写剧本，因此廖沫沙称赞吴晗“破门而出”。

风云突变，惨遭厄运

上海和北京两地分别由两位京剧大师编排、演出海瑞戏，相映成趣，成为京剧界一时之盛事，也是广大戏迷朋友一饱耳福的绝好机会，更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历史上清官的热切希望和呼唤。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有谁能够未卜先知，顷刻间就来了一个180 度急转弯。“文革”狂飙袭来，一切都变了：原先被各界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海瑞戏，突然变成了向党进攻的大毒草。而两位京剧大师也在顷刻间被打成黑帮分子，无情地揪斗和折磨，终于惨死在他们曾经是那么热爱过的祖国大地上。

周信芳与马连良在舞台上塑造的海瑞形象特别成功，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还因为二位都是正直的艺术家。他们热爱海瑞，是用赤诚的心来拥抱角色，人们看到的是两个活海瑞。可以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分别是周信芳、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两出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

《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前者是奉命创作，后者是有感而发。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配合宣传发扬‘敢说敢为’的精神。此外，海瑞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杰出的政治家，在舞台上高扬他的斗争精神，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这两个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江青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

1964年下半年，她找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对方没同意。1965年2月，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此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

这样，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文章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分“《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个假海瑞”、“《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四个小标题进行了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分析批判”。

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黑文一出，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随之而起。

在关键的时候，一切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同一个毛泽东几年前还喋喋不休地号召文艺界应该“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这时却转换了话题。1965年12月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主席'等等。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海瑞上疏》当然也不能幸免。这场批判运动一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双雕。他在文章中特别点出："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接着江青、张春桥等又把枪口对准了《海瑞上疏》。1966 年 2 月、5 月，先后又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黑文。文章诬称"《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他们硬把《海瑞上疏》的写作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海瑞上疏》就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还抓住这个戏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戏中海瑞抬了棺材上台，便是对无产阶级的诅咒和示威。文章还公开点了周扬、周信芳的名。

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欲置人于死地。文章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可是《海瑞上疏》写作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文章诬称 1960 年演出的《海瑞罢官》支持单干风、翻案风，然而批单干风、翻案风，都是 1962 年的事。作者岂能未卜先知？

对《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场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吴晗被投入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其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夫妻二人于 1969 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吴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 1976 年去世。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有儿子吴彰得以幸存。

马连良从 1966 年 8 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 1966 年 12 月 16 日含冤去世，终年 65 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

周信芳先是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其夫人受到株连，被毒打致死。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女被逼疯。周信芳本人由于长期被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于 1975 年 3 月 8 日去世。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悲惨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2、盖叫天：江南活武松惨死于文革

盖叫天（1888－1971 年）著名京剧演员，原名张英杰，号燕南，直隶高阳（今河北省）人。幼时入天津隆庆和科班，习武生，后改习老生。倒嗓后仍演武生，以短打武生为主。他 10 岁开始登台，13 岁在杭州演出时开始用"盖叫天"之名。长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来并且有所发展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时称"盖派"。代表剧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49 年后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

1954 年，给他拍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京剧电影（由白沉导演，黑白片），涵盖《白水滩》、《七雄聚义》、《茂州庙》、《劈山救母》、《英雄义》、《武松》等 8 出戏的精彩片段，由

上海京剧院的前身上海市人民京剧团联演，王燮元打鼓（鼓师是京剧乐队的总指挥）。

1963 年，又给他拍了《武松》，这是他第 2 部京剧电影，也是他第 1 部彩色京剧电影，琴师郝德泉、黎秋觉，高明亮打鼓。周恩来原来邀请崔嵬执导，后来在应云卫和俞仲英两位导演手里完成。

他的艺术心得集成《粉墨春秋》、《盖叫天表演艺术》、《燕南寄庐杂谈》等书。

盖叫天是一位艺德双馨的京剧演员，非常敬业。15 岁在杭州演《花蝴蝶》时曾不幸折断左臂。1934 年，他在上海大舞台，用当时流行的机关布景演出《狮子楼》时，按照传统戏的一般演法，舞台上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足矣，既可代山代城，又可代楼代墙，根本不必搭制机关布景。可是，当时剧场老板为了招徕观众，竟搭了满台硬景，还别出心裁地在舞台上搭了个“酒楼”。演到武松替兄报仇，到“酒楼”上追杀西门庆时，“酒楼”就开始摇晃。西门庆见武松追上楼，吓得从窗上跳了出去，落在台面上。武松在楼上追到窗口，自然也应往下跳。可是，脚下是一排窗栏，上面又是屋檐，中间只剩下几尺高的一个窗洞。跳高了头碰着屋檐，跳低了又跃不过去。尽管这样艰难，也难不倒演技高超的盖叫天。按照戏路，他纵身一跳，一个“燕子掠水”动作，便从两丈多高的“酒楼”上跳了出去。

可是，当他跳到半空中的一刹那，忽见西门庆还躺在地上（按演出要求，西门庆跳下楼后，应迅速滚到一边，给马上跳下楼的武松腾地方）。盖叫天考虑到如果按原来的戏路跳下去，可能压伤扮演西门庆的陈鹤峰。在紧要关头，他急中生智，在空中一闪身。由于这一闪已非原来的戏路，又用力过大，落地时折断了右腿。当局，强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其艺德情操之高尚，由此可见。

在医院，不幸又碰上庸医接错了断骨；盖叫天一听说有可能无法登台，便毅然在床架上撞断自己的腿骨，要求医生重接。为此，陈毅曾题诗云：“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当他腿伤痊愈后，又在更新舞台演出了头二本《武松》，从“打虎”一直演到“逃亡”，先后演了三个半月。由于他在武松戏方面的突出创造，因此被世人誉为“活武松”。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也受到残酷的批斗和迫害，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反对样板戏”等罪名。1966 年夏天，杭州气温高达三十八度，盖叫天被拉去游街，并且要戴上高帽子，穿上武松的戏衣，装在一辆垃圾车上。他老伴也被拉出来，光着脚，不穿鞋袜，跟随在车后，走不多久，她的双脚就磨出血来。盖叫天年近八十，怎经得起这般羞辱与折磨，他愤然从车中跃出，摔在地上，以致腰椎骨摔断。他们再把他扔回车上，继续游斗。但“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断举行批斗会，将盖叫天拉去批斗。最残酷的一次是 1968 年在杭州青年路灯光球场，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押进场地，共有五百多人，每人颈下挂一块牌子。盖叫天也被押来了，他已经蓄发留须，长长的直披到肩上，双目紧闭，闭口不语。造反派要他跪倒，盖叫天却坚决不跪。上去几个特意挑选、会武术的壮汉，强行要他下跪。他虽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动他分毫。他们要扭折盖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劲避过。他们用一根粗木杠，将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压住他的双腿，两个壮汉踩在杠的两头，强行把他上身拉起来。只听“咔嚓”一声，盖叫天的腿被压断了。这位在舞台上为艺术累次断肢折臂，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伤残，重新站立起来的艺术家，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自己的腿竟然被这些娃娃们彻底折断了。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是扫地出门，盖叫天和老伴、孙女被从金沙港的燕南寄庐中赶了出来。他数十年珍藏的那些罗汉、塑像、绘画、古玩以及全部衣物、家具被洗劫一空。

往年过生日，盖叫天的习惯是吃一碗有特制浇头的“长寿面”。当他 83 岁生日来到时，他对老伴说，能不能再给他做一碗面。这个要求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可在‘文革’期间却难住了老伴。她只得想方设法，东借西挪，才借到几个钱，做成一碗面端给盖叫天。盖叫天接过面，愉快地吃完。吃完面，他又提出要洗浴。11 月的天气，小木屋四处透风，穿

着棉袍都嫌冷，怎么洗浴？但他坚持要洗，老伴只好依他。把门窗堵上，把室外的煤球炉移进屋内，勉强提高些温度，帮他洗了个澡。吃了面，洗了澡，盖叫天睡下了。过一会儿，他把老伴叫到身边，对她说："剑鸣娘，平白无辜地遭到这份罪，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如果我先走了，你一定要活下去。"他要求老伴重复回答他三遍："要活下去，要活下去，要活下去。"于是他才闭眼睛，不再说话，安心地睡去。

这以后，盖叫天的身体更为虚弱。过了年，由于天气严寒，他抵抗不住，感冒发烧。老伴要送他上医院，但家中只有十五块钱。去文化局请求，造反派不理。她只得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他到医院。三轮车夫听说老人是盖叫天，坚决不要车钱，义务将他送到医院。但他是"牛鬼蛇神"，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是再回到小木屋，经过漫长的黑夜，在天将黎明之前，他却溘然去世。身边还放着那对代替双鞭的木棍，时为 1971 年 1 月 15 日清晨，终年 83 岁。

一代名伶，在被折磨 5 年、受尽凌辱的晚年生活后，终于魂归天外。他能闭目吗？不能，不能啊！因为他的死完全是人为的，是被'文革'黑手所毁灭的，盖叫天死不瞑目。

他期待什么？期待着当局给个说法：是谁导致这场灾难？谁是罪魁祸首？……

他的期待何时能实现？

【补白】

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导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判处死刑，受刑前如是说

3、荀慧生：四大名旦之一被折磨致死

荀慧生（1900—1968 年）初名秉超，1925 年起，才改名荀慧生。出生于河北省东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由于家境贫寒，从小被卖给天津一个梆子戏班学戏，后被转卖给一位花旦为私房徒弟。自此，荀慧生沦为家奴，吃尽苦头。但他仍以巨大的毅力坚持每天练功。夏穿棉袄，冬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功练出了硬本领：唱、念、做、打无一不精。8 岁登台表演，11 岁跟师父入北京三乐班。后从陈桐云、乔惠兰、曹心泉、陈德琳、吴菱仙、孙逸云、路三宝等名师改学京剧。与侯喜瑞、刘鸿声合演《胭脂虎》《霓虹关》等戏，又同杨小楼、余叔岩、王凤卿、高庆奎、朱桂芳等合作，并拜王瑶卿门下学青衣。同年杨小楼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会同尚小云、谭小培等合作演出。请荀慧生担任"刀马旦"，公演引起轰动。荀慧生的表演生动活泼，扮相俊俏，使上海观众耳目一新，被赞为"誉满春申"。后又与周信芳、冯子和、盖叫天等人合作，演出《赵五娘》、《劈山救母》、《九曲桥》、《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戏，名震沪上。上海国画大师吴昌硕同知名人士严独鹤、舒舍予也为宣传和扩大荀慧生的艺术影响而积极宣传。荀慧生喜欢作画，1924 年正式拜吴昌硕为师，他又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等名师求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境界，提高了艺术素养。1927 年北京报界举办京剧旦角评选活动，他与梅、尚、程等三位一起被评为"四大名旦"。从此标志着他的艺术走向成熟，得到社会的肯定，赢得了观众的赞赏。1931 年再次当选为"四大名旦"。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荀慧生对于剧本、唱腔、表演、念白、直到服饰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与探索。他演出的剧目有三百多出，主要包括《红娘》、《红楼二尤》、《杜十娘》、《荀灌娘》、《钗头凤》、《十三妹》、《玉堂春》、《金玉奴》、《得意缘》、《卓文君》等。在唱腔艺术方面，荀慧生大胆破除传统局限，发挥个人嗓音特长，吸取昆、梆、汉、川等曲调旋律，大胆创新。这不是简单的一曲多用，而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感情与心境出发，字正腔圆，腔随

情出，令人着迷。他善于使用上滑、下滑的装饰音，听来俏丽、轻盈、谐趣，具有特殊的韵味。他还十分注重道白艺术，吐字清晰，声情并茂。他创造出融韵白、京白为一体的念白，韵调别致，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表演方面他强调“演人不演行”，不受行当限制，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突破。他塑造的许多少女、少妇的艺术形象，具有大众化、生活化的特点。娇柔妩媚、清秀俊美、风格各异。

在京剧四大名旦中，荀慧生的唱念做打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其唱腔委婉动听，俏丽多姿，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在传统唱腔、唱法的基础上，他结合剧中人物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大胆创造。如《勘玉钏》中的“二黄快板”、《红娘》中反汉调“听琴吟”、反四平调“佳期颂”、《还珠吟》中的四平调“节妇吟”等等，都成为学习荀派的必修课内容。

50 年代后，历任中国戏曲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梆子剧院院长等领导职务。荀慧生一生收徒之众，不计其数。他指导和亲自传授的后人、学生、徒弟有：吴纪敏、金淑华、李薇华、荀令莱、宋德珠、毛世来、童芷苓、李玉茹、李玉芝、吴素秋、赵燕侠、小王玉蓉、张正芳、尚明珠、厉慧敏、陆正梅、宋长荣、李妙春等。还有许多人虽未拜师，但得其亲授者多矣。

1966 年的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荀慧生还没有弄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会事的时候，他就成了“牛鬼蛇神”、“反动艺术权威”、“残渣余孽”、“反党分子”，被揪了出来。其妻张伟君、儿子荀令香、荀令文，女儿荀令莱都被隔离审查，一家人失去了自由。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一下子却成了“反党分子”呢？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和审讯，他只有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但他认定一点，“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所以他倒没有什么担惊害怕。他扪心自问，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的事，他一生都是“老老实实唱戏，清清白白做人。”至于“反动权威”的那些头衔，不管有多少，说白了我只是一个唱戏的，又不是我讨来的，是党和组织上给的呀！荀慧生实在不懂得，唱戏和政治有什么关系，这回怎么会扯到一块儿呢？

8 月 23 日，“造反派”打着“破四旧”的旗号，拥着威风凛凛的军代表来了，把北京市京剧团所有戏箱集中起来，全部烧毁。他们还勒令荀慧生、老舍、萧军等文化界名人及一批著名演员，全部跪在地上接受教育。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空中呼啸着口号声、皮鞭和漫骂声。面前熊熊的大火，烧毁了唱戏用的行头，更烤痛了荀慧生和许多艺术家的心。

后来荀慧生被押到沙河农场监督劳动。12 月的一天，荀慧生的腿和脚都肿了，身子虚弱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才开始感到自己的体力实在不行了，但仍然坚持着下地劳动。在下地的途中，实在支持不住沉重的身躯，倒在瑟瑟的北风中。却听到有人骂他“装死”，说他是逃避劳动，根本就无动于衷。

在冰冷的泥地上，荀慧生足足躺了四个多小时。当他的女儿荀令莱赶到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她叫着、哀求着，才允许她把父亲送进医院。

荀慧生正在发高烧，迷迷糊糊，医生诊断是老年性肺炎。医生抱怨家属送医院太晚了，生命危在旦夕。病床前只有女儿一人，她对爸爸说：“我到单位去请个假，一会儿就回来”。女儿一走，荀慧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妻子张伟君、儿子令香、令文都是管制对象，失去了自由。女儿虽然解除了管制，但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处境也可想而知。

荀慧生没有等到亲人的到来，就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这天是 1968 年 12 月 26 日。12 月 29 日，张伟君得到通知，让她去见荀慧生。她还梦想着元旦的时候，也许一家人可能团聚，过上一个新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见到自己的丈夫，竟是在医院的太平间。当她揭开蒙在荀慧生脸上的白被单时，她实在接受不了这一残酷的现实。她看到丈夫削瘦的脸上发青、发乌，她紧紧地抱着冰冷发硬的丈夫，泣不成声。深情地看着这张熟悉的脸，她摸他的脸，摸他的手臂，手是粗的，手臂上还留有被打过的鞭痕。此时，她是被“造反派”押着来与丈夫见最后一面的。她流着泪，解下脖子上的纱巾，盖在丈夫的脸上，让带着她体温的纱巾，

伴随荀慧生一路远行。

四大名旦中，梅兰芳、程砚秋二位先后走了，都走得隆重、风光，当局为他们召开了追悼会。荀慧生之死，属于“反动艺术权威”焉敢奢望？此后只剩下尚小云了。但尚小云也在挨批斗、被管制，自身难保。

以后还会有新的、观众票选的‘四大名旦’吗？不会有了。只会有官方指定的、御批的货色，没有观众的发言权。自然，观众也不会买账。

4、小白玉霜：评剧皇后惨死于文革

李再雯（1922—1968 年）祖籍山东，5 岁随父亲从天津逃荒到北京。父母无力抚养，不得不把她卖给著名评剧演员、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做养女。白玉霜特地请了天津有名的评剧彩旦李文质做她的启蒙老师。李文质讲究演唱技巧，板、字、气、腔，都很有功夫。李再雯聪明好学，刻苦用心，打下了坚实的唱功基础。后来李再雯随同白玉霜演出，在艺术上又受师傅的熏陶，逐步掌握了白玉霜的唱腔和表演技巧，继承了白玉霜的演唱风格。

李再雯 14 岁登台演戏。两年后，白玉霜却不辞而别，戏班为了维持生计，让她接替母亲担任主演，挂出了“小白玉霜”的牌子。她的演出，意外地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几年之后，白玉霜在北京病故，小白玉霜正式挑起了母亲的班子，在京津一带颇享盛名。

她的代表剧目古装戏有：《朱痕记》、《闹严府》、《杜十娘》、《秦香莲》、《桃花庵》、《玉堂春》、《临江驿》、《打狗劝夫》、《劝爱宝》、《珍珠衫》、《红娘》、《小借年》等。50 年代初期，按照中共官方的要求，又主演革命现代戏《兄妹开荒》、《农民泪》、《九尾狐》、《千年冰河开了冻》、《小女婿》、《罗汉钱》等。1953 年中国评剧团建立后，排了《秦香莲》一剧，在剧中她塑造的秦香莲形象是她表演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1956 年《秦香莲》拍成电影，她获得金质奖章，蜚声海内外。六十年代后，塑造了《金沙江畔》中的金秀，《苦菜花》中的母亲，《朱痕记》中的赵锦棠，《闹严府》中的严兰贞，《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等。在演出中，她努力塑造出一批风格各异、性格生动的新妇女艺术形象。特别是在《小女婿》中扮演的杨香草，堪称脍炙人口，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小白玉霜音色纯正，音域宽广，她的行腔柔润平稳，深沉流畅，演唱圆润隽永、低回婉转，讲究节奏的变化及快慢、轻重的对比，形成了韵味醇厚、朴素大方的演唱特色。小白玉霜扮相大方，善用眼睛传神，表演风格轻淡素雅，细腻含蓄，不浮不泛。无论是演唱技巧的运用，还是唱腔的设计安排，她都能从刻画人物需要出发，细腻而真切地表达人物感情，塑造准确的人物形象。

1953 年小白玉霜加入了国营剧团，在艺术上更加努力，不断追求创新。在演出剧目上，她一直坚持古装戏和现代戏同时并举。在传统戏里扮演过许多古代妇女角色，如《朱痕记》中赵锦棠、《闹严府》中的严兰珍、《杜十娘》中的杜十娘和《秦香莲》中的秦香莲等。这些性格鲜明、形象各异的舞台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她的代表作《秦香莲》，在表演上吸收并借鉴京剧、梆子、曲艺等兄弟剧种的长处，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在电影《秦香莲》的拍摄过程中，她尊重导演对剧中人物造型的需要，毫不犹豫地剃掉自己的双眉，卸装后蒙着头纱回家。此后被传为戏剧界的佳话。

在跟师傅学戏的过程中，小白玉霜明白：自己既要高举白派的旗帜，又必须和白玉霜的唱腔有所区别。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发现自己和白玉霜在声音素质方面的异同。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白玉霜的嗓音宽亮，底气没有白玉霜足，但却可以在“膛音”和发音厚实上挖掘潜力，发挥白玉霜咬字狠、字音准的长处，并使自己的演唱吐字清楚。其次，她不能像白玉霜那样放开喉咙唱，以免招致白玉霜吃“戏醋”。她必须悠着劲儿来，使暗劲，要

以情感人，不必争亮嗓音。她尝试着提着气唱，既用丹田气，又不让声音完全打出去，而是让声音保持不炸不喊，又能送远，形成另一种劲儿。因而创立了自身的唱腔风格。可见对于她来说，创新真的不易，也可以说她的创新完全是在内外压力下逼出来的。

小白玉霜与新凤霞，都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在天津评剧舞台上升起的耀眼新星。小白玉霜出道较早，1937 年年仅 15 岁就在天津代替养母白玉霜挑班并开始走红。但在同龄演员中却从不摆架子，一直关照着比她小七岁的后起之秀新凤霞。当时新凤霞家庭较为贫困，刚加入戏班时，虽然从师傅小五珠处学了不少戏，也显露出艺术天赋，但却无力购置行头（戏装）。而当时戏班是不为女演员准备行头的，完全得自备。为此，新凤霞终日愁锁眉尖。小白玉霜就主动把自己的行头和头饰借给她用，有很长一段时间，新凤霞就是穿着小白玉霜的行头演戏。这在人情淡漠、“同行是冤家”的旧时代，此等义举实在难得，值得称道。

小白玉霜对新凤霞不仅生活上关心，在艺术上也给予了很大帮助。1943 年 3 月，新凤霞在河东天宝戏院首演白派代表剧目《潇湘夜雨》。小白玉霜与她并不在一个戏班，唯恐新凤霞演出不熟练，便专程从南市庆云戏院赶往河东给新凤霞把场，使新凤霞的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此后，她们还多次共同参加全市性义演活动。小白玉霜总是为新凤霞配演二路旦角，以此来提携这位小妹妹，为她成名铺路。姊妹在共同的艺术生涯中休戚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由此可见，其艺德之高尚，非同寻常。

1952 年，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战地慰问，小白玉霜参加了慰问团。跟评剧团一起乘坐大卡车入朝，冒着美机的轰炸，到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部队驻地。小白玉霜不辞劳苦，冒着极大危险，一会儿在山洞里为志愿军机关演出，一会儿又在山坡上给战士们演出。有时，还到伙房给炊事班十几个人演出，甚至爬上高山哨所给防空值勤的两个战士清唱。指战员们都非常希望看到她的代表剧目《秦香莲》，因此她一天早、中、晚连轴转演出两、三场全本《秦香莲》。有一天竟然演出 4 场。在第四场演出前，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演员们吃夜宵。这时小白玉霜的声带疲劳至极，几乎难以发声，怎么办？唱不出来，还要演出，她又不愿意让别人代替。无奈之下，她一面用小茶壶喝水，一面对后台管理说：“这场，咱们卖字儿吧！”

“卖字儿”是怎么回事儿？小白玉霜见领导有点疑虑，笑着对大家解释：“卖字儿”是评剧界的行话，指的是演员的嗓子突然出现问题时，还照样演出。但在演唱时，不用拖腔，用吟诵的办法表现唱词，而琴师则采用特殊的伴奏手段，烘托演员的吟诵。观众听起来，仍然像演唱一般。啊！原来“卖字儿”是这么回事。小白玉霜还特意谈到英年早逝的评剧名旦爱莲君的故事。她说爱莲君不但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还是位作曲家，有时能即兴在演出中临时设计新腔新调。比如评剧迷非常喜爱的《八月中秋雁往南飞》这段唱，就在某次演出中，爱莲君上场之前忽然来了灵感。对她的琴师说：“这场咱们把调改一改，你注意兜着点。”琴师和爱莲君配合得珠联璧合，一炮打响，这段唱腔便流传下来……

小白玉霜说：请领导放心，有琴师的巧妙配合，第四场《秦香莲》我一定能演好。上场之前，小白玉霜又用化妆笔在手心上写“卖字”二字。为了让声带休息，她尽量不说话，把手上的字举给琴师和乐队看，大家心领神会地点头。果然第四场演出圆满成功，大家纷纷上前和演员们握手致谢，久久不愿离去……

1957 年，新凤霞的爱人吴祖光被划为右派，并流放外地改造。新凤霞被迫搬到了单位去住，单位给她安排了一间阴冷的小屋。后来新凤霞因居室潮湿患了关节炎。当时新凤霞属于监管、批判对象，谁也不敢接近她。小白玉霜发现新凤霞经常在院子里晒被子，便到她的居室看了看。看后既震惊又难过，便不顾众人非议，找到单位领导据理力争，才给新凤霞调换了一处条件较好的住处。由此，新凤霞更由衷地感激她。

1967 年 12 月 21 日，在红卫兵造反派的迫害下，遭受毒打以后，悲愤难抑，愤而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一代坤伶，竟然惨死，时年 45 岁。英年早逝，身后并无子女。作为 50、60 年代的评剧泰斗和领头羊，也没有嫡传弟子，但她的唱腔却广为流传。

当小白玉霜因遭受“文革”政治风暴摧残而自杀身亡时，新凤霞闻讯悲痛欲绝，但处于当时情况，自身难保，未能给情谊笃厚的姐姐送葬，一直成为新凤霞的一块心病。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

在美国，你说了 100 句话，只要有 1 句是对的，他就肯定你这一句的价值。在中国则相反，你说了 100 句话，如果有一句错了，他们就追究这一句话，而忘了其余 99 句好话。

——旅居美国学者刘再复《阅读美国》

5、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死后竟被剖腹

严凤英（1930—1968 年），祖籍安徽桐城罗岭。原名黛峰，艺名凤英。幼时即喜唱山歌和黄梅调。12 岁拜桐城艺人严云高学唱黄梅戏，为族人、家庭所不容，后离家出走正式搭班，改艺名为凤英。1946 年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轰动安庆，也因盛名而招致灾祸，严凤英不得不离安庆去南京。后又得著名老艺人丁永泉指点，辗转演出于贵池、青阳农村和安庆、皖南等地区。1947 年曾随胡金涛、刘凤云学唱京戏。1949 年后又拜北昆名演员白云生为师，不断汲取兄弟剧种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表演技艺。1951 年重返安庆。1953 年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历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副团长，中国剧协第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 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1960 年，严凤英加入中共。于 1954 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获演员一等奖。

在 23 年的艺术实践中，严凤英在唱腔和表演方面都有新的创造，为黄梅戏艺术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她嗓音清脆甜美，唱腔朴实圆润，演唱明快真挚，吐字清晰，韵味醇厚，并注重从人物感情出发，力求达到声情并茂、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表演质朴细腻、塑造过许多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如《打猪草》中的陶金花、《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女驸马》中的冯素贞、《牛郎织女》中的织女，以及现代戏《丰收之后》中的赵五婶等。其中《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均摄制成影片。

她特别注意广为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等艺术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时称‘严派’。

严凤英的艺术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5 年春天以前，是第一个阶段。由于父亲严司明和母亲离异，她在四五岁时就回到祖父母居住的罗家岭。田园风光陶冶她幼小的心灵，与姑、姐们挖野菜、放牛的同时，她学唱了流传于当地的不少民歌，艺术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中悄然播下。不久，因为抗战爆发，其父严司明也回到家乡，闲居无聊时，教她唱京剧，这使她与戏剧艺术有了接触。在十来岁时，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授艺，严凤英由此与黄梅戏结下缘分。她始而偷偷学戏，继而拜严云高为师，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并学会了《送香茶》、《春香闹学》等传统戏中的单折。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从四五岁到十五岁，严凤英度过了从艺准备期。

1945 年春至 1951 年初，是第二个阶段。1945 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畲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当时、当地的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可她却没有放弃，继续参加黄梅戏班的演出活动，终至离开家庭，从桐城唱到怀宁、枞阳等外

县，唱到当时的省会安庆。

随着舞台实践的不断丰富，严凤英的表演艺术水平迅速提高。她本来就有较好的演唱天赋，又虚心向前辈艺术家学习，她回忆道："我到安庆想把戏演好，就努力学习。那时学表演，主要靠观摩，看老前辈在台上一举一动怎么做，我就一点一滴记在心里，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因为我是女性，演旦角戏的动作要细腻些，像是那么回事，观众看得很有味"。正是凭着这种学习精神，严凤英在表演艺术上崭露头角。据老艺人回忆，《二龙山》一剧的主角是女寨主畲素贞，严凤英扮丫环表演竟使剧名改为《丫环挂帅》。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艺术上崭露头角的严凤英非但没有得到扶助，反而遭到摧残，她被迫一次次地离开她钟爱的舞台，其间，她又学唱过京剧。

1951年初，她终于重返黄梅戏舞台，是她生活上备受磨难、艺术上得以丰富提高的时期，也为她艺术创造的辉煌作了铺垫。

从此，严凤英进入了艺术道路的第三阶段。回到安庆后，她在"群乐"剧场演出，这时，中共派干部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演出过《江汉渔歌》、《两朵大红花》、《木兰从军》、《柳金妹翻身》等剧目。从1953年到1965年，她先后主演了《天仙配》、《女驸马》、《打猪草》、《闹花灯》、《牛郎织女》、《红色宣传员》、《江姐》等近50个大小剧目。其演艺水平也不断提高，既形成了独自的风格特色，又代表着当时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并对该剧种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严凤英的唱腔，首先贯穿着一个"情"字，在深入把握人物性格、测度具体戏剧情境后，以声传情，以情带声。《天仙配》是她演唱十分成功的一部作品，她曾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谈过自己的演唱体会，充分表明了她对七仙女在特定情境中情感的把握，并介绍了自己在演唱中的处理方法。

严凤英除了在唱腔艺术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外，在舞台上乃至银幕的表演上，同样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她所塑造的陶金花、七仙女、冯素珍、江姐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她在表演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可用"细腻"、"传神"四个字来概括。

严凤英虽然只活了38岁，但她对黄梅戏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极为深远的贡献。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严凤英，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更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观众群。

文革中，她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生性要强的严凤英不堪其辱，毅然服用大量安眠药。当其家属发现后，要求立即送医院抢救。但是，不行。因为她是'敌人'。随后，许多人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军代表来了。此时严凤英神智还算清醒，如果及时抢救，应该不会死亡。但军代表不是立刻抢救，而是对命悬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据其子回忆："我爸爸跟一个要好的老演员借了板车，老演员实在看不下去，求军代表，你让她去看病吧"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没办法，要送到住院部去。从门诊部送到住院部又耽误了很长时间，住院部的医生看了却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要我们抢救的话，需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等证明开出来以后，病人已经连呼吸都没有了。这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严凤英死后，军代表刘万泉仍不放过她，说她是国民党特务，肚子里有国民党的密电和发报机。于是，他叫来了医生，命令医生给死者当众开膛剖肚。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X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颤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人把死者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出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还发现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这一天是 1968 年的 4 月 8 日，距离严凤英 38 岁的生日还差 5 天。

【编者按：这个军代表刘万泉，1967 年底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支左”。从肉体上消灭了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刘万泉对严凤英的虐杀不是一般的政治迫害，而是所有刑事罪中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什么是‘危害人类罪’呢？例如：那个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人、那些用皮带把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的人、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等等，还有本文中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就是典型的危害人类罪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指示不能重用‘三种人’。但是他却忽略了第四种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谬。】

6、杨宝忠：戏曲大师囚于斗室冻饿而死

杨宝忠（1899～1968 年）安徽合肥人。出身梨园世家，京剧余派老生演员。其祖、父两辈都是著名的花旦演员。其姑丈王瑶卿，乃京剧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大名旦”皆出其门下，人称通天教主者。在王瑶卿的亲自指点、教授之下，杨宝忠 11 岁时便以“小小朵”艺名登台演出于北京、天津等地，颇受欢迎。21 岁，拜著名老生余叔岩为师。

上个世纪 20~30 年代是杨宝忠舞台生涯最活跃的黄金时代，虽然没有挑班唱头牌，但他在京剧舞台上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生演员。常与杨小楼、尚小云、小翠花、章遏云等著名演员合作，颇为一时名流所重。

后因变声，改工操琴。又因自幼酷爱音乐，与琴师陈彦衡过从甚久，对谭腔和胡琴演奏技巧有深湛的研究。他嗜爱西乐，师从朱蛛隐学习小提琴，并将小提琴的某些弓法融于胡琴演奏中。他的指法灵活，弓法顺畅，独具一格。

某次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举办音乐会，其中有老志诚的钢琴独奏，也有他的小提琴独奏。杨宝忠用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乐曲《梅花三弄》，令听众与同行惊叹不已。“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中国古人的乐思被他的西洋技法演绎得细腻流畅，绽放出异样光彩。杨氏“三弄”像春风吹遍了京城。不久这支曲子由美国胜利唱片公司以优厚的酬金请他录制成唱片，刚上市即畅销全国。

尚小云与他合作演出的新戏《摩登伽女》里，最后一场叫“斩断情丝”。尚小云以西洋踢踏舞蹈场面作为结尾，特请杨宝忠小提琴伴奏。当杨宝忠手握提琴，身着西服，风度翩翩地走上舞台，频频向观众躬身致意时，那个自发的、热烈轰动场景，实为现时舞台上靠“掌声有请”才有稀稀落落的掌声所望尘莫及。

中年以后，正式拜奚子刚为师，专业操琴。先后与言菊朋、马连良、杨宝森等合作，配

合默契。他与杨宝森和鼓师杭子和的合作，被观众称为三绝。着有《杨宝忠京胡经验谈》一书。

杨宝忠在当演员的时候，以《击鼓骂曹》最受欢迎。这是杨宝忠享名最早的拿手戏之一。这出戏有三段西皮二六唱段，第一段“丞相委用恩非小，区区鼓吏怎敢辞劳……”，转快板“罢、罢、罢暂且忍下了，明日自有我的巧妙高”时，“罢、罢、罢”三字，嘎然叠起，令人精神一振。每当唱到此处，全场必报以热烈掌声。演到击鼓时，[夜深沉]曲牌的鼓套子音色之美有如“敲金击玉”，铮铮有声，听之令人陶醉。与曹操对话时唱的“鼓打一通天地响，鼓打二通振朝纲……鼓发一阵为雷响”的“一阵”鼓，如单皮鼓的“丝边”，落点铿锵，快而不乱，确是不同凡响。

50 年代以后，杨宝忠出任天津市戏曲学校副校长并兼任课教师，积极培养戏曲人才，为京剧事业贡献甚伟。

北京京剧院的青年老生安云武，毕业于北京戏校。云武的父亲安延年是杨宝忠的弟子，宝忠很喜爱云武，曾教过他《碰碑》、《文昭关》、《击鼓骂曹》等戏。为了让云武在家中练习鼓套子，杨宝忠把他早年演《骂曹》使用的南堂鼓送给了云武，以鼓励他学好、演好这出戏。云武对杨宝忠先生的栽培教育总是感念不忘。

今天，闻名京剧舞台的很多位中年琴师如王鹤文、万瑞兴、魏国勇等皆为杨宝忠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菊圃百花开，杨派琴艺，后继有人。

“文革”开始，杨宝忠立即被他的学生、红卫兵以“反动权威”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市最早的“牛鬼蛇神”。后来杨宝忠身患重病，回北京家中就医。在此期间，他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串门。杨宝忠管梅夫人（福芝芳）叫舅妈，管姜妙香夫人（冯金芙）也叫舅妈。姜夫人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则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色拉。他每周三天去梅宅吃饭，三天去姜家就餐。所以杨宝忠自己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

【编者按：今天的青年人未必理解当时的情景。由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物资极度匮乏。当局不得不规定：每人每月配给几两油、几斤米。除非过年，根本就没有猪肉供应。因此偶尔有机会吃一点荤菜，那就好比过年一般。】

在北京，他还常去西单一家乐器行闲坐聊天。冬季某日，被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发现，劫持回天津，囚于斗室，无人管理，无人过问。几日后，冻饿而死。

‘文革’固然是毛泽东发动的，他无疑是罪魁祸首。但那些把杨宝忠劫持回天津，囚于斗室，无人过问,终至冻饿而死的红卫兵们，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吗？今天有谁能勇敢地挺身站出来承认、忏悔的？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些娃娃们今天的生活过得特美好，票子、房子……什么都不缺，唯一缺乏的就是：良知。而良知才是做为人最根本的品行啊。

夕阳十里，西风一叶。一个极具才情的艺术家，拯救自己的能力一般都很弱、很弱。杨宝忠广结人缘，最后却孤立无援。杨宝忠生性乐观，而离世的那一刻，不知心上可滴血，眼中可有泪？

第 9 单元　艺坛明星

1、石挥：戏剧和电影双栖　‘皇帝’被逼投水

石挥（1915-1957 年）著名电影演员、话剧演员、电影导演。原名石毓涛，天津市人，是“津门八大家”之一的石家第二门正廉堂后代,生于杨柳青。出生不久即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师大附小毕业又上了两年初中，因父亲失业生活困难，15 岁时就独立谋生：先后卖过报、在牙科诊所做过学徒、当过北宁路列车服务员、真光电影院小卖部会计等。1940 年赴上海，经幼时同学董世雄(影星蓝马)介绍，参加了“明日剧团”，又来天津演出。几经磨

练，演技逐渐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 40 年代初，参演了 30 多个剧目。

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独具风格、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无论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剧、悲剧，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演得栩栩如生。特别是他饰演《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蓉天锡，《秋海棠》中的秋海棠等角色，更是令人叫绝。

他扮演《雷雨》中的鲁贵一角，连曹禺都心悦诚服地说："石挥演得，比我写的都好。"他饰演《秋海棠》里的秋海棠，当石挥那张贴着口香糖当疤痕的脸，凄然地面对观众落幕时，连台下的梅兰芳都高声叫好。当时《秋海棠》在上海连续上演四个半月，共计一百八十场，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上海人吃了晚饭去看话剧，相互打招呼时不是说"看话剧去"，而是说"看石挥去"！石挥替代了剧名。当时生活在上海的张爱玲，观看了石挥的演出，并在她的文章中这样记述：《秋海棠》一剧风靡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味气氛的浓，石挥身上的京味或是痞气都让上海滩的观众感到新颖。

此外他还写过话剧剧本《云南起义》，导演过《福尔摩斯》等话剧，因此，1942 年，石挥被报刊与观众舆论一致评为"话剧皇帝"。

1941 年开始进入电影界。他第一部影片是在金星影片公司拍摄的《乱世风光》中担任主要角色。1947 年到 1951 年石挥在文华影片公司先后主演了 12 部影片，导演了 3 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抗战期间，在敌伪监视下，他竟大胆地把苏联文艺"夜店"改编为电影拍摄。其勇可嘉、可敬！电影《我这一辈子》是根据老舍的原著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作品，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经典影片，曾获文化部 1949－1955 私营制片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4 年石挥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 1955 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1955 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由于他在电影事业的突出成就，和赵丹一起被评为"电影皇帝"；而石挥则是戏剧和电影的'双栖皇帝'。

反右运动中，恰好刚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个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就说他'污蔑党的干部'；他平时爱说笑话，如指电影管理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等。这些玩笑话都作为罪证，遭到连续的批判和斗争。

两天之后，石挥登上了他拍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所使用的道具船"民主三号轮"。在甲板上久久徘徊、痛苦地思索，终于下定决心，以死了之。终年仅 42 岁，多么可惜！

石挥是个孝子，临死前几个小时，他仍不忘给远在故乡的老母亲汇出最后一笔赡养费用。

石挥的失踪立即引起官方的高度紧张。当局曾发过一条内参《右派份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楼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相符，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17 个月后，也就是 1959 年 4 月间，在一个春雨绵绵的黄昏，上海南汇县的滩涂上，被潮水冲上来一具早已腐烂、面目难辨的尸体。由于被裹在棕灰色的呢大衣里，人们很容易地断定：就是石挥。

几十年后，人们又从黑白胶片和发黄的文字中重新发现了他。1995 年，石挥被评为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研究石挥，已经成了电影学院的必修课。一家收藏旧物的旧书店中，常年高价悬赏收购石挥的旧剧照。

黄宗江在央视的《人物》访谈中，回忆起石挥时很是感慨，黄老说石挥是个天才，我最佩服的人是石挥。赵丹也曾经表示石挥是自己最佩服的演员。李雪健、刘佩琦、张国立、谢园等都曾表示石挥是自己最敬佩的表演艺术家。

2003 年电影《我这一辈子》被改编成电视剧，剧组曾邀请葛优来主演，但被葛优婉言谢

绝了；2004年崔永元的《电影传奇》栏目请姜文来再现石挥演过的电影，姜文也没有答应，他们都表示尽管石挥离去了50多年，但他的表演至今都是很难超越的。

石挥是中国演艺界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特色’下的牺牲品。他的死，标志着电影和一切艺术在中共统治下不可避免地衰败的命运。中共要求所有艺术都必须为政治服务，而政治又归结为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党魁的个人独裁。艺术和其它一切上层建筑统统被纳入政治的统帅之下，成为婢女、伺妾。悲夫！

【补白】

“我的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之所以能够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像抽彩。”

——前苏联作家爱伦堡回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时如是说

2、郑君里：“演导双绝”病逝在看守所里

郑君里（1911—1969年）汉族，原籍广东中山。中国著名影演员、导演。自幼家境贫寒，进义学念书。因酷爱艺术，读到初中二年级，中途毅然辍学，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南国艺院”是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解放后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如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著名艺术家等都毕业于此。

1929年夏，郑君里在南国剧社参加《莎乐美》、《卡门》等剧的演出，与陈白尘等创办《摩登》戏剧半月刊。1931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起草《最近行动纲领——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同时，他还加入摩登剧社、大道剧社，演出《乞丐与国王》、《血衣》、《乱钟》等剧。1932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先后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20部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并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娜拉》、《大雷雨》等舞台剧。在银幕和舞台上，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和表达角色内在情绪，富于艺术魅力而逐渐成名。

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三队队长。带领队员辗转沪宁铁路各站，溯江而上。武汉失陷后，又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接着在桂林、宁夏、青海、兰州、西康、西昌、兰州以及缅甸的密支那、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所主演的《民族万岁》、《野人》等剧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他还曾导演过《求婚》、《狂欢之夜》等话剧。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历时两年，亲赴西北、西南地区拍摄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了《戏剧春秋》、《祖国》等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

1947年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虽是在老艺术家指导下的导演习作，却已显露出他非凡的禀赋与才华。翌年，他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了该片。据说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郑君里与赵丹、陈鲤庭、陈白尘等人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兴趣盎然，便开始酝酿该剧本。这部影片的创作最终跨越了两个时代，它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在人物刻画、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影片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从此，郑君里凭借此片当之无愧进入中国一流导演的行列。

50年代后期，他的电影导演艺术步入鼎盛时期，影片《宋景诗》（与孙瑜合导）场面宏伟，气势磅礴，反映了当时鲁西农民起义的真实面貌。他执导的《林则徐》和《聂耳》，获得广泛的好评。现在看来，这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有很高成就。它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经典，

也是郑君里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这两个人物都是由赵丹主演的；特别是“林则徐”，是赵丹所创造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

1949 年后，郑君里很快创作了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长期以来，他还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和著述。据其子的回忆文章写道：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在表演理论方面下工夫。他先是试着翻译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技》。由于自己只有初中肄业水平，英文并不好，只能靠着刻苦用功。先是对照英文字典“啃”下来，再拿俄英字典对照原本，发现差错再改过来，这样一遍下来英文也有很大进步了。

郑君里也是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他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语转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他与章泯合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话剧表演艺术的著作。郑君里另一部重要著作——《世界电影艺术史》。当时还没有人把世界电影和苏俄电影融合在一起，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从世界电影的角度来编写世界电影的编年史，这是他的一大贡献。对国外的表演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总结，对他自己后来转做导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准备。

他的《论抗战戏剧运动》1939 年曾以单行本出版。进入 40 年代后，即已开始《角色的诞生》的构思和撰稿。在人生的艺术道路上，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已经出版的论着有《角色的诞生》、《画外音》，译着有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郑君里是一位擅长驾驭“重头戏”着称，以拍摄人物传记片见长的电影艺术家。

‘文革’开始，作为“反动艺术权威”、“资产阶级黑线人物”，郑君里和一大批演员、导演都被打入牛棚，受到非人的虐待。据其子的回忆：好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只是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那种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还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另一个著名导演，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导演还是父亲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也是父亲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亦复可叹的是，此人虽然打了父亲，也未能减轻自己的“罪责”。真是何苦来哉？

“关于父亲之死，公认的说法是：因为父亲熟知江青上个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滩的底细”——他儿子如是说。

郑君里、赵丹和蓝苹(江青)，都是上世纪 30 年代上海演艺圈里的好朋友。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女主角，郑君里与赵丹、舒绣文都曾给她配过戏。1936 年 4 月 26 日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恋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隆重的婚礼，曾经轰动一时。这场婚礼就是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证婚的。郑君里与黄晨结婚，伴娘也是蓝苹。蓝苹不辞而别唐纳，后来又给唐纳写信，也是由郑君里转交的。

50 年代初期，郑君里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但随着江青日益走红，逐渐步入政坛，这种朋友关系很快变成了仇敌。对于郑君里来说，就成为一种灾难。当年那场轰动一时的婚礼整整 30 年之后，摧毁一切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文艺界中，导演郑君里、演员赵丹二人首当其冲。

据郑君里之子郑大里回忆：某日忽然来了几个身份不明的人进行抄家。那些人把家里抄得乱七八糟，但该拿什么东西、不拿什么东西，他们显得非常专业。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等几家，其中我们家被抄得最厉害，足足抄走了两卡车文字材料。被抄家后，父亲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事后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来抄家的都是空军第四军的人。但究竟谁是"导演"，现在还是个谜。有一种说法是幕后的操控者实际为叶群，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得很详细：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锅炉房里，叶群把江青叫去，当着她的面全部烧毁。据说还有一部分材料，被带到林彪叛逃的飞机上，或者被烧毁，或者失落在俄罗斯的某个地方，至今仍然是个谜。我曾经托人设法把这批材料要回来，但没有下文。

郑君里与赵丹先后入狱，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 5 年，总算有幸被"解放"出来。但郑君里却一直没有"出来"。郑君里被隔离审查后，曾先后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少管所等数处。其夫人黄晨不能与之见面，只有他 17 岁的儿子郑大里偶尔前往探视。在看守所，郑君里患上肝癌晚期，1969 年 4 月 23 日，郑君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他的亲属前往道别，只有匆匆 10 分钟时间。

1984 年郑氏族人及家乡父老建亭纪念。该亭位于三乡镇下杨村，亭为六柱四角黄色玻璃瓦攒尖顶，亭额刻有"郑君里纪念亭"，由吴作人题额。

（附注：当年那场婚礼的参加者中，除了杜小娟病逝，唐纳、叶露茜远在海外，凡是留在大陆的无一幸免。其中顾而已在屡遭迫害之后，终于不堪其辱，于 1970 年 6 月 18 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的门梁上自缢身亡，时年 55 岁。同在五七干校的其父顾也鲁，当时正在烧锅炉，闻此噩耗，顿时痛彻心扉。）

3、冯喆：一代才子死因十分可疑

冯喆（1921—1969 年）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原籍广东南海（佛山），生于天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辍学，后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主修大提琴。曾参加美艺、华艺、同茂等文艺团体，先后演出了《家》、《风雪夜归人》、《上海屋檐下》、《大明英烈传》等 40 余部话剧。1946 年入上海国泰影片公司，主演了《裙带风》、《忆江南》等多部影片。1948 年到香港，在《恋爱之道》、《结亲》等影片中扮演多种角色。1950 年回上海，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后调入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在《羊城暗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桃花扇》、《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一提到《南征北战》中的有勇有谋的解放军"高营长"、《金沙江畔》中英勇果敢、斗志昂扬的"指导员"、《羊城暗哨》中的虎胆英雄"侦察员"、《铁道游击队》中睿智老练的游击队政委、《沙漠追匪记》中为革命献身的"骑兵班长"，还有《桃花扇》中那位多情却又变节的一代名士"侯公子"，热心的观众定会对这些中国著名影片中的著名角色记忆犹新，津津乐道。这些使我们一代又一代影迷朋友熟知的银幕形象的扮演者，正是鲜为人知的冯喆。不难看出，冯喆的戏路非常宽广，且人物反差极大，既能演文人，又能演武将；既能演现代革命青年，又能演古代多情公子，可以说是古今纵横，工农商学兵都能演，而且演得十分逼真。"性格演员"之誉当之无愧。根据冯喆唯一在世的亲人——他的胞妹——香港前凤凰影业公司演员、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前副会长冯琳女士的回忆：早在 1961 年，由于"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后遗症，空前大灾难的无情袭来，国家重新调整经济方针，开始压缩、改建、合并和撤销在"大跃进"中纷纷上马、遍地开花的各省已成立的地方电影制片厂。上影的天马厂决定与四川的峨眉厂合并，厂址仍定在成都。冯喆被列入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厂建设者的名单中，但美其名曰是'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在此之前 1957 年，他的妻子张光茹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川剧事业，已经调往四川成都川剧院。

冯喆在峨影厂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无片可拍，只能全身心投入新厂的各项建设之中。仅在本厂参加《人民公社万岁》等纪录片解说的幕后工作，倒是在上影厂来四川外景地拍《金沙江畔》时，临时借用他主演了‘指导员’这一角色；同一年的 1963 年又被西影厂盛情特邀主演《桃花扇》。

来势凶猛的“文革”风暴，彻底改变了冯喆的命运，使他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中。‘文革’刚开始，峨影厂紧跟形势，全厂上下开始深入揭批“文艺黑线”。冯喆遵照厂里的决定，对这场触及灵魂、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匆匆告别当时借调工作的珠影，返回峨影，参加运动闹革命。然而，等待冯喆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刚一回厂即被戴上“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等莫须有的大帽子，遭到厂里造反派的围攻和批斗。这场来势凶猛的打击，给冯喆猝不及防，当头一捧。他解放前参加由党的“左翼”文化运动领导的“同茂”剧团演出，还有解放前夕赴香港拍片的经历，本是他一生都引以为荣、感到自豪的历史，却在当时是非颠倒，成为其罪证。对这些强加的罪名，冯喆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并且极力申明、表白、解释、辩护，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他的每一次申辨，换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的批斗、游街，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拳打脚踢。冯喆身陷囹圄，随时都可能被失去人性的造反派招之即来，进行肉体摧残和人身凌辱。这是冯喆一生中最为沉重而悲凉、凄惨而恐惧的日子。

此时，冯喆的妻子张光茹自然也是被作为“专演才子佳人的旧戏子”，强行送进了成都市文艺系统学习班，整天就是不断地反省自己。其实她与冯喆早在上海就已情感破裂，早已分居。她还向峨影厂造反派密报了冯喆和一些同事从前谈论形势的言论。结果，冯喆被装进麻袋里毒打。在遭受肉体摧残的同时，他的内心更在默默地流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倾情恩爱过的妻子，竟会如此无情无义地检举、揭发自己那些早已淡忘、无关大局的闲谈。

从 1966 年到 1969 年，是“文革”风暴最为猛烈之时。

1969 年新春刚开始，省“革委会”就迅速做出决定：把整个省级文化系统单位的人员全部驱赶到著名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所在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也就是所谓“刘文彩庄园”（“收租院”就在这里）去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全班人马一千多人进驻安仁镇中学，当时名称叫“四川省级文化系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千余人全部按连队编制，集体居住在各大教室内，室内安置上下铺木床，仅留过道通行。而对那些重点管制的“专政对象”，则集中在与一般人员居住区相隔不远处的大教室里，后来被称为“红色牛棚”。当时，“专政对象”共分为三类，即“走资派”、“当权派”、“黑线人物”和“三名三高”，冯喆被列为最后一类。这个学习班的活动首要任务是“天天读”，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大批判”，以及折磨人的苦役惩罚。在学习班里，冯喆对造反派强迫自己所干的重体力劳动，只能默默地干，而且干好。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对自己的精神折磨。《桃花扇》作为“大毒草”，在“集中营”的大操场上放映。造反派们边看电影边振臂高呼“打倒”口号。随后，又把从剧团抄来的戏服强行给冯喆穿上，拉到街上对着高音喇叭，又是一通响彻云天的批斗口号，使冯喆的身心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摧残。

1969 年的初夏悄悄地来到，“集中营”里对“重点管制对象”的历史问题和现行表现正在进行综合定论，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线铺开。这些“重点管制对象”，一个个被单独带走，重新提审，令其交待以前所谓的历史问题。过去的批斗、游街和毒打，现在升级到更加残酷的严刑逼供。

6 月 2 日这一天，“集中营”里的高音喇叭传出凶神恶煞般的声音：“冯喆，你在哪里？赶快回来！如不回来，后果自负……”这种声音反复叫嚷了十几遍，十几个专政队员来回奔跑，像是在上天入地般地搜查“逃犯”。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到操场大草坪上，口气生硬地宣布说：冯喆已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著名影星自此永远消失。他死亡的时间是 1969 年的 6 月 2 日，年仅 48 岁。

对于冯喆自杀的说法，人们一直怀疑。据知情人揭露：冯喆在死亡的头天下午还被造反派几个头目叫去训话有人亲眼见到冯喆与造反派头目发生争执，被这个小头目用一个三条腿的板凳猛击后脑勺。因而很可能是被打死的；而且在他死后当天下午立刻送火葬场火化，实际上就是焚尸灭迹。

1995 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 100 周年、中国电影诞生 90 周年之际，冯喆被国家文化部列为 126 名“中华影星”之一。2005 年，冯喆又被评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星”之一。然而这一切对于冯喆来说，已毫无意义了。

有位哲人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中死去，而死人却可以在活人心中复活”。细品此话，很有道理，而且含义非常深刻。

4、王莹：中华女杰瘐死狱中

王莹（1913—1974 年）安徽芜湖人，中国电影女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1928 年秋天，为了躲避军阀的追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阿英等人的帮助下，她从南京逃到上海。最初在浦东的一所小学任教，同年十月，王莹加入了由阿英、夏衍等人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这是中共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剧社。王莹跟随剧社参加了不少演出，最早是在复旦剧社里充当配角。但因她有一定的表演基础又有艺术爱好，胆子也比较大，所以在演出中渐渐地展露出独特的表演天赋。后来就逐步由配角而主角，最后终于成为名闻遐迩的表演艺术家。

在艺术上日益精进的同时，她还参加了共青团，并于 1930 年加入中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此曾经 4 次被捕。

1932 年参加左翼话剧运动，与袁牧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同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女性的呐喊》（1932）、《铁板红泪录》(1933)、《同仇》(1934)等影片。这三部影片是当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经典之作。

因对当时、当地的电影界腐败现象极为不满，1934 年发表《冲出黑暗的电影圈》一文后去日本留学。1935 年回国后进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在夏衍编剧的《自由神》中成功地饰演冲出封建家庭的‘五四’新女性陈行素。电影艺术家赵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观看王莹演出时的情景——“我当时去看她演出的时候，演完以后整个静场。过了很快，底下掌声像暴风雨般响起。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1936 年主演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话剧的奇迹。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组织救亡演剧二队，到 15 个省区巡回演出抗战戏剧。1939 年任新中国剧社副团长兼主要演员。1939 年，根据周恩来指示，王莹和金山带领文艺工作者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募捐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深受当地侨胞欢迎。在陈嘉庚的协助下，购买药品，支援抗日。在新加坡，徐悲鸿在为王莹作题为《放下你的鞭子》的画上题词：“中华女杰——王莹”，此画由陈嘉庚珍藏，现存台北博物馆。1940 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将王莹等人驱逐出境。1941 年，在香港参加“旅港剧人协会”，为配合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宣传，王莹参加《马门教授》（又名《希特勒的杰作》）的演出，并得到香港“保卫中国大同盟”领导人宋庆龄和外国友人的帮助。不久，港督向日军投降，他们被迫撤离香港。王莹、夏衍、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等辗转至重庆。1942 年，王莹准备离开重庆去美国，周恩来单独接见并叮嘱她要不断求艺，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年 7 月，王莹和丈夫谢和庚一起，在中共的协助下，以国民党政府“选派留学生”的名义，前往美国学习。王莹开始在耶鲁大学攻读文学，后去邓肯舞蹈学校，常与美国文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赛珍珠、美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以及美

国作家史沫特莱等名流交往，并帮助史沫特莱校订朱德将军传记。王莹还担任了美国民间组织“东西文化协会”的董事兼中国戏剧部主任，组织在美国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到美国各地演出抗战戏剧，介绍中国抗战情况。1943 年，王莹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以纯正、流利的英语在白宫表演了话剧《元配》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时身已瘫痪、坐着轮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携妻子、子女等前来观看，副总统华莱士以及白宫高级官员、各国驻美使节等也看了演出。赛珍珠女士报幕，王莹用英语介绍节目，接着演出《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和其它民歌，当王莹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时，观众深受感染，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王莹与罗斯福总统合影留念。她的这次演出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在白宫演出的中国演员。”多年以后，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回味无穷。1946 年，王莹开始自传体小说《宝姑》的创作。为了写作这部 30 多万字的小说，整整用了两年多时间。这部小说当中，她以细腻而温情的笔触详尽地描述了故乡芜湖的风土人情，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和祖母、母亲三代女人各自不同的故事，其间，她还将这部小说翻译成英文。

1949 年后，为了阻止王莹夫妇回国，当时的美国移民局将他们逮捕入狱。经过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他们才于 1955 年元旦之夜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国后调北京电影制片厂，旋迁居北京西郊香山从事小说创作。这期间完成了《两种美国人》的写作，这是王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作品。60 年代全国文代会在香山召开时，周恩来发现王莹没有到会，就叫人把王莹找来参加会议，而且当着那么多与会代表的面对王莹说：“你在美国做的事情我们都是知道的，你做了不少工作”。

王莹学识广博，多才多艺，从 30 年代初起就在文坛上享有盛誉。她以清新隽永的文笔撰写了许多散文、游记和影评，颇受知音者的赏识，故有“文艺明星”之称。夏衍赞誉王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情”。王莹与陈波儿等人被认为是电影圈内的女作家。

‘文革’风暴袭来，王莹的命运顿时逆转。由于当年和她争演“赛金花”一角而失败的江青已经成为“伟大的旗手”，其势炙手可热、权倾天下。在江青的指使下，王莹夫妇被诬为“30 年代的黑明星”、“美国特务”。于 1967 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狱中遭受了长达 7 年的非人的折磨，1970 年后，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

1974 年 3 月 3 日不幸含冤瘐死狱中。在她的死亡书上，留下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一个‘6742’代号。1975 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此情况后，马上下令放人。被关 8 年的谢和赓终于出狱，此时两耳失聪，甚至丧失语言能力，也丧失了思维能力。

一代名伶，瘐死于‘文革’中。聊以告慰于亡灵的是：她所写的《宝姑》、《两种美国人》等书已由夏衍、阳翰笙等作序，公开出版。她的传记《洁白的明星——王莹》也已出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 2000 年设立以来，共有 20 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 15 位是 1951 年前大学毕业的。

5、孙维世：烈士遗孤惨死狱中

孙维世（1922—1968 年）是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炳文牺牲后，被周恩来收养为义女。1934 年在北平贝满女中上学。

1936 年随母亲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剧活动。1937 年随兄长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 年 16 岁加入中共。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后至延安学习。1939 年被周恩来从延安带到莫斯科留学，攻读戏剧。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1946 年回国，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陕、晋、冀一带活动。当时的延安，有冯风鸣、张醒芳、郭兰英等女性比较活跃，一时被称为“延安四大美女”。

1949 年 12 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担任翻译组组长。

1950 年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先后执导了《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先后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兼副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中国剧协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她还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4～1956 年间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教材，还翻译了哥尔多尼的名剧《女店主》、《一仆二主》。1956 年夏与欧阳予倩合作组建中央实验话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导演了《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等。她是新中国的杰出导演之一，曾系统地传播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并联系中国的戏剧界的实践，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舞台艺术形象。1954 年编导童话片《小白兔》。着有话剧剧本《初升的太阳》。

1950 年在导演《保尔•柯察金》时，与饰演‘保尔’一角的金山相恋，并随之结婚。在婚礼上，周恩来送来一件礼品，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义父的良苦用心俱在这本小书中。

像孙维世这样根红苗正、又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其人生道路本来应该是一帆风顺、直上青云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飙骤起，她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早在苏联学习期间，当时也在苏联养病的林彪曾经狂热地追求过这位绝代美人。虽然遭到婉拒，但仍然贼心不死。作为林彪的现任妻子叶群心里非常清楚，当然视为潜在的情敌。此其一；其二是江青曾经多次提议和她合作搞出点艺术成果，又被婉拒了。因此不免怀恨在心。另外，江青之所以迫害孙维世，还有一个更阴险的政治目的，那是企图通过孙维世，栽赃诬告，揪出她的义父周恩来。

“她是我的仇人。现在趁着乱，你去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是叶群对江青的一段悄悄话。这段话雄辩地证明：两个野心家同心、合谋，再借助于‘文革’的狂潮，孙维世的悲剧命运就成为必然了。

1967 年 9 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哥哥的无辜死亡，引起孙维世满腔悲愤。她当即写信给江青，要求中央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但其结果如泥牛入海。

第二步棋是：1967 年 12 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资料、照片。最后一步直奔主题：1968 年 3 月 1 日深夜，孙维世家里的房门被敲响。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汽车在外面转了不知多少圈才停下，孙维世被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并连夜审讯。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只有司法机关或公安部门才有权对公民实行逮捕法办。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里。抓捕孙维世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为了阻止周恩来的营救，他们没有将孙维世关进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看管”，而是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并将她的名

字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从被关押那一天，孙维世就注定了将被磨至死。

孙维世被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 1968 年 3 月 1 日投入监狱中，即时就戴上手铐。在随后的日子里，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仅仅 7 个月后，1968 年 10 月 14 号，孙维世就被活活打死。死后浑身布满伤痕，冰冷的手铐脚镣仍紧紧地锁着她的四肢，据说头颅中还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钉子。据同狱人讲，她的尸体赤裸着，遍体鳞伤，让人惨不忍睹，可怜！可叹！新中国第一代著名女导演，年仅 46 岁，竟这样死于非命！

三天后，即 1968 年 10 月 17 日，周恩来得知孙维世死亡的消息后，大为震怒。这位在“文革”中为了维护大局，对许多事情一贯隐忍的国家总理终于愤怒了。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挥笔批示：“（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可是江青一伙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强行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

40 年前，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密令腰斩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他的妻子任锐忍着悲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0 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在烈士的女儿身上重演。只是凶手不再是国民党、蒋介石，而是…….。

如今又是 40 多年过去了。可还有几人记得这“血”、这“恨”？也许真的已经付与“秋风”了？

第 10 单元　杏林高手

1、傅连璋：毛泽东的救命恩人 却无人救他一命

傅连璋（1894--1968 年）著名医生，福建长汀县人。青年时代就读于汀州亚盛顿天主教医学专科学院，后留在长汀天主教医院执业行医。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激于义愤而参加签名，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并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1927 年 9 月南昌起义军途经汀州时，傅连璋基于人道主义关怀而发动汀州所有医务人员成立“合组医院”，无偿医治徐特立、陈庆等 300 多名红军的伤病员。此后，以其社会职业作为掩护，积极从事革命事业。1929 年 3 月，红四军入闽再度夺取汀州城后，他领导福音医院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1931 年后，在汀州先后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并任校长，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培训了一大批医护人员。

1933 年，毛泽东患恶性痢疾赴长汀求治，经傅连璋救治后病愈。从此，傅放弃每月 400 大洋的优厚待遇，连同自己的整个福音医院和多年的积蓄，迁往红色之都——瑞金，全部捐献给中共，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叶坪洋岗下村创立了苏区最大的医院——中央红色医院。后又创办了红军卫校。1934 年红军长征的前夕，毛泽东连续两次患恶性虐疾高烧昏迷，生命垂危，均由傅连璋抢救后，妙手回春。因此毛泽东称誉傅连璋医生为“活扁鹊”，三次救其性命。随后，傅连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中央总卫生处处长，中央医院院长，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局局长。1938 年加入中共。1949 年后，历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首长保健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学会会长，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 年获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像傅连璋这样的高级干部，又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怎么也会遭受迫害呢？说来话长。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早在 1950 年准备“抗美援朝”时，毛泽东首先点的将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林彪竟然拒不从命，还提出反对出兵的异见。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举。美国又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 个军就有各种火炮 1500 门，而我们 1 个军只有 36 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为此，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

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毛泽东专门找林彪谈话。恰在此时，林彪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什么病？答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怕……竟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因此，林彪在北戴河的别墅是经过反复选择才确定下来的。要求是一定要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浪声，但又有着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他住室的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空气还要进行过滤。外人进去，必须经过紫外线消毒后方可进入室内。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也不好勉强了，才改派彭德怀率兵前往赴朝。

由于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这次虽然违命，毛泽东对林彪仍然十分器重和偏爱。不但没有批评他抗拒赴朝的行为，反而更关心他，让医术高超的傅连璋组织专家为他全面检查身体。傅连璋奉命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萧华将军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特意让叶群出面找傅连璋，暗示他最好先给林彪开一个疾病证明。秉性正直的傅连璋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主要器官有什么严重的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更与他吸毒成瘾有关。会诊后，傅连璋将林彪健康情况向叶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晒太阳，多散步，多呼吸室外新鲜空气，并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多喝茶水。傅连璋还亲自劝告林彪：“若要长寿，请戒吗啡！”事后，傅连璋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钻进“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为戒。

从此，林彪便怀恨在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恰好在 10 年后即 1960 年，林彪全面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遂开始找岔儿整他。再过了 6 年，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已是炙手可热，乃进一步迫害傅连璋：殴打、游斗、抄家。林彪的死党邱会作一伙组织人批斗傅连璋所谓的“三反言论”。在军委卫生部机关和宿舍大院内，揭露他“罪行”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在遭受迫害后，傅连璋于 9 月 3 日写信向毛泽东求救。信中云：“我在长汀、瑞金救过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

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而且‘一句顶一万句’。可是他这句话却丝毫不起作用，等于废话。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他这个批示既不交代应该由谁来贯彻执行，更没有追究责任。看来这个批示纯是敷衍而已。部下那些走狗们当然心领神会，知道领袖的真实意图何在，也就没有当真了。

因此，林彪才敢于无视毛泽东那个‘最高指示’，仍不放过傅连璋这个‘宿敌’。1968 年 3 月 14 日清晨，邱会作根据林彪“把他抓起来”的旨意，在京西宾馆坐镇指挥，将傅连璋及其妻子陈真仁秘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

他被单独关押在 201 监区 16 室，囚号为 6847（囚号是监狱当局为被押者所编的代号，即 1968 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的第 47 位高级干部）。其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无休止的审讯逼供，让他交待“罪行”，他坚决抗拒，并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生活上的折磨很快就摧残了他的身体。他的体质本来就虚弱多病，管理人员却奉命只给他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他只能喝几口菜汤。在审讯时他“拒不交待问题”，因此被打断了 3 根肋骨。此时傅连璋已是 74 岁高龄，拖着断了 3 根肋骨的身体，又有胃病，不能吃窝窝头，要求吃稀饭，监管人员不给。3 月 18 日，他敲门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 33 室看押。3 月 19 日至、21 日接连 3 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他进食很少，吃了一点也都吐出来。由于营养不良，老将军卧床不起。3 月 22 日开始他不再进食。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向‘上面’交代，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太晚了。3 月 23 日他“两顿未饭”，又被换到 27 室关押。3 月 28 日，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晚上，牢房外惨淡而昏暗的路灯光，透过窗子射进屋子里来，老将军无法入睡。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有时又从床上爬起来，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

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床下。3 月 29 日早晨 7 时，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等到 8 点多钟打开牢房时，这位中将、高干浑身冰冷，早已魂归西天矣。傅连璋将军从入狱到死，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死后当天便被火化，骨灰也没有保留。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傅连璋临死前仍然顽强地要求见毛泽东。他哪里知道：今日的毛泽东不再是那个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的时候了，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神已不再需要他这个老医生了。当然不会屈尊来见这位昔日的救命恩人。在迷惑与悲愤中，傅连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关押在秦城监狱中第一个含冤而死的高级干部。

傅连璋以仁术济世，行医数十年，挽救过无数生命，包括中共权贵、要员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彪、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最后却惨死在毛泽东的极权制度的迫害下。终年 74 岁。

傅连璋生前的遗着有《肺结核病的疗养》、《养身之道》(后更名为《健康漫谈》)、《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等。

“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没有肉的香肠”

——1990 年 2 月 4 日莫斯科 20 万人在市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向将于次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示威口号之一。

2、王药雨：国医巨子一门三右派

王药雨（1904--1979 年）出生在天津桃源沽。其父是老中医，因此王药雨跟着父亲学医。但因家道贫寒，不得不到天津学银匠。这活儿又苦又累。

由于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矢志于济世救人的医学，有“不做良相，便为良医”的远大抱负。他一边敲打着银活，一边自学中医，只要有时间就阅读、背诵《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和张仲景的《伤寒论》等名著。后来经人推荐，转入天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

又一个机会降临了：美国植物考察团来华，准备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王药雨有幸随团而行，再次上演了神农尝百草的一幕。1928 年，又师从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泰斗张锡纯。(张锡纯是中西医学汇通派代表人物，1909 年完成《医学折衷参西录》巨著，是提倡并实践中西医相结合的先行者，1920 年誉为中国四大名医之一)。这期间，他还结识了北京四大名医中的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名师出高徒，高徒缘名师。在张、孔、施等名师指导下，再加上个人的拼搏奋斗和聪明过人的智慧，王药雨奠定了高深扎实的医学造诣。1930 年，他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 年又转入施今墨为院长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还主编了《明日医药》杂志。这本杂志是专门宣传提倡中西医相结合和中药西制的刊物。一时名扬神州，影响遍及海内外。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支持抗战，他来到陪都重庆的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究、试制中西医结合的中成药。其中最成功的方剂是《健胃灵》，商标注册图形为“射箭”。此药效果灵验，深受民间和军队好评。中共方面闻讯也来购买，出面的人物竟是康生。没有想到药厂成了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很快被炸弹荡平。负债一身的王药雨，只好跑到昆明去行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草药最大的出产地和集散地，也为王药雨的‘中药西制’思路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实验基地。那些驰

名中外的中成药就是在这里陆续诞生的。1954 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声名远播的王药雨当然也被召回北京，从事中西医研究工作。此项研究得到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亲自批文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王药雨的宅居。今天为国人所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中成药方，就是王药雨在此时此地源源推出的。

王药雨的人生信条是：作为医生就要"敬事爱人，医德为先"。就是这么一个"敬事爱人，医德为先"的国医巨子，竟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要来过问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也是政治压倒一切的必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1957 年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王药雨却一言不发、一字未写，拖到最后，党委书记找到他谈话，再一次进行动员。这时老王担心落个'抵制运动'罪名，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内容先是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然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应选用多少懂点医学或学历高的人来学习中医。自觉谨言慎行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祸从天降：大字报内容属于恶攻击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社会主义毒草"。这年年底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与此同时，"农工民主党"竟然为此开除了其党籍。

是真金，到哪里都会闪光。王药雨是个以行医为己任、敬业守道之人，到了青海省医院不久，竟然门庭若市，求治者常常排队候诊。凡经他把脉处方的病人，无一不是药到病除，霍然而愈。一时王药雨被誉为神医。

1960 年时值"大饥荒"年代，全国一盘棋，青海省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基于少数民族政策，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以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奔赴牧区。

他们以马代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访问和诊治（1961 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费时半个月，历尽艰辛，考察结束回到西宁市，在写考察报告时，王药雨与党委书记李子彬产生了分歧：李子彬让王药雨执笔，如实呈报，不回避死亡是饥饿造成。但王药雨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绝口不提"饥饿所致"四个字。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理直气壮地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王药雨被逼无奈，诚恳地说出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

通情达理的李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李子彬执笔：开门见山，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造成，而且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因为饥饿！

另一份报告则由王药雨撰写。内容却讳莫如深，全篇报告不提"饥饿"二字，只是说'缺乏营养所致'。考察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不经意间被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两位记者看到，一下捅到了北京。

"庐山会议"后全国各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批特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省、市也在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情闹到中央，刘澜涛只好责令批判李子彬。不久，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黜到黑龙江省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与此同时，王药雨却因避重就轻的"圆滑"报告，得到省委书记的赏识而受到表扬。两种做法，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说真话者，自讨苦吃；说假话者，有功受赏。他们二人的试验，再一次证明了：在极权制度下，通行的规则就是如此。

在李子彬举家搬迁的前几天，特邀请王药雨去家中吃晚饭，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倾诉，破例地喝光了一瓶茅台酒。李子彬酒后吐真言，坦率地说："王医生啊，看来我们共产党是

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了真话成‘右派分子’，我说了真话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还有谁敢讲真话啊？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如何得了哟！”王药雨含蓄地深沉一笑说道：“李书记，喝酒，国家大事我们就管不了啊！”

自此，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了莫逆之交。1972 年 5 月，李子彬把已经退休的王药雨请到双鸭山矿务局边休养边给干部、职工义诊。分开十一年的老朋友在异地它乡重聚，‘别有一翻滋味在心头’，往事、今事、后来事，一直谈了几天几夜。1973 年，李子彬调到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任党委书记，再次邀请王药雨到疗养院义诊和疗养。他们俩互诉衷曲。但谈了什么？二位都先后作古，我们无法得知。王药雨不但自己是“右派”，两个儿子也都成了“右派”。

三儿王唯，少年报国，投笔从戎，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解放前夕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进军西藏。因为有文化，几年后提升为副营级干部。在后藏日喀则担任班禅活佛的机要秘书，实际上是西南公安部门安插在班禅身边的眼线，负责监控任务。但他不履行职责，不去监控班禅。由于所谓“思想右倾”，被调到重庆北陪军事干部学校进修。1957 年毛泽东号召“向党提意见”，他极积响应号召，本着赤诚爱党之心，向学校高层领导林铁开炮：批评林铁重用曾是三青团骨干的小舅子。有领导劝他悬崖勒马认错，他不听规劝，坚持己见，后来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改造，后又转到“415”劳教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1959 年因私下说毛泽东先后有过四个老婆，江青是与毛先怀孕后成婚，不是元配夫人等等，被人揭发检举，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 9 年。后一再申诉，改判为 4 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劳动（实为“二劳改”）。“文化大革命”期间留场单位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说他“叛国投敌”被判刑 7 年。1979 年“平反”，时年己 52 岁，恢复 18 级干部待遇。因军校编制早已撤消，故就地安置，至今一直生活在云南一个边远小县。让人欲哭无泪的是 7 年冤狱的‘刑事判决书’，竟然是就业劳改单位伪造的，没有存档底案。据此，政法部门不予受理赔偿事宜。

四儿王古白，1949 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任北京一中心小学体育教师。1957 年“大鸣大放”，也是响应毛泽东号召，将 1955 年“机关肃反”所目睹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之类事例揭露出来，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所幸能及时“认识错误”，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尔后又调回学校烧锅炉。1979 年“改正”复职，至今未获分文赔偿。

在王药雨的儿子中，只有六儿王六桥幸运。1957 年秋季刚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因涉世不深，又临近反右运动的尾声，因而平安渡过 6 年大学生涯，是王家最幸运者。大儿王誉虎虽未当右派，却卷入“6•4”政治风波，同情并支持学生，因而被关押了七个月，所幸未判刑。

今天，谁还知道国手王药雨其人呢？只有他研制出的那些疗效显着的中成药片剂、丹剂、水剂仍在被人们广泛地服用，并且疗效显着。他的医着《实用中药学》也在被广大医务工作者不断地学习、引用。他的药在、书在，在人们不断地运用中，王药雨是不朽的！

王药雨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济世救人，服务公众，造福社会，传诸后代”。

3、李宗恩：医学博士晚年抑郁而终

李宗恩（1894－1962 年），江苏武进人（今常州市），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幼时就读于其父所办的新式小学，后来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11 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继而进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 年毕业；1921 年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1923 年回国至 1937 年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

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间并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李宗恩所任职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办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建成于 1921 年。

1918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投资兴建协和医院的同时，还在当地建立了专家别墅区（另一处别墅区建立在北极阁胡同，称“南院”），历时三年完工。这片建筑，被当时的北京人称为“洋楼”。至今，整个院落仍完整保留了西洋风格，国内罕见。现为“协和”的家属宿舍。

1937 年秋开始，李宗恩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担任院长职务。1947 年 5 月回到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院长；1948 年获格拉斯哥大学医科博士学位。

李宗恩在 20、30 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共 18 篇。他曾在华北、华中地区设立血吸虫病及其它多发性热带病的病情观察站，是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后期投入医学教育事业，造就无数医学界人才。毕生从事医学教育、科研工作，对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有较深研究，在领导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尤有建树。1948 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据其弟回忆：在贵阳医学院期间，一天早晨，一辆汽车开到阳明路本部，跳下两个大汉，要求马上见李院长。一听说院长还未上班，就要了地址飞驰而去。李宗恩所乘坐的人力车正好与他们相遇而错过。他一到学院，听说有这样的人找他，心中十分狐疑。等那两个不速之客再次折返贵阳医学院，才知道他们是来求援的。原来当时关押在贵州修文县的张学良将军患急性盲肠炎，要李宗恩派人去做做手术。在东北军的余部中，少帅的威信很高；东北军当时军心不稳，抢救张学良就成了当务之急。李宗恩当即向红十字会借了一辆救护车，配备了必要的器械药品，派学院的外科主任杨静波率一个医疗小组前往修文县，是就地手术，还是带回学院手术，全由杨静波视病情决定。他事先与中央医院联系，安排了“保密”病区——非医护人员，不得进入该病区。手术后来由杨静波在中央医院完成。张住进病房以后，消息层层封锁。病区有人把守，赵四小姐是当时唯一准许留在张身边的非医护人员。这些都是军方提出的要求，非接受不可。李宗恩在紧急时刻作了周密安排之后，就再也不过问此事。院中有人对这样兴师动众颇有非议，李宗恩说：“医生要创造条件，尽力抢救病人，其它的事就不是医生能够过问的了。”

在李宗恩的默许下，贵阳医学院的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搞些课外活动。例如：成立一个“阳明学社”，而且召集二三十位同学和贵阳师范学院的部分学生联合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的题目为:什么是最完美的大学训育方针？绝大多数发言者一致主张国民党应退出大学，大学应该是独立的，和政治、政党保持距离。后来有位发言的同学林敦英被捕，李宗恩又亲自出马，多方活动，并“以身家性命，力保林敦英”，才使林获释。但担保人必须保证把林羁留在学院内，不准外出活动。李宗恩把林敦英安排在生物教研室当实验员，为他创造了完成医科学业的条件。这位林敦英后来从事生化研究，成为一名药学家。由于当年被捕而又获释的这段历史，给他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灾难和致命打击。终于在十年动乱中，林敦英不堪受辱、投水自尽。

1957 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据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派他去协和医院“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李医生去了两次，回来汇报说：在批判李宗恩的时候，大家批判的重点是说，他要向党争夺‘三权’，其中包括人事调动权。

在听了李志绥的汇报后，毛泽东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三权是党的领导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来，党还领导什么？”，稍后又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人，共产

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得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 201~203 页）从此，李宗恩和另一位医生李克鸿二人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后被"放逐"到云南，任职于昆明医学院。由于心情抑郁，1962 年病逝于昆明。

【编者按：我们今天重新回味当年毛泽东那几句话，心情倍感沉重。

辛亥革命后，有位思想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100 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看来，这两句诗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就是为了消灭爱新觉罗氏一家一姓、专制独裁的家天下制度，建立"天下为公"的共和国。可是结果如何？换来的却不是真正的共和国，而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孙先生的理想仍然是"山在虚无缥缈间"。此后几十年，中共为了动员民众以夺取全国政权，也是以'建立共和国'相号召。但结果又复如何？不过是以'毛氏王朝'来代替'蒋家王朝'而已。'共和国'仍然只存在于善良人们的幻想中。原因何在？就是毛所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得这三权"。据说在 1989 年大镇压、大屠杀前夕，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花了几十万人头，才夺得这个政权；现在有人想要，那就请先拿人头来换"。瞧！毛、邓二人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天下是我们用武力打下来的，只能由我们来'坐天下'。他们的思维永远停留在'家天下'的范畴。在这种'家天下'思维里，天下是'我们的'，而且永远是'我们的'不允许其它人染指。全国人民千呼万唤、日夜盼望的社会转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至于那些'打天下'的后人们，理所当然地仍然保持这种'家天下'思维，不敢、也不愿实行社会转型。一来是害怕失去原来享受的大量特权，二来也是为了保住先辈们用'人头'换来的江山。否则，将有愧于列祖列宗吧？如此说来，近年来某些海内外的学者着文指望，到了第 N 代当权人物时有可能主动实现社会转型、学习蒋经国云云。这类预测，恐怕是一厢情愿罢了。】

一个由暴力，而不是由自由、正义和真理建筑起来的国家，

一个人们只能服从、驯服、被剥削的国家，个人不受尊重的国家，是不会胜利的。

——引自 19 世纪德国著名作家亨利希•曼《论佐拉》

第 11 单元　体坛名将

1、傅其芳：中国乒坛三杰之一 自缢身亡

傅其芳（1923-1968 年）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总教练，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和夺魁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与容国团、姜永宁并称为当代中国乒坛的三杰。

1953 年春天，傅其芳从香港回到中国大陆，贺龙（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特批其月薪为 200 元，在当时属于相当高的水平。1954 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傅其芳获乒乓球男子单打第三名，并与王传耀合作获男子双打第三名。1957 年 3 月在斯德哥尔摩第 24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获团体第三名，他是主力队员之一，他在团体分组赛中获全胜。傅其芳原是打削球的，到香港后转为进攻型，发球抢攻、滑板、放短球是他技术上的"三绝"。他精心钻研乒乓球技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创新。1957 年，有些运动员学习外国的打法失利，中国乒乓球正处在"十字路口"。如何走出困境，众说纷纭。傅其芳则明确提议：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打法。从 1958 年起，他开始担任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

1959 年 4 月 5 日，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在傅其芳的指导

下，22 岁的容国团一飞冲天，在德国多特蒙德第 25 届世乒赛上勇夺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捧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打开了中国乒乓球登上世界顶峰的大门。为此，世界体坛对中国也另眼相看。国际乒联决定，将 1961 年第 26 届世乒赛的举办地点选在中国的北京。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体育比赛。国家体委提前一年就从全国各地抽调精兵良将 108 人，在北京开始大规模集训，准备人才；傅其芳率领国家队日夜苦练，志在必得。1961 年 4 月 4 日，第 26 届北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万众瞩目中开幕了。特地为世乒赛新建的、能容纳 15000 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中共政要全都出席了开幕式。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北京，集中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中国男队凭借威力无穷的快攻打法，一路过关斩将，在半决赛中以 5∶1 横扫世界强队匈牙利，杀入决赛。决赛的对手是如日中天、气焰万丈、五次蝉联男团冠军的世界乒坛霸主日本队。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新发明的“魔法球”——弧圈上旋球，扬言要用这一新式武器打垮中国队，实现六连冠的梦想。谁知双方过招后，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居然不怕弧圈球！他们刁钻古怪的“魔法球”没起什么作用，中国人疾如闪电的快攻却大发神威，速度之快常常令他们措手不及，顾此失彼。

日本人大惑不解：这种一碰就飞、又飘又转的怪球，曾将欧洲强队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怎么在中国人身上却失灵了？

他们哪里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队足智多谋的总教练傅其芳，早就作好了对付他们的准备。

原来，第 26 届世乒赛前，傅其芳得悉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使欧洲人谈“弧”色变。咱们中国队谁也没见过弧圈球，更谈不到如何对付。傅其芳一面设法从日本媒体的相关体育报导中寻找蛛丝马迹，一面通过同日本队关系很熟的香港乒坛老朋友“刺探军情”。然后让几名经验丰富的老将模仿弧圈球的打法，让主力队员逐渐适应。这种“陪练”方法后来成了中国队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不久，日本队去香港热身，傅其芳又不失时机，派庄家富教练到香港去进行火线侦察，带回第一手情报……

通过精心的分析研究和刻苦的模仿试验，中国队员终于对弧圈球摸到了门道，制定了以“快”制“弧”的方案。傅其芳仍然十分低调，不露声色，任凭日本队去渲染、鼓噪。

最后，当容国团经过激战击败弧圈高手星野，中国队终于以 5∶3 击败世界乒坛“天皇”，第一次把代表世界乒乓球运动最高奖项的斯韦思林杯高高举起时，整个中国沸腾了！全世界惊奇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中国运动员身上。

接着，庄则栋和邱钟惠相继将男单、女单奖杯收入囊中，加上 4 项亚军、8 项第三名，中国乒乓球队在第 26 届世乒赛上一鸣惊人，世界为之震惊。

没有什么比赛能像第 26 届世乒赛那样对中国体坛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傅其芳率领的中国乒坛健儿所展示的风采，使全国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成了乒乓球迷。人们见面谈的是乒乓球，学校里最普及的运动是乒乓球，最耀眼的明星是乒乓球运动员……

当时正值困难年代，乒乓健儿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也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第 26 届世乒赛上失去五连冠宝座的日本队，发誓要重新夺回斯韦思林杯。他们积蓄力量，等待与中国队进行决战。1963 年 4 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 27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拉开了战幕。几番激战后，中日两队在男团决赛中再次狭路相逢。

日本队教练刚拿到决赛的排阵名单时，不禁傻了眼。赛前，他预料中国队必将安排实力最强、有“小老虎”之称的庄则栋打第一主力。而日本队的头号选手荻村因在上一届决赛中被庄则栋以 2∶0 击败，从心理上畏惧庄则栋，所以排阵时让荻村避开庄则栋，先与张燮林对阵。谁知中国队教练傅其芳棋高一着，他摸准了日本教练的心态，出其不意，偏偏把庄则栋排到第三号位置，而让“秘密武器”张燮林出任头号主力。这个阵容使日本队还未开战先

输谋略，导致阵脚大乱。

谁都知道，乒乓球的技巧多种多样，打法五花八门，选手之间往往有“相克”的现象，就像“石头、剪刀、布”的关系。教练的用兵排阵、斗智斗勇，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再说张燮林，为什么说他是“秘密武器”呢？因为他曾经在上届世乒赛的单打赛中，以变幻莫测的削球淘汰过日本选手。此后，他就被傅其芳当作“秘密武器”雪藏起来。访日不去，日本队来访也不上场，就是为了在此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果然，张燮林施展神削的绝技，接连削掉日本队的三木和木村两员大将。

中国队一鼓作气，最后以 5∶1 大败日本队。

傅其芳知己知彼，用兵如神，中国队高奏凯歌，再度捧回斯韦思林杯。

在第 27 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囊括男子项目全部锦标，共获得三金、两银、两铜。

1965 年 4 月，在原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第 28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傅其芳又带领中国队第三次蝉联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冠军；他还配合已经当上女队教练的容国团，首次攻下分量很重的女子团体冠军。神勇的中国队总共揽得五金、四银、七铜，取得了参加世乒赛以来的空前大丰收，使原来怀疑中国人夺魁只是如流星一样、瞬间即逝的论调一扫而空。可以说，傅其芳、容国团这一代人创造的业绩，不仅是乒坛的辉煌，而且真正代表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标志。

可惜的是，正当中国乒乓球队挟“三连冠”之余威，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战两年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 29 届世乒赛，总教练傅其芳准备再接再厉、大展宏图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暴发了。国家体委瘫痪了，乒乓队的训练也中断了。造反派造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反”，中国队被迫滞留国内，无法参赛。傅其芳则被扣上“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不幸于 1968 年 4 月 16 日自缢身亡、含冤去世。

为了缅怀这三位乒坛英杰，由中国乒协牵头，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后加入澳门）等五地乒协发起，每年轮流举办“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三英杯”赛发起人是当年应贺龙元帅之邀，从澳门回到内地的王锡添。据乒坛名宿张燮林介绍，王锡添当年是继容国团等三名香港青年之后从澳门来到北京的。“文革”期间，他同样遭到了迫害，但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虽然他从国家队被下放到了什刹海业余体校当教练，但他仍毫无怨言地默默耕耘，并培养出了王涛这样的世界冠军。1985 年，王锡添建议举办“三英杯”赛，以缅怀当年与他同时回到内地的三位英杰。王锡添的提议得到了当时国家体委的支持，并正式批准于当年创办该项赛事。王锡添老人虽然已于数年前身患癌症去世，然而他发起的“三英杯”将继续在我国 5 省市及地区轮流举办下去。

在担任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期间，傅其芳探索出一条近台快攻的路子，培养出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名闻遐迩的世界级乒坛名将。因此 1961 年、1963 年，两次被中国国家体委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 年起，他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一职，同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优秀乒乓球教练员，傅其芳强调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他提出的“练为战，不为看”的原则已成为我国乒乓球队的优良传统。他注重研究，曾与我国第一位乒乓球教练、著名的乒乓球专家梁焯辉合着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一书。他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所做的贡献必将彪炳史册。

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

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薪金。

——孟德斯鸠

2、姜永宁：乒坛健将自缢身亡

姜永宁(1927～1968 年)广东省番禺县人。1952 年获香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后，即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获男子单打冠军，并成为国家队队员。此后，他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乒乓球比赛，均获得好成绩。1954 年，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三名；1955 年，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友谊联欢节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于 1956 年荣获中国乒乓球运动健将的称号。他曾代表中国队先后参加过第 20 届、2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表现出色。特别在 23 届乒乓球比赛中，中国男队与美国、南朝鲜、南越等队比赛时，姜每场都是连胜三局，被国际乒联评为世界十佳运动员之一。

姜永宁球艺独特，他是中国式直拍削球防守型选手，特别是步法敏捷，削球稳健，动作准确，比赛时斗志顽强，每球必争，素有“拼命三郎”之称。

削球技术的特点是把对方攻过来的球，稳稳地削回去，一个比一个削得更近网，使对方越打越费力，逐渐产生急躁情绪而失误。往往一个球要打上十几个、二十几个回合。当对手放小球时，只见他一个箭步冲向球台一个快攻打得对手措手不及。这种以守代攻、以柔克刚的打法，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开创了‘以削为主’的球技之先河。

1957 年至 1965 年，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后担任北京队总教练。60 年代初退役，任国家女队教练，培养出许多优秀运动员。还曾受国际乒联委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任教。

姜永宁为人诚恳、老实、厚道，从不与人争执。生活方面更是非常刻苦，但对各项工作任务则干劲十足，十分执着。这些优点在国家体委内部早已有口皆碑。即使担任教练期间，也堪称表率。60 年代中期，他已经 40 岁了，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先农坛，每天五点半准时起床，六点半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每天训练下来，已是疲惫不堪，但他仍然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遍。”他沉默寡言，但内心却非常热情，待人和善。观众来信向他询问球技，他有信必覆；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花钱买来后认认真真地钉在木箱内寄出。

1968 年春，文革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殃及许多无辜。姜永宁自然也无法幸免。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体育馆，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一下惊呆了。当晚回到家中，他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这位打球向来泼辣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她说：“让他们写去，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

其实事情的起因非常可笑：

姜永宁为人向来小心谨慎。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往事足可为证：有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由此可见一斑。尤其在‘文革’大潮中，更生怕惹事。他仔细反思，是不是说错过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于是，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文字的东西。他把所有带文字的纸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妻子孙梅英开门让空气对流一下，哪料隔墙有耳，却被邻居汇报上去，又添了一条“销赃灭迹”的罪状，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紧逼！

1968 年 5 月 10 日下午 5 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从先农坛出发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在姜永宁家中乱抄一气，并拿走了一包照片。从那一包照片里，专案人员发现姜永宁少年时代拍的一张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专案人员如获至宝。他们逼迫姜

永宁承认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专案人员根本不予理睬，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

5 月 16 日清晨，在先农坛和他一起被专政的王锡添看着姜永宁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他不敢说挨打了。在先农坛宿舍楼，队员们都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寻找。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着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才发现姜永宁已经吊死在窗口，早已断了气……

姜永宁去世后，妻子孙梅英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这位 50 年代中国最出色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陷入了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不久，周恩来问起孙梅英的情况，国家体委军宣队的人回答：“她还有问题。”周恩来说：“她一个学生出身的运动员能有什么问题？”这才使得孙梅英彻底摆脱了被审查的境遇。1993 年孙梅英因脑溢血猝然去世。

3、容国团：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自缢身亡

容国团（1937 年－1968 年）杰出的乒乓球运动员，出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

容国团从小喜爱乒乓球运动。十五岁时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7 年他刚满 20 岁，怀着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毅然回到中国大陆，即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 年被选入广东省乒乓球队，首次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就获得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为国家集训队队员。他采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而且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他运用的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技术，就是在总结了他的经验后，由原来的“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最后加上这个‘变’字意义非凡。因为多变，使对手无法设防，难以适应，十分被动。而自己则处于主动地位，稳操胜券。

1959 年在第 2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在落后一局的不利形势下，容国团奇迹般地连扳三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被掀开了！他的对手匈牙利老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容国团，这个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被镌刻在圣•勃莱德杯上。1961 年在第 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面临 3∶4 失利的情况。容国团振奋精神、激昂慷慨地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于是精神抖擞，挥拍上阵，力挫素有“凶猛雄狮”之称的日本队员星野，以 5∶3 战胜日本队而首次问鼎斯韦思林杯，从而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从此“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名言便广为流传，成为激励运动员以及各行各业有志之士发愤图强、力争上游的座右铭。

1964 年，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在他和其它教练员的配合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 28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容国团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火相传，直到今天仍然光耀世界乒乓球坛。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不断地缅怀这位乒坛老将。

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于 1958 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 年、1961 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就是这样一位曾经为祖国体育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乒坛闯将，却不幸死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容国团即遭受诬陷，被扣上“特务嫌疑”等帽子。一颗善良而又正直的心灵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冤屈？从此，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甚至成了他的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罪恶的渊薮；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被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国家体委领导人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同是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宁，竟被逼得悬梁自尽；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经常为这些领导人和许多昔日的战友遭受不白之冤而伤心落泪，然而却又无可奈何、忧心如焚。

然而，“人生能有几次搏”，这个经典箴言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人！也成为他一贯信奉的信条。今天，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在所不惜。1968 年 5 月初，面对邪恶势力，受战友们的委托，他奋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最为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

【编者按：由于极左势力的干扰，中国当局决定不参加 1967 年举办的第 29 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第 30 届也未参加。】

容国团和他的战友们热切希望中共当局能理解他们的热血衷肠，他们盼啊盼着……1968 年 5 月 12 日，被称为《5.12 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该文件十分武断地认为：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痛心。有《5.12 通知》这个尚方宝剑，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人被点名批判，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被批斗者的种种错误，但他依然公正地评价自己的战友：“他们都是好人”。

自这一天起，容国团神情大变：沉默寡言，眼神中经常透露出凄婉、无奈。他似乎感到已经走进了毫无指望的绝境。他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家，而自己却被认为是掉进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怀疑成‘颠覆祖国的特务’。《5.12 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文件大概是永远不会错的真理吧？’他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理解形势的诡谲：过去的欢乐与今天的困境，过去的喜悦与今天的痛苦，如此巨大的落差，令他无法释怀。他终于离开家，走到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在月色下，不断地徘徊着。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压抑：成荫的柳树好似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更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晚上 9 点，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没有。11 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

“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凌晨四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

整个体委都震惊了。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一代球星，竟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非常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他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如此性格。

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围观的

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听到这是容国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叹息：“哎……天哪……”。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抗议了。他没有白白地死去，他留下了他浩气长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诉，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惨烈记录。

周恩来得知后极为震怒，他再一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几天以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容国团的死，才换来了众多战友的生。国家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容国团的死因未经详细调查，遗体在几天后火化。

【编者按：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确保护过一批知名人士（大知识分子、高级统战对象、著名艺术家、功勋运动员、与中共要员有特殊关系者……）。这些事迹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被认为是周的大功劳。却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这些举措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对中共自己有功，还是对于整个中国人民有益？其实，周这样做仅仅是从中共本身的利益出发，因为这些人将来还有用（发展科技事业、统战工作需要等等）。所以其出发点仍然离不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而不是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观念出发。难道说：知名人士应该保护，而普通民众就不需要保护，就可以任意折磨、蹂躏、摧残吗？当人们在颂扬其功德时，千万莫忘记进一步的思考：何功何德？】

但是极左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其家进行了再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死时恰好30岁，从拿到世界冠军之后仅仅9年……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着文回忆和容国团早年的交往时，颇为感慨地写道：“1989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覆没!30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成为乒乓球的王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到今天为止，整整30年。”抚今追昔，不胜唏嘘！张教授还回忆说：当时朋友们都力劝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因此，容国团决定北上大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编者按：当然这并不是张教授和朋友们的错，谁能够未卜先知，谁又能看透大陆极权制度的本质和凶险，以至于预测到大陆当局竟然如此迫害一个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乒坛老将？】

文章末尾，张教授无限感慨地写道：“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柔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还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

1987年11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50周年纪念会，规格甚为隆重。当局特地邀请容国团生前友好人士参会，这位张教授欣然赴会。期间见到容国团的遗孀和唯一的女儿，会后，三人相约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死的，张先生冲口而出：“写得不好!”。为什么如此掩盖真相呢？

真相并不会因为人为的掩盖而消失，相反，只能证明当年迫害他的势力仍然阴魂不散，或者心中有鬼、惧怕人们知道真相。

著名女作家张抗抗曾经写道：“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不会有‘明天’的”。为什么他们不敢认真’拷问’昨天？因为这些人对于‘昨天’所发生的一切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心中有鬼，他们害怕。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普利策

【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1911年），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

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

附录：青年才俊

1、遇罗克：人权思想家死在不讲人权的国度

【编者按：被收入本单元者都是青年人，当然算不上是“精英”人物。但他们的事迹证明：这些人肯定是未来的精英人物，是精英的幼苗。只是由于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暴行而过早地夭折了。其次，他们都不是自杀，而是被当局枪杀的。张闻天在庐山会议期间那篇著名的长篇讲话中说：“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错了！错就错在大前提。此话的大前提是：共产党永远是正确的、光荣的、伟大的，被这样的党杀头当然是要遗臭万年。但是，几十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共产党自己所谓的“伟、光、正”完全是虚构的宣传，是自我吹嘘。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党做了许多错事、蠢事、坏事，那么被这个党所杀害的青年人绝不会遗臭万年，恰恰相反，他们应该被纪念，而且一定会流芳千古。明朝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于慎行在其遗着中有句话说得很好：“是古人之所为辱，乃今之所为荣也，岂盛世所宜有哉！……夫使上之刑赏不足为荣辱，而士之荣辱制于下之毁誉，则国是将日非矣。”这段话说得非常到位，也非常切合我们所收录的这几位青年才俊，更值得中共当局认真反思和抉择：是继续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是非观、荣辱观，还是深入解放思想、顺应民意，转变价值判断标准呢？正因为如此，本书才把他们的事迹一一收入，留垂后世。】

遇罗克（1942 年——1970 年）出生于北京。自幼聪明好学，父亲遇崇基曾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王秋琳亦曾自费赴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父母1957 年均被打成“右派”，遇罗克高中毕业后，于 1959 年、1960 年先后两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秀，但仍未录取。为了从事社会实践，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 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县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在农村，遇罗克亲眼目睹“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更为残酷：一些地主的小孩子都被斗死，行凶者们用形象的语言表述为“连根拔”。1964 年，患严重神经衰弱的遇罗克回到城里。曾在小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从自己所受的不公，再扩展到整个社会，遇罗克通过观察和阅读大量书籍，并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于1966 年 7 月，写成了《出身论》。

文章首先揭露了当局赋予不同阶级以不同权利的事实，并进一步分析了根据血缘标准将社会区分为‘人民’和‘敌人’两个截然对立阶级的荒谬性。作者认为：个人权利不能因为其社会出身和其它外在因素而被否定或扭曲。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遇罗克还没有提出‘人权’这个概念，但在文章中所说的‘个人权利’实际上就是指代‘人权’一词。同时文章还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作者坚定地写道：“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文章在 1967 年 1 月 18 日《中学文革报》第 1 期上刊载。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购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因为《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整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所以在社会上引发极大的轰动。旅美华裔学者宋永毅先生认为：《出身论》是一份“黑暗王国中催人惊醒的人权宣言书”。这个评价是非常精当的。

此外，遇罗克批判的矛头所向，还直指那个善于迎合上意的金棍子姚文元。针对姚文元批吴晗的御用文章，遇罗克写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的继承》。文章先后投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当然不可能发表。但遇罗克仍然毫不气馁、坚毅而执着地继续写

了《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这次是寄给《文汇报》,结果总算是摘要刊登了大约 3000 字。事后他长舒一口气说：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1967 年初，许多‘老红卫兵’头头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其成员必须是 13 级以上高级干部的子弟。这些人大肆搞‘打、砸、抢、杀’等违法活动，十分猖狂。在‘联动’如此猖獗之时，又是这位惯于冲锋陷阵的遇罗克第一个写出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 3 期头条。

群众所喜爱的东西，却被自称“代表群众利益”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所不容。1967 年 4 月 17 日，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反动的。于是，1968 年 1 月 1 日，遇罗克被捕。1970 年 3 月 5 日，惨遭杀害。从逮捕到杀害，当局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的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借口。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

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一书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这可是震惊全国的天大罪名。但事实真相如何呢？1967 年夏天，《中学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恰逢长春车站向‘革命群众’发武器，遇罗克领到了一颗手榴弹，并带回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就想到香山去埋到地下。恰好被公安局发现。于是就被扣上‘暗杀’的罪名。暗杀谁呢？为了扩大‘罪行’的分量以耸动听闻，在“死刑判决书”上写着：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大罪，应该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吧？于是就加上：“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十分空洞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后判处遇罗克死刑。

遇罗克的不朽贡献在于：当“血统论”风行全国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了现在看来已成为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

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声中的最后审判，用诗的语言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1949 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神州大地上竟然出现了比西方种族歧视和印度种姓制度更黑暗、更残酷的人权歧视现象。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它同龄人同等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

人权歧视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在当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的纵容下，先是北京郊区大兴县，再是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受害者唯有听天由命，像弱小动物一般孤苦无告。在高举的屠刀下，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血腥的大屠杀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

遇罗克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这句话可谓经典式的名言，也成为遇罗克自己所实践的人生信条。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牢房里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

遇罗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值!”

历史终于翻过去沉重的一页。遇罗克死后 9 年，1979 年 11 月 21 日被宣告无罪。1980 年 9 月 21 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此后全国各种媒体纷纷刊载关于

遇罗克的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的称号，发给他父母的是遇罗克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官方不予承认‘烈士’称号，但民间却自发地、百倍地予以补偿了。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的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学者于建嵘曾陪同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前去参观。这位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于建嵘：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这一问，令于建嵘无限感慨。为此，他撰写文章《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学者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的理论；另一种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敢于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他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却是生命。

2、林昭：宁为玉碎浩气长存

林昭（1932—1968年）原名彭令昭，林昭乃其笔名。苏州人，其父彭国彦曾做过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很早就受到其舅舅的影响，思想左倾，并参与中共夺权的事业。大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处决。

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年幼的林昭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很大的敬仰和热情。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不顾母亲的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毅然投身革命。稍后，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这期间林昭深入工人群众中，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导。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转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同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并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的主编就是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则是林昭和张元勋。

1957年5月19日，为了响应毛泽东的鸣放号召，张元勋等同学联名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右派刊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什么话？》,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右派分子的狂潮。林昭在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当然地被划为右派。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态度恶劣”、“负隅顽抗”而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共青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曾勇敢地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他们的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因此，林昭和另外两位也同时进入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

1958年6月起，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在此期间，林昭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了爱情，并提出结婚申请。但学校当局批评他们谈

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结婚。

1959 年 9 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

1960 年春，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当林昭病情渐有好转时，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和兰大学生张春元等人，共同酝酿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不久，《星火》杂志的全体人员都被捕。1960 年 10 月，林昭也被逮捕入狱。

1962 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保外就医期间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手稿带到海外发表。

1962 年 12 月，林昭被收监。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先后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有二十万字之多），内容是控诉中国当局的对她残酷政治迫害，表达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坚定信念和坚定意志。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监狱里的那套规矩，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更残酷的虐待。

1965 年 3 月 23 日，林昭开始写作《告人类》。

1965 年 5 月 31 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

1965 年下半年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6 年 5 月 6 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

1968 年 4 月 29 日，林昭接到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 36 岁。5 月 1 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向其母索取 5 分钱的子弹费。

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林昭的弟弟彭恩华，2004 年 8 月 3 日逝世于美国，享年 59 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现居美国。

1980 年 8 月 22 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 435 号判决书”，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林昭被平反后，在北大举行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此联绝妙：未着一字，内涵隽永；可谓‘无声胜有声’。

2004 年 4 月 22 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骨无存。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其舅许觉民有一本书叫《林昭，不再被遗忘》，可时至今日，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殒灭的英灵？

林昭的墓碑，在苏州木渎镇灵岩山安息公墓，碑后有诗：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补白】

包括林昭在内，……只是出于本能的正义感，发表了当权者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更没有自己的自觉的“阶级立场”。

他们的真正“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为右派以后。也就是说，是反右运动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阶级自觉的反抗者。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们也可以说，专制体制发动的反右运动也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序•钱理群

3、沈元：史学天才难逃一死

沈元（1938--1970 年）浙江桐乡人，出生于上海。其父沈鹏，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生，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沈鹏就曾担任镇江县长。抗战时期又曾主持修建滇缅公路，担任铁路总工程师，后来因公殉职，其时沈元只有 7 岁。他的姑妈则是美籍科学家，也很有名气。1955 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1957 年沈元正在读大二时，就曾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加以评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斯大林问题的性质是“个人崇拜”。但沈元却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深层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上，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个观点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之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深刻的。

由于这件事情，沈元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期间又得了肝炎，但未得到及时的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伴随他短暂的一生。1961 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由于他在北大和在家闲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聘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给黎澍当助手。那些比较‘左’的调干生对此很不服气。质疑道：一个历史系没毕业的学生，还是右派，凭啥来中国最高级的研究机构任职？他们告状，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里。据说，由于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郭罗基的保护，才勉强维持下来。在近代史研究所期间，是沈元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许多著作先后在专业杂志上刊出。

从 1962－1964 年间沈曾在《历史研究》和《考古》两大全国权威性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中两篇转载在《人民日报》整幅版面上。后三篇鉴于舆论压力是用笔名发表的。其中一篇《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被一日本老史学家读后，以为是一老学者写的，钦佩万分。

1963 年第 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沈元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学术论文，2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篇幅转载此文，题目改为〈论洪秀全〉(即前文的压缩版）。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从未以如此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竟然获得如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据说郭沫若读了此文后，誉之为‘神童’；翦伯赞、黎澍则认为‘他是北大 50 年才出一个的人才’。沈元文章的冲击波从学术界扩展到政界。甚至得到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的说法。一时间，‘沈元道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也有了转机。

但所谓“转机”背后有杀机。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告状：沈元是右派，报刊以如此规格发表一个右派分子的文章，显然是公开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传开，反响强烈。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所要有 10 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形势所迫，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不久，沈元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署名为“张玉楼”，仍然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又一次全文转载。可有些人在得知沈元仍在用笔名发表文章后，又再次告状，仍然不依不饶。这次直接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按照当时的逻辑，‘脱帽右派’还是右派）。这封告状信落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手中，田打电话给黎澍说：“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要是让毛看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当面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

意！”黎澍回答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好几年，写不出一篇文章。沈元来了一年，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这些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这番话揭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树大招风，才高招忌。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黎澍必然首当其冲。罪名就是“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批斗黎澍时，一定要沈元陪斗。沈元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白专”道路的样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最初，他还能忍着不与亲友联系，怕更加连累他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打电话给他姐姐，她是他唯一最亲近、可以联络的亲人。说想要来她家避一避，这可把他姐吓坏了。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原已是被严格监控的对象，如果沈元一来，三人就会一起被抓进去。于是只得硬起心肠表示婉拒。沈元苦苦哀求也无效，最后只得在电话里说句：“好吧，那我走了！”。

他真的走了。他既然觉得在中国无望，就想跑到国外去。沈元瘦高、圆脸，头小。他根据自己的体型特点，心生一计：把自己的脸用鞋油涂黑，化装成黑人，跑到一个非洲国家的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也充分体现了沈元的智慧和聪明。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应该知道：‘文革’期间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友好的，怎么会收容一个友好国家的人来‘政治避难’？大使馆马上给外交部打了电话，把沈元带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按照‘叛国罪’被枪毙了。

1970 年 4 月，北京街头张贴了公安局的布告。内容是：沈元工作期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后来又化装成黑人，逃进某非洲国家大使馆被截获，犯了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又一次发生戏剧性的场景：到了刑场，人头马上就要落地之际，沈元突然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当其它处死者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沈元被押了回去。其实，他哪里有什么重大问题交代？他只是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所以死到临头，还在继续运用超人的智慧，以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多么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的生命，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的奇迹。然而奇迹没有出现，第二天仍然被押赴刑场。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延续自己那无限宝贵、只有一次的生命了。

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文革’过去，沈元的姐姐和 80 岁的老母赴京上访，要求复查平反。1980 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

“原审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 1968 年 9 月 1 日被逮捕…….1970 年 4 月 18 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 1970 年 4 月 18 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收到判决书的刹那，他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是啊，80 岁的老母要的不是那张已毫无意义的纸，而是要人，要活生生的、会思考、会说话的人。

人，是不可能复生了。但人们都在思考着：用什么更好的方式来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他的‘伯乐’——黎澍先生逝世前曾与朋友们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有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心怀对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元（人民币），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免遭淹没。该书出版时，沈元的表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先生为之作序。

一个人是生命可以有好几种衡量的指标：长度、高度、厚度。从长度来看，沈元仅仅活

了 32 年，可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是个遗憾。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生命的高度与厚度，却是非常了不起：大学刚刚毕业，就在全中国最高级的专业性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长篇大论，而且得到最具有权威的《人民日报》的青睐，特地破例为他提供版面，转载他的长文。半个多世纪以来，全中国能有几人？没有，只有他一个，他是唯一的，也就是不可复制的。当许多人都认为斯大林的问题在于‘个人崇拜’时，他却慧眼独具，看到了‘个人崇拜’背后、更深层次的病根所在。

沈元，我们时代的骄子，当代青年人的楷模。

可惜的是：中国少了一位具有无限潜力的、未来的历史学大家。

后记

当编者整理完最后一位被毁灭精英的资料时，已近午夜。万籁俱寂，但心潮难平，多日接触这类材料引发的愤怒情绪不能自己。想当初接手这个项目时，就感到是对自己精力、智力和体力的严峻考验，对晚年悠闲生活、慢节奏的一种挑战。人生苦短，年近耄耋，以老迈病弱之躯，能否顺利完成？心里没有十足的把握。深恐力不从心、半途而废。可是一想到那些屈死的亡灵，仍然被当局千方百计地掩盖、隐瞒，不为人知，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怒。作为一个略通文字、具有起码的良知的人，有责任献出自己一份光和热，为这些亡灵做些什么。编辑这本书正是对于那些冤死的亡灵一种真诚的纪念，一种迟到的安抚，也是为这些死难者及其家属将来追讨正义时必要的一环。曾经为中共政权夺得第一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金牌的容国团生前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那么，这本书的完成也可以算作是编者人生中的最后一搏吧！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材料大多来自网络。一方面，我们向有关作者表达由衷的谢意，以示不敢掠美。而另一方面，根据个人的年龄、精力及资料条件，都不可能对材料进行比对和核实，如有的材料存在时间、地点、人物及个别细节等不准确处，亦请亲属和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舍弃了几位死难精英的资料，未予收入。理由是这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不仅是分析经济形式，研究其它社会现象何尝不是如此？何谓‘抽象力’？就是排除一切其它因素，专门从单一的、纯粹的要素中分析事件的本质。马克思本人的巨著《资本论》就是恰当地运用‘抽象力’的成功典范。他在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时，不仅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甚至在第一卷中还排除了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过程，把关注的目光专门集中于生产过程，才能在深入分析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论证商品的二要素，从而为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而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天看来，这位先哲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结论当然可以继续探讨，但其在研究中的认真精神和科学态度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在借鉴马克思这一方法的前提下，对所搜集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甄别的过程中，发现有好几位精英人士，虽然也是死于‘文革’期间，但死亡的原因并非完全出于政治迫害，而是另有其它因素。例如：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某教授，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再加上政治上被批斗，以至于精神萎靡、悲观厌世。儿子又背叛他、揭发他和香港的某位女郎有不正当关系。这恐怕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由于多箭齐发，在心理承受力不足以抵御的情况下自杀了。又例如：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某教授，也是因为妻子琵琶别抱、改嫁他人（恰恰是嫁给他的老师，又同在一个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失颜面；再加上政治上又被批斗，里外夹攻，精神崩溃，只好一死了之。第三个例子是一位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坤伶，也是死于‘文革’期间，但其原因同样是政治迫害与夫妻感情破裂交织，使她感到生不如死，才毅然诀别

人间。最后再举一例：有位知名度非常高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被多次搬上银幕和荧屏，其故事情节几乎妇孺皆知）虽然也是死于‘文革’期间，但不是直接死于被迫害，而是由于他所参加的‘派’失宠，被得势的那一派打倒了，在关押期间跳楼自杀。这种情况就很难归入‘被毁灭’的名单中。以上几例，虽然死于‘文革’期间，也遭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迫害，但其直接的死因比较复杂，是多种因素交迫的结果。经过权衡，最终都未收入本书。

像这类人和事，虽然网上很多关于“文革期间死亡者名单”中都曾列入，但却很难把当事人的死因完全归罪于政治迫害，因此只得割爱。排除那些非政治原因造成的自杀事件，剩下来的就全部是政治迫害的恶果，是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牺牲品。这样，才具有无可争辩的、经得起质疑和辩难的说服力。

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又因为篇幅太大，无法容纳。不得不删略几位精英人物。

现将被删章节的标题列后：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件祭品——张霖之的死

开国上将阎红彦被逼猝死

“纠左”干将、青海省长汪昭之惨死

张学良之弟、海军少将张学思之死

海归学者王均惨死至今无法追究责任

海归化学家肖光琰一家三口同归于尽

海归的化学教授陈天池之惨死

选择在圆明园废墟上自缢的——陈祖东教授

我国早期的生化学家和营养学家——陈同度服毒自杀

反右运动中第一个自杀的科技精英——武兆发教授

长期默默无闻的曹亨闻死在文革中

上官云珠不堪羞辱愤而跳楼自杀

“《星火》案”首犯张春元被枪杀

在整理成书的过程中，为了慎重起见，曾将部分内容分别发送给几位朋友，请他们协助把关，并且得到他们的热情回应，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使本书得以避免许多错讹。他们是：某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w 先生、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 zh 女士、长期从事党史研究颇具心得的 x 先生等，特此致谢。古人云：“秀才人情一纸书”，无以为报，特地赠送本书一册，作为纪念。

被毁灭的各界人士多矣，我们只能选择精英人物来先做起。但就是这份被选入的精英名单，也是很不完备的。被遗漏者多有：就在本书稿杀青之时，编者又读到《五七动态》第四期第 31 页：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董坚毅 1952 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 年支持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1957 年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 年大批劳改和劳教人员饿死。11 月某日，董博士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在这里。死后数日，其妻顾晓颖（同为留美生）前来探望，得知丈夫死讯，痛哭一阵。后要求去丈夫的坟墓祭拜。才发现尸体早已被活人割肉吃掉，空余那颗肉少的头颅。当时当地，饥饿之状，可见一斑。真是惨绝人寰！

特录以闻。

本书参考书目

《三十万言书》胡风着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亲胡风》晓风、晓山、晓谷合着　春风文艺出版社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思》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狱》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死》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我所亲历的政治运动》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五七右派列传》（一、二卷）申渊编着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的夏季》朱正着　河南人民出版社
《禅机：苦难的祭坛》胡平着　广东旅游出版社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赵旭着　黑色文库第 23 集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着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反叛的御医》　开放杂志社编　新世纪出版社
《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着　书作坊出版
《50 年后重评‘反右’》丁抒主编　田园书屋出版
《“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上、下两册）　真相出版社
《北大精神五七绽放》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炎黄春秋》（北京出版）月刊
《随笔》（广州出版）双月刊
《往事微痕》（民办刊物、北京出版）月刊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文革死亡档案（1967—1968 年）杨英法整理